

五角大楼内幕

〔美〕蒂姆·韦纳著



東方出版社

导言全息文件箱

我的旅行开始了，我不仅穿过了五角大楼那没有尽头和光线柔和的长廊，而且跨进了中央情报局那漂亮的、由大理石装修的门槛；这次旅行是由于我到新泽西州坎登县政府办公楼下面一个黑暗的、由石头砌成的地下通道去散步而引起的，坎登是美国最贫穷最破落的城市之一。在这座办公楼的地下室内，保存着几千份有关房地产交易的档案材料，它们揭示了一桩桩罪恶的事实经过。

这些材料都是原始证据，表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住房规划完全为一些盗贼所控制。这个规划对穷人明抢暗盗，使贪得无厌的富人中饱私囊。浏览过这些案卷，我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问题，但还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其深度如何。所以，我去找了一个正派人，他在坎登县政府中处于最底层。

我发现他坐在一个脏乱不堪的房间内，在那里，该县存放着无数册过去的契约。这些文件的保管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叫德梅戴奥。他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档案资料，它们是一部尚未成书的、足以促使当地政治机构得以顺利运转的交易史。

当我告诉德梅戴奥我的发现，并请教他这些发现的意义时，他不停地抽着一支劣质香烟；他把背靠在木椅上，铁簧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他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以后，先看了看烟，又瞟了我一眼，稍有讨厌之意。

“听着，伙计，”他说：“你在这里会打开一个真正的全息文件箱。”

在你发现它们的地方，你会得到上天的启示。德梅戴奥那语无伦次的话提醒了我。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密封在钢盖下面的秘密世界；我要撬开那个箱子盖，要从中找到一条线索，看一看放在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全息文件。

又一次读完这些档案材料之后，我去敲开了一些人的门，发现操纵着联邦住房局的竟是一帮骗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卷曲在监狱中。我离开了坎登，我意识到了解政府活动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那些说明资金流向的文件，通过追踪钞票的运动过程，你就可能了解权力的作用。为了适应他们自身的需要，接受你采访的人们可能说谎，可能含糊其词，也可能遮遮掩掩，但正如律师们所说的，那些文件本身却是一清二楚的。

两年以后的1986年4月，我所在的报社派我到华盛顿去尽力打开另一只箱子，一只比前一个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的箱子。是年春，某种疯狂举动似乎正在华盛顿出现，气氛令人不安，人们有一种形势难以驾驭的感觉。我听说，对于议员们就五角大楼最昂贵的武器问题提出的质询，空军的将军们拒绝回答；我获悉，中央情报局长打电话威胁记者，要控告他们发表那些使他不快的文章；我还听说，总统的雇员们关于白宫在中美洲的活动问题，明目张胆地撒谎。然而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个神魂颠倒的海军陆战队成员，正在特古西加尔巴、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有关部门进行着一场有利可图的武器交易。

所有这些秘密、骗术以及盗用权力的勾当，都是由这些全息文件箱中最大的一个，即装满五角大楼黑预算的箱子产生的。

译者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前苏联在全球范围的激烈对抗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两极结构的基本框架。为了争夺霸权，前苏联在苦斗 40 多年之后终于一败涂地，分崩离析；美国虽自称“战胜”了苏联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自身也已经精疲力竭，大伤元气。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本书从若干侧面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本书作者系《费城问询报》驻华盛顿记者，他凭其职业的敏感性和有利的活动条件，以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及其下属各种秘密情报机构的秘密预算和秘密活动为线索，从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实施到第一架隐形轰炸机的问世；从美国积极准备第三、以致第四次世界大战到大规模生产和部署全球战略控制系统和热核武器；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到美国为与其对抗而在全世界组织向阿富汗抵抗力量秘密运送武器的地下运输线；从伊朗门事件到美国政府为抵制苏联在拉丁美洲“渗透”而颠覆一系列合法国家政府的阴谋、以及美苏双方在其他一连串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明争暗斗，生动地描绘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两极对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揭露了所谓美国“民主”的虚伪性。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在新形势下的世界战略走向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我们希望本书在这个方面也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1992 年 12 月

五角大楼内幕

第一编 秘密武器

第一章 黑预算

黑预算是总统的秘密金库，它用以为总统、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企图逃避公众监督的各种项目提供资金，它用以支付为进行冷战和第三次以及第四次世界大战而研制的武器费用。这些钱均不入帐，在政府的分类帐上亦被抹去；它为其支付的那些秘密武器、秘密战争和秘密政策，都未经公众讨论。

这种黑预算开始于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项目，即曼哈顿计划；随着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它变成了政府永久性预算的一部分。

在五角大楼的分类帐目上，用以经营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款项是隐蔽的；用以支付另外两个更大得多的情报组织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的费用也是如此，前者负责窃听全世界的电讯来往，后者负责操纵间谍卫星。国家侦察局的活动高度保密，甚至国会发言或任何非保密性政府文件，都不得提及它的名字。

在八十年代开始时，某些新情况使这种黑预算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于保密问题而备受困扰的政府，开始对许多最昂贵的武器费用进行掩盖，以曾经用于维护间谍任务的外衣更深一层地隐瞒这些费用；以此为掩护，黑预算开始膨胀。到 1989 年里根政府届满时，该预算达到每年 360 亿美元，比联邦政府的交通或农业预算还多，是教育部经费的 2 倍，比环境保护局的支出多 8 倍；除了苏联以外，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军事预算都多。

这种隐蔽的预算，都被封存在五角大楼存放分类帐目的那些隐蔽的，而且是相互隔开的小储藏室中。按照设计，周围院墙是根本挖不透的；五角大楼掌握着这些预算的钥匙，并且只复印很少几份。这些机密帐目被称之为“特别手段项目”，意思是，你必须拿到保密安全密码出入证，才可能知道其中一种帐目。关于这种项目的帐目，人们比较熟悉的称谓是黑项目，“黑”是间谍领域的词汇，它意味着暗地里、不被察觉以及避光藏匿。这些项目都是黑活动，属于“黑袋职业。”1986 年我被委派到华盛顿去，就是要追踪消失于这些黑预算中的资金，以及看一看用这些钱购买了什么东西；我只能从一个地方起步：一行一行地阅读五角大楼的预算。

每年 1 月份，五角大楼把他的帐目粗制滥造一番，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用硬皮纸包装捆扎，盖上国防部的印章、一个抓着 3 支箭的展翅之鹰，最后用船运到国会。这是一种用于公共消费的军事预算，仅仅就该预算最下面一行的数字大小而论，它也是一套令人吃惊的文件。在里根总统任内，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3000 亿美元，或者说每天 10 亿美元，如果不计星期天和节假日的话。

围绕这一笔巨款、世界上最大一笔公共资本，每年春天都要进行一次例行舞会。来自五角大楼的陆海空将军们，穿过波托马克河，成群结队地进入国会；他们向国会作证说，最新式的核导弹，核轰炸机，核潜艇或空间卫星，对于保卫美国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议

员们很清楚，大约 200 万个职业就来自这笔不断膨胀的巨款；他们自己的职位部分地也取决于他们把这笔钱流入自己家乡地区的能力。因此，当某些议员还站在照相机前，报怨五角大楼挥霍无度时，多数人已经回到自己的席位，去为他们家乡的军事承包商们批准另外 10 亿美元的预算了。那些显赫的承包商们生产武器，在爱国报纸的广告中展示武器，发表令人印象深刻

的利润报告，同时，也为对于向国会作证已经腻烦的五角大楼官员们提供上等职业。五角大楼开支的公开面目就是反反复复地演奏这组回旋曲。

我知道这种面目是一副假面；五角大楼提交国会的预算是一份被掩盖的报告。

我开始搜集八十年代五角大楼历年的预算，包括它提交国会用以说明其支出的帐目简编，以及陆海空将军们向武装部队委员会所作报告的铅印材料。我桌子周围越来越多的大量公开文件，是美国政府公开性的一个证据，但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却不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帐目；在我查阅这些帐目时，发现几百个项目均以密码代号为掩护，它们的费用被抹去，它们的目的被隐瞒，应该用事实和数字表示的地方，却是暗语和空白。

我必须尽力吃透这种预算，分析一下哪些暗语可以解释，把意思完全加上去，这是进入这个黑暗世界，这个核武器和鬼怪幽灵世界的唯一道路。

由这种黑预算提供资金的某些项目可能是讲得过去的，如果政府对此进行解释的话，但有些项目却不然。对于用 200 亿美元设计一个进行 6 个月核战争的军用卫星系统，人们可能表示怀疑；对于花费 600 亿美元以上的巨款，去生产一种要停放在机库中积满灰尘，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才使用的新型核轰炸机，有些人可能也看不到其逻辑必然性。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那些核战技术，被称之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体系（MILSTAR），以及隐形轰炸机（Stealth），这些都是寻求核优势的新式武器。

此后，我研究了 3 种黑活动：中央情报局对阿富汗的秘密武器供应线，阿富汗新的准武装部队的建立，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军火走私的勾当，这些使命都是高尚道义原则的必然结果，都是由于精神涣散、金融崩溃以及政治混乱而开始的。还有，对于航行半个世界，把价值 5 亿美元的武器运送给崇拜已故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谋杀突击队这类常识性问题，也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对于美国军事官员们不顾他们宣誓要维护的宪法而秘密支付几十亿美元，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表示气愤。当我自己亲眼看到一种其公款被秘密支出的制度时，我也开始对这种制度本身以及维系着它的秘密状态提出了疑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制造核武器和采取隐蔽行动，已把其权力的阴影投向整个世界，任何一个看过报纸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它们的费用和组成部分，却基本上为这种黑预算所掩盖了。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秘密武器。我没有看到过五角大楼如何在轰炸机、导弹或空间卫星的价格单上打上“绝密”的字样。对于那些奇特技术或最先进设计的具体分类，我还是可以弄懂的，尽管我不了解这些武器的成本。我想，秘密地为重武器拨款是与美国民主的本质相违背的。

在五角大楼于 1990 年 1 月提交给国会的 1991 年度预算中，有 3 页开列的是空军的战略武器研究项目。“战略”是一个军用的委婉术语，它意味着进行针对苏联的核战争。在这 3 页上有 11 个很大的黑项目，都由于是军事秘密而被删去，它们的费用也因此而被从黑预算中一笔勾销。不过，把这一部分中非保密项目的费用加起来是 14 亿 1 千万美元，如果从这些战略武器清单上最下面一行的 42 亿 6 千万美元中减去前一个数字，即使三年级小学生也可以看出，这 11 个研究项目的费用达 28 亿 5 千万美元。如果进行一些比较，即可知道整个国务院的费用大致有多少了。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这些核战项目之中的 8 个都已经被掩盖起来，我确实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项目，如果我知道，我就可能被指控犯泄

密罪了。但是，其中有 4 个的密码名称是：奥林匹克（OLYMPIC），贝尔·韦瑟（Bell WEATHER），子午圈（ME—RIDIAN）和伯尼（BERNIE）。另外 4 个的名称驴唇不对马嘴，毫无意义：特殊分析活动（Special Analysis Activlties），特殊应用项目（special Applications prograin），特殊评估项目（Special Evalua-tion Program）和先进战略项目（Asvanded Stratigic Programs），听起来更象是研究生计算课程。所有这些项目都是为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没有任何说明，令人难以理解。

我可以更多他讲一讲其余 3 个项目：隐形轰炸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以及新式巡航导弹（Advanced Cruise Missile）。按照国会决定，有关这几个项目的某些财务方面的情况，首次在五角大楼 1991 年的预算中公布出来，它们的实际费用在 10 年之内仍属国家机密。

隐形轰炸机是这种黑预算的完美象征，它是一种费用极高，而且据说是难以发现的武器。据空军人士称，这种轰炸机的能够吸收雷达波的表皮和飞镖式的光滑外形，几乎使它难以为敌人发现。它的使命是特殊的：避开苏联的空中防御，向苏联的活动导弹体系投掷核炸弹，以及消灭躲进地堡中的苏联领导集团。

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曾经制造过的最昂贵的飞机，是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价格最高的一种秘密武器。今天，最恰如其分的猜测认为，每一架这种飞机的费用不低于 8 亿 2 千万美元，仅稍少于用 70 吨纯金制造十架飞机的价格。截止 1990 年 5 月，五角大楼还要制造 75 架这样的轰炸机，耗资将达 615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一年的预算，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一年的销售额还高。几乎可以肯定，隐形轰炸机只有在激烈的核大战爆发时才可能投入战斗，因为它的费用太高了。

如果这种战争爆发，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帮助进行战争。据悉，这种系统大约价值 200 亿美元，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空间卫星项目。据说，它是核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大脑，可用于控制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有报导说，这种系统灵敏度高，力量强，足以在 6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核战期间播出发射命令和协调战斗计划，并在此后随时准备打第四次世界大战。

隐形轰炸机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有一个共同目标：赢得一次较长时期的核战争。我知道，关于美国为取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必备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核火力，五角大楼的许多著名战略家们都已谈得很多。我一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其目的在于吓唬苏联人的战争叫器，然而我逐渐明白，黑预算中的计划已经想到了胜利，它们要求赢得一场在国家的大城市遭到破坏，在军事指挥机构被毁灭之后还可能继续很久的核战争。按照这些计划，将由计算机进行一场人脑无法控制的战争，由机器人组成的军队在充满放射性物质的战场上昂首阔步，将军们坐在进行过特殊防护处理的卡车上奔驰于州与州之间，指令从遥远的地下武库中发射弹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是一种计算机化的首席指挥官，它控制着这种使全球毁灭的交响曲。五角大楼要赢得战争的叫喊，已经转化为无数黑美元，被秘密地支付于轰炸机、导弹、卫星、莫名其妙的复合碳化物、硅片、微型电路以及计算机密码，所有这一切的费用极高，技术精湛，但在空袭的警报开始吼叫之前又毫无用处。苏联军界也了解这些计划，他们也有类似的、尽管是不太完善的谋略。很少有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制定了这些计划，他们正在为此而付出代

价。

空军预算中的第三种战略武器是新式巡航导弹，或称 ACM，这是一种用秘密技术加强的核弹头，细长约 20 英尺。它是一种稀有导弹，是首先被部分降低保密等级的黑武器，归政府机构即独立为国会开展审计活动的总审计局监管。审计人员的结论认为，制造这种新式巡航导弹要花去 70 亿美元。

关于新式巡航导弹问题，已经公开的款项和物资全部记在《国会记录》上。正象对任何秘密武器的讨论一样，公开这个问题的范围也只是在国会内部。1988 年，众院军事委员主席莱斯·阿斯平，曾力图归总一下与里根政府用 1/4 万亿美元制造核武器有关的主要项目的公开报导。他对其同僚们也只讲了一点点他可能提供的内容：委员会的多数报告都已经公开发表，关于新式巡航导弹的报告是个例外。这个报告已经提出，但是，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故仍然只能锁在委员会里比较安全的地方。

新式巡航导弹不是一个机密的黑项目，并没有人阻挡我去了解它的存在。我可以说出它的名字，但由于是高度机密，几乎它的所有令人感兴趣的具体细节都必须保密。只有一个引人注意而又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它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新式巡航导弹是委员会所看到的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项目……

为什么？鉴于保密，原因仍将是肤浅的，差不多是不存在的。

事实在于，新式巡航导弹并没有引起反响，五角大楼生产的以 10 亿美元计的毫无价值的武器，完全不可能造成震动。问题是，黑预算所引起的灾难通常都是秘密发生的，要使类似于新式巡航导弹这样的黑预算的细枝末节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能性极少。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和总审计局的弗兰克·康纳汉进行过一次长时间交谈。康纳汉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白发爱尔兰人，主管总审计局的国家安全科，负责对五角大楼批准的黑项目进行某些表面的审计工作。他是极少数有权力看到某些黑项目内幕的公民之一。

从 1981—1985 年，尽管五角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为黑武器的秘密拨款也增加了 8 倍，但无论是总审计局还是五角大楼的审计人员，均没有对这些秘密支出进行任何即使表面的监督。康纳汉说：“直到 1985 年，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把你所说的黑项目包括在工作范围之内”。总审计局是在历经 4 年多之后，直到里根政府终结之时，才开始逐步接触这个黑暗世界的。今天，第一次有 24 名审计人员被派去调查黑项目，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迄今还未能解决。

在五角大楼，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黑项目存在，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也没有任何人对这些项目作过记录。消耗这种黑拨款最多的是空军和海军，他们拒绝就他们已经开立的新的黑项目，向那些来自平民百姓的监督者发表意见。总审计局的大多数人都说有几千个特别手段项目，军队在八十年代开立有几百个未经审批的黑项目；文职官员对黑预算实施管理已经毫无意义。

康纳汉指出：“在缺乏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就会为所欲为。”

五角大楼争辩说，黑项目与非保密项目相比，管理得较好，效益较高，且不会容忍欺诈行为；康纳汉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他说：

“我看不出它们哪一点管理得比较好，我们在黑世界正象在其他项目

中一样，发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只不过这些问题保密的程度。”

即使暗地的和公开的军事订货合同的签定，都按照同一正直和统一的标准进行，超量的成本和公司犯罪活动也会秘密产生。我们一直被要求相信，在黑预算掩护下进行生产的防务承包商，从不会滥用保护他们的护身符；然而根据最大的黑承包商那些引人注目的合法金融史料，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可能更多。

请看一下它们的历史材料吧：1989年3月，贯犯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在和空军签定制造卫星合同时，由于犯行贿罪而被罚款550万美元；洛克希德公司的犯罪事实包括为行贿支付几百万美元；通用动力公司从五角大楼的开支中骗取2亿4千4百万美元；

通用电气公司在和国防部签定生产军用计算机，以及为空军生产核武器的合同时，两次犯欺骗罪；隐形轰炸机的最大转包商波音公司，为得到五角大楼绝密的计划文件而行贿，结果被罚款几百万美元。

在1990年初，隐形轰炸机的制造商诺思罗普公司，对于它的三四条严重罪行均供认不讳，并且，由于它在巡航导弹和喷气战斗机的测试结果方面对政府撒谎，还被罚款1700万美元。黑预算的承包商诺思罗普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1989年5月）；同时也概述于《特别手段项目：必须改变国防部的标准及其创设程序》，见美国总审计局编：《关于机密报告GAO/NSIAD-88-152的非保密性总结》（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印刷局，1988年5月）。奇公司，无一不在接受犯罪调查，它们均被指控为获得五角大楼的拨款计划而行贿。五角大楼自己的调查人员，也称这些公司的行为“阴险狡诈”，“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是“公司批准的”；不过，这种案件很难在法庭起诉，因为这些黑文件都是机密。

今天，还有100多个几百万美元和几十亿美元的武器系统正在秘密地建造着，它们包括的项目有诸如海军的A-12攻击机，以及陆军的以代号毛草叶（Grass Blade）命名的地空导弹）。

按照计划，诡秘的A—12飞机应在1990年底进行第一次试飞。海军要求制造620架这种飞机，费用达750亿美元。这个事实直到1990年1月还是秘密，当时，由于五角大楼偶然违犯安全规定，才导致在国会文件中公布了A—12的费用。国会内部几乎没人知道A—12的费用高达每架1亿2千万美元，是它计划取而代之的飞机的6倍。这个偶然发现，真犹如你妻子把你的信用卡收据翻看了一遍，并且用你的老式雪兰牌轿车换回了一辆美洲虎牌轿车，而没有对你打任何招呼一样。

没有人乐于谈论象毛草叶这样的项目。这种导弹的设计是为了用雷达和红外线自动导航系统去跟踪和消灭敌人的飞机和导弹，但是，它从没有发挥作用；1990年初，在经过12年试验和耗资了1亿5千万美元之后，这个秘密项目仍然以失败告终。在美国的武器库中还没有一枚可以使用的毛草叶导弹，然而，它依旧被列入五角大楼1991年的预算中，为它提供的资金以及它的失败情况仍然保密。

五角大楼的秘密武器就象是一座座没有窗子的建筑物，围在四周的栅栏上装有带尖的龟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在紧锁的大门后面值勤。要偷偷摸摸地制成武器，需要修建高度伪装的建筑物，以免被人偷听；仅隐形轰炸机的机库费用就高达16亿黑美元。在黑项目中寻求职业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都必

须首先通过五角大楼长时间的安全审查：等待发放安全证件的时间平均要 8 个月。申请人在等待期间发全薪，却什磨也不生产，丢失的时间一年可能要折算几十亿美元。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开支，都要作为这个黑世界业务活动的费用，秘密地向纳税人征收。

这种秘密系统的巨额费用令我迷惑不解：五角大楼有什么权力和理由这样秘密地动用公款呢？有一次，我曾经找机会问过法人律师卡斯珀·温伯格，他作为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应该为这种黑预算的极大膨胀承担责任。温伯格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 1988 年和 1989 年五角大楼的预算，这种招待会可能并不是刨根问底的最好场合，不过，也还是一个向这位负责人提出问题的机会。我问道：黑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快？有什么理由确定如此大量武器的费用为机密？

温伯格眯起眼睛环视了一下他的讲坛，用非常生气的口吻说：“我们相信，不公开这种资金对于我们是比较好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给敌人提供更多情报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前提。”说得妙极了，按照温伯格的分析，国会和公众也应包括在敌人的范围之内。五角大楼关于这些秘密支付的论点是这样的，公开这些项目的支出将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危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武器的费用，苏联人就可能推断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计划，以及我们的意图。这种推理给我的印象似乎非常不充分：如果你告诉我你花多少钱买了一张机票，我能够说出你要到何处去，或者你什么时间能到达吗？

我到华盛顿去进行报导的第一周是仔细调查预算情况，当我被介绍给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汤姆·艾姆莱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我的问题的另一种回答。在我所采访过的五角大楼内外的所有人中，还没有一个能够象这位灰白头发的空军财政分析家那样，非常简要地对问题进行了归纳。艾姆莱还是一个精干的武器设计工程师，曾帮助发展了极其有效的空对空响尾蛇导弹。他从事武器研究已有 38 年历史。在五角大楼内，他除了有充足的时间认识这个黑世界以外，对其他问题知之甚少，而在五角大楼之外，却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某些观点。

对艾姆莱的采访是我第一次到远离五角大楼内几个大厅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五角大楼的建筑式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由 5 个各五个面的同中心环形建筑群组成，每一个内环都包含着更高层次上的权力机构；这是一个严格按设计命令建造的混凝土堡垒。在五角大楼内，人们看到的是复杂迷宫似的走廊，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来苏味；还有按装密码锁的办公室门；监视着受限制的通道的武装警卫；以及令人难懂的缩写标志。艾姆莱帮助我走出了迷魂阵。当我们在五角大楼一个拥挤不堪的自助食堂里坐下来吃午饭时，我问他五角大楼如何评价它的秘密预算。艾姆莱拿起一块索尔兹伯里牛排后解释说，确定这些黑武器项目有 3 个基本原因：

“你所从事的活动确实应该是属于机密。这种活动只有少数几个，隐形轰炸机并非其中之一。

“你所从事的活动完全是一种愚蠢的活动，对此，你不想要人知道。

“你想打开一个钱包，弄到尽可能多的钞票，然而你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对此进行说明的。”

黑预算是不可能有什么帐目的。对五角大楼 1991 年的要求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察表明，有几十亿美元都用秘密作掩护，阻止公众进行讨论。

在海军用于战术研究，即研究短时间世界大战所需的某种武器的 61 亿美

元的预算中，有 30% 是黑预算。陆军 30 亿战术武器研究预算的 40% 是黑预算。空军用于情报和通讯研究的预算，有 95% 是黑的，还有 22 亿 6 千万美元公共基金中的 21 亿 6 千万，也被纳入了秘密项目之中，这是五角大楼黑预算中最黑的部分。

用这一笔物资所从事的活动，仅仅给一个代号：“项目构成号 0304111F—特殊活动”。一旦要进行说明，该项目号则表示，用于“特殊活动”的经费是为了给国家侦察局的研究提供资金。按照官方的说法，国家侦察局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信笺上端的各种文字都是保密的。它用作掩护的名字是空军航天系统局，位于五角大楼内两道上锁大门后面的 4C1053 房间。它负责建造和操纵对全球进行快速自动摄影的间谍卫星，特别是拍照五角大楼所确定的“被否定之领土”，例如苏联。国家侦察局在这一方面的紧急使命，目前正变得似乎烟云笼罩，因为苏联人正在向来自美国的每一个人，从科学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放他们的核武器工厂和前沿军事基地。

这些卫星还根据核战争进行的情况提供重要联络信息，帮助核战指挥者推敲和修订已经列出的目标，目前，这些目标包括苏联地图上的 15000 多个圆点。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卫星便可以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向隐形轰炸机飞行员传送照片信息资料，帮助他们确定空袭地点，消灭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通过冻土带运载苏联导弹的卡车与火车。苏联是一个大国，土地面积 865 万平方英里，各种道路和铁路密如蛛网，要击中活动导弹目标，这决

不是目前已知的人力或机器所能及的任务。五角大楼正在为此而努力。

国家侦察局要制造若干功能异常显著的卫星，它们极其昂贵，每颗要 10 亿以上的黑美元。制造这类卫星的工厂设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的高技术工厂城，那里的郊区不停地延伸，有成千上万人以在这种秘密项目中获得一种工作为生。我到那里去采访过一些制造情报卫星的工人，其中还有一个系统工程师，名叫马蒂·奥弗贝—布洛姆；他在位于辛尼维尔的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的空间系统部研究卫星情报程序。参与洛克希德黑卫星的研制工作，使马蒂对这种项目的效益表示怀疑。

马蒂说：“在黑项目中工作，人们不用担心钱不够。如果你需要，你就可以拿到，如果你工作抓得紧，需要更多的钱，你也会得到。你尽管往你的项目上流水似地花钱，直到完成为止。在这里，刺激因素不是一次完成任务，谁会去过问这种问题呢？”

要对你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提出质疑是困难的。我追踪了整个 80 年代五角大楼研究与发展项目的轨迹，发现越来越多的大笔资金消失了，就象群星消失在了太空的黑洞中。在 1986 年和 1989 年之间，有 50 多亿美元从前属于五角大楼公开项目的资金，都消失在了黑预算的苍茫太空中，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发展更新、更好的核武器系统和核战争技术。正象天文学家们通过计算黑洞的引力而认识了黑洞一样，我正在通过观察钞票的流失过程而认识这些黑预算。

我发现，黑预算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五角大楼秘密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增长得快，它在 80 年代增加 16 倍。在 1981 财政年度，它的拨款为 6 亿 2 千 6 百万美元，而 1990 财政年度则达到了 102 亿 7 千万美元。在 1991 财政年度的今天，五角大楼每一美元的研究拨款中，几乎有 25 美分都属于黑预算。

这一切预示着，90 年代在秘密武器方面的支出将极大地增加，因为象隐

形盗贼轰炸机和 A—12 攻击机这样的武器，将要从设计台进入生产流水线。研究与发展是强化国防的源泉，就如橡树是由橡子长出来的一样。五角大楼帐目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用于研究与开发某种武器的每一个美元，至少要求有 10 美元用于该武器的制造和操纵。黑武器的研究项目表明，它们比同类型的非保密项目要昂贵得多，因为它们的使命要求有复杂技术，因为它们对拨款的秘密使用不负责任。除非下达一系列使帐目完全公开的命令，改造五角大楼。否则，今天确定的 100 亿美元的黑研究预算，将预示着必须在今后几年为秘密发展的武器提供 10 倍于这个数目的拨款。——五角大楼秘密支出的费用，在它已经获得的预算即购买武器的拨款中，表现的最为清楚。开列于下面栏月中的每一项，都是以百万美元为标记的。1991 年的分类帐包括有诸如这样的项目：

有选择的活动： 5354.1 特别项目： 3101.8 其他生产费用： 491.5

这就是所有公开的、允许整个国会知道的 3 个黑项目，它们用去将近 90 亿美元。

用这些黑钱购买的某些武器，是为了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因为这里包含的很多资金，都被暗地里用于支付情报帝国的费用。这个王国的核心是中央情报局，它所支配的拨款被偷偷地用于“特别项目”。中央情报局是一个 40 年前就开始秘密花钱的机构，它一贯抵制外界的监督和控制在财政方面所玩弄的某些花招，教给了五角大楼预算办公室的金融家们。

这些已经得到的预算，加上用于研究与发展的预算，仅占五角大楼支出的大约 40%。空白支票以及用暗语表示的部分，在黑项目中至少占用 260 亿美元。还有五角大楼的其他开支，例如活动费和维修费，职员薪水和建筑费，在秘密资金中大约占 80 亿美元，差不多接近于我所追踪的结果。

在对五角大楼的预算经过差不多 4 年的剖析，以及和当前与过去的军官、议员、国会职工、五角大楼顾问、加上国防工厂工人们——所有这些人对黑项目有所了解，并希望给予某种具体讨论——的谈话之后，我发现，要使黑预算的数目确切到比上述最接近的统计更进一步是不可能的，任何局外人都没有希望知道这种黑预算的细节。五角大楼的非保密项目，似乎还对黑项目起掩盖作用，就象中国的大箱子里面套小箱子一样。例如，五角大楼有一个空中侦察支持项目，它实际上包含有 25 个保密项目，它们的费用是不可能搞清楚的。——

不过我可以肯定，这种黑预算在 1988 年和 1989 年大约达到了 60 亿美元的顶峰。在 1991 财政年度，按照五角大楼的要求，隐形轰炸机以及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费用被划归非保密范围，使这种黑预算降低到了 40 亿美元。

总之，在过去 3 年，每天差不多有 10 亿美元从财政部流出，经地下通道，秘密地进入了核导弹、核轰炸机、间谍卫星以及几百个其他秘密项目之中。这种黑预算是由每一个美国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平均大约 150 美元税收构成的，尽管五角大楼并不赋予任何公民以权力，去了解这些钱是如何支付的。为了纳税，你必须向政府说明你所得的每一个美元；而这个政府却不对你讲明有关这种黑预算的任何一点情况。

我已经领教的这种制度，与我在学校所受到的如何制定法律和如何如何

使用各种经费的教育，丝毫也联系不起来。我在小学就读过宪法，我在第一次仔细分析了黑预算之后又重读了宪法。宪法规定，政府必须公布它花我们钱的确切帐目；宪法的语言是一清二楚的：“必须不断地定期公布一切公款的收支报表和帐目”。“公布”意味着印刷出来公诸与众，“不断地”意味着每年要定期这样作。五角大楼的黑预算根本不符合这种标准，宪法所要求公布的帐目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公布。

在黑预算上升的时候，国会干什么去了呢？它玩忽职守。对于黑预算的大小和规模，多数国会议员都毫无所知。我曾经遇到过众院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些新成员，他们从未听说过有黑预算，只有少数资高历深的议员，对于五角大楼的秘密开支了解较多。国会对黑武器增长情况的第一次系统评价是在1986年4月，也就是我在华盛顿开始进行报导的那个月。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斯·阿斯平曾简明扼要地评论说，自1981年以来，黑武器的预算上升了80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大了，”他说，“如此大规模地向公众隐瞒防务预算是毫无理由的”。阿斯平评论说，问题不在于保护军事技术，而在于政府就自己如何支付公款隐瞒了基本情况，一些在民主体制下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基本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还未能公开展开争论。在国会内部讨论这个黑世界，也可能被认定是一种叛卖行为，没有哪一个议员乐于承担受责备或被开除的风险。还有一系列类似允许黑预算存在的国家安全法，也禁止就特殊武器或特殊美元，或为特殊动乱所支付的黑预算进行公开争论。里根政府曾要求强化这些法律，以使那些得到黑项目情报和公开这种情报的记者或政府官员，被定为严重叛国罪。一旦被定罪，这个叛徒就可能被行刑队开枪毙命。

在政府内部肯定有真正的机密，任何政府都不会公开的机密，象理查德·加温这样的人相信应该保守的机密。五十年代初，加温帮助发展了氢弹；他曾是总统顾问，在40多年内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防务顾问。我希望和这样的人交谈，帮助我在这个黑世界中保持方向。我打电话问他是如何考虑黑预算的增加的；他说，他知道五角大楼正在搞大量黑项目，其中很多而不是少数都有明确目标；不过，把这种机密抬得太高了；五角大楼为了保密而过分地隐瞒了公众。

加温说：“这些项目的扩散是非常有害的；保密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批评和评头论足，这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

在我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根本上反民主”这个术语不时地浮现在脑海。

我在国会大厅里穿来踱去，乞求与人们谈话并进行观察。这与我在坎登县政府办公大楼内进行调查时的情况，大体上没有什麼太多区别。钞票不间断地在消失，种种犯罪行为不停地出现；但并非每一个人都乐于谈及这些情况。

也有人愿意讲。我曾经和丹尼·斯密谈过，他是俄勒冈州共和党人，国会议员，一个退役的空军飞行员。他对军事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自称“廉价之鹰”，在防务问题上，他是一个有成本意识的保守派。他谈到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项目，似乎五角大楼正在使用一种新式武器。斯密说：“他们控制着国会应该得到和看到的一切，我作为议员不能够获得有关信息……他们不愿意我们打乱他们的预算。”

他停顿了一会，仔细选择其用词：“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他说，“在

军方选择武器的时候，它愿意接受文官的领导吗？”

这不只是谈谈而已，这是共和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在问，军方是不是会向文官统治屈服；向美国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有点奇怪。

我对黑预算了解得越多，这个问题似乎就越不奇怪。当我进一步剖析包含着几十亿看不见美元的一行又一行空白项目的时候，似乎有一台X射线机出现在了眼前，我开始看到了黑预算的骨骼和血管，以及更深一层的东西：支撑着这种秘密武器的遗传密码逐步显现出来了。秘密武器和秘密战争是这种黑预算产生的一种双螺旋形结构；砸开这个密码，你就会认识冷战的代价。

这种黑预算是从决定制造原子弹开始的。原子弹作为一种机密诞生了，不仅如此，它的种子还长成了一个秘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军事机密居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从广岛事件开始，军方就这类炸弹作出的有关秘密决策，形成了今天的黑预算。

第二章 斩尽杀绝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两个月的 1941 年 10 月 9 日，秘密金库已经开始膨胀，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意识到，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

罗斯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万尼瓦尔·布什向他解释了这种裂变可能释放出的力量；一个 25 磅重的原子弹，爆炸后可能产生 360 万磅甘油炸药的能量。这种炸弹可能是赢得此次世界大战的武器；第一个制成这种炸弹的国家将可能控制战后的世界。

罗斯福告诉布什，国家应该立即进行制造这种炸弹的研究，他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秘密的方式把它研制成功。这位总统说，他可以制订一项秘密储备基金的计划，作为“用于这种非寻常目标的特殊资源”。

当时的最佳猜想是，这种努力可能要耗费大约 1 亿美元。此后 4 年，21 亿 9 千万美元从财政部秘密流入了曼哈顿工程特区——制造原子弹项目的代号。用曼哈顿计划粗暴而直率的指挥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的话说，秘密支付如此大笔款项，需要某些“非正统”的方法，采取某些“非寻常的程序”；这些方法仍然对黑预算起着某种样板作用。

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用军事预算中的两个项目伪装起来的：“工程劳务：陆军”和“加快生产进度”；收付差额则打入其他战争拨款之中。格罗夫斯将军说：“压倒一切的保密需要”，要求我们“下决心努力控制与原子弹项目有关的一切情报，不使任何人得到”，特别是国会，它直到 1944 年 2 月，还依旧“对我们的任务完全一无所知”。

就在上个月内，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开始折腾起来，他领导着一个参院委员会，调查利用战争进行的投机活动。对于几十亿美元消失在他一无所知的秘密军事工厂中，他先是极感兴趣，而后则勃然大怒，立即指派其调查人员追踪这笔巨款的来龙去脉。他们终于进入了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军事迷魂阵中；曼哈顿计划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法律和语言，其公民的思想和言谈都属于机密；它的工厂已制造了大量秘密产品。

无论杜鲁门及其调查人员如何努力，他们都未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杜鲁门非常气愤地找到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杜鲁门要了解情况；陆军部长予以拒绝，说总统命令他确定这个问题为“绝密”，他决不能把有关情况告诉这位参议员。杜鲁门改变初衷，撤回了他的调查人员。

此时，格罗夫斯将军意识到，这样的完全保密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曼哈顿计划每天开支 200 万美元，“我们的支出太多，这个计划太庞大，不可能继续掩盖下去。”史汀生和格罗夫斯认为，应该告诉少数重要议员有关这种炸弹的某些情况，即使仅仅为了

保证这笔秘密资金的安全的话。1944 年 2 月 18 日，史汀生、布什和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来到了众议院议长的私人办公室。他们对有关情况的简单介绍，使议长萨姆·雷伯恩，众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科马克和少数党领袖约瑟夫·小马丁茫然不知所措。这 6 个人之间终于达成秘密谅解。议员们同意把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费用纳入陆军的预算中；只有雷伯恩知道掩盖这笔资金的具体方式；麦科马克和马丁负责使其同僚们保持沉默，不对此提出疑问。到 1944 年底，美国完全肯定地知道，纳粹还不可能生产这种炸弹。这种秘密武器是安全的，并没有被敌人掌握的危险。最初要求保密的理由—

——给希特勒以突然袭击——已不复存在，原子弹的构成成分铀 235 已经成为关键。

这种秘密终于开始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手段。极其有力的保密工作，致使一位总统在 16 年之后才看到军方制定的使用原子弹的计划；此时，核武器已经发展成为如此强大的力量，控制了它的制造者。

在曼哈顿计划的秘密实验室不断做出巨大努力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停止打听有关消息，他们想确切地知道如何或者是什么时候

候，或者是否使用原子弹。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 1944 年 9 月私下商定，这颗炸弹“在深思熟虑之后，也许用来对付日本人。”

这位总统并没有把这个审慎的决断告诉美国政府的任何人，他 1945 年 4 月 12 日把它带进了坟墓。

现在，这个秘密就要落在哈利·杜鲁门的手中了。前堪萨斯城选区的这位无名小卒，通过大城市政治老板们进行的拜占廷式的密谋策划，于前一年夏季当上了副总统，并且突然之间变成了总统。当杜鲁门宣誓就职的时候，巨大的权力一下子使他茫然无所措手足。当晚，内阁在白宫简短会晤；当内阁成员们一个又一个沉默寡言，鱼贯而出的时候，史汀生留了下来。是告诉杜鲁门有关原子弹问题的时候了。

这位陆军部长告诉新总统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制造“一种新的、其威力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物”——他再没有更多他说下去。杜鲁门回忆说：“那是当时他认为可以透露的全部内容；他的陈述使我困惑不解。”

12 天以后，杜鲁门打开了史汀生给他的一个便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应该就一个绝密问题和您谈一谈。

在您就职后我曾简单向您提起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考

虑到您所忍受的压力，我没有急于和您谈……我想，您应该了解这个秘密，不能够更长时间地拖下去了。

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将军在 4 月 25 日带着 24 页有关原子弹的报告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不耐烦地翻了一遍那个报告。格罗夫斯回忆说：“杜鲁门先生不喜欢看长篇报告。就这个项目的规模而论，这个报告并不算长……他经常在看报告时停下来，说，‘哎呀，我不喜欢看报告。’”

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些严肃的政治、军事和道德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在其当晚的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就目前世界道德成就的情况而论，这个世界……将最终为这种武器所左右；换句话说，现代文明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杜鲁门却从没有理解这些问题，正如格罗夫斯所说的，“他就象坐在平底雪橇上的一个小孩子，”因为此后 4 个月，正是这种炸弹的巨大引力把历史拉向了下坡路。

几十亿美元已经花光，原子弹的试验工作也已准备就绪；一旦成功，无疑将投入使用，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7 月 16 日午夜后几分钟，当隆隆雷声在新墨西哥州的不毛之地上滚动，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夜空的时候，罗斯阿拉莫斯的一批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为观察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而云集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上。这个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背诵了约翰·多恩的以“轰击我的心脏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开

头的 14 行诗、灵魂的轮回以后，给这次试验确定了一个代号：“三位一体” 。奥本海默的想法也许可以把诗与物理学，把原子的威力与神话的比喻联系起来。上午 5 时 30 分，当三位一体试验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亮光爆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使他产生一连串想法吧。奥本海默可能会想起那个讲述秘密与灾难的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的秘密吧；报复心极强的宙斯把潘多拉连同一只藏着无数灾难的盒子送到了地球上，这就是火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无尽的后患。

当天早晨太平洋海岸的黎明时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载着代号为“小家伙”的原子弹的构件，驶离了旧金山湾。该舰向西航行，目标是马里亚纳群岛和 B—29 轰炸机全体工作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小家伙”的去向是广岛。

这支军舰准备起锚之时，正是杜鲁门在柏林的碎石烂瓦上开始旅行之日，他等待着斯大林到来，参加盟国领导人的波茨坦会议。在一片废墟的大街上，幸存者盲无目的地游来逛去，他们的眼光茫然不知所措；饥饿的孩子们把死马撕碎了充作食物。

当晚在柏林，史汀生收到了报告“三位一体”获得成功的密电；

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助手哈维·邦迪，后者的儿子麦乔治和威廉在战后的世界上都抓到了大权。这位陆军部长转向老邦迪，长叹一声，松了一口气。他说：“好了！我一直在为这种原子事业所花去的 20 亿美元承担责任；现在既然成功了，我也就不会进利文沃

思堡监狱了。”

当天深夜，史汀生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颇感伤心：“他告诉我要把原子弹扔到日本人头上。哎！我听着，我并没有自愿提出给他以任何帮助，因为，我在欧洲的战斗已近尾声，但对我来说，这场战争毕竟还没有完全终结。而且，仅仅想到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令人沮丧……我反对这样干有两个理由：其一，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已没有必要用这样可怕的东西去打击他们。其二，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关于这个秘密，在场的少数几个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同意艾森豪威尔的忧虑，史汀生对这个将军非常生气。艾森豪威尔回忆说：“这位老先生暴跳如雷。我可以看出他会如何行动。争取如此大笔款项去发展这种炸弹，毕竟一直是他承担了责任，他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结论是投原子弹。责任由总统承担，但决定由军方作出。杜鲁门让军队进行裁决，他同意原子弹应该使用，但从未签发投掷原子弹的任何命令，或给予任何明确的口头批示。格罗夫斯将军正确地指出：总统的作用“是不干预，基本上是一个不打乱”军方已经制定的“现有方案的决定”。格罗夫斯在战争结束后很久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不需要总统按按钮。”

这种动量不只是军事的，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会促进这种秘密武器的发展。格罗夫斯将军说：“当我们把越来越大笔的款项投入这个计划的时候，政府也日益致力于这种炸弹的最后使用。”国家不可能在原子弹上花去大量财富，而后又把它放在架子上不用，赌博的刺激是必然存在的。

“我们为制造原子弹已支付了 20 亿美元，国会一定非常想知道我们花这些钱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精明强干的政治骗子，杜鲁门刚刚任命的国务

卿吉米·贝尔纳斯如是说：“你将如何得到国会为原子武器的研究拨款，如果你不显示出拨款的成就？”——

太平洋上的司令官们希望投掷原子弹而不事先警告，必须保守这个秘密直到它爆炸的一瞬间。这个秘密最终于8月6日在广岛向日本人揭示了，它的直接结果是7万1千人立即丧命，还有几千人则面临缓慢死亡的威胁。

杜鲁门总统在3周前他停留柏林时的日记上写道：“我们已经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可怕的炸弹，迄今所有发明中最令人恐惧的东西。”现在，当他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特号从欧洲返国的时候，一份急电交给了杜鲁门：“广岛已经被炸”。杜鲁门宣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在舰上游来走去，宣扬这则新闻。杜鲁门的一位知识最渊博的传记作家写道：“杜鲁门疯了，他说他对其曾经发表的任何消息都没有如此高兴过。”——人们发现他既恐慌又高兴，既在道德方面担心这种可怕的炸弹，同时又为它的巨大威力而欢欣。在那一瞬间，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火，且从没有想过去扑灭它。

第二颗原子弹“胖汉”（Fat Man）于8月9日落在了长崎，13万多人死于冲击波、大火和放射性物质。军方选择了这个目标，确定了时间，下了最后命令。杜鲁门在波茨坦曾告诉史汀生，他希望只需要一颗原子弹，但是，他又一次没有作出决定或确定政策。这个总统并没有考虑用这样的决定去摧毁长崎。杜鲁门在当天通过电台告诉全国听众：“我们发现了这种炸弹，并且投入了使用。”——

战争结束了，但从来也没有真正结束。胜利一经到来，军方就开始制定未来战争的计划。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广岛事件9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坚持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维护和保守原子弹的秘密。”他们要尽力保密，制造尽可能多的原子弹，并使其在物理学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达到尽可能强大的威力。从这个新时代的第一周开始，军方就在构造核未来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岛事件4星期之后，就制定了美国进行原子战争的第一个秘密方案，呼吁美国时刻准备着，“一旦必要就先发制人……只要发现侵略势力正在装扮起来对付我们。”尽管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此情此景，但这个先发制人的秘密计划确实是存在的。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赢得一场核战争。

美国已制定了新的战争计划，但却不了解其新的敌人，华盛顿对莫斯科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每一个人都知道斯大林是个杀人狂，也没有人对他对美国在欧盟国造成的威胁提出疑义，但是，他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性质却是个谜。苏联是一个由暴君领导的封闭堡垒，它的军事意图对于美国情报机构还是个谜。

苏联的秘密助长了美国的恐惧，由于缺乏实际根据，美国总统作了最坏的设想。美国领导人认为我们比苏联弱，即使在我们可能强大得多的时候。新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多估计了几百万苏联部队的力量。在战争中，苏联失去了两千万人的生命，750万士兵；他们的经济亦遭到破坏：有3万1千个工厂，4千万头牲畜，以及1/4的国家财产被纳粹摧毁。他们没有现代海军，没有远距离航行的空军，亦没有原子弹，他们直到1949年夏末才进行原子弹试验。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巨人。我们损失了不到30万军队，我们控制着全世

界 2/3 的资本；我们几乎垄断了一个遭破坏和被浩劫世界的技术、科学和工业；我们还有原子弹。但是，我们仍然担惊受怕。——

恐惧招来资金。1948 年初，五角大楼不停地为增加其来年预算而想方设法。陆军情报部门请求德国美占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帮助他们敦促国会更多的为军备拨款。3 月 5 日，克莱无视正常安全通讯渠道的规定，给华盛顿发了电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警告说，苏联人正在准备与美国进行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突如其来地爆发。”这次警告吓坏了杜鲁门，他问道：“俄国首先采取行动吗？由谁来扣扳机？尔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五角大楼在华盛顿四处传布电报内容，武装力量哗然。国会拨出了陆军所寻求的款项，且数额更大。

这个夏天，苏联人从陆上和水上封锁了柏林，双方都在为争夺对欧洲的政治控制权而斗争，紧张局势深化了。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一场战争。”——

3 天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秘密发出了它的第一道关于原

子战争的命令。这个绝密令的号码是 NSC—30__，它要求“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准备好果断而有效地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适当手段，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同时必须制定相应的计划。”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指示军方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如何使这些计划与国家的政策、更确切地讲与什么样的政策相一致。

总统的部属不可能制定出前后一致的政策，因为他们对原子弹知之甚少。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秘密了，以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也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它的机密程度太高了。即使总统对它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杜鲁门不知道美国究竟有多少，以及它到底需要多少原子弹头，不知道这种技术的关键在何处，以及军方正在准备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原子力量的这位合法舵手正在盲目地向前航行。——

麦乔治·邦迪说：“秘密以及恐惧，甚至制约了那些明显应该知道”原子弹情况的人，“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人均属禁忌之列，结果使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上也是如此。”——邦迪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后还用 10 年时间研究了总统们有关原子弹问题的决定。

秘密、无知和恐惧造成了相互作用的链锁反应：掩盖原子弹的秘密导致了无知，无知加深了恐惧，恐惧又制约着领导这个国家的

人们。恐惧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恐惧扭曲了他们的思路，他们所看到的敌人犹如在游乐园镜子里看到的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完全变形的恐怖形象。敌人也盯着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情况；双方都开始筹建他们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力量。

制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略的任务，竟然落在了空军中将柯蒂斯·E·李梅的头上。1948 年 10 月，李梅成为新建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准备全球战争的空军精锐集团的第一任司令。如果说有人要为世界末日制定一项计划的话，这就是李梅。

在很多年内，政治性的讽刺漫画都把李梅的形象勾画为一个妖魔鬼怪，一个嘴里不停地吧嗒吧嗒嚼着雪茄烟的战争贩子。这种设想是不公正的。李梅确实嚼雪茄烟，且由于面部神经麻痹而使他脸上的一些肌肉变形，永远东

歪西扭地粘结在了一起。然而在这副怪相后面，却有一个超常的军事头脑。李梅是一个被赋予极大权力的爱国者，他对权力的运用达到了完全彻底的程度。

在 1944 年和 1945 年，李梅任第 20 轰炸机司令部司令，曾受命以闲散空军人员、闲置飞机和备件为主组成为一部战争机器，用它去摧毁日本。李梅作战从不顾及后果。他说：“担心我们行动的道德规范，那是傻瓜。一个士兵的责任就是为了打仗，我们要打仗。如果我们在既定战场上完成了任务，而又没有过多造成我们自己人的伤亡，我们认为，这就是非常幸运的时刻。”他对东京的轰炸，使这个城市的 1/3 被摧毁，至少有 8 万 4 千人在一夜之间遭屠杀。“我们就是要去屠杀大批妇女和儿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李梅认为，他的工作就是挽救他的部下、美国人的生命，他对日本城市的无情袭击完成了这项使命。李梅把空战看作为一种总体战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辜平民。你们现在要与之战斗的是他们的政府，是一个人，你们并不是要和一支武装力量打仗。”他对战争的看

法是由投放原子弹的战役形成的。

到 1948 年李梅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职务的时候，一系列代号为“沙岩”（SANDSTONE）的武器试验已经肯定，新型原子弹头是可能制造出来的，这是比以往更小得多和轻得多，然而威力却大得多的弹头。可能生产这种武器的事实使人们相信，这类武器一定能够制造出来。一年之内，原子武器的储备翻了一番又一番，到 1949 年底已接近于 200 枚弹头。但是，李梅考虑的是更大规模的序列：他希望核武器增加 10 倍以上、百倍以上。

李梅知道，他能够把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一支使世界走向末日的空军力量。他要在下次战争开始的那天，不仅要摧毁苏联所有城市，而且要消灭整个民族。他的目标在于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一种“常备不懈的武器”。他要预测敌人的战争计划，“相信我能够预料一次攻击……抢在敌人之前采取行动。”他要先发制人，“短

时间、大规模地一下子”把数千枚弹头投到苏联人头上。共产世界将在突然袭击的瞬间土崩瓦解。

李梅关于用原子武器进行袭击的观点，开始产生于 1949 年。

海军军官的一些领导人物曾对此提出异议。这种不同见解不是军种之间的分歧，而是对大规模屠杀计划的反感。正如海军将领丹尼尔·加勒里所指出的，他们的论点是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与象美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的政策相冲突为基础的”。

加勒里在写给海军副参谋长的私人信件中说，“荡平大城市的倾向与居民的感情格格不入，而且不会在战后形成一种具有良好愿望的国际气氛。”他指责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划“对于具有我们这种力量的国家是毫无价值的。”

海军少将拉尔夫·A·奥夫斯蒂认为，“鉴于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进行战争的方法就应该适应于政策目标。”李梅的计划“与政策毫无关系。”它鼓吹“大规模屠杀平民”，这是“残酷和野蛮的”，“与美国的基本理想背道而驰，因此，一定会由于道德原因而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

海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路易斯·登菲尔德也加入了这个反抗的行列，他说，这种战争计划是行不通的，也是讲不明的。

当登菲尔德企图把他的不同意见提交国会时，他采取的是一种职业上自

取灭亡的行动。1949年10月27日，杜鲁门解除了他的职务。

1949年10月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是不祥之时。一个月之前，在阿拉斯加海岸进行巡逻的空军间谍飞机，在高空发现了放射性微粒的踪迹，它产生于原子弹爆炸，但不是我们的原子弹。它表明，苏联人已经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原子武器试验。

由这股狂风引起的政治动荡的风波，回旋在华盛顿上空。美国知道，斯大林会在某一天具有原子弹，秘密仅在于这种没有锁在五角大楼保险柜之中的炸弹的性质。不过，华盛顿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是如此之快。现在，用原子弹接二连三地轰击苏联人的想法，已经完全是“不祥之兆”了，第一次打击必须是致命的一击，否则，遭到报复则是肯定无疑的。

军方决定，把有关氢弹的情况告诉杜鲁门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武器的威力要胜过1千枚原子弹。是时候了，应该告诉总统，掌握着这种武器的是我们，告诉他，我们国家需要几千枚、几万枚这种武器。这位总统从没有听说过氢弹，他对于这种武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毫无所知。然而此时此刻，这种武器可能已经存在有4年之久，但却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

战争的权力以及有根据地进行审核的民主程序所左右。不到战争爆发之时，这些秘密决不准泄露。

关于海军将领们1949年提出反对意见的具体情况，可见格雷格·赫尔肯：《胜利之武器：冷战时期的原子弹，1945—1950年》（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80年），第290页。《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卷第341页；以及弗雷德·卡普兰：《国际大决战的魔方》（纽约，塔奇斯通出版公司，1983年），第232—223页。

杜鲁门问了几个问题，了解了一些有关这种炸弹的事实。他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炸弹，究竟应该如何使用。杜鲁门在他公开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以为这种炸弹是一种军用武器。”但“你们必须弄清楚，这不是一种军用武器。”杜鲁门在1949年的一次与空军军官的会晤中，坚持这样认为，“这种炸弹的用途在于屠杀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人民，而不是为了军用。”他不可能支配一种他完全不理解的力量。

军方实际上控制着提交总统的具体情况，因此也控制着他的抉择。李梅以及五角大楼内许多和他有类似思想的助手，都不是把氢弹视为一种象征，或者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那是未曾制造过的最重要的武器，他们或迟或早要把它们扔到苏联人头上。

他们有权决定美国需要多少这样的弹头，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总统只不过是他们的决定上打上橡皮图章而已。只是在发现苏联人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之后，杜鲁门才批准极大地增加原子弹头的生产，无需他的文职顾问们进行任何论证和探讨。1950年1月，杜鲁门为他的“所谓氢弹或超级炸弹”发放了通行证。此时此刻标志着，事变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竞争正在继续发展。

是年冬，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华盛顿。将军们和政客们开始叫嚷进行一场反对苏联人的战争；在他们思想上，这种战争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比喻。未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1950年3月曾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我们正处于比我们所经历的任何战争都严重的战争之中，这不是一场冷战，而是热战。”美国“必须切切实实地开始行动起来，好象我们正遭到入侵敌人的炮火袭击一样。在

这场我们正在从事的战争中，我们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战斗。”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认为，美国应该立即进攻苏联。约翰逊是取代詹姆士·福莱斯特而任职的。福莱斯特于1949年患了精神病，他总以为有一帮共产党的阴谋家包围了他，扰乱他的思想，毒化他的头脑。约翰逊也是如此，始终表现出一种心神不定的迹象，且似乎鬼迷心窍，经常围绕华盛顿游来转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相信，约翰逊的行为“过于狂躁，仅仅用脾气执拗是解释不通的”。他认为，这位国防部长或则是“大脑受伤”，或则是“患了精神病”。

约翰逊的战争叫嚣只不过是一场大合唱中的一种腔调。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提出要给苏联人以打击，说这将会“树立我们维护真正民主的新形象……”因为苏联人是“侵略战争的挑动者……是和平的首要破坏者。”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提出“用氢弹维护世界秩序”，并且私下为李梅辩护，要求赋予他以对莫斯科进行空袭的权力。空战研究院长奥维尔·安德森将军，公开鼓吹“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阻止苏联成为核大国”。他要求华盛顿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退回你们的边界去，否则我们将把你们消灭。安德森将军在一次范围广泛的公开讲话中宣称：“给我下一道采取行动的命令，我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俄国人的5个原子弹基地。当我去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对他说，我挽救了人类

文明。”

1950年的狂热还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一份最全面和管制最严格的绝密指示NSC—68号文件中，这是一篇2万5千言的专题论文，于1950年4月完成，是年9月被杜鲁门作为国家政策予以批准，一直保密到1975年。这篇语言狂热奔放的NSC—68号文件，形成了近40年美国的战略思想。

NSC—68号文件有两个持续至今的遗教：它确定，美国的未来主要决定于苏联的大规模即将出现的军事威胁。它为美国持久的战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一直是冷战时期的基本文件。

NSC—68号文件的主要作者是保罗·尼采，他在美国的核战略研究中，是一个台柱子式的人物，是一个才华横溢，有时又十分傲慢的人；他占有巨大财富，又有钢铁般意志，刚刚被提名去领导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接替当时主要的冷战理论家乔治·凯南。凯南是一个外交家，他视世界为灰色阴影所覆盖，各国差别细微，模糊不清。尼采是一个专家治国论者，他视世界由黑白分明的数字和绝对形构成，在他的头脑里，对国家政策进行研究，似乎就是列出一个复杂的数学等式。尼采实地考察过广岛被炸后的情

景，他企图“确切估量”原子弹爆炸的“实际后果”，声称“要把仪器放上去测量，而不是以动人的词语进行描绘。我要对那些据认为是不可能计量的因素进行定量说明。”从此以后，他相信核战争可以用数学矩阵表示出来；数字具有政治价值。美国的政策必须以核统治为基础，必须以有比敌人更多的核武器为基础，无论是在下一次战争的开始或结束；一句话，具备赢得一场核战争的力量。对核优势的计算将决定世界的命运。

尼采估价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1950年冬的力量平衡情况，得出了一个令人可怕的结论：在4年之内，美国将会看到大量使人畏惧的武器、一台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这个民族在道德方面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莫斯科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号文件说，苏联人“由于受到一种新的狂热

信仰的激励，”企图征服整个世界。美国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如果克里姆林宫要达到他们的根本目标，美国的统一和生命力必须予以破坏或摧毁……”一旦苏联人积累了象美国所占有的那么多核武器，克里姆林宫就可能因受到利诱而偷偷摸摸地发动突然袭击。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正在迅速接近，时间正在飞逝而去。

美国可以闭起眼睛，等待上帝赐予好运；或者是在 NSC—68 号文件所提出的 3 条道路中作出抉择。其一，“停止抵抗”，交枪投降，让红军把镰刀和锤子的旗帜在美国高高升起。这是不可思议的。

其二，“突然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这是一种可能性。“有些美国人热衷于作出一个审慎的决定，在不久的将来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但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可能会使许多美国人反感。尽管美国人民可能会团结起来支持进行战争的努力，但是，由突然袭击的责任所引起的震荡，很有可能使美国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

其三，“迅速而一致地制造”武器，这是争取和平的唯一和绝对必要的道路。NSC—68 号文件声称：“显而易见，我们的军事力量正日益危险地不能适应我们所从事的整体斗争”。必须大规模和坚持不断地制造武器。“预算方面的考虑需要和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协调一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可能处于危急之中”。美国必须象战争已经爆发那样制造几千枚热核武器，“别无其他选择”。

这种秘密政策使国家的预算完全本末倒置。杜鲁门的防务开支已经超过了和平时期的任何一个总统，但军事费用仍然只是根据国内项目和用于和平外交政策目标的项目确定下来的款项。现在，国家的任何其他考虑都在军费之后，尼采私下计算，这种政策的标价每年均在 400 亿和 500 亿之间，比 1950 年全年的联邦预算还多。具有成本意识的杜鲁门从来不了解这种计算；艾奇逊指出，“这并不是疏忽”。杜鲁门曾告诉尼采，在这个报告中要只字不提钱的问题，争论为达到 NSC—68 号文件目标所需的费用，就会使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而艾奇逊则说，这个任务就在于用“比真理更清楚的语言”，“强制统一‘政府高级人士’的大量意见”。

NSC—68 号文件的确是言过其实。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清楚的、但却是虚假的印象，似乎仅仅 8 个月之前才试验了第一枚未定型原子弹的苏联，已经对美国提出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它说，苏联人在核火力方面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核对峙实际上要持续大约 30 年左右；苏联已有 175 个师作好了战争准备。后来尼采承认，175 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是幻想。这个一定要计量不可能进行计量的核爆炸的破坏性的人，把苏联军队的真实数字扩大了 3 倍。

由艾奇逊所描绘的这种迟钝的仪器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美国的军事开支扩大了 4 倍，从 1950 年的 137 亿美元，上升到 1953 年的 528 亿美元。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消耗，不到这个增加数的 1/10，大部分资金的用途，都在于围绕苏联和中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大规模汹涌澎湃的武器生产。NSC—68 号文件要求袭击“苏维埃的战争经济”，因为它把苏联国民总收入的 13.8% 都用于军事；然而到 1953 年，美国的军费支出却是国民总收入的 14.4%；其中用于支撑朝鲜战争的大约仅仅 1%。

对于华盛顿来说，那次战争只不过是一台大戏的小插曲，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或北朝鲜人，而是他们在莫斯科的主人。艾奇逊曾经明确表示：朝

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1950年11月，当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冰封的泥泞土地上相互厮杀的时候，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圆满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将在共产党人的头上扔原子弹吗？总统说：“那是一个必须由军界人物作出决定的问题。我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军事权力当局……这个方面的军事指挥员有权使用这种武器，正

象他们历来所决定的那样。”在原子弹问题上，杜鲁门给了军界以控制政界作出决定的权力。他已经给过海外司令们以直接使用原子弹头的权力；现在，他似乎又把他们的指头放在了扳机上。他在11月的日记中写道：“这似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希望不是，但无论是什么战争，我们都必须迎战，而且一定要迎战。”此后不久，他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军队开始动员起来，准备下一次世界大战。——

在我们积累的核力量远远超过我们所设想的苏联在某一天的力量之前，我们不准打这种战争。随着五角大楼支出的膨胀以及新式核弹的迅速发展，该国制造弹头的工厂开始全力以赴。核弹的积累改变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面孔。在李梅开始控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时候，他只有30枚左右的原子弹，到1953年，他已经有1千多枚。他所掌握的爆炸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在二次大战中使用的全部炸弹，他支配着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力量。——

1953年，美国人民把权力交给了一个答应给他们以和平的退役将军。走上总统职位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结束朝鲜战争，因为他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清楚战争的恐怖；他的战略是控制由于五十年代的战争狂热而造成的大规模军事预算。这位新总统认为，制造更多的核武器与保留庞大的现役部队相比较，支出较少，而对抗苏联的威胁却更有效。核炸弹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它为孤注一掷提供了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反映了五十年代对电力工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核动力正变得越来越清洁、高效，且便宜得无需计价，因此，成本和效用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犹如标尺的亮光所显示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是制造比较多的核武器，但是，随着核战争计划越来越复杂，有几千个核弹头瞄准了几千个目标，这位总统也就失去了对核战略的控制权，他所能了解的不过只是日益发展的核战计划的梗概。当他意识到核武器的增加已经超越了一切理性的范围时，已经太晚了。他企图加以限制，但已经不可能。这位总统6年之内都不得不把恐惧留给自己。当李梅将军制定出越来越庞大的计划，企图摧毁苏联地图上的每一个武器库的时候，他不得不默默地看着自己这个国家的核武器，已经成为自行膨胀的主宰世界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的公开声明有时候也给人一种印象，他似乎认为，不断堆积起来的核弹头是完全无用的。在他就职后还不足3个月的1953年4月，他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饭店发表过一次演说，这是他在任期间最好的演讲之一，他对军备竞赛的费用提出了警告。他说：“令人恐惧的最严重问题和令人期望的最美好的理想，均可以简单地予以表达，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原子战争，最美好的理想可能是：过一种永恒恐惧的和局势紧张的生活；军备的重负正在耗竭全体人民的财富和劳动……

“已下水的每一只军舰，已发射的每一枚火箭，从最终意义上讲，都意

味着去抢劫那些饥饿而没有饭吃的人们，去抢劫那些寒冷而没有衣服穿的人们。”艾森豪威尔说：“一颗新式重型炸弹的费用”——李梅一千颗炸弹中的一个——“有这么多：它可以为30多个城市的每一个，都修建一所以砖为材料的新型学校；它可以修建两座发电厂，每一个均可供给6万人口的城市用电，它可以修建两座设备非常完善的医院……”艾森豪威尔由于肠胃感染而冷汗淋漓，不停地发抖，他加快了对演讲的总结；“这完全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在威胁性战争乌云的笼罩下，人类正逐渐为沉重的铁制十字架所勒死。”

艾森豪威尔并非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对军备竞赛费用的担心，使他很难想象能把苏联摧毁。结束冷战的逻辑思路可能是消除竞争，他曾多次与其激烈反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讨论过这种思想。杜勒斯的兄弟艾伦当时主持中央情报局。这个问题是在1953年8月，即苏联爆炸第一枚氢弹后的一周提出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告诉总统：

“我们或早或迟都必然要设法解除使用这些武器的禁令。”美国在核火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我们也可能失去这种优势。如果我们要袭击俄国人，时机已经成熟。9月初，艾森豪威尔写信告诉福斯特·杜勒斯：由无穷尽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军费大规模增加”是美国难以忍受的。这位总统说：“这种费用可能或则把我们拖入战争，或则形成某种形式的独裁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被迫考虑，我们对未来几代人的义务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一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反反复复地考虑了这种发动战争的思想，并且否定了它。1954年6月他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我希望你们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回家去考虑考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又能怎么样？从易北河到符拉迪沃斯科的广阔地带‘——整个苏联和东欧——’都已经被彻底摧毁，没有通讯联络系统，完全是一片饥饿和灾难的土地。我问你们，文明世界对此该如何处置？让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我们所设想的胜利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其他胜利可言”。军界的设想不同于艾森豪威尔，他们所考虑的是胜利。艾森豪威尔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参谋长内森·F·特文宁将军说：“毫无疑问，战斗准备最充分的一方将‘赢得’一场核战争，正象赢得了过去的战争一样。”正是这种观点，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决定了美国核力量的进程。

军界的观点很快就失败了。到1955年，核武库的威力已经膨胀到了不可能再使用这种武器的地步。当年，五角大楼进行的一次战争游戏揭示了这种困境，该游戏的代号是“打扑克”。

这次打扑克游戏被设想成为一种中等程度的军事演习。美方参加游戏者仅仅拨给自己335枚小型核弹头，大约是美国可供使用之火力的1/10。他们设计了一个对付苏联侵略西欧的保守攻击方案：在游戏的第一天，美国有270枚弹头在德国爆炸，估计直接死亡的平民有170万人，伤350万人。打扑克的游戏表明，为了挽救欧洲而用核攻击对付苏联侵略，最终必将摧毁欧洲。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李梅希望有一支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核力量，并据此制定了他的计划，但是，他计划要打败的敌人却远远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强大。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是以设想苏联拥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基础的。担心与苏

联轰炸机之间存在差距的心理开始出现于 1955 年。美国空军情报机构估计，苏联在 5 年之内将制造 500—800 架熊式和野牛式洲际轰炸机，实际上，苏联人所生产的这两种飞机从来都没有超过 200 架。智囊机构千方百计搞的这种对苏联空军的估计，更象是一种炼丹术，而不是进行分析。空军情报机构所收集的，都是一些质量低劣和鸡零狗碎的资料：在莫斯科进行航空表演时出现的 12 架苏联轰炸机；对苏联飞机流水线效用的推测；以及纳粹对俄国工业工厂的侦察照片。尔后，他们把这些材料撮合起来，形成研究报告，说明苏联对美国的攻击至少需要有 500 架远程轰炸机。突然，这些资料变成了宝贝，它们表明，苏联正在制造至少 500 架轰炸机；如果苏联正在生产如此多的轰炸机，其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攻击。

当时，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名称叫“威胁膨胀”，它还在继续干扰美国对苏联力量的估计。核指挥官们创建了一支力量，然而他们担心苏联已有了同样的力量，因此，他们就创立一支更大的力量；一旦对方抵抗这种力量的防御能力形成，他们就会有另一种力量与这种防御能力相对抗。他们从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望远镜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已。

他们象中古时代的地图制作者一样，企图画一张未知世界的地图。他们在地图的边缘范围以外，在知识逐渐转化为可怕猜想的地方画上龙，刻上警告字样：这里有妖魔。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院长杰罗姆·韦斯纳曾经说过：“美国……正在和一个用以恐吓孩子的怪物进行斗争”。回想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自己非常理想的情报机构。事实上，我们对苏联能力的估计就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镜子里的影像，这种倾向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在把核幻觉伪装成为讲求实效的唯实论之类情况中，轰炸机的差距问题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远远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些武器提出的最困难问题，应该由那些武器的最大鼓吹者去回答：你们如何进行核战争？有多大的火力才够用？一旦这种战争爆发，还可能控制吗？答案都在主管战略空军司令部者的脑袋里；李梅相信，他个人有能力和远见去赢得一场核战争。4 年过去了，他完全拒绝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每年修改一次的战争计划，那是他的秘密。他一个人将决定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这种战争的确切方式。

1955 年 6 月 9 日，特文宁将军终于给李梅发去一信，实际上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战争计划究竟是什么。4 个月之后，李梅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概括性计划说明。该计划要求立即摧毁苏联的 654 个军事目标，118 个城市和 6 千万人口。在听罢该计划打击范围的简单介绍之后，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外的几个军官无不晕头转向。一位海军军官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概括介绍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在两个小时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实际上将不复存在，除了浓烟滚滚、充满放射性物质的一片废墟以外。”

迄今为止，美国在炸弹的选择方面有两种政策：国家的政策——美国公开宣布的政策——是一回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宣称注重政治效果的公开政策是，为了和平而限制和控制原子弹：一旦战争爆发，敌人将面临大规模报复行动，但是，核武器将不会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

实际政策则是柯蒂斯·李梅的政策。他相信第一次打击对于取得胜利是非常根本的。他说，如果他发现苏联人准备把轰炸机投入战争：“我将在它

们离开地面之前，就把它打个屁滚尿流。”他计划在总统发布命令之前就发动这种打击，一旦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历届总统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民，只有总司令才有权按启电扭，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从 1957 年以来，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一直控制着这种权力。

—— 1957 年 10 月，托马斯·鲍尔将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司令，9 年后升任司令，此时，李梅被提拔为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在空军司令部中为第二把手。战略空军司令部这个封闭世界以外的官员和平民们，发现鲍尔此人确实令人胆惊受怕，他夸夸其谈，大喊大叫，敲桌子打板凳，并且深信秘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政策是明智之举。

1957 年 11 月 22 日，鲍尔将军收到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的一个备忘录，授予他在紧急情况下发射核武器的权力，“一旦时间或环境不允许总统作出决定的话。”——李梅将军可能还没有收到正式公文，授予他在危机中发动核战争的权力，但是，鲍尔将军确实收到了这种公文。“他所控制的核武库，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还不曾见到。——

到 1958 年，核武器已经是一种无限膨胀的巨大力量。借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新型 U—2 间谍飞机，一种在高空制作苏联地图的空中飞眼所拍的照片，战略空军司令部所画出的黑点目标，在共产国家的地图上大约已达到了两万个，其中包括俄国、东欧和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铁路编组站，机场、大坝、发电厂、油井、桥梁、化肥厂、机械制造厂以及一切可能被证实的军事或经济目标。每一个目标至少都必须用一个弹头去摧毁，因此，战略空军司令部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弹头。这些弹头很快就制造出来了，每一个目标可以分到 2 或 3 个。大量的弹头还需要有大量的运载导弹，大量的轰炸机以及大量的计算机对这些使命分类排队；而大量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又要有更大量的弹头，等等，等等，如此无穷无尽地螺旋形上升。

1954 年摧毁广岛的那颗代号为“小 伙”的原子弹，其爆炸力大约相当于 1 万 2 千 5 百吨梯恩梯。在 1952 年，这种武器库则储存有 1 亿 2 千 8 百万吨放射性火力武器，到 1959 年，其存量已达到 190 亿吨。如果这种武器库是一列货运列车，每一节敞篷车厢的长度为 100 英尺，上面装载一个广岛市的话，那么，这列火车的长度将能绕地球一周，运载 150 多万个遭屠杀和被摧毁的广岛。——

会使美国瘫痪的话，总统就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因此，即使以显而易见的普通常识为根据，也只有第三种选择似乎才是唯一可行的结论：预先授权在某些情况下的事变中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种选择”就是特文宁在职时期的政策。那个将来可以发射核武器的“某些情况”，自然而然属于秘密。内森·特文宁：《既非自由，亦非安全》，第 242—243 页。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们并没有要予以袭击的 150 万个目标，他们控制的火力比其要攻击的地点多得多。因此，他们打算用 600 倍于“小家伙”威力的核弹，去袭击与广岛同等规模的苏联城市。——

随着战略空军司令部战略计划的制定，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威力，他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担心。

1958 年，军方谋求并且得到了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提炼更多的铀，以及在一年之内使核弹头数量扩大 3 倍的保密基金。艾森豪威尔问原子能委员

会主席、未来的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这里有什么奥妙？要害是什么？1959年1月，艾森豪威尔告诉麦科恩：“他们正企图使自己处于令人吃惊的地位——足已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可以发现的目标；还要加上3倍的储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并不是要禁止核武器，他的意思是，即使漂移回来的放射性尘埃，也会摧毁美国、整个欧洲乃至半个星球的生命。他1959年2月对其国家安全助理戈登·格雷说：“在北半球，可能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来了。”

核武器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生产这些武器的各类综合企业的力量亦是如此。1960年4月，艾森豪威尔问他已奄奄一息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我们应该如何缩小我们那些项目的规模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干，“那么从长远看，除了进行战争以外别无它途——如果我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的话。”

在那几年，这位总统一直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核战争计划进行某种控制，然而，他们却把这个工作推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而後者的计划则对总统保密。直到1960年，这位总统才要求他那些核司令官们，给他看一下他们的战斗方案。在艾森豪威尔下达这个命令3个月之后，鲍尔将军才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其名字还文不对题的方案：单一作战计划。最后到1960年11月底，这位总统才第一次全面看到了军界的核战争计划。

艾森豪威尔所看到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然而还对他有所隐瞒。他懂得战争，看到过变成废墟的城市，他明白死亡和毁灭的含义。这位总统认为，这种计划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不折不扣地大屠杀。

该计划主张以灭绝性的第一次打击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单一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打击中，用3267枚核弹头洗劫苏联、中国和东欧。此为第一次打击，且仅仅是开端。在这种尤如世界来日来临之时的痉挛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再发射成千上万枚、甚至更多的核弹以及我们所控制的一切武器。有10个国家将化为灰烬，5亿人口死亡。

该计划非常确切地反映了鲍尔将军的思想，他在1960年12月曾经扬言，“整个计划都是为了消灭那些孽种！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如果还能留下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个计划并没有反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思想，他曾经告诉他的海军助手皮特·奥兰德中校，对这个计划必须进行某些限制：

“我们必须把这种东西减少到恰好保持一定威慑力量的程度”——

把核武库削减到阻止苏联人发动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然而，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

任何总统也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后来，军方的核武库中大约存放有2万3千枚核弹头，差不多完全和今天的数目一样；其中90%以上都已放置到位，时刻准备发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军方已经计划好进行一次完全自动逐步升级的核战争，无论美苏军队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一旦拉动发射引线，只要战争爆发，就完全无法控制。所谓总统控制着核武器的说法，已经成为实用主义的虚构。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对核武库的指挥权，他没有把这一点通告全国，也没有说出他所了解的情况，这个问题太秘密了。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能不尽可能清楚地提出某种警告。在第一次看到单一作战计划两个月后的1961年1月17日，艾森豪威尔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他

讲的内容令人大为震惊，人们迄今仍然记得他讲话的要旨：

我们今天的军事组织和和平时期的任何一位前任或者和二次大战中或朝鲜战争中任何一个战士所知道的情况，的确已经很少有联系。在我们的世界发生最近一次冲突之前，美

国没有任何军备工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由于需要，美国的犁头制造者也制造了剑。

但是现在……我们被迫创设了持久的大规模军备工业。

除此以外，还有 350 万男男女女直接从事于防务活动。我们每年的军事安全支出比美国全部公司的纯收入还多。

庞大的军事机构与大规模军备工业相结合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还是新现象，它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全面影响，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州议会大厦以及联邦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感觉得到……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综合体得到未经授予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不是它们寻求的。由于滥用权力而造成巨大灾难的潜在危险，目前存在，将来也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结合所形成的力量，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过程，置于危险境地，对于任何有关问题，我们都不应该听之任之。

这位作为五星级将军的总统，是在呐喊五角大楼的权力对国家造成的威胁，说明国家核武库的扩大，正在践踏国家法律，破坏国家的宪法。

然而在这些年内，五角大楼最担心的却是美国的核力量还不够充足：它在轰炸机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弥补其差距，又发现导弹方面存在不足。空军认为，苏联人很快将会有多达 3000 个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这是一种新的、可怕的导弹，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从苏联飞到美国。3000 枚这个数字比美国具备的力量要大得多了。

这是预测还是谎言。鲍尔将军分辨了侦察俄国领土的照片，指

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基地实际上是战争纪念馆、大教堂、粮库、干草堆和休耕地。情报机构估计的苏联人在未来可能会拥有的导弹数，被引用来作为他们确实已有的证据。

保密活动阻碍着把谎言曝光；美国非常喜欢美苏导弹之间存在差距的消息只有几个人掌握。U-2 飞机发现了这个消息，并且为新型间谍卫星发现者号所证实，但艾森豪威尔认为，间谍卫星太秘密了，不能告知国人。在美国政府中，只有 4 个文职官员粗略地知道间谍飞行；然而，俄国人从 1956 年 U-2 飞机第一次侵犯苏联领空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一点，至少还有 6 个为这种间谍飞机提供航空基地的国家政府，也了解这种情况，但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却对此一无所知。

导弹差距这个秘密，这种谎言，一直被掩盖了 4 年之久未被揭穿，只是在它败露之后，才被公开说是一种幻景；那还是在 1960 年 5 月 1 日苏联人击落了 U-2 飞机之后很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被发现就间谍飞机问题对公众撒谎之后很久。

艾森豪威尔在 1961 年 1 月他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终于告诉公众说：“若干年以前的‘轰炸机差距’就是一种虚构，‘导弹差距’也显示出各种同样的迹象。”第一个美国情报卫星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苏联并没有 3 千枚具有几百万吨当量梯恩梯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瞄准美国的脑袋和心脏，就象空军情报机构所担心的那样。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坚持的，他们

连 1 千枚这种导弹也没有；尤如中央情报局所审慎估计的那样，他们连 200 枚也没有。他们只有 4 枚这类导弹，都安装在地面唯一一个发射场上；装好一个弹头就足以把它们摧毁。美国的战争计划和战争政策，都是根据头脑中对俄国的想象，都是根据由于无知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恐惧所

构想出的敌人去制定的。

约翰·肯尼迪在其竞选运动中，也把苏联导弹这个幽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他设想美国面对着一个已完全武装起来的核敌人，但却没有制定先发制人的计划。然而，他在就职后不久就知道，我们的导弹比苏联人要多得多，我们确实正在计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受到战争威胁的话；我们正在计划立即把一切武器都发射出去，一旦这一时刻到来的话。——

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由于这种残暴力量以及单一作战计划缺乏灵活机动性而烦躁不安。他是 1961 年 9 月 13 日从参谋长联席会议那里，第一次收到关于单一作战计划的简报的，他被告知，一旦战争爆发，他除了把全部核武器发射出去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个计划的“制定要求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实施。”一次有限的打击“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姿态毫无实际意义”，它仍然会毁灭几百万平民。这些武器的威力非常之大，所以，“苏联人能否把一次全面战争和一次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区分开来，还是个极大的问题。”

在咀嚼了这个战争计划之后，肯尼迪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转向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低声报怨说，“我们还称自己为人类！”——

在肯尼迪统治下，核武库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它的动量已经非常强大，以致难以停顿下来。现在，围绕战争机器的一场激烈斗争，在军方和文明人员之间开始了，新上升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开始提出了一些异端问题：有多少导弹，多少轰炸机以及多少弹头才你得上足够？麦克纳马拉把空军的民间思想库、兰德公司中那些思想最敏锐的人物招来，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空军要求，最低限度必须有 1 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但是，民间分析家们计算的结果认为，用大约 400 枚百万吨级的核导弹袭击苏联领土，就可以摧毁这个国家。400 枚以外的任何袭击，都只能使这个国家变成烂砖碎瓦，都只能是灭绝性屠杀。

只要对导弹差距的恐怖感继续蔓延，制造 1 万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一旦事实代替了恐怖和无知，400 枚似乎已绰绰有余。一个政治上的妥协方案终于达成了：据信，1 千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是阻止——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美国军界和国会保守派——攻击白宫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力量。一千枚已足矣，且绰绰有余；即使今天，30 年以后，当苏联人也已形成了和我们同等规模的核力量的时候，一千枚依然是绰绰有余。

到 60 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看上去已大体上近乎于今天的模样：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远洋潜艇导弹系统以及机载核炸弹的相互配合行动。今日核战略家们面临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进行战争和怎么样取得胜利。

第一个单一作战计划要求美国发射其全部武器，一旦苏联人侵略欧洲的话；如果苏联人不相信我们为了拯救欧洲将毁灭欧洲的话，这种战略就是毫无价值的。肯尼迪政府中战争计划的制定者，从鲍尔将军到保罗·尼采，再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都接到了命令，要他们提出某种较摧毁整个国家更为复杂和更加灵活的方案。

他们开始研究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方法，他们希望有可能选择已予以明确规定的核暴力的水平，一种逐步升级的阶梯，其中包括从和平走向全面战争等许多层次。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指令，以便控制逐步升级的阶梯，从而控制战斗的发展趋势。使单一作战计划更加符合理性的努力便由此点起步。

关于使核战争更加符合理性的问题，对发射武器的数量加以限制的问题以及要摧毁之目标的性质问题，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们均竭尽全力考虑了很久。1961年夏，单一作战计划已有所发展，其中包括了5种逐步升级的选择：首先是摧毁苏联的导弹、轰炸机基地以及潜艇停泊地；其次是美国轰炸机飞行道路上的空防力量；第三是各城市附近的空防力量；第四是苏联的指挥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最后是彻底实施单一作战计划，全力以赴投入战争。

这整个一套战略都是以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1962年10月16日，当美国政府毛骨悚然地发现，苏联人正在向古巴偷运核导弹的时候，它同时也觉察到，它的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现在，这种炸弹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旦发射了一颗，使用的禁令被打破，战争就不可能予以控制。

在美国完全占有核优势的时刻，全世界所看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出现了。美国占有2万5千枚以上的核弹头，在发出命令几分钟之后，就能够向苏联人发射至少2千枚战略导弹。苏联人只有大约340枚核弹头能够击中美国，其中有40枚据信安置在古巴。然而当此次危机暴发时，所有集中在白宫的人们都清楚，这些苏联核弹头的一个，即可杀死500万美国人。

在后来发生对抗的第一天，肯尼迪总统企图在思想上先估计一下，瞄准美国的40多枚导弹，在这种战略平衡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想，我们的危险增加了。”肯尼迪反反复复地仔细研究，尔后又说：“核弹头数目的多寡又能产生什么区别呢？无论如何，他们已拥有足以使我们毁灭的力量了。”

敌方的300枚导弹就足以使争取核胜利的一切思想上崩瓦解，从那一时刻起，再也没有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谈论使用核武器了。当人们想到单独一颗苏联核弹头就可能造成的灾难时，核优

势的意义也就变得极小，或者完全没有了。

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并没有领悟到这一契机的含义。核武器的储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导弹变得日益精确，同时，弹头越来越小，威力却越来越大。用计算技术创造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可以使多达14枚的弹头在唯一的一枚导弹上端摆动，在飞行中途转向不同的目标。探索通过超级核力量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的途径，依然是渺无人烟大沙漠上的一项研究。随着苏联人慢慢地建立起他们接近于美国水平的核力量，经过调整的1961年的单一作战计划，此后13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曾经集中精力于完善核战争艺术的那些人们的注意力，现在转向了这样一些领域：

开辟核基地的方式，导弹的精确性，如何防止核武库受到袭击以及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技术，——还有军备控制谈判的理想。但到60年代中期，从理论上研究战争的强度下降，进行实际战争的强度上升。

美国探索用于战争技术的开支，比它在越南10年的损失还大，然而什么也没有研究成功，没有电子对空搜索仪，没有激光制导的炸弹，没有计算机化的爆炸模式，没有统计数据、或分析资料、或各种图表，什么也没有搞出

来。在越南进行的有限战争以及核战略家们所构想的有限战争，均有其类似之处；每一种都取决于用数量表示的屠杀情况——尸体清点的数字，烧毁的城市，优势兵力的确切部署；每一种都企图把暴力转化为敌人可能理解的语言；每一种都假定，遭轰炸的城市会传送出一种信息——这些轰炸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向光荣和平的明确信号。

越南使某些核战略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精心设计的计划在实战中可能毫无意义，某些人开始带着厌恶的情绪去看待对合理核战争的探索，他们讨厌战争研究。因此，他们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1974年7月提出的那些令人沮丧的问题找不到答案：“究竟什么是战略优势？按照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标准，这种战略优势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行动上有什么重要性？你们要用这种优势干什么？”

到1975年4月西贡陷落时，核教堂中各教派分裂的局面正在形成。有一派十分忠诚，他们仍然相信有限的和精心调整的战争计划，尽管他们也在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限制和具体调整超级大国的核武库而奋斗。另一个集团则起而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又一次面临着苏联核力量造成的巨大危险，正象他们在50年代所看到的一样。核优势对于这些异教徒非同小可，意义重大，如果美国占优势，世界就会是安全乐土；而如果苏联占优势，世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军备控制谈判毫无意义，除非美国鼓起勇气，彻底重建其核力量，对抗正在到来的苏联核侵略的威胁。

1976年初，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布什，开始听取那些异教徒们大喊大叫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对苏联的力量及其缺陷的年度估计报告中，低估了苏联的威胁，他们在对苏联力量的评估中看到了一种微妙的叛卖行为。布什对这些抱怨所作的反应，在以前的中央情报局不曾出现过，在此后的中央情报局亦未见发生，他参加并支持了一次对中央情报局的思想打击。布什挑选了一个由将军和新保守派组成的小组，邀请他们到中央情报局总部，重新撰写对苏联的估价。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其反共证书已经得到彻底偿付的雷·克莱因说，布什这一招暗地里抵毁了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理智的诚实分析。他称布什挑选的这个小组为“袋鼠法庭”

局外人知道这个小组叫“B组”，其中明星演员就是保罗·尼采。他辞去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代表团成员的职务，责骂军备控制谈判是傻瓜的差使。他的反抗是一次讨伐活动的开始，很快就赢得了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

在日组于1976年结束其工作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突然把他对苏联军费开支的估计翻了一番，这种支出差额的发现，终于使苏联的意图和能力，形成了一幅令人大为震惊的画面，这是自1950年以来所从来未见过的。回想起来，中央情报局当时似乎已经搞出了一项严重错误的计算，对苏联人投入军事重武器的费用总数，多估计了几十亿美元；然而，它的令人可怕的猜测确被视之为事实；

庞大的苏联军事机器又一次浮现出来。

尼采又一次预料，出现核珍珠港事件的时间正越来越近。苏联人正不停地谋求扩大“赢得战争的能力”，而美国却一步一趋，落在苏联核战争力量的后面。尼采企图用各种图表、图例以及数字去证明这一点，以表明苏联人的导弹目前已非常精确，他们可以发射某些洲际弹道导弹，摧毁我们的全部导弹，尔后再威胁发射其他核武器。苏联人将在一次危机中首先发动攻击，以闪击战摧毁美国“的可能性似乎极大”，每一个活着的美国人都将是核战

争的抵押品，美国将不得不投降。国家正面临打一场核战争的突破口，命运攸关的时刻已越来越近。——

当尼采在一片荒漠上探索通向聪明才智的道路时，他总是从数字中寻找现实。自他在广岛的核废墟上旅行之后，他一直企图找到一些公式和数学模式，去证明一个伟大的命题——战略优势意味着：和平时期的外交胜利，战争时期的军事胜利。

尼采把他的命题钉在白宫的墙上，并于1976年3月组织了一个由再生的冷战吹鼓手参加的联盟；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就是一个处于流亡状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相信，苏联死心塌地想统治世界，追求赢得战争的核战略。他们宣布，“极不牢固的窗子”已经洞开，苏联力量掀起的妖风正在通过窗子吹进来；

美国正接近于进入毫无核防御能力的状态。——

尼采在1976年的一个宣言中写道，现在“要准备一个一般的防务体系，也需要象1950年那样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了解历史的那些人不可能误解尼采的意思；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不停顿发出呼号的警笛声正在激烈地回响。

美国必须为准备未来的战争而重新进行武装，重新进行强有力的武装，以便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该委员会一个很有影响的成员科林·格雷写道：“除了进行一场核战争外，美国实际上已别无其他出路。”一旦美国树立了战斗的意志，“胜利是可能的”，格雷在198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就是用这样的题目进行鼓吹的。他还说：“美国应该计划击败苏联，同时，这场战争的代价还不应该有碍于美国的恢复。”格雷所说的这个“代价”，就是2千万美国人的死亡。——

1981年1月，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的时候，研究当前危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控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在该委员会公众。”斯科维尔的评论，可见1982年的一部记录片《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的录音。中，有5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找到了工作，最有名的是里根本人。

其他人还有：威廉·凯西控制了中央情报局；乔治·舒尔茨当上了国务卿；理查德·艾伦成为国家安全顾问；保罗·尼采变成了军备控制谈判的首席代表；约翰·莱曼升任为海军部长，并且立即宣布，我们“必须具有赢得战斗的能力”；进行新型核战争学说的设计师弗雷德·伊克尔，成了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认为除了与俄国人进行战争以外，似乎已别无选择的理查德·派普斯，变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苏联问题专家；进行核战争的吹鼓手科林·格雷，也当上了核军备控制的首席顾问。

对胜利和秘密着了迷的这些人控制了核政策。曾经主管五角大楼研究与工程项目的著名核武器科学家赫伯特·约克博士说：

“这些狂热分析家的地位，比在正常情况下上升得还高；他们可能更深刻、更激烈地贯彻他们的思想，因为上层人物比在正常情况下更加缺乏知识。”——

这些分析家们委身于他们的计算机，被一个似乎是无穷尽战争的方案搞得麻木不仁：双方各伤亡800万人；一个政府从废墟上逐渐爬起来；展开一连串新的核攻击和反击。国务院一位官员在简评这种方案时说道：“这种战争从来也不可能真正停止下来，在一方逐渐恢复了通讯设施和轰炸机跑道以后，另一方则再一次予以摧毁……”——

斯珀吉翁·基尼曾是 3 位总统的核武器顾问和空军核武器董事会的前民间会长，他在粗略地考虑过五角大楼新的领导集团后说：“他们中有很多人认为，进行一场核战争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仅仅宣布这种政策和实际相信这种政策是大有所别的。”

美国政府的信条是赤裸裸的：美国全国已处于紧急状态，国家的生存危若累卵，所以要求提供经费。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首席邦办小詹姆斯·P·韦德博士，直来直去地对参议院核力量小组委员会说：“对有关国家生存的问题不可能标价。”

1981 年 10 月 3 日，里根向全国宣布美国生存的代价为 1 千 8 百亿美元，这就是重建国家核力量的价格。这个数字中的大约 1 千亿美元缺乏事实根据，因为，打一场长期核战争所需要的最昂贵技术，都是由黑预算提供资金的。

隐形轰炸机，秘密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卫星和计算机系统，以及设想的未来核战争的指挥所，均已开始秘密地出现。曼哈顿计划的超常机密，现在已成为五角大楼内部的日常实际活动。目前，不仅核战略的制定是秘密，就是所使用的武器本身也是秘密。

这些核战略家们经过长期而艰苦地对镜窥视，终于发现苏联人正在为争取胜利而奋斗，所以，我们必须效而仿之。现在，几十亿黑美元正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出，以便制造最令人惊奇的秘密武器，建立以空间为基地的制导系统，从而指挥一场可能要进行几周，几个月，也许是几年的战争，直到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胜利者。

第三章 为着更好地进行国际大决故

1992 年的某一天，大力神 4 号火箭将按计划从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升空；确切的发射日期是保密的。五角大楼将会把它描绘为仅仅是一个“通讯卫星”，它会发出娓娓动听的某商用电话公司的声音，提醒我们与自己最喜欢的公司保持联系。

当这枚火箭起飞的时候，舆论机构可能会把该卫星视之为缩写是 MILSTAR 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第一颗卫星。但是，这种卫星的性质以及据猜测它所传递的信息，完全可能不予提及。公众在晚间新闻中可以看到 10 秒钟发射升空的画面剪辑，欣赏那光彩夺目的影像，最后又让火箭的耀眼光辉在记忆中消失。

不可能有人会象空军少将杰拉尔德·亨德里克斯那样，在 1982 年一次关起门举行的会议上，对这次发射的使命作出这样的解释，他说：“根据设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种进行战争的系统，它是第一个此种类型的系统。”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为第三次以及第四次世界大战制造的一种军用全球情报交换装置。在五角大楼所准备的要进行几个月，并在最后以胜利告终的战争计划中，该系统是核心。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目标，在于保证一次长期战争的胜利，并且时刻准备着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在白宫和五角大楼被摧毁以致变成碎砖烂瓦之后的长时间内，帮助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乍听起来可能令人惊奇，但这就是美国的战争计划：进行并赢得一场 6 个月的核战争；随时准备继续发动攻击并取得胜利，一旦下次战争又爆发的话。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核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卫星是一个空间星座，它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信号发射器是一种电子导航装置，用以协调整个国家核力量。一旦华盛顿被摧毁，一旦指挥链被打碎，一旦没有人的声音去直接指挥战争计划的实施，五角大楼就要求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帮助指挥战争，把分散的力量联系起来，协调在世界各战场上空飞行的核武器。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五角大楼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通讯网络，它用自己的特异频率和难于破译的密码进行广播。可以设想它是一种军用电台和电视台，它的卫星、发射塔、天线、接收机以及最现代化的控制室等，都根据战略需要而设置在地球周围的大空和海底。这些装置与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月球上向我们传送生动广播电视的系统相比，要复杂很多很多，这个网络的建造是为了向我们传送更大得多的画面。

整个 90 年代，将有 9 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利用致力于秘密军事使命的新型大力神 4 号火箭，一个接一个地从发射台上升空。一旦进入距地球 2 万 2 千 3 百英里的高空轨道，这些卫星就会通过电子仪器相互联系起来，同时也与间谍卫星和传感器以及与地球上的计算机终端联系起来。五角大楼正在设立 3—4 千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终端，每一个的费用至少是 1 百万美元。布什总统的新型高级轿车中就有一个；他为世界末日准备的飞机，在危机时刻可以载上他逃离华盛顿的机载椭圆形办公室中也有一个；建筑于戴维营北部山旁地下深处的五角大楼的附属建筑物中，将会有许多这类终端；操纵核武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接触这种终端，从执行特别行动

计划的突击队到隐形轰炸机的飞行员。

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以把总统与在全世界指挥美国军队的将军以及其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装置上的每一个士兵，都联系起来。核战司令官和军官们，或将隐藏在地堡中，或将躲避于水下核潜艇内，或则高飞于空中指挥所，或则乘坐带有特殊信号和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和大篷车，疾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联系起来，使人对指挥全球战争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发挥辅助作用。一旦战争爆发，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帮助这种软件系统协调空中轰炸机、海中核潜艇以及陆地核导弹等 3 种硬件的组合行动。

当核弹头摧毁大量现代城市和孤立的前沿军事阵地的时候，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则通过上述措施，可保持其核指挥和核控制命令的信道畅通无阻。由于在空中变换飞行技能，通过智斗排除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冲破核战争引起的强大电子干扰，该传递系统的卫星将能够躲避苏联的攻击。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一旦对战争的政治控制崩溃，据说，军事战略和策略传递系统无论如何也会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在潜艇中以及在导弹库中仍然活着的军人，将会战斗到发射出他们的最后一颗弹头。按照设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停留在它的轨道上，保证在几个月内，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连续不断地发射和传递信息，直到最后一枚导弹的呼啸声划

破天空。

在里根总统当政之前完成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全部设想，据说不可能需很高费用。但是，当这位总统于 1981 年宣布重建该国核力量的纲领时，五角大楼抛弃了它原来的核战网络计划，重又勾划了一个方案，它开始把几十亿美元投入了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一家优先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签定合同的公司，五角大楼正等待着从发射台上得到结果。

现在，第一次升空的时间已越来越近了。到 1990 年，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秘密研究与发展，已经支付了大约 50 亿美元；

该项召比规定时间已推迟了两年，而预算却大大超过。每一个卫星的费用都已经翻了 3 番，接近于达到 9 亿美元，加上发射火箭的费用，每一颗新卫星的标价至少也需要 10 亿美元。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包含的梦想得以实现，如果完成了这个系统的话，总费用大概要 200 亿美元，这将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卫星通讯项目。

尽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大部分内容依然保密，但有一个过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它表明，为一个能够在战时发挥作用的通讯网络系统，一个实际上能保障长期进行核战争的系统，我们才仅仅支付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事实在于，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否会发挥作用，在核战争爆发之前的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人想进行这样的战争，也没有人知道在有或没有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这种战争。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结束这种战争。

自有军事冲突以来，司令官们一直在梦想找到一些方法，能够透过战争的烟云和迷雾，去控制冲突的泛滥，去传递不停顿贯彻执行的命令，去根据前线的最新情报采取行动，进行指挥。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托马斯·鲍尔将军有一次所说的：“如果没有通讯系统，我可能指挥的就是我的桌子。”为了在核战争中指挥他的部队，该将军必须知道他的部队是否收到他的命令；为了控制他的部队，他必须听到来自他部队的消息，这就需要能够在

核爆炸声中工作的双向通讯系统。他需要有电子情报网络，既能收到攻击的警告，又能知道战争正如何进行。作为一种理想，美国总统应该指挥和控制这些将军。

五角大楼用于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网络的速记文字是 C3I 系统，读作 C 的三次方 I。该系统的理想运行状态是“连通性”状态。即在相互连通的状态下。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可能成为这种理想状态的最高技术表现形式，即 C3I 方程式的解。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为下述一些关键性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核战争开始，总统的命令将得以贯彻执行吗？将军们能够控制国家的核力量吗？或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吗？

对核战争的指挥和控制，取决于掌握合法政权者和控制致命武器者之间的通讯联系，没有通讯系统就意味着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会造成混乱，而核危机中的混乱状态，则意味着盲目无目的地去摧毁一个星球。

过去 10 年来，五角大楼和美国总统都一直在要求能够把进行核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因素，诸如命令的制定、武器的控制、战时通讯联络以及战场情报机构，统统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网络，以便经得起几千枚核弹头的攻击，据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就是这样

一个天衣无缝的系统。

不，不是的，这个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尽管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的第一个发射日正在一步步逼近。该系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与缺乏资金，或者是缺乏意志均毫无关系。钞票正在不停地支付，战争计划业已确定。该系统之所以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还没有任何人有一丝一毫如何建立这种系统的概念。这个挑战已经使两代人的主要军事思想乱成了一团。

核武器威力的增加，较之人脑在战场上控制这些武器的能力要快得多。今天，美国的核武器相当于 7 万亿磅梯恩梯炸药，地球上人类的每一磅体重，就可以平均分到 10 磅放射性炸药。多少年来，五角大楼加强和改建了它的核武库，扩大和修改了它的战争计划，然而美国的这些钞票和天之骄子，却从未能创造出一个在实际战争中能够指挥和控制核武器的系统。五角大楼所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庞然大物，正如 C3I 的一位分析家保罗·布雷肯所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却十分愚蠢的机体”，一只非常狂暴的野兽，它那令人可怕的力量早已远远超过了人类指挥它的能力。

成千上万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总额达几百亿美元的秘密拨款，都汇聚为力量巨大的武器和极其复杂的系统，目的就在于为了进行一场核战争。警戒雷达、传感器和卫星，估价一次攻击和协调一次反应的地下中心，发射控制中心和计算机化的导航系统，核武器的安全装置、起暴装置和爆炸力等等，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精确的一种技术系统。但是，它仍然不可能协调一次核战争。

随着核武库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以及随着技术的日益精确，战争计划也变得更加复杂，柯蒂斯·李梅的一短时间、大规模地一下子”把核武器投到苏联人头上以及他的单方面盲目攻击的信条，都已过时。国防部长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们以及那些文职专家治国论者，全面调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留下的粗浅而且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计划。战争策划者们运用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系统分析家的方法，坚持把进攻计划修改成为微妙的一系列进行“有限核选择”和“灵活反应”的方案。

单一作战计划亦发展到了包括很多有计算机驱动的不同作战方案，它们不是使战争在一个小时或一天之内结束，而是长期延续下去，有时候暂停，有时候出击，有时候回避，有时候猛攻和反击，这一切均是城市或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象棋赛的重要策略。今天的计划、单一作战计划（SIOP6—F），大约包括攻击 1 万 5 千个苏联目标。一旦战争爆发，总统必须根据来自 4 个新型秘密卫星的情报，在单一作战计划提供的选择方案中进行选择，这四个卫星的代号分别是圣象（IKON）、兜网球（LACROSSE）、曼托尔（MENTOR）和马格南（MAGNUM），其发射费用达 50 亿美元。

这些选择包括诸如：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吗？这里是已确定的一个小目标——苏联人最大的一个水泥厂。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吗？这里的目标是庞大的军火工厂。苏联人摧毁底特律了吗？这里是苏

联 3 个具有同等规模和战略重要性的城市。总统希望消灭苏联领导集团吗？战争策划者们设想，几百万吨核火力的这种相互对射过程，似乎就象是非常理智的人们正在进行一次有条不紊的谈话。

但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编入单一作战计划的一些差别细微的程序，就好比力图让一颗子弹射向雷龙”。如果政府的命令无法得以遵从和执行，国家的核战略就是毫无意义的。

发展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战略也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一旦战争机器的电缆在受到攻击时断路的话，一旦对指挥和控制机构的攻击打乱了战争计划的话。

在一次有限的核冲突中，在一次除全面战争以外的任何战争中，国家领导人都可能要通过外交途径调整作战方案，以便战争在可能升级到失去控制和毁灭地球之前得以终止，这里没有出现失误的余地。总统或任何在最初几分钟核攻击之后生存下来代行总统职务，发出一连串核指令的人，都必然要在难以想像的压力之下采取一些欺骗行动，他必须在命令其部队进攻敌人的同时，和敌人进行谈判以及控制自己的力量，限制战争发展。

如果华盛顿在战争的最初几分钟遭到攻击，来自首都的命令由于电子干扰而消失，战争将如何进行？在核战略中，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令人不愉快的名字：斩首。政府的头在华盛顿受到攻击时被砍掉之后，华盛顿的国家领导集团和核指挥官们之间的通讯联系，政治领导机构对核战争的控制便会迅速丧失，一系列指令的控制权便会落入年轻军官手中，他们是那些分布于内布拉斯加、阿拉这个问题。50 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 年代，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出警报。苏联人开始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 60 年代中期时，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在导弹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 80 年代又开始彻底重建核力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 1957 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

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 1958 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继承者。”__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问题。50 年代，美国建立了地下指挥中心，确保总统和将军们在一次密集的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继续指挥战斗。60 年代，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雷达、卫星和预警系统网络，以便在苏联人发动攻击时发出警报。苏联人开始弥合了有利于美国的导弹差距，而且到 60 年代中期时，它已经有能力发射自己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以便摧毁美国。我们又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在导弹上装置多弹头，强化其精确度，并且加固了核武库。当所有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使我们消除恐惧，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 80 年代又开始彻底重建核力量。

为了避免我们的核力量被斩首，为了确保在苏联先发制人时能给予大规模报复性还击，发射核武器的权力在 1957 年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鲍尔将军接到放权命令的时候，就授予了将军们。今天，分布于全世界的大批美国陆、海、空将军，都已被预先授予了这种权力。这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美国总统的合法继承方式毫不相干，按照宪法规定，总统遴选人应该从副总统开始，而后到众议院长，到参议院临时主席，再往下以各部成立的年份为序，到诸位内阁部长。然而，五角大楼不愿意在核战火纷飞之时到农业部长那里去取命令。在导弹时代，宪法规定的命令环节不可能适应需要，按电纽的权力不可能再由总统一个人决定，更何况在战争开始时，他很可能就排在第一批需要离开的人中间。所以在 1958 年，五角大楼在宪法规定的途径之外，又提出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之为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五角大楼划定这个实体的范围包括“总统和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们正式授权的候选人和继承者。”__这个发出核命令的通道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再到形成为一体的特定的指挥官，诸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以及再往下到战场上的将军们。

通过命令通道下发的一道命令究竟要传递多远呢？要经过抵达存放在密苏里州地下核仓库中各组民兵式导弹的全部路程。在这些导弹的顶端，安装的不是弹头，而是一个录音磁带，上面录入的是已编制为程序的紧急状态行动指令，即核武器发射令。据说，核司令可以命令处于紧急状态的火箭通讯系统，把行动密码送上高空，并向战略空军司令部在高空的轰炸机飞行员以及在地堡中的导弹发射手播送。该系统实际上是一种机器人，用以指挥部队执行战争计划。

在一次核危机和核战争中治理国家的计划——“保持政府的连续性”计划，正象黑预算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一样都是高度保密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为了使政府继续下去，这个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分散为若干候补政府，卷缩于无数地下司令部中。

为了建造两个核战指挥中心，五角大楼在 50 年代末就开始钻探活动。这

种地下掩体是军政府的战时首都。这种临时政府的两个所在地分别是：备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它深埋于马里兰州戴维营西北，阿勒格尼的拉文洛克山下。后备国家首都，位于弗吉尼亚州芒特韦瑟的蓝岭山下，由华盛顿向西约一小时路程。这两个巨大的地下堡垒是两个地下城市，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全日制雇员几百名，有电车来往的街道，有相当舒适的办公室和公寓，丰富的淡水水库以及以几十顿计的干冻食品。

督促文武官僚机构进入地下掩体躲避起来的警报系统，是五级戒备系统。这五级统称为防御状态，缩写为 DEFCONs。每提高一级，政府对核武器的控制权则会沿着命令通道下降一步，核引爆器上的保险装置也随之逐渐打开。

在和平时期，除了轰炸机飞行员以外，我们均处于五级防御状态。从准备战争的年代开始，这些飞行员便一直保持四级防御状态。自 1961 年以来，总有一个空中指挥所，载着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将军和作战参谋机构，连续不断地在中西部飞行，随时准备接受任务，一旦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被摧毁的活。这些计划有一个优号：镜子，听起来很美妙，却非常容易破碎。1989 年 12 月，空军建议减少镜子计划规定的飞行次数，以便每年节省大约 2 千万美元，但布什政府拒绝了这种思想，镜子仍然未被打破。

处于三级防御状态时，核战争系统的神经和肌肉便开始紧张和颤动，就象一只猫正等待扑捉食物时那样。民兵式导弹的全体人员手持钥匙和密码本，准备发射他们的导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头们则把一个小队派往拉文洛克山；文职领导人则相互用电话传达命令，撤离办公室和家庭到芒特韦瑟山去。满载传递发射命令用通讯器械的卡车和大篷车，也已进行调试和检测，总统的四架“末日号座机”也发动起来，它们是五角大楼机载指挥所机群的一部分。总统座机的正规名称叫国家紧急状态空中指挥所，非正规称呼叫“护膝”。五角大楼为布什总统建造的是新型座机，由军用 747 型改装的防核战飞机，每架耗资 3 亿美元。这 4 架飞机中的 3 架，停在內布拉斯加的奥弗特空军基地，那里有一个战略空军司令部，第四架则停在印地安纳的格里索姆空军基地。

我们最后一次处于三级防御状态的时间，是 1973 年阿以冲突，即斋月战争就要结束前的几个小时。苏联要求联合国敦促美苏共同派军队到前沿阵地去，强制实行停火，美国反对这样做，苏联领导人威胁要单方面派军队前往。1973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10 点 40 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不在，理查德·尼克松在周末之夜大屠杀，即下令解雇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和几名司法部官员之后，由于酗酒和气愤而无法参加会议。

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告诉基辛格说，总统也过于“激动”，难以厉行职责。副总统亦不在场，斯皮罗·阿格纽也由于犯罪受到起诉而辞职。没有人去打扰总统，就在午夜之前，白宫地下室的几个人决定美国进入三级防御状态。24 小时后，基辛格认定苏联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个“大骗局”，警戒部队撤出阵地。

二级防御状态表示国家已处于战争边缘。地下临时政府已经组成，副总统乘直升机飞往有一架末日号飞机所在的指定地点，第二架这种飞机则飞往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接应总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不停地空中警戒，避免停在地面为苏联的导弹击中；大约有 300 架这种轰炸

机起飞，带有 3 千多枚核炸弹和导弹。海军的潜艇运载着 5 千多个弹头，以扇形队形在大海上前进。具有特殊防护装置的牵引式卡车队奔驰在州际高速公路上，驶向秘密目的地，每一辆卡车都以一名一星级将军为首，他已被授权向导弹和轰炸机飞行员发布行动密码。五角大楼的计划者意识到，在一场全面核战争中，很少有重要指挥所能够避免遭到直接核袭击，苏联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诸如五角大楼和战略空军司令部这样的重要神经中枢。考虑到活动目标比较难以袭击，五角大楼在黑项目中投资 30 亿美元，建造了汽车指挥所；大量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使苏联人不可能选中目标。

在外观音普通通的牵引卡车中，行进在路途的战争狂人就可以操纵计算机化的指挥中心。每一辆卡车上都将安装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一套价值百万美元的发射机、接收机和传感装置，它们放置在犹如垃圾桶盖大小的一个抛物面卫星天线上。关于这种卡车的使命的其他细节，例如，在核战中间，它们在什么地方加

燃料，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更换报废的轮胎，目前仍然是未知数。不过，这种卡车队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与轰炸机和导弹手保持联系，将会使这些卡车成为一个个协调国家核力量的微型五角大楼。

一旦这些卡车滚动起来，一级防御状态即将来临。宣布处于一级防御状态，将完全改变美国的政治机构，我们将处于戒严状态，可能遭到攻击的警报已经发出，核战争迫在眉睫。

国家投资几十亿美元建立的警报系统，把全世界都包围了起来，但是，它仍然只能告诉总统，他有 10 分钟时间选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今天，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系统，都可以发出核攻击警报：国家侦察局的卫星，它们安装有非常强大的红外线摄像装置；建造在美国、加拿大、格陵兰和英格兰的陆基雷达装置；海军的声控监测系统，一种追踪苏联潜艇和军舰的秘密水下微音器；围绕苏联边界排列的 30 多个高度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空军的电子窃听装置；各种各样的飞机和空基遥感装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系统。

来自所有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资料，据说都要经过监控官员分析，尔后提交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白宫形势分析办公室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在白宫对面行政办公大楼内的危机协调中心。控制这些活动中心的人，据说都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估价，并和国家安全局内声音嘈杂的全国作战与情报值班军官网络系统相互交换看法，同时通知核战总司令战争是否已迫在眉睫。

军方应付这一级核警报的应急计划，任何总统似乎都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向总统全面简报有关情况。五角大楼内只有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两个文官，允许查阅这些计划，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文官，都不曾深入地具体审阅这些计划，以便掌握其复杂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让任何不穿军装的人审查这些警戒计划，他们说这是“文官对纯军事问题的干涉”。

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一旦导弹开始飞出，他几乎已没有时间作出应该如何办的决定。苏联对准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而美国至少要用 10 分钟，才可能发现这种进攻；才可能确信的确是一次进攻，而不是警报系统的某种计算机故障；才可能认定导弹飞行轨道和袭击目标；最后再通知五角大楼和白宫。一旦总统接到警报，至少又需要 10 分钟才可能下达命令至国家的核力量；才可能确证这种命令的可靠性，尔后在苏联导弹爆炸之前发射美国的洲际弹道

导弹。因此，留给总统及其军事顾问研究形势和制定决策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 10 分钟。苏联潜艇的攻击还会把这个时间削减到 5 分钟以内。投入各种卫星和传感装置的几百亿黑美元，只能为总统提供一个紧急状态警报，留给他几分钟出走的时间。

随着时间滴滴答答地消失，总统必须通过电子装置和分成为等级的核司令们协商，形成决议。假定总统还有控制权，仍然坐在白宫，还能够指挥核力量，他会环视一下形势分析办公室内宽阔的会议桌，要求交出执行战争计划的授权密码。

单一作战计划及其行动密码，都锁在一只小箱子里，由一个不引人注目但时刻在总统身边的官员保管，据说，这个箱子被称之为足球。总统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并不熟悉。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任内的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比尔·古利曾经指出，对于足球的内容，他们任何人也没有得到比一个简单报告更多的东西，任何人也没有看到过最新内容，尽管足球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任何一位总统也不可能打开这个足球，只有接到授权的军官，总统的军事助手和军事办公室主任，才共知打开足球的密码。如果有一个家伙得了心脏病，或者是他在去找总统的路上被击毙，他们就只能把这个讨厌的东西砸开。”

一旦足球被打开，总统就会看到很长很长一串用以选择摧毁的目标，它们共分 4 大类：苏联政治领导机构；苏联的核力量；它的常规军事力量；它的主要工业部门。总统可以命令战略远程轰炸机出击，命令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艇开拔；他可以命令把地球的 1/4 从地图上除去，或者仅仅发射一枚炮弹以示警告。只有下达摧毁第一类目标的命令时，他必须和有关方面联系。C3I 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必须相互联系起来才可能使战争计划得以实施。

五角大楼多年来就知道，它的通讯网络无论在和平或者是危机时期均可以工作，但是，这并不能加强它的信心，认定该系统在战时也能够畅通无阻。面对核危险的总统，可能会发现他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他将不得不象战场上的一名将军那样，找到他的副司令去通知其部队，说明通讯系统失灵。

一连串通讯系统失灵的问题，60 年代末就已经引起五角大楼重视，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WWMCCS），这是一个基本网络，它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危机时刻的一个主要通讯系统。整个 60 和 70 年代，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都未能开通。这是一种军事系统，常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两个首字母缩略语 SNAFU 和 FUBAR 进行说明。前者斯文地译为“正常形势：一片混乱”；后者则译为“前所未有的混乱”。

关于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几打之多，最有名的一个涉及美舰自由号。1967 年 6 月，自由号作为情报收集船，装载着国家安全局的大量窃听电子通讯联络信号的装置，驶往西奈半岛沿岸，去监视 1967 年的阿以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它一份绝密电报，指令它绕开该海岸，因为担心该船会遭到攻击。打着“加急”印记的这份电报，通过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发出，接收者姓名是：驻欧洲美军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统领第六舰队的诸位指挥官以及自由号。

自由号从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亦没有从任何司令官那里收到该命令的副本；而且在以后 24 小时内也没有收到其他几份电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把自由号的这份电报副本，发到了位于菲律宾的海军通讯联络中心，苏比

克湾的人们又把它送回五角大楼，建议五角大楼通过设在莫洛哥的传递站传送这份电报；尔后，五角大楼又把这份电报送交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在那里，该电报在归档后被忘得一干二净。这份电报的第二个副本，次日晨围绕地中海转来转去，从一个传递站到另一个传递站，为这份绝密电报寻找畅通的安全通道。当天下午，以色列的喷气飞机和鱼雷艇向自由号开火，用炸弹凝固汽油弹和重炮炸毁了这只船，并且向救生筏射击，打死 34 人，打伤 100 多人。

用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话说，“在国防部历史上，这是通讯系统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次失败。”为此，同时也为了维护国家保密局机密的尊严以及美以关系，美国政府几乎对这次悲惨秘密的

一切方面均守口如瓶，企图阻止公众的调查。差不多 5 年之后，这次一片混乱的某些细节才逐渐为人所知。

差不多过了 10 年时间，五角大楼才了解到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失灵，它对于执行核战争计划可能是不恰当的。控制一个用于核战的传送网络，比在和平时向一只船发个电报要复杂得多。

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特殊信道，最低限度的基本应急通讯网络，也许可能在任何苏联导弹到达之前，就向美国的所有核力量传送一个简短的、没有错误的电报、一个命令在单一作战计划的许多选择中进行挑选的电讯信号，但是，这个系统一旦遭到攻击就会崩溃。

70 年代末，著名系统工程师艾伯特·巴比特接受了一项令人羡慕的任务，修复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他报告说，该系统的能力“对于支撑和维持军事行动是不充分的。”它甚至不能够支持一次模拟战争演习，在 1980 年 11 月进行的一次代号为自尊精神的国防军事演习中，该系统仅 12 个小时就完全失灵。总审计局报告说，从 1975 年西贡陷落到 1980 年从伊朗营救入质失败，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历次军事危机中均发生故障；在五角大楼耗资 6 亿美元对计算机进行维修，并重新加工了几乎全部软件之后，

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支出已超过预算 300%，然而，该系统已经过时。

对于全球通讯网络，五角大楼和总审计局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研究，国防部诸多部长和副部长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会作证，美国需要有一个在危机时期能够发挥作用的系统。五角大楼和国会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个问题，每一次报告都肯定前一个报告，每一次新的艰苦努力都得出同样的基本结论：“国家还未能布署可能与未来战争和现代武器系统相适应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这与 1978 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一模一样。

这个单一作战计划的内容极多。有几枚核武器就可以使指挥和控制系统失灵，这意味着，核战争计划精心炮制的“有限选择”，在遭到进攻时是不可能执行的；脆弱的通讯网络使我们的核武器毫无用处，除非是接到第一次警报，也就是说，当任一雷达上，任一预警警报站，以及通讯系统的任一网络节上出现警报声或标示遭到攻击的闪烁光斑时，就把核武器发射出去。执行这个战争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指挥和控制系统崩溃之前，把尽可能多的核武器尽可能快地发射出去。一旦遭到进攻，美国仍然可能实施单一作战计划，但不是我们制定的那套精工细做的计划，而是柯蒂斯·李梅将军那套搞突然袭击的计划，那套在 30 年前就曾使艾森豪威尔总统胆颤心惊的计划。

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个严酷的事实意味着，有关核战略的常规哲理是

绝对错误的。我们假定，我们占有如何如何多的弹头，如何如何坚固的地堡，如何如何多的导弹，确实关系重大；但是，如果脆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把美国推到了孤注一掷的末日，推到了或则使用、否则就抛弃这些东西的末日，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正是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所面临的处境。在我第一次在五角大楼的一份打印件上看到这个词，这个没有任何官方文件用任何一个字加以解释的缩略语之后，它费了我大半年的时间去琢磨其含义。无论在五角大楼或者是国会山，没有人愿意讨论它，我一谈到这个问题，空军的军官们就回避。只有 6 份含糊不清的技术文件和军校的博士论文提到过它；只有少数几位大多都在五角大楼内度过了很多年的学者，才既了解、亦有勇气深谈这个问题。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个技术难题，30 年来使核战战略家们屡遭挫折。该系统企图用 200 亿美元回答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难题：你如何赢得一场核战争？当乔治·布什于 10 年前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经非常贴切地陈述过这个问题的结论：“你必须有一套指挥和控制系统……你必须能够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其程度要超过对方给你的打击，这就是你取得胜利的途径”，在战争中，一套完好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即走向胜利的道路，有赖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

无能于建造一套使核战争取得胜利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在 70 年代末第一次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最终逐步传到了美国总统的耳朵里。吉米·卡特一直是一个废除核武器论者，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誓要为在地球上销毁一切核武器而奋斗。就在他作出这个保证的前一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送去了第一份简报，他曾询问，是不是可以把核武器砍掉大约 90%，剩下 200 枚由潜艇发射的导弹，这个力量已足以摧毁苏联的每一座大城市，且绰绰有余。卡特这个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渴望把核武器“削减到具有威慑程度”的设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力，但却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震惊。据报道，该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以极不信任的目光死死盯着卡特。总统建议参谋长们回心转意，发誓要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

卡特对核武器的看法很快发生了变化，从极度的讨厌到完全迷恋。卡特首先为复杂的核战略所吸引，继而又沉醉于其中，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证明自己认可新的武器系统，就在一个简短的命令中同意，在不违犯现有军备条约的前提下制造最大的和最精确的新型导弹。1977 年秋，美国情报机构监听到的苏联的导弹试验表明，苏联的新型导弹可能和他们的旧导弹一样精确。作为反应，卡特发出了制造 MX 导弹的许可令，这是一种可装 10 个弹头的武器。据说，新型 MX 弹头的精确程度可以用英尺计，这就是说，战争策划者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袭击苏联一系列完整的新型目标系统和子系统。关于 MX 导弹，一切都是一清二楚和毫不含糊的，它的威力及其精确程度，使它成为一种潜在的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

这种武器又为未来要使用它的战略提供了一条出路。技术不停地驱使政策发展，苏联的某种新武器，要求美国有更新的武器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战争战略。双方武器精确度的不断改善，意味着核战争计划也要进一步修订，意味着核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几天或一周之内结束，必须考虑使战争计划把这种认识包括进去。一个更复杂的战争计划则要求有更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此后两年多，卡特及其高级助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新的核

战略方面。大部分重担都落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军事助理威廉·奥多姆将军肩上；美国驻苏联使馆的这位前武官，对于苏联及其核理论知之甚多。基本上就是通过奥多姆，卡特成了

第一个沉浸于具体制定核战争方案的总统。1980年，奥多姆曾在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班上说，总统“确实了解每一个步骤，审查过无数方案，并表示非常满意。他要求早晨3点钟就叫醒他，以免糊里糊涂：他明白他必须过目的东西，他就要听到的内容以及电话线另一端的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卡特从奥多姆那里听到的，都清楚地出现在了总统的绝密命令中；奥多姆是这些命令的天才设计师和作者。总之，他们呼吁建立一个能够经受核战争袭击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1979年11月5日签发的总统53号令说，对“美国安全最根本的，”在于通过C3I系统保持活下来的领导人与国家核武器的联系，以便“在敌人的核攻击过程中以及此后，支持实施灵活的报复性打击。”1980年6月30日签发的总统58号令，要求改善在核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保持“政府连续性”的系统：较好的转移计划；领导人新的供紧急状态用的掩体；改善战时地堡中紧急状态用计算机和通讯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写道，“美国第一次切实认真地为自己寻求左右一次长期核冲突的能力。”

1980年7月25日签发的总统59号令，要求美国发展它可以进行并赢得一次持续数月，而不是一个小时或一天的核战争的能力。

在1980年夏天的竞选运动中，与罗纳德·里根相对抗的卡特政府严重地滥用其权力，把总统59号令的本质内容泄露给宣传机构，使人们知道了一次设想的战争将要进行多长时间。专门进行战争研究的理论家科林·格雷写道：“总统59号令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长期的，6个月之久的核战争是普遍一致的猜测。”只有对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技术进行革命，才可能达到这种努力的目的。

信誓旦旦要在全世界消除核导弹的这位总统，突然掉转航向签署了自柯蒂斯·李梅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战争计划。但是，总统59号令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这个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在它传达到下级核指挥员之前，卡特就下台了。然而，卡特还是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耕好了土地；为下一任总统播种并提供了价值数十亿黑美元的肥料。里根政府上台后，对进行核战的现实提供了一套全新看法，它希望把进行核战的花言巧语，与将近1/4亿美元真正结合起来。到1980年秋，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以及五角大楼的某些战略家们，都在公开谈论赢得一场核战争。

1981年1月上台的一帮核胜利的信徒，很快就起草了一份要总统签署的秘密命令，10月份，总统就在“关于国家安全决定的13号命令”上签了字，这个迄今仍然属于秘密的命令，要求创立一个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使其能够满足进行核战的新的花言巧语的要求。它说，美国必须有能力进行一次6个月的核战争，并迫使苏联人投降，尔后，美国还必须保存有足够大的核力量，时刻准备着

再次投入战斗。它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反对苏联人的核战争中，“美国必须是优胜者”。接下去，它又大量讨论了“优胜”是什么意思：“优胜”意味着取得胜利，赢得一场核战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五角大楼需要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它并不考虑修理其报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而是希望有一个有实战能力的全新系统。

布鲁斯·布莱尔从前是一个控制发射民兵式导弹的军官，他在五角大楼就核战指挥和控制网络提出过一个前所未闻的研究。布莱尔说：“位于右边的人们希望制定一个赢得战争胜利的政策……所以，把 10 个比较可靠、坚实但缺乏雄心的项目的钱抽出来，用以支付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费用，位于右边的人们为支付这笔款项开了个先例。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温伯格会说他的工作就是收钱。”国防部长收到了这笔钱。五角大楼在国会敦促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 C3I 网络的质量；较为真实他说，它是实施新型核战略目标的工具。

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上，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个含糊不清的作战用卫星网络的蓝图，缩写为 STRATsAT 的战略卫星系统便是其中之一。空军对于创立这种系统的想法有极强烈的热情，赞扬它为“长命”系统，意思是，它在经过最初几天的核战争之后还会生存下来。战略卫星系统计划在高空放置 4 颗卫星，价值至少 30 亿美元；

卫星轨道距地面 11 万公里，差不多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从而免受苏联的攻击。这些卫星将通过超高频无线电传送装置相互联系起来，它们的波长达 55 兆赫，频带宽度在已知物理学理论所发现的边缘；从理论上讲，这种超高频可以较快地传输较多数据。卡特政府的空军部长汉斯·马克在 1980 年曾告诉国会说，战略卫星系统“肯定能够在一次双方进行的核对抗之后保存下来。”

战略卫星系统是不可能通过严格审查的，国会不可能接受为这样一个系统支付 30 或 40 亿美元的设想。海军战略家们在私下与军事委员会职员谈话中，也贬低这个系统，说它根本不可能和潜艇相沟通，更不用说在战时和它们保持通讯联系了。国会在 3 年之后否定了这个系统。

但是，里根的革命还是到来了，有关的一切均与过去有所不同。国防部长温伯格在 1982 年告诉国会，在政府创建核力量的过程中，一个新的 C3I 系统“可能是最紧迫的一种因素”，没有这种系统，五角大楼就不可能达到其在秘密政策说明中所确定的目标，即 1982 年泄露给报界的战略五年计划。该计划说，美国的核力量必须“在经历了长期冲突以后，仍然保持一定的能力，以便给苏联的工业和经济基础以更严重的毁灭性打击。”它说，美国需要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要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支持已经受到遏制的核反击，同时还能够保持足够的核力量，以便在发动攻击以后的时期内继续发挥保护和遏制作用。”用简明的英语说，就是在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核战争并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力量不能削弱；要保留足够的核力量，用于消灭任何可能保存下来的苏联部队。这种政策使“长命”C3I 系统变成了一个已过时的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系统，一个能够确保战、胜和再战的系统。

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随着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在 80 年代逐渐成型，五角大楼必须开发指挥核战争的新的计算机和程序，书写几千万条排除故障和毫无误差的计算机密码线路，而每一条的费用至少也要 100 美元。它还必须把各种数据编程，输入核战指挥系统新建立的网络节数据库中，这些网络节包括空间卫星，地面终端，具有特殊防护装置的牵引卡车，以及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控制中心，以便发射核武器使用的各种指令，在华盛顿被摧毁之后还能继续得以实施。它必须开发通过秘密超高频进行工作的发射和接收装置。它还必须研制使卫星具备灵活应变能力的装置，以便它们在高空发现和躲避攻击。它还必须对各个卫星、终端以

及卡车采取防护措施，抵御核爆炸的破坏性影响。

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系统，它能够经受一次全面的核战争，能够协调 5 千枚、1 万枚或 1 万 5 千枚核弹头的起爆，从而导演一场可以把导弹爆炸误差缩小到毫秋弹道导弹芭蕾舞。五角大楼企图把恐龙变成九头蛇，变成一种即使在失去脑袋以后亦能够继续明智地进行战斗的动物。它还企图创造一个核脑外科手术的奇迹，把永远破坏不了的神经系统移植到无比强壮的动物身上。

这种设计要求超越了大批计算机程序编制者和战略家们的能力范围。布鲁金斯学会负责对外政策研究的主任和核战略专家约翰·施泰因布雷纳说，五角大楼“不断发出信号，他们需要一个永久性系统，他们要求武器和系统设计提供这样的系统。他们把设计师逼得都要发疯了，这些设计师不知如何是好，即使支付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也罢。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经受大规模攻击的系统。不过，钱是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用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世界范围的控制中心、地面终端以及为空军大部分飞机提供的试验线路的拨款，在 1982 年就已经开始涌流出来了，在 1991 年第一颗卫星按计划发射之前，该系统拨款所占空军的费用将会超过 10 亿美元。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是主要承包商，它签订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合同，是一种成本加价之类的协定，洛克希德公司超出成本部分的 70% 都要由纳税人承担，这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五角大楼最初的估计认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完成，需要款项的总额可能是 100 亿美元；我所采访过的空军内外的分析家们则认为，如果加上超额支出，以及完成时间比原计划再推迟两年，发射这些卫星和维持它们在高空运转的费用，200 亿美元是较为确切的价格。

从提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最初日子开始，军内外的怀疑论者就一直认为，无论多少钱也不可能买到五角大楼所设想的作战网络，他们曾一再警告国会和五角大楼，制造一部有效指挥核战争机器的设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幻想、梦想和海市蜃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在他 1982 年退休时告诉国会，军界由于制定长期进行核战争的计划，把钱扔进了“无底洞”，“我看不到存在有很多进行有限或长期核战争的机会。”

五角大楼对这种批评的反应是，把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定为更高层次的机密，把它的各组成部分统统隐藏在从未有过的保密隔间中，争论沉默下去了，然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经受一次长期核战争吗？它可能实现五角大楼的设想，赢得一场 3 个月、4 个月或 6 个月的核战争吗？

耶鲁教授保罗·布雷肯自 70 年代初以来一直研究指挥和控制系统问题，就此问题撰写了受到最广泛赞扬、且并不保密的研究文章。他在对 系统进行了 15 年探讨之后非常直率他说：“要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安全运转 120 天的思想，象精神错乱一样令我吃惊。把钱花在准备长期核战争上是一种浪费。”

艾什顿·卡特在五角大楼的系统分析队伍中是一名高级文官，作为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研究公共政策的一名教授，对 C³I 系统发表过不少开拓性研究文章。他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不可能期望任何一种指挥和控制系统去完成它所假定的任务。它具有极为凶残的本性：要在我们不可能预料的情况下，在由技术和武器，

而不是由人类决策支配的时限范围内，打一场我们从未进行过的战争。”

他问道：“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价格去购买这种系统的幸存机会呢？”在一次核战争中，任一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存在时间，究竟可望有多久呢？他继续说道：“问题在于，这种系统是不是可能存在一天，而不是6个月。”

必须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予以协调的战争机器，有许多活动的部分。在大约50个美国基地和160个国外驻地上，有12万人直接负责实施核战争计划，他们中有几千人必须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接收命令，并于回执。总统或生存下来的核战总司令的意向，必须与洲际弹道导弹库中的军用导弹，与在大海中秘密航线上游戈的潜艇，与远离美国几千英里的轰炸机结合起来。大量的情报资料也要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信道进行传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在核战争中，应付这些资料和电报的轰击吗？它可能按时接收和传送电报到所有部队，使首尾连贯的战争计划得以实施吗？似乎是不可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每一个卫星，每次最多只能处理15个信号，第16个呼叫者得到的将是占线信号。五角大楼还必须为维护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畅通，避免干扰和窃听而付出代价。

敌人会通过用同一波长广播而对信号进行干扰，造成干扰电文和混乱电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采用一种称之为频跳的方法，使电文可以从一个频率跳到另一个频率，形成活动目标，破坏敌人的干扰台。对敌人造成的结果，就好象是打开一台有60个频道的电视机，如果在2频道发现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画面，此节目便立即消失，如果用遥控器搜索，在49频道重新发现该系统的画面，它一秒钟之后会又一次消失。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还能够把它的声音和数据编程传输，改变传输频率，尤如有线收费电视台对你进行封锁，使你完全不可能免费看电视一样。

但是，正如所有技术一样，都是有代价的。为欺骗敌人而作的一切努力，削弱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和其朋友联系的能力；把信号编成密码以及再把密码翻译出来需要时间；频跳需要能量。所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难于干扰，但这样一个先进的系统，却只能用很慢的速度接收和传输数据。

即使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在爆发的战争中圆满地运行，但有可能通过其9颗卫星同时进行联络者也不过135个用户，如果五角大楼深谋远虑，决定使其中两颗卫星作为备用而行向地球，该系统在同一时间内处理的紧急呼叫信号，仅仅有100多个。

必然会有很多军人要排长队等待进行联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造价昂贵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企图满足三个非常不同和非常庞大的军事团体的需要。战术力量，即操纵地面终端、战场联络站、以及流动指挥所的士兵，他们不仅需要接收和传送急电，而且也需要小型终端装备其卡车和大篷车。战略用户，即隐形轰炸机飞行员，战略空军司令部控制武器发射的军官以及潜艇司令官，他们也需要总数相对较少的电报信道；但是，为了在进攻中免受袭击，他们必须直接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联系，接收行动密码，发现目标，发时武器，以及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核战总司令，情报机构和操纵指挥中心的监控军官，他们需要极高速度的电报信道，因为他们必需吸收大量情报，必须发出很多命令。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还必须处理来自其他军事重武器的大量数据。它们必须接收和传送间谍卫星发来的侦察照片的数据，这是在高空提供的观察战斗进程的眼睛。它们必须接收和传送来自星座型卫星导航系统

卫星的数据，后者是一个为我们的导弹导向，使之在攻击目标的 50 英尺范围内降落的系统。它们还必须接收和传送来自核爆炸定位的空基传感装置的数据，以评价造成的破坏，以及向空中指挥所和地下防空洞的指挥官们报告结果。

据说，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要从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间谍卫星上，接收用数字处理的核战场图像，尔后通过地面站把这种图象传递给隐形轰炸机驾驶员，驾驶员俯瞰苏联战场，搜索并消灭苏联的活动导弹。这必然是令人触目的功绩；但是实际上，空军中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在全世界的所有核力量，都必须直接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进行联系，在核战争中，每一分钟都事关重大。艾什顿·卡特站在一个核战总司令的立场上说：“我已经就如何在遭到攻击后的几个小时内作出全部决策的问题作好了安排，我也已经解决了在遭到攻击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注意，朋友们，我们就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作出全部重要决定了。’”但是，完全有能力使自己免受苏联核攻击的力量，无论这种攻击是来自隐蔽的陆上部队的，空中力量的，还是海军集团核攻击部队的，至少也要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可望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收到和传送电报。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卫星，有一组与流动部队通讯的天线，但是，这些天线只能复盖很小一个发射地区；因此，当它们穿越天空、陆地和海洋时，必须不断调整位置，以便追踪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联络人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理查德·朗多，曾

经得到必要的安全许可，了解过该系统的弱点。据他 1987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当特遣部队或活动发射台穿过海洋时，（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的覆盖波束，必须重新定位，才可能保证覆盖这些发射台。这可能使信息处理过程拖延很长时间。”朗多的结论认为，拖延的传递时间可能会持续 30 分钟以上。在核战争中，30 分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正如艾什顿·卡特所说，它足以使人们作出生与死的决定；它也是导弹从奥马哈飞到莫斯科的时间。如果有很多时间滴滴答答地流失，通过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传送的停火电报，可能不会按时到达核武器发射者手中。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还必须说明一种引起严重争论，但人们还知之甚少的现象，即电磁辐射脉冲。在大气层进行的高空核爆炸，会招致极严重的电磁变化。如果有一枚苏联弹头在奥马哈上空 300 英里处爆炸，它可能使带电电子象巨浪从一个海岸奔向另一个海岸那样，直接冲击美国；美国的各种电子系统，各种无线电发射装置，每一个计算机数据库，都将经历一次百万倍以上的闪电式冲击；每米电线上高达 5 万伏高压的强电涌，将通过联结整个国家的所有电路。这种现象是 1962 年发现的，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空爆炸了 3 枚核武器；尽管这次试验是在夏威夷上空 800 英里处进行的，但瓦胡岛的路灯还是全部熄灭，檀香山的各种防盗铃响作一片。这次试验表明，空中核爆炸可以造成暂时的、但是令人惊恐的后果，这在此前 17 年的核试验中是不曾想见的。今天，在 17 年以后，这种电磁脉冲的后果仍然被工程师们称作是一种“已知之未知”现象，一个只知其存在，但还不知道如何予以解决的问题。

核战争网络的整个结构是以计算机系统为基础的，如果计算机不能运行，几乎没有任何环节还能发挥作用。核专家们强调，他们不同意存在有抗

电磁辐射脉冲的可能性的说法，强调电磁辐射脉冲是一个严重威胁的专家，认为它可能打乱该系统每一个计算机的集成电路，使低压电路由于巨大的高压电涌而超负荷。从理论上讲，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整个电路设计，不致于因为一次核爆炸就遭到破坏；五角大楼正在想方设法避免该系统受损。联结民兵式导弹库和它们的发射中心的电缆，包有 6 英寸厚的铅皮；在新墨西哥柯特兰空军基地。五角大楼的科学家还把 1 千万伏的高压电，输往飞机和电子设备，实验保护它们的方法，总统的“末日”号座机，也安装了价值一亿美元能够抗电磁辐射脉冲的盔甲。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中还有一个网络节，却是以任何代价也不可能保护的，这还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人的头脑。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必定会削弱安装在一触即发之核武器上的这个唯一真正可靠的安全装置的作用。

五角大楼的预警警报系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突然狂躁不安。1980 年，当还很不完善的 46 音分计算机集成电路块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计算机数据显示屏报告说，苏联已有几千枚导弹发起了进攻时；当失误的雷达把初升的月亮以及一群乱哄哄的鸭子，解释为飞向华盛顿的核弹头时；以及当一名技术员通过警报系统操作试验录音带，从而引起了全面警报时，均是由一种特殊装置终止了这种失误警报的传播：这就是人的头脑，它否定了计算机发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信号。人的头脑能够进行理性分析，可以发现图象之间的差异，独立地确证一个孤立的事件；头脑具有人所独有的一个被称之为常识的特点，这是任何计算机也不可及的一种能力。

已经纳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新型指挥和控制技术，日益采用闭合电路取代人的理性分析，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局长乔治·海尔梅耳在作证时说，“在日益复杂的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中，人在复述和传递各种要求时的局限性是主要困难。”五角大楼前负责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位局长走得更远，他说“任何人也不可能进入适时决策系统的闭合电路，控制这个系统，它已用逻辑语言编制力程序，所以，计算机可以制定决策，操纵这场竞赛。”

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在 1987 年的一份含糊不清的文件中报告说，这个结论的基础在于认为，机器在战时可以取代走路的士兵和将军之类的人员。这个局说，它正在开发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以便“协助军事人员，向他们提出建议，或把他们从危险和迅速变化的复杂决策任务中解脱出来。”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还在研制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能够象坦克一样机敏和快速的“六足兽”；能够疾驰和跑步的“四足兽”；还有“手扶交通工具”，以及机械手。它还在发展机械人的智力，其重点是“保证解决复杂军事问题的灵活软件系统。”指挥官们将通过“被称之为艾拉斯（IRUS）的一种最先进的人机接口”与机器人取得联系。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所设想的未来的机器兵，能够接受命令，“但不能进行对话”，不会回话或躲避。这些机器兵将可能使指挥官们有能力使其命令在“强化的核环境”中得以贯彻。五角大楼所说的“强化的核环境”，指的是具有致命核放射物质的战场。

五角大楼明确地认为，在核危机时期倾泻于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计算机化的大量数据，一定会压倒人的头脑，它的结论是让计算机操纵这场景观，这也许是核战术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任何防护电磁辐射脉冲的装置，任何极高频天线以及任何计算机软件，都难以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受命去解释战场声音和信号的许多人，都可能在核战争爆发后最初几分钟和几

小时之内死去；没有他们，核战争机器上的安全装置也会遭到破坏。生与死的决定，可以通过由计算机化的电路板决定的那些死刻板板的程序化步骤去作出，但是，你不可能闲秘密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安装在卡车上的一台台接收机，去取代一个智能集团，你也不可能用卫星的传递作用取代人的理性。

不过，你能够把一个致力于核战争的通讯网络置于太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是第一个真正的空基作战系统，它将以新的、极不稳定和潜藏着危险的方式，把军备竞赛带到太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五角大楼每一个研究过指挥和控制系统问题的人都知道，赢得核战争的途径在于使敌人的反击能力瘫痪——打碎他们的脑袋，他们的C³I网络。很多拳击比赛的胜利都不是由于猛击对方的身体，而是脑袋，显然，克里姆林宫战争计划者也懂得这一理论。

除非美苏签定一项禁止在高空进行反卫星战的条约——美国已表示坚决反对这种条约，否则，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将会成为反卫星武器以及此类武器竞赛的第一步。现有的国际公约禁止将空间用于军事目标，但是，五角大楼却用这些条约为自己辩护，它告诉国会说，在关于反卫星战的政策声明中，美国所解释的“有权为和平目的利用空间，包括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在军事上利用空间”。

最后，形势还会由于系统的复杂性而越来越糟，越是复杂的系统，越可能出毛病；如果可能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恰在于此。以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为主体的核指挥和控制系统，是迄今人类头脑所创造出来的最复杂的系统。尽管它极其复杂，但若有任何一台计算机在危机时期报废，都可能被其他计算机解释为是对C³I系统的攻击，仅此一点就可能引发大规模反应。

如果一次核战争真的开始，闭合电路中的人必须识别受攻击的方式，而且是在C³I网络遭到攻击的瞬间，仅仅少数几枚武器对C³I系统的攻击，都可能被该系统解释为意在砍掉恐龙的脑袋，摧毁它的神经系统；巨大的压力会促使核司令官们争取在自己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崩溃之前，就发射他们的每一种武器。充其量，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能够使核战争持续到这样一个时刻：把某些保存下来的、支离破碎和胆颤心惊的力量搜罗起来，对最容易攻击的目标来一次还击，但是，这些目标既不会是苏联的导弹，亦不可能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只能是它的城市；第二次对城市的攻击除了进行盲目报复以外，难于达到预期目的。

少量武器对指挥和控制系统任何部分的袭击，最终均可能导致人们做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和破坏规模压缩在几个小时之内去完成的反应。保罗·布雷肯曾经写道，“有10枚核武器命中要害政治和指挥部位，就可能被解释为一次盲目的致命打击，”所有预先制定的进行有限和有控制战争的计划，都会因此而破产。“以指挥系统为目标的一次致命打击，很可能产生一次不发射几百、甚至几千枚核武器就难以结束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很容易使几亿人丧生。”

90年代美国的核武器，是以建立一个在长期核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系统为基础的，正是这个目的，导致五角大楼要建立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它将引导我们奔向的目标，是一场较为理想的国际大决战，一场更为有效、更

为复杂的核战争。

这种胜利观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我们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即使在核战争的理论基础消失的时候。美国并不想摧毁苏联，然而正象布什总统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是在继续建立这种秘密系统，寻找赢得核战争胜利的途径。

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背后的思想，使非常熟悉核战争计划的一些人也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切实际，该系统的费用难以承受，其保密措施也是反民主的；但是，我们那些当选代表却不能对这种思想进行公开争论，它也是那个封闭世界的一部分。

布鲁斯·布莱尔曾经是一名核武器发射人员，现在华盛顿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中心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指挥和控制问题。布莱尔皮肤苍白，有一双猎人的眼睛，今年43岁，70年代初是一个控制导弹发射的军官，一个在地堡中按动发射电钮的人。后来，他加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行列，作为一名士兵在“镜子”号飞机上服役；该飞机是一个空中指挥所，一旦战略空军司令部被摧毁，它就会成为核战争的神经中枢。这种经历使他开始思考核战争问题，并且在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出了一些清楚的结论。他为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以及进而为维持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花去了10年时间。

布莱尔离开空军之后进入耶鲁大学，钻研指挥和控制问题，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并为国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技术评估局所雇佣。1982年，国会委派布莱尔研究五角大楼的核战争计划以及设计用以实施计划的网络。布莱尔成了外界曾经看到过整个单一作战计划、核战争蓝图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他看了这个计划以及它的许多附件，包括赤裸裸暴露出来的美国核战争战略的指挥与控制程序，它的肌肉、骨头、韧带和神经末梢；他几乎看到了五角大楼每一个机构就这个计划所写的材料；他还访问了陆、海、空军的一些将军；最后用两年时间写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报告。即使在五角大楼，能够部分看到单一作战计划者也是极少数；从前，还没有任何文官能象他这样接触这个计划；五角大楼内外也还没有人曾经把这些事实系统地归纳整理出来。

布莱尔的结论认为，脆弱的指挥系统可能会使核战争无法控制，常规危机的任何实际加深，都可能逐步升级为核屠杀。他的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就是，解决进行核战争问题的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研究是受国会委托进行的，报告是由布莱尔撰写的，但是，它却为五角大楼所没收；五角大楼在上面盖上政府最高安全机密的大印，除现有的少数几份以外，其他统统销毁。布莱尔的报告现在被划入了“单一作战计划/极端绝密情报”一类，允许阅读的范围仅限于4个人：总统，国防部正副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国会不能看布莱尔的研究报告，布莱尔也不能看布莱尔的这个报告，五角大楼内只有三个人有权看布莱尔的报告。这是保密已达到了疯狂程度的一个例子，它先人一步，阻止人们有根据地讨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危机和战争中控制核武器。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曾经说过，自由意味着二加二等于四；布莱尔把二和二加在一块，但五角大楼禁止他说等于四。

布莱尔对其作品细节的讨论是不允许的，他只能讨论其研究报告受到压制的政治气候。布莱尔坐在他位于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杂乱不堪的小办公室中

说：“这些黑项目的一部分表明，人们对于能够就武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的民主制度、协商对话的制度失去了信心；把问题掩盖起来，消除了平等对话和协商谈判过程的压力。你们不必进行民主对话的肮脏交易……”

他说：“黑项目是对我们政治制度的歪曲，它意味着，有关核武器的决定权，一贯逃避民主控制的这个决定权，现在都赋予了一个内部小集团。我们不能把涉及国家目标的决定权，都赋予少数内幕人物，这是不正当地逃避协商对话过程，它会导致极严重地歪曲公众的争论，并且有可能造成严重错误的资源分配。”

关于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布鲁斯·布莱尔也得出了某些结论：“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用于一次长期核战争，那么，关于防务的传统目标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掩盖达到目标的特殊手段，例如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那是错误的，因为你掩盖了这些目标本身；那是用阴谋手段破坏我们的政府形式。”

布莱尔说：“你看，我已经读了单一作战计划，我也看了我们在遭到进攻后采取行动的计画，它们非同小可。进行大规模核武器对射的鬼话完全都是无稽之谈，那是办不到的，无论你花多少钱。我仍然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论。战争开始，战略空军司令部孤注一掷，一切都完了。”

说到底，如果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失效，我们花 200 亿美元扑了个空；如果它奏效，使它成功的幸存者将不得不忙于找食物，找住所，和一个在道义上受到严重创伤而无入过问的星球打交道。

有人在艾伯特·爱因斯但的晚年，曾经问他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武器，爱因斯但回答说确实不知道；不过，他清楚第四次世界大战可能要用的武器。爱因斯坦说，这就是：“棍棒和石头”。

第四章 隐形轰炸机

1988年11月22日在莫哈维沙漠一个绝密空军指挥所，五角大楼展示了自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它最大的秘密武器。

军乐队高奏“整装待飞的勇士”以及特地谱写的乐曲“隐形轰炸机之歌”；安全警卫带着警犬站立监视，当机库大门在格格格的响声中打开，一辆拖车拖着一台装上翅膀的战争机器出现在晨曦之中的时候，照相机咋嗒咋嗒地响个不停。

这个机械怪物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柏油跑道上，在人们思想上唤起了各种各样死亡的设想：有些人看到了一条刺__；有些人看到了一只凶猛的蝙蝠；有些人看到了来自日本科幻影片上的一只异手龙；在场的《时代》周刊记者看到的，是出自达斯·瓦德尔工厂的“一台杀人机器”。

这台机器的外观极为丑陋。它的外皮呈黑色，由铅灰到渐黑。它的躯体象一颗尖头子弹，其唯一的翅膀象一把锋利的大砍刀，它的尾巴象鲨鱼的一对牙齿。它的腹部隐藏着一个和左轮手枪的弹舱相似的可转动弹舱，用以装载核炸弹。

这就是人们最后看到的隐形轰炸机，即 B—2 轰炸机，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奇妙武器。简易机场上的围观者狂热起来了，空

军的高级官员，制造这种飞机的诺思罗普公司的职员以及国会议员们热烈鼓掌、欢呼和吹口哨。空军部长小爱德华·C·奥尔德里奇拿起了话筒：“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牢记美国永恒的希望和祈祷：

B—2 轰炸机将加强和平事业，但愿这架巨型飞机永远不要愤怒地飞行。”

空军一直在希望和祈祷说，这种飞机终究是要飞起来的。将近 10 年来，空军一直用歌与舞一般的简报向当选议员们推销这种轰炸机，说它是极大的技术突破，光滑的机翼设计及其能够吸收雷达波的表皮，几乎使苏联的早期警报传感装置不可能发现它。它会使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苏联空防系统变成废物；它会使核战争发生根本性变革；它是曾经制造过的最大轰炸机。__

但是，它的造价是多少呢？隐形轰炸机从研究到开发都是完全保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它属于绝密，即使国会也不得对此进行辩论。它很容易遭到知情者的批评，但没有这种批评，因为公众根本不知内情，但是，当空军把这种轰炸机推到摄像机前的时候，就再不可能使它那令人惊愕的费用继续保密了，企图把隐形轰炸机用黑预算掩盖起来，就好似企图用一条手绢去包一头大象。

已经逐渐清楚的是，这个项目的实施稍稍超出了它最初的成本计划。1981 年，空军想最多用 220 亿美元即可建造 132 架这种飞机，8 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数目的钞票已经用光，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架可供展示。__

随着诺思罗普公司为制造这种秘密轰炸机而忙碌，它的费用也在秘密增加。隐形轰炸机极其复杂，是由一个使用计算机工作的委员会进行设计的。现在，当这种飞机开出机库之时，空军承认他们的估价略微少了一点，440 亿美元可以囊括这个项目，尽管这个数字上还打着一个号，因为，这是空军按 1981 年美元计算的，现在，这些美元的价值还不到原来的 70%。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空军修正的数字略少于 680 亿美元，每架飞机的耗资在 5 亿美元以上，这是最低估价。在隐形轰炸机公开展示之前，我曾经和空军

的3名文职分析家交谈过，他们都说，若少于800亿美元，空军就无法建立一支隐形轰炸机群，这就是说，只有国会向这种飞机倾注足够的钞票，才可能满足90年代初进行大量生产的计划要求。生产时间拖得越长，该机的费用就越高。众议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说，每架飞机的费用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按照这个价格，隐形轰炸机可能永远也飞不起来了。

11月份的那个早晨，空军参谋长拉里·D·韦尔奇在离开简易机场后慢慢自豪起来。他说：“B—2轰炸机是自由社会在技术上一贯占优势的一个极好例子，这种飞机结合了进攻性轰炸机的所有特点——长距离飞行，巡航效果好，负荷量大，投弹准确，可靠性高，保养方便。”

韦尔奇如醉如痴的评说，既是以飞机又是以祈祷为基础的。站在他身后的轰炸机还是一只会飞的鸟；柏油道上的隐形轰炸机当天不可能飞起来，它第一次试飞的日子又向后推迟了4年。空军制造改型飞机，并没有预先制造一个试验模型；大力神火箭的制造者也是如此。如果隐形轰炸机在其试飞过程中被推向极限，一败涂地，人们将会提出某些严峻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提出，既然隐形轰炸机已经出现在夜色中。这些问题较之一切对付飞机的武器，可能都更加危险。从隐形轰炸机开始剥去其秘密外衣的那一刻起，只要人们可以看到它，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愚蠢行动的体现：此种飞机如此昂贵，国家不可能提供制造经费，这就是隐形轰炸机最秘密的秘密。

就这种飞机召开的国会第一次公开听证会，在1989年春天开始。该年4月，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第一次就这种轰炸机向公众作证时说得十分清楚：隐形轰炸机“极其复杂”，“极其昂贵”，“我们最终如何为它提供资金，以及它最后的代价是什么，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次，切尼说他不可能在空军找到任何一个人，愿意或者能够告诉他这种飞机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切尼作证说：“如果我不向你们表明我们在B—2轰炸机方面遇到了难题，我今天对你们就不能算是开诚布公。”在隐形轰炸机问题上，五角大楼的任何人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直率过。切尼答应对隐形轰炸机的现实情况重新进行考虑，这种措施确实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验。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令人难以忍受的数字和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开始向外界披露。

在切尼作证几天之后，国防部负责收购事务的副部长，五角大楼内“主管收购的铁腕人物”罗伯特·B·科斯特洛宣布辞职。几周后，我曾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一个思想库赫德森基金会拜访过他，科斯特洛说，制造隐形轰炸机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令人难以容忍，应该撤销。

科斯特洛指出：“无论象空军所说的那样，隐形轰炸机的价格在5亿美元以上，或者是象莱斯·阿斯平所说的，每架在7亿美元以上，我想，我们都不可能按这种价格提供支付；不管这种飞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利用这样的飞机，以这样的代价去进行攻击的目标会越来越少。”

科斯特洛所说的目标就是核战争计划确定的目标，显然，谁也不会派隐形轰炸机去袭击一个水泥厂或火车编组站。空军为隐形轰炸机选择的目标要有价值得多：苏联领导集团以及他们的活动导弹SS—24和SS—25，这些导弹均安装在卡车和火车上，不停地游动于冻土带。不过科斯特洛说，空军要找到这些活动导弹目标，会遇到很多问题，没有人知道如何击中隐藏在大片苏联领土某地的一个很小的活动目标。以苏联领导集团为目标的麻烦在于，

还有很多比使用秘密轰炸机飞往红场更加便宜和更为保险的方法去实施这个步骤。科斯特洛称，他讨厌使用“屠杀及其费用”之比例的说法，不过，隐形轰炸机的“屠杀及其费用”之比也实在太不合理：“如果要袭击克里姆林宫人的房间，我可以有很多便宜的行动方案。”

科斯特洛说，从隐形轰炸机推出到他于1989年5月辞职之间的6个月内，他一向认为应该砍掉这种飞机：“我曾建议取消这种飞机，在五角大楼也得到不少人暗地里支持，但是，私下支持者并不是非常多。”缺乏公开的热情支持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在五角大楼，他们不会为砍掉一些重要武器项目而颁发奖章。

科斯特洛说，隐形轰炸机作为一个试验项目仍然是有价值的。

他说，“我的意思是对它进行试验，试验它的电子装置系统，它的设计方案。不过，要减少损失，好比说，你要到拉斯维加斯去，当你走得靠前了，你就停下来；一旦把损失削减到了最低限度，你就会停下来。”这个在五角大楼曾经主管武器购买的人，把制造隐形轰炸机比作为在赌场上掷骰子。

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五角大楼大约已经支付了300亿美元

元，刚刚制造了一架实战隐形轰炸机。而每架飞机的造价，已经上升到了8亿2千万美元，且还在上升。正如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在11月份的那个早晨所说的，“这种新型轰炸机压倒一切的目标”，“就在于确保我们永远不要使用它。”

如果阻止核战争是一个显示力量的问题，那么，隐形轰炸机就是代价高昂的一个令人的崇拜偶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对于国家来说，其主要作用就好比是为秘密而付出代价的一个纪念碑。

在现代战争中，由人控制的轰炸机占有特殊地位，自1944年底以来就是如此：由柯蒂斯·李梅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指挥的B—29轰炸机摧毁了日本；各种新闻电影片上炸弹爆炸的熊熊火光，照亮了美国的电影院，东京以及上千个欧亚其他城市遭到破坏，都是这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战争技术的胜利。由人操纵的轰炸机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第一种可以随心所欲摧毁大城市的机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盟军就想拥有一种轰炸机能够从安全的美国机场起飞，穿越大西洋去袭击纳粹在欧洲的堡垒。杰克·诺思罗普认为他能够生产这种轰炸机。诺思罗普在70年代初，就开始为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设计飞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设计一种流线型飞机，可以更高的速度，跨越更远的距离，他在考虑如何使机身变得细长，直到它成为一种单翼飞机。

1939年，诺思罗普开始创立他自己的飞机制造公司。他是有胆量，有创新能力，除了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大量申请政府基金）去制造战斗机以外，其他别无所有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在战争结束前，诺思罗普就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洲际轰炸机，一种有螺旋推进器的飞翼型飞机，这种试验用轰炸机被冠之以XB—35的名称。战争结束以后，诺思罗普与1947年新组建的武装力量空军进行了密切合作。对远程轰炸机的研究，也由于冷战持续而不间断地进行着。诺思罗普维持XB—35的基本设计方案，同时运用试飞得到的经验教训和喷气推进的科学原理，制造了YB—49轰炸机。

诺思罗普的新型轰炸机看起来象一个喷气推进的飞标，它的机身和发动

机都埋藏在机翼里边；这种飞机表面光滑，可以减弱风的阻力，提高燃料效用。空军不能不承认 YB—49 细长的外形减少了飞机的雷达截面。这种特质并没有什麼神秘，雷达只不过是反射空中物体，显示该物体方位的一种无线电波：一个物体的雷达截面，是该物体反射多少雷达回波的计量方法。B—52 轰炸机的雷达截面就比较大，因为，它看起来象一个由于吃类固醇而摇摇晃晃、肩膀上扛着一条长凳的足球队前锋，在它庞大的机身上有肥大的翅膀，悬挂的引擎以及突起的尾巴；人们送它个外号叫多层碉堡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反射的雷达回波很多，其值大约为一百平方米。

杰克，诺斯罗普的轰炸机象飞鹰一样轻快，它的机翼和机身混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平滑的曲线形表面；它的雷达截面最多 10 平方米。如果美国在 50 年代进行一场反对苏联人的战争，YB—49 将是俄国雷达难于捉摸的目标。

这种飞机的机翼历来都是隐形设计，而且一贯都是不固定的。YB—49 要试验飞行员与其相配合。格伦·爱德华兹是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一次又一次把机翼抬高，企图掌握这种新型机器。爱德华兹在他的飞行笔记中记录说：“YB—49 今天又一次试飞，要得到一些数据实在是大困难了。这是我曾经想对付的一架最令

人讨厌的飞机，很多次都难以操纵。”

爱德华兹最后一次驾机试飞是 1948 年 6 月 5 日，与其他 4 名机组人员一起，由于 YB—49 失去控制而坠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上。在离他死去不远的地方，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以示对他的纪念。

由于对飞翼的活动性能灰心丧气，空军于 1951 年取消了 YB—49 轰炸机；诺斯罗普也在一怒之下关闭了他创立的公司。隐形轰炸机的梦想并没有泯灭。在此后 30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空军对制造这种飞机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但是，诱人的技术挑战仍在继续。整个 50、60 和 70 年代，一种隐形技术慢慢发展起来了。

隐形技术不过是一种古老伪装伎俩的高技术翻版。过去，欧洲军队的军装通常都采用鲜艳的颜色；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军队在绿色原野上与一支革命军作战时，经过坚苦斗争才认识到，明亮的红色大衣非常不利于隐藏。今天，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部兵军装，都是深色卡其布或以绿色为主的杂色布。在那些把肉眼作为发现战斗机的唯一途径的日子里，战斗机飞行员就已经认识到，必须用涂料把飞机伪装起来。

雷达和红外线传感装置取代了肉眼。隐形技术在于寻求不同的方法，把飞机伪装起来，抵御这些探测器。比尔·斯威特曼是这个领域内极少数专家中的一个，他说：“隐形是一种哲学，不单纯是一种技术。”任何这样的技术都不是秘密，更不用说爱因斯坦的等式 $E = MC^2$ 了。一个学过物理的高中学生也懂得这个等式，但却不可能制造出炸弹；隐形是把多种技术结合起来，使一架飞机难以被发现。寻找正确的结合方案是非常困难的、每一种设计、原料或系统的选择都会有弊端和缺陷，都需要权衡各种因素。隐形技术也有局限性：任何飞机都不可能是看不见的。

改变飞机的设计方案是最简单的伪装方法，B—52 轰炸机的发动机在机身外面，隐形轰炸机则把引擎藏于内部。红外探测器是通过追踪引擎散发的热量发现飞机的，隐形飞机使其发动机绝热，把它的废气与冷空气混合起来。金属是雷达回波最理想的反射物，所以隐形飞机不可能制作的象一个大金属箱。隐形轰炸机的表皮由雷达波可以穿透的材料制成，这些材料包括抗热热

塑性塑料，一种以可塑性环氧树脂为粘合剂，用钢化石墨纤维制成的碳化合物以及用以作防弹背心的合成纤维凯弗拉。然而，最轻微的擦伤都会破坏表皮的隐形作用，该轰炸机的操纵必须小心翼翼。

可透性表皮是毫无用处的，如果皮下的肌肉和骨骼裸露在雷达回波之中的话。在隐形轰炸机 14 万磅的总重量中，有 1/3 到一半的部件是由可以吸收雷达波，可以使雷达波转向、衍射和消失的材料制成的。这些材料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就象你的微波炉，当你打开微波炉时，它之所以不伤手，原因在于它的构件吸收了为你烤肉的微波。多种多样的物质都有这种吸收雷达波的特性，其中有一些在 40 年代就已经发现。铁氧类物质，就完全可以破坏发射来的雷达波束。另外一种方法是，在三角形似的楔形部位，涂上一层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就象蛋盒的底部那样，这些楔形部位能够吸收和抑制雷达波，犹如隔音房间的吸音壁能够吸音一样。

同样地，这些方法也有欠缺。雷达有各种各样的波长，安装足够多层次的材料以吸收不同波长的雷达波，那至少也要使飞机的防护层达到 8 英寸的厚度。这样的飞机将会非常隐蔽，但它可能根本

飞不起来。兼备各种雷达防护装置的隐形轰炸机的重量，就是它相对速度缓慢的一个原因，它的最高时速还不到 600 英里，尚不及音速的 3/4，一旦被发现，决逃不脱超音速米格战斗机的袭击，事实上，它连红眼睛导弹的袭击也逃不脱。除了它所携带的弹头以外，隐形轰炸机是一种非武装飞机，一旦被发现，便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目标。

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者是根据头脑中的新式雷达去制造这种飞机的，然而苏联人却很少把任何东西都扔掉，他们空防力量的大约 1/4 仍然是以旧式长波雷达为基础的。这种雷达工作的频率大致上相当于电视机，属甚高频，或叫 VHF，其波长在 1—10 米之间。隐形轰炸机的机身若装上轮子，稍高于 5 米；当雷达波长与它所扫描的机身尺码相近似时，雷达波一旦在机身周围流动，就会产生共振回波，吸收雷达波的物质不可能阻止这种共振现象。简言之，50 年代的陈旧技术长波雷达，就可以发现隐形轰炸机这个 90 年代令人眼花撩乱的高技术武器。

对付雷达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方法就是进行干扰，以和雷达同样的频率发射信号；一个轰炸机飞行员也总是按照惯例用雷达发现目标，引导他在夜间飞行中穿过崎岖不平的地面。不幸的是，这些技术都可以用来对付整个隐形概念。

空军的汤姆·艾姆莱曾经是加利福尼亚沙漠中一个秘密导弹试验场——中国湖武器研究中心——的技术指导，他对于武器问题略知一二。他说，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难以变动的物理学规律，根本没有办法把象隐形轰炸机这样大小的轰炸机截面，缩小到雷达不可能发现的范围以内。艾姆莱的老顾主是前空军部长爱德华·奥尔德里奇，他承认，隐形轰炸机“可能会被敌人的雷达发现，但只有当它接近雷达时。”何为接近？艾姆莱说，普通商用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雷达，可以在 35 英里以外就发现隐形轰炸机，或者说，在

大约 4 分钟的最高速飞行距离以外。苏联人防空力量的设备，比奥里尔国际机场上的控制塔复杂得多；当这个核火刑柱飞在高空时，4 分钟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要想不被发现，隐形轰炸机飞行员必须紧贴地面低空飞行，为此，他必须使用地形显示雷达；如果使用这种雷达或者是采用干扰措施，他就再不可

能隐形。一旦他打开干扰雷达，他的飞机就会通亮，犹如白宫的圣诞树，他就会成为敌方传感器和武器的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这个飞行员和他的对手，就好比黑暗空仓库中的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每个人都拿着手电，带着枪，谁先打开手电，谁就可能第一个死去。

最后，任何方面的修修补补都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有两只翅膀比有一只的好。飞翼式设计的机翼在飞行中是不固定的，而且永远不固定。这种飞机要想停留在高空，只有机上的几百台计算机不停顿地计算，不断地校正其空气动力装置，如果计算机报废，飞机也就完蛋。

在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受委派为隐形飞机工作的几万名工程师、技师和科学家，均一直面临这些令人苦不堪言的复杂问题。

隐形轰炸机的根子一直隐藏在军事秘密的阴暗角落里；1973 年阿以战争以后，空军对制造隐形战斗机变得明显有兴趣起来。阿拉伯国家的苏制 SA—6 防空导弹，在对付以色列的美制飞机，包括当时最先进的战斗轰炸机、F—4 鬼怪式飞机时，证明非常有效。

以色列的飞机装备有最先进的电子抗干扰设备，复杂的干扰装置，抗干扰的金属碎箔，为迷惑雷达和干扰导弹导航仪器而从飞机上抛出金属碎片等等，但是，它们均未能迷惑苏制导弹，在斋月战争的头 48 小时内，以色列损失了 70 多架飞机。

此次战斗以后的报告，明显地开始改变了空军某些部门的方向，在隐形技术方面有某些创造性思想闪烁起来。1974 年初，五角大楼自己的一个投机资本企业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开始为一个代号为“占领蓝天”的秘密研究与发展项目筹措资金，该项目的目的在于开发一个小型隐形飞机的原型。3 年以后的 1977 年初，在围绕内利斯空军基地漫延的沙漠上的一个被称之为梦乡的试验场上，一架隐形试验战斗机从内华达州格鲁姆湖附近的一片水质低劣的平地上起飞了。在以后几年的试飞中，尽管至少有 3 架秘密战斗机粉身碎骨，但这个项目依然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此后到 1977 年 6 月 30 日，空军突然对隐形轰炸机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一天是美国总统砍掉 B—1 轰炸机的日子，B—1 是空军企图用以取代 B—52 的一种飞机。吉米·卡特认为，B—1 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时代错误，是 60 年代遗留下来的技术，是一匹载着费用很高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的老战马，美国已不需要它。此外，他已经得到了有关秘密隐形轰炸机项目的简报以及空军的允诺。卡特就职 6 个月以后，宣布了“一个我曾经作出过的最困难的决定”。他是面对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帮助为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制造 B—1 轰炸机的工会工人的极力反对，宣布这个决定的，美国将不再购买新的战略轰炸机：B—1 寿终正寝。

B—1 没有死。20 年来，空军一直企图制造一种新型战略轰炸机，它现在也不会停止这种企图。空军中的一些著名将军领导了一场拯救 B—1 的地下运动，他们征集到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国会职员，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所在选区几千名 B—1 制造者的支持。

这些将军们反对总统的决定，卡特对他们也非常痛恨，怒斥他们“把我当敌人对待”。在反对卡特的人中，有一个是主管空军研究与发展项目的中将托马斯·斯塔福德，他是个试飞员，曾指挥 1969 年阿波罗 10 号围绕月球的飞行。总统和这位宇航员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卡特认为斯塔福德是下级，斯塔福德则说总统不过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斯塔福德站在总统身边，

在边缘上标有各种图案的轰炸机方案上划了一个 8 字形·企图说服总统帮助把五角大楼不同帐目上的至少 4 亿 5 千万美元,包括隐形轰炸机的基金在内,在 1978 年转让出来维持 B—1 轰炸机的存在。就为制造出一种新型轰炸机、任何种类的新型轰炸机而论,他的努力是首屈一指的。——

当年早些时候,斯塔福德在五角大楼接待了一个衣冠楚楚、高谈阔论商业的来访者,这就是诺思罗普公司的主席和主持人托马斯·V.琼斯。琼斯是一个宇航工程师,1960 年以来一直主管诺思罗普公司。该公司还没有上升为一流防务承包商,自杰克·诺思罗普设计的飞翼型飞机 YB—49 以来,还没有制造过大型飞机;它是作为一个分包商起家的,主要制造雷达干扰装置和导弹导航系统。

琼斯本人在宇航工业方面亦堪称为明星,他文雅滞洒,是斯坦福大学的理事和《洛杉矶时报》的董事会成员。他的家位于洛杉矶最优美的邻居贝尔埃爾的边缘,家中散乱,装饰以印象派的书画;他经常在那里举办野餐会,广交朋友。——

琼斯及其公司也是被宣判有罪的法人罪犯。1972 年 8 月的一天,琼斯到了办公室以后,把一叠 100 美元一张的 7 万 5 千美元钞票递给了一个名曰赫伯特·卡姆巴克的律师,他曾经是尼克松竞选总统运动的主要筹款人;这是一笔密而不宣的交易。总统的部下把这笔现钞送给了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几个盗贼,他们在次年 6 月抢劫设在水门综合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时被捕。当追综这笔钱到诺思罗普公司时,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向琼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想知道琼斯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他还想知道,琼斯及其公司是不是经常向不正派的律师和委托代理人送钱。

事实正是如此。在琼斯指示下,诺思罗普公司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把几百万美元的公司基金转移到外国银行,用以对美国在海内外的将军和政治家们吃喝和行贿。琼斯于 1974 年承认,他建立秘密的诺思罗普行贿基金,打通把 15 万美元现金转交尼克松竞选运动筹资机构的渠道是有罪的。该公司也被判有罪。在公司董事会认定,为在海外取得军事定货而用于行贿的这笔巨额款项应该由琼斯负责之后,他只好于 1975 年暂时从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琼斯坚持下来并且重又得到了对他公司的控制权,不过,现在的时势比过去更艰难了。越南战争已经结束,军备工业正在下滑;中东富油国家的武器市场已经饱和。琼斯在最近几年弄到手的最大一笔交易,就是签定了一笔 20 亿美元的合同,为 1978 年由卡特总统批准的新型 MX 陆基导弹的 10 枚弹头,制造计算机化的制导系统。为了满足国会提出的最迟交货期的要求,诺思罗普公司立即扩大其工资名单,雇佣了 2 千名新工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一位宇航工业分析家所说的那样,把它的劳动力由“瑞士手表的制造者,变成了一帮穿着报恩死人的 T—恤衫的伙计。”MX 导弹的制导系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个公司;严重的混乱毁掉了这些光吃饭不干活者的工作。五角大楼最后以欺骗罪控告诺思罗普公司,并且终止了为 MX 支付的 1 亿 3 千万美元,说这个公司伪造试验结果,把一个有缺欠的系统搞得在图纸上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系统。——

1978 年,在 MX 导弹那里似乎已不可能有很多利润了,五角大楼也没有答应诺思罗普公司制造其他什么武器。该公司的资金流动已经有停滞的危险,它需要进行新的交易。斯塔福德将军正坐在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上,

在他的头脑中会否可能有什么任务呢？

斯塔福德看到了一着棋，他将确定由诺思罗普公司研究一种新型进攻性轰炸机，一种将采纳在梦乡试验场上进行过试验的极新型技术的轰炸机。如果 B—1 不能存在下去，一种先进技术的轰炸机也许可能抓住总统的想象力。斯塔福德草草写下了有关这种飞机的一些大体上正确的数据：它用一灌油能够飞行的英里数；它的负载量；它的雷达截面平方米数。琼斯瞟了一眼这些说明，答应保持联系，便飞回了他洛杉矶的总部。诺思罗普公司研究了这些数据，展望了未来，又考察了其奠基人那富于幻想的轰炸机 YB—

49。到 1979 年夏，该公司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飞翼隐形轰炸机设计方案回到了五角大楼，一种秘密的轰炸机诞生了。——

“报恩死人”：有许多文化的民间传统，相信为死人送葬者，以后必定会得到儿者的厚报，死者会在关键时刻给送葬者以及时和有力的帮助，使之摆脱困境。

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诺思罗普公司企图甲缺乏技术的新工人。以解燃眉之急，实际上尤如希望死人报恩一样，只能事与愿违。——译注

它的诞生在年内即被公布于众，美国总统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以此作为他为自己政治生命进行斗争的武器。1979 年，吉米·卡特的政治生命开始严重受损：伊朗国王倒台，霍梅尼崛起，伊斯兰教的狂热在全世界爆发；52 名美国人在德黑兰被抓，他们的困境在晚上的电视节目中向全国播出。俄国人向阿富汗发动了残酷进攻。加利福尼亚的隆隆地震声此起彼伏。罗纳德·里根正竭尽全力争夺总统职位，他在每周一次的全国报业辛迪加广播节目中以及在竞选运动的全过程，都不断尽其所能向卡特发动猛烈攻击。

卡特取消 B—1 轰炸机的决定，成了里根手中的避雷针，他利用这个决定把卡特描绘为叛徒卖国贼，是国家防务活动中的内维尔·张伯伦。里根在广播节目中说，取消 B—1 轰炸机的决定，“对莫斯科必然是一个好消息，苏联人一定正在克里姆林宫举杯祝福。”里根在 1979 年还说，当吉米·卡特否决防务项目的时候，“苏联人高兴得笑了。”——

在 1980 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卡特极需要发出一种有力的信号；选民们对他的无能感到厌烦，对他的防务努力亦表示怀疑。

1980 年 8 月，卡特的助手泄露了决定制造隐形轰炸机的这一秘密新闻，企图通过这种秘密武器获得某些政治优势。泄露这个秘密给人们留下的最明显印象是，五角大楼还有一批看不见的轰炸机处于戒备状态。——

隐形轰炸机变成了一种政治飞机。民主党人需要有一个被据为己有的重要武器项目，他们选择了隐形轰炸机，并且坚决给予支持。共和党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喜欢这种轰炸机所包含的思想。但是，无论那一个党的政治家们都很少知道这种技术，更没有任何人会梦想到它可能需要的费用。

在 1981 年，一种新式武器的成本尚不是政治争论的问题，里根的当选使五角大楼及其承包商们兴奋不已。这位总统坚持对他的顾问们说：“防务不是一个预算问题，你们需要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吉米·卡特的预算分配方案是他右翼立场的反映，他为五角大楼的新项目拨款仅 200 亿美元；白宫的这个新班子则把这个数目追加到 330 亿美元，并且答应还可以更多一些。国会的大多数人则乐于顺水推舟。在里根的第一任内，防务项目的选择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几乎没有任何一项被禁止，差不多每一项都得到了批准。

为里根主管预算工作的第一任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在回顾五角大楼毫无

节制的开支时曾冷嘲热讽他说：“他们拿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但却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极其贪得无厌，所以一直处于神经紧张、走头无路的状态之中。”

总审计局的弗兰克·康纳汉曾力图追索第一任里根政府时期大量防务资金的来龙去脉。他说：“在这4年之内，五角大楼的防务预算翻了一番，由1981年的1420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2820亿美元。哎！那是一大笔钱呀！五角大楼并没有准备聪明地花这些钱，那里的整个奖赏体制就是为了弄到钱，弄到项目资金，这种情况导致他们干了一些蠢事。”

里根政府不能不作出困难选择：制造B—1呢还是隐形轰炸机·B—1也是一种政治武器，里根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有力的竞选问题，一个不只是防务、而且是爱国主义和道德的问题。在重要问题上，道义上的多数派一向在国会投票记录上保持领先地位，投B—1票的人是很多的。如果里根取消了B—1，他就可能被视之为一个伪君子。

还有隐形轰炸机，尽管人们知之甚少，但听起来它似乎是那么甜蜜，也不能放过，这种秘密技术太令人捉摸不定了，如果美国真的能制造出一种看不见的轰炸机，避开苏联人的空防力量，这种轰炸机就会是一种赢得胜利的武器。

诺思罗普公司的汤姆·琼斯正在竭力推动隐形轰炸机的成功，似乎他的公司的生命就决定于此。他不放过对隐形轰炸机的未来可能说上话的任何一个人，他乞求于五角大楼，活动于国会的参众两院，并在军事委员会成员及其工作人员的左臂右膀那里磨来蹭去。这个合同将是国家防务史上最大的一个，当然也是一种成本加价合同，边际利润担保，成本超额部分则由政府负担。这项工作可能价值几十亿美元，也许在研究与开发时期的纯利就有10亿美元，生产高峰时期的年利润可达20亿美元。把这样的轰炸机搞到手，可能使这个公司兴旺，也可能使它破产。

在航天工业的同行中间，琼斯占有特殊地位：他是总统的好友。琼斯自50年代他中止其演员生涯，成为通用电器公司的发言人以来，就一直是接近于里根的保守派企业家圈子中心的一个。他的妻子鲁斯，从好莱坞时代起就是南希·里根的亲密朋友。鲁斯的父亲康拉德·内格尔，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无声电影演员；在里根从事影视活动的年代，内格尔是公布奥斯卡金像奖的组织、电影艺术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除夕，琼斯一家都和里根一家在出版业大王沃尔特·安南伯格宏伟的棕榈泉庄园，举行庆祝会。1981年2月，琼斯一家也在白宫开列的参加总统生日宴会的宾客名单之中；是年5月，琼斯一家又在首都最繁华地段的一所古老而漂亮的私人住宅乔治城俱乐部，为里根一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正规宴会。汤姆·琼斯正在华盛顿沿着最快的捷径追逐他的飞机。

琼斯为他的隐形轰炸机讲得条条是道，罗克韦尔公司负责制造B—1的经理巴兹·埃洛，也把他那复活的飞机说得天花乱坠，并冠之以B—1B的名称。里根总统显然不可能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他的重建国家核力量的一揽子武器计划，包括132架隐形轰炸机和100架B—1轰炸机。对于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来说，问题在于为二者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只有在轰炸机方面存在着需要弥补的差距，才可能名正言顺，但差距在哪里呢？汤姆·琼斯上下活动，说他在1987年底能制造出一批隐形轰炸机；罗克韦尔公司则担保，将竭尽全力到1985年完成100架B—1。温伯格作为一个律师，他准备了自己

的理由，好象是要去审问一个困难的委托人。两种轰炸机的预算似乎都没有决定下来，可以为任何一个鼓吹者所获得，尽管在五角大楼，这笔巨额款项已经开始筹措。老资格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宣称：“温伯格毕竟不用力得到制造这两种轰炸机的钱而祈祷，我们用于这方面的钱很多，他是知道的”。

在1981年10月至11月的10天听证会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战略和战区核力量小组委员会，对温伯格的请求作出了答复。这次听证会和国会山上的其他听证会是一样的，尽管所涉及的是不平常的秘密飞机。听证会的副本显示，参议员们曾经为后来在辩论页岩钻井、电视谈话节目的形象以及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吃饭等问题时离题太远而表示道歉；有许多人在等待了10或15分钟以后才就秘密飞机提出了几个问题，接着便匆匆转入了下一个有关任命的议案。大多数人没有把足够充分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这个问题上。

温伯格向其不耐烦的听众们陈述了双方的理由。11月3日，他对美苏在轰炸机方面正在出现的差距提出了警告，他说，必须立即开始制造B—1轰炸机，以取代B—52；但到1988年，派B—1去对付苏联的空防力量将会是“自杀”；是时，就应该准备好隐形轰炸机中队，如果这项工作现在就能立即上马的话。所以，国家对于这两种飞机都是需要的。

细想起来，这似乎并不象是同意批准B—1轰炸机。所以在11月11日，温伯格反其道而行之，拿出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示B—1轰炸机在90年代完全可以穿越苏联的空中防线；而隐形轰炸机——当时的全称叫所谓先进技术轰炸机或缩写为ATB——是更高级的飞机，它对于本世纪末以及以后的国家安全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国家需要制造这两种飞机。

空军参谋长小卢·艾伦告诉参议员们，空军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非常彻底的研究，“答案是清楚的和毫不含糊的。在得到B—1的同时继续搞先进技术轰炸机，这是费用最低的方法”。为什么代价最高的方法却又是费用最低的方法，原因尚不清楚。

由于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沃纳强行要求在二者中选其一，艾伦有点局促不安：“先生，我很遗憾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我看不出有任何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强迫我作出选择，那么，我将首先考虑B—1轰炸机。仅仅有先进技术轰炸机将会是一条必走的危险道路，”因为这种技术非常新，尚无得到证实。B—1轰炸机实际上已经准备好离开生产流水线，空军也已经决定先生产几年这种飞机。隐形轰炸机还是一纸空文。

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本尼·戴维斯同意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不过是用了一种圆滑的方式。他作证说，这两种飞机都是必不可少的，隐形轰炸机的设计比较好；不过，如果要他在枪口下进行选择，他宁可要手头的B-1轰炸机，而不选灌木丛中的B—2轰炸机。戴维斯说：“如果要进行检验，如果这个国家说，我们不可能按照已提出的速度为两种轰炸机提供经费，我必须考虑近期作战能力，这就是B—1轰炸机。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永远把隐形轰炸机置于死地。”

戴维斯将军的解释，使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年轻参议员迷惑不解：

参议员奎尔：不知我能否占用5分钟时间，我还要去参加另一个会议，我的提问将限制在5分钟以内。您关于B—1轰炸机的说明，意思是大概在30年以后我们才能造出这种飞机。（战略空军司令部根本没有讲这样的

话。)……不过,这不是我的问题。B—1 轰炸机的设计在于以高速和从高空穿过防线,是这样吗?

戴维斯将军:不,参议员,我们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就是低空飞行……我们多年来一直是低空飞行的。

参议员奎尔:我们已从高空转向低空……那么,作为一种攻击机,隐形轰炸机好点还是 B—1 轰炸机好点呢?如果你

可能在今天或 1987 年进行选择的话,哪一种更可取呢?您选择 B—1 还是隐形?

戴维斯将军:正如我前面所说,我选择 B—1……

参议员奎尔:即使你到 1986 年可以得到隐形轰炸机的话?

戴维斯将军:哦,我并不认为那是个可靠的假设……

参议员奎尔:我只是想知道哪一种是比较理想的攻击机。

戴维斯将军:当然是理论上雷达截面比较小的。

参议员奎尔:那就是隐形轰炸机了?

戴维斯将军:是这样。

参议员奎尔:所以,隐形轰炸机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可能早一点得到这种飞机,体会把重建计划放在隐形轰炸机,而不是 B—1 上吗?

戴维斯将军:我想这个问题完全是一种假设,参议员。

参议员奎尔:的确如此;很多问题都是假设,将军。

戴维斯将军:如果我们有一种四倍于音速的飞机,那才是最理想的。——

奎尔的迷惑是可以原谅的,哪种轰炸机更好一点?没有几个参议员能下得了决心。在 1981 年,隐形轰炸机高度保密,还完全是一种理论,供参议员过目的材料,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很少。究竟是 B—2 还是不是 B—2?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研究报告以及五角大楼的报告,均对每一方面的论点都表示支持。乔治亚州的参议员萨姆·纳恩唉声叹气他说:“我们请专家检验,他们进来后要我们完全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四、五天后,我们又请另一些专家检验,他们进来后也要我们充分相信,他们是正确的。我们从没有单独研究一下各种不同之处……如果我们能够单独研究一下各种差异的话,我们就可能作出某些有意义的决定。”——

国会从来也没有这样作过。政治问题压倒了军事、经济以及技术问题。里根在 1980 年竞选中的压倒优势,使共和党的 B—1 轰炸机得到强有力支持,民主党的隐形轰炸机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只有少数共和党人否决总统的武器建议。11 月 18 日,众议院以 335 票对 61 票,同意制造这两种轰炸机;12 月 3 日,参议院也以 66 票对 28 票通过为这笔交易盖上大印。

汤姆·琼斯在国会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选择达拉斯的林坦科—沃特公司为隐形轰炸机的主要转包商,并没有使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得克萨斯的约翰·托尔感到不快;托尔提出由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参与研究隐形轰炸机的设计方案。这一点对于军事委员会中最有势力的民主党人,华盛顿“善发横财”的参议员,人称“来自波音公司”的鹰派人物亨利·杰克逊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诺思罗普公司负责市场和技术的老资格副主席唐纳德希克斯说:“波音公司经验丰富,林坦科——沃特公司声誉良好,选择它们确是令人愉快的巧合:这是在为未来着想。”希克斯于 1985 年离开诺思罗普公司,成为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五角大楼隐形轰炸机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监

管人，1987年他又离开五角大楼，今天仍然是诺思罗普公司的顾问。

希克斯认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看，制造这两种轰炸机是很有意义的：“它是向这个集团”——防务集团——“注入金钱的理想捷径”。

为B—2支付的黑钞票像石油溢出一样开始流动起来，通过军事工业联合体的食物链扩散出去。在主管这笔财富的一名诺思罗普公司经理的办公室，挂着一幅象躺在地上的一头豪猪似的美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百棵小松树，每一棵都插在一个城镇上，那里有一个隐形轰炸机的转包商或者是向其转包商供应设备的公司。包含着全国435个议员选区中383个的46个州，都插上了这样的小松树。

诺思罗普的黑钞票也漂回了国会山。该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79—1988年，送给国会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成员共605747美元，仅最后一年的1988年，诺思罗普公司就为感谢一些有防务头脑的议员而奉送他们6万2千美元，因为，他们对该公司适用于在烟雾弥漫的洛杉矶郊区皮科里维拉飞行的一种大型无窗飞机，发表了令人鼓舞的谈话。

1982年初，诺思罗普公司签定的成本加价合同获得批准，它真正开始了生产隐形轰炸机的过程。这个合同要求该公司从零开始，在6年之内制造一个机队的隐形轰炸机。诺思罗普公司卷起袖子，雇佣1万3千名工人；为设计和生产工作制造了一个3—D计算机制图网络，并为它的新生产线制造了成吨的机器人设备，该生产线就建在位于洛杉矶以北一座沙漠城帕尔姆达尔的空军秘密42号工厂附近。生产的压力是巨大的。迫于时间短促，诺思罗普公司为生产其装有蝙蝠翅膀一样的轰炸机而采用了快速跟踪式生产技术。按照这种快速跟踪制造法，生产阶段相互重叠，你在完成蓝

图之前就可浇灌水泥。用五角大楼人的话说，这种方法叫所谓“协作”，也就是研究、工程、测试和生产同时进行；协作的整个思想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诺思罗普公司没有时间首先制造一个试验模型，而后再从中找到欠缺之处；它直接通过3—D计算机数据库生产隐形轰炸机。

它在该数据库调校之前就制造了机床，并立即形成了流水线，在研究与开发接近于完成的3年前，它就开始了第一个模型的制作。兰德公司1988年为五角大楼提供的秘密报告警告说，过于紧张的时间安排，在象隐形轰炸机这样复杂的系统中，必然招致严重的技术混乱。

诺思罗普公司严重低估了它制造这种轰炸机所需要的时间。

该公司挂在办公室墙上的日程表，规定了严格的进程安排，这是工厂工人们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该公司也严重错误地估计了隐形轰炸机的成本；正如总审计局调查人员弗兰克·康纳汉在1988年的一份非常秘密的报告中告诉国会的，这个错误至少要使纳税人多付110亿黑美元。但是空军说，协作比成本更为重要。

隐形轰炸机的战斗能力也是如此。1983年，空军突然命令改变隐形轰炸机的总体设计方案。正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戴维斯向参议员奎尔所解释的，轰炸机有高空飞行的和低空飞行的，空军决定，它想要隐形轰炸机具备这两种性能。希克斯说：“空军决定，它要求隐形B—2轰炸机有更加精确的进攻能力，它必须防范过去不曾被人们预料到的、将来仍然可能未被预先发现的威胁。”

这种飞机最初的使命是，在相对较为安全的4万英尺或更高的高空去摧

毁苏联人，现在，空军要求诺思罗普公司使隐形轰炸机在 400 英尺或更低的空中去完成这个任务。在空气稀薄的 8 英里以上的高空和在大气层很厚的海平面，战斗机的空气动力装置和燃料的效用是完全不同的，强调其机架的构造是十分重要的，一旦要求飞机以高速穿过大山的话。使隐形轰炸机成为一种低空飞机，它必须减轻重量和增加力量。诺思罗普公司不得不重新回到制图板上去。

希克斯说：“你们必须回过头去，从零开始，重新构思”这种飞机。一旦第一架生产模型完成，就不可能再对隐形轰炸机进行调校了，这种飞机不能有缺陷。由计算机推动的设计方案意味着，生产出的第一架轰炸机和最后离开生产线的一架是一模一样的。

仅仅设计方案的改变，就要多耗费 10 亿美元，并且使生产推迟一年，由此而浪费的生产力和时间，价值 15 亿美元之多。

进行这种改动的原因是什么？要飞行员低飞只有一个真正原因：避免被雷达发现。如果隐形轰炸机真的是不可能被发现的话，它为什么还必须贴近地面呢？这种重新设计的一个目的，在于这种轰炸机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搜寻和摧毁苏联的活动导弹。没有人知道如何完成这种使命的事实，并没有吓倒空军；这些活动导弹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一天，在亚音速隐形轰炸机可能发现它们之前，就完全可能发射出来的事实也无关紧要；对这种想法不可能进行争论的事实，使这笔交易已成定局。由于后来这种想法而追加支付的几十亿美元，几乎一直保密达 6 年之久。

这部机器上的另外一把活动扳手，是调查诺思罗普公司为制造隐形轰炸机而雇佣的几千名新工人的忠诚程度，爱国思想，以及正直精神：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调查局被委派以这个任务。国防安全调查局已经严重超负荷工作，它有 250 名调查人员，已承担有其他责任，例如，监督黑武器项目正在进行的国防工厂和私人公司的 1 万 3 千 5 百座建筑物的安全。

在这个国家，隐形轰炸机的安全规定是最多的和最彻底的。它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被称之为“七个屏幕”：每年对 2500 名工人进行测谎录像检查。五角大楼的调查人员不可能完成他们积压的工作，一个新工人平均必须等 6—8 个月以接受政府审查，政府要访问他的邻居，检查他的信用程度以及追寻他的生活历程。据总审计局报告，这几千名工人在等待安全检查期间要领取全工资；这笔通过国防工业支出的费用，仅 1984 年就高达 10 亿美元，和防范苏联间谍的费用持平。

这些新雇工要在诺思罗普公司设于皮科里维拉的工厂接待室内待上几个月，他们喝咖啡，看杂志，凝视天空，犹如等待长时间延期航班的游客。这些围栏似的接待室，在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名字，在加利福尼亚州尼维尔的罗克希德导弹和航天公司，等候的工人把他们的接待室称之为“冰箱”，而在皮科里维拉，他们则称这个地方为酒柜。

一些骗子从缝隙溜过去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1984 年 3 月，诺思罗普公司雇佣了一个名叫威廉·赖因柯的男士，出任隐形轰炸机工程师，赖因柯在其申请表格上填道，他大学毕业获得工程专业学位，一直在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研究绝密卫星项目。实际上，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刚刚由于赖因柯超支而解雇了他。申请表还漏填了一些事实。赖因柯说，他毕业于一个工程学校，实际上还在佛罗里达蹲过监狱，并曾由于偷汽车和使用空白支票而被强劳 3 年；

他是个曾经 13 次被捕的 10 年级退校生。五角大楼精心设计的安全屏幕，并没有向诺思罗普公司显示这些方面的任何情况。有一次，当除了 4 名国会成员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被拒绝接近隐形轰炸机项目时，赖因柯却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赖因柯只不过是能够随机应变罢了。但是，他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签定防务合同的企业，名为 RF 工程，并且搞到了价值 60 万美元的隐形轰炸机转包合同。即使按照防务工业合同数额巨大的标准，赖因柯的合同价值也算是高的了。RF 工程把价值 20 美元的无线头戴授活器，以 90 美元的价格卖给诺思罗普公司，把价值仅仅 1.24 美元一英尺的普通电线，标价 4.50 美元；每次标价都要在隐形轰炸机的价格标签上多少加上一点。诺思罗普公司的审计人员，在 17 个月之后才发现赖因柯是在为自己购买设备，他们告诉了国防安全调查局。

以诈骗罪判处赖因柯监禁 5 年的一位联邦法官说：“我发现赖因柯这种背景的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实在是令人震惊，几乎是令人恐惧。但是，我并不认为赖因柯先生令人震惊，世界上有很多赖因柯先生；不过，我倒发现诺思罗普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以及政府是令人震惊的。”

在赖因柯的名字进入诺思罗普公司工资单之后的两周，诺思罗普公司主管购买隐形轰炸机部件的一位经理罗纳德·布鲁西奥，在他的起居室和一个搞经营活动的熟人理查德·哈斯克爾闲聊。哈斯克爾是为隐形轰炸机制造某种部件的一个地方工厂、RH 制造厂的部分资产所有者；他们两人的关系比单纯的职业来往更多一点。布鲁西奥是一个骗子，哈斯克爾是政府的一名侦探。

当年冬初，联邦调查局曾拜访过哈斯克爾，让其参与调查和南加利福尼亚航空空间工业贪污受贿案有关的情况。哈斯克爾对其来访者说，他有一些他们可能会感到兴趣的情报，RH 制造厂为隐形轰炸机转包合同而支付布鲁西奥 5% 的佣金。这种事在工业界已是惯例，其别名叫“5 分钱职业”。

美国政府答应对哈斯克爾免于起诉，如果他能够设法帮助使布鲁西奥上钩的话。1984 年 3 月 16 日，当二人谈到比 5 分硬币更有利可图的交易时，带在哈斯克爾身上的一个小型录音机，抓住了这次谈话的机会：

布鲁西奥：我们谈谈你找工作的事吧……那个事值得干，一个零件 100 美元，是吗？……我现在把价格提高 75 美元（达到 175 美元）。你最初提出的 100 美元的价格是个好价格，你说呢？在你看来是这样，它可以为你提供少部分利润。我现在把价格提高 75 美元……我希望得到这 75 美元加价的 25%，你留下 75%，行吗？

哈斯克爾：好吧。

布鲁西奥：这似乎是一种公平的意见。

布鲁西奥把隐形轰炸机当成了他提早退休的一个理想航班。

布鲁西奥：我们……处于这个项目的最低层。我今年正好 44 岁，我已经下决心 55 岁退休。我只要这里捞一点，那里捞一点，把钱放在鞋箱里，把箱子埋起来，埋在后院……

哈斯克爾：不要那样贪婪。

布鲁西奥：不要那样贪婪！你知道，这里有 5 分钱，那里也有 5 分钱，每一个人都肥起来，每一个人都高兴；我 55 岁就要

说再见了，伙计；我要买一间小屋，要买一条在河里钓鱼的船哈斯克爾：很好，你就朝那个方向奔吧。

布鲁西奥：人就是越贪婪，越引人注目。

布鲁西奥和他所喜欢的那些隐形轰炸机的分包商，由于采用优惠报价艺术而又肥又快活。优惠报价是一种非法定价方法，它要求买卖双方达成秘密谅解。

下面是布鲁西奥对哈斯科尔所作的解释。布鲁西奥联系 3 家分包商，他们达成了秘密协议，3 家同意轮流充当报低价的角色。当布鲁西奥手中有隐形轰炸机的某种任务要转包的时候，他就会在合同上用铅笔写一个小写的字母“C”，表示优惠转包，然后一式三份寄发给他的朋友们。按照他们预先的安排，其中两家提出很高的报价，使布鲁西奥不可能接受，而第三家则提出一个可以取胜的“低”报价，实际上也是一个要把价格提高到包括布鲁西奥的佣金，以及很高利润的高报价，从而制造一个竞争报价的假象。布鲁西奥很乐于奖赏这个秘密合同，而踢开其他合同；由于贪污受贿费用而膨胀起来的隐形轰炸机的制造价格，再一次上升。

布鲁西奥告诉哈斯科尔，他和一帮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共同工作，他们都属于隐形轰炸机零件的供方或需方。如此轻而易举地从隐形轰炸机项目中偷钱，使哈斯科尔大为震惊：

布鲁西奥：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负责，我们不要任何人监管……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想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或者，我希望他们要什么就……没有人提出美元或类似问题。

既然我能够说明是竞争报价，无论是真竞争，优惠竞争，或胡拼乱凑的竞争……大家看起来都不错，我们赚钱了。

面对这盘录音带，布鲁西奥对其欺骗罪供认不讳，不得不在监狱里渡过他以后的 3 年光阴。本案的联邦公诉人弗雷德·希瑟说，布鲁西奥是以隐形轰炸机的非公开性为掩护的，“秘密的外衣使他有可能干一些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干的勾当。”希瑟的老板，洛杉矶的美国律师罗伯特·邦纳告诉我，他认为布鲁西奥一案是隐形轰炸机项目中搞欺骗活动的“冰山的倾覆”；但是他说，由于隐形轰炸机属于秘密，这类案件若没有人自愿充当秘密侦探，几乎是不可能进行调查和提起公诉的。邦纳的办公室并没有为这样的自愿者所淹没。

布鲁西奥的录音带的副本，在由国防部为保守隐形轰炸机秘密而剪裁了几部分以后，几经周折被送回了华盛顿，它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联邦调查局秘密录音带的副本，常常有一种特殊味道；这一次，他们又使国会调查人员的鼻子一阵又一阵地抽搐起来。

1986 年 1 月，一个很有势力的议员看到了这个副本，他就是密执安州民主党人约翰·D·丁格尔，此人块头大，举止粗，专爱揭露丑闻，浑号“卡车”。丁格尔驾驶一条大帆船：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特别是它的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仅仅就名字而论，丁格尔的委员会似乎无权过问五角大楼的事务，但他的看法是，“商务”意味着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问题，五角大楼的合同是由城镇中最大的商业活动构成的。

丁格尔非常喜欢苛责那些应召来解释五角大楼神秘财政问题的将军们，以及防务工业部门的总经理们，他认为，他最得意的时刻，就是严厉盘问把个人支出记入公司一般管理费用帐目的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 A·M·洛夫莱斯博士。防务工业巨头一般管理费用的 94%，都要向纳税人征收。当摄影机转动起来的时候，丁格尔把支出帐目一页一页地翻开，他大声念道：“弗斯顿

在西尔弗·梅普尔农场登机，87.25 美元”。丁格尔透过他那很厚很厚的眼镜，盯着目瞪口呆的洛夫莱斯博士问道：“谁是弗斯顿？”弗斯顿是洛夫莱斯博士的狗。尽人皆知，通用动力公司向五角大楼索要的非正常开支达 2 亿 4 千 4 百万美元以上；倒霉的弗斯顿成了防务公司拿于薪的象征。

1985 年，国会的调查向美国人介绍了五角大楼用 9606 美元购买的艾伦板钳和其他可疑产品，在当地五金商店，一把上好的艾伦饭钳不到一美元。五角大楼为普通工具和备件而支付的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价格，只是一幅巨大画面上的一个很小部分，但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典型，人们很容易理解。丁格尔的委员会力图宣传这种典型；他一直在考虑该委员会的兼职顾问，空军文职分析家和五角大楼内部最有名的批评家埃尔尼·菲茨杰拉德提供的线索。菲茨杰拉德曾经作证说，要了解一架军用飞机的成本，人们就应该把它看成是“收集接近于完成组装的极高价飞行备件的费用。”

1985 年，国会形成了少有的一致意见：防务预算失控。由于听证会的刺激，一个其成员包括从鸽派中的激烈分子议员到鹰派中的温和分子议员组成的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根据得到的惊人事实向五角大楼发动了猛烈攻击。由专业经济学家莱斯·阿斯平把持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众议院，是防务美元的主要策源地，是首先提出全部支付清单的地方。40 年来，该委员会一直被诸如乔治亚州的卡尔·维逊和南加利福尼亚的门德尔·里夫斯这样的主席所控制，他们与五角大楼形成了一种相互保护的关系，陆海空将军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甚至给的更多。阿斯平则不同，他及其多数同僚认定，一年 3 千亿美元的军费足够使用，五角大楼的预算要停止增加。

五角大楼内的人很清楚，黑预算仍在不停地增加，由于缺乏监督，它比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增加得更快。读者广泛的行业杂志《防务新闻》于 1985 年 9 月发表的一篇社论，对日益逼近的危机提出了警告：“公众对高价备件的愤怒，与似乎就要到来的对防务开支的冲击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在未来几个月内，纳税人会逐渐意识到，如此大量的武器项目和几十亿美元的开支，均避开公众监督而隐藏在高度保密的‘黑’计划之类的老鼠洞中……公众看到这个老鼠洞的内部情况，并为其存物所激怒，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是由于一种大规模系统的失败吗？又有一架飞机坠毁了吗？10 亿美元被浪费了？这种黑制度购买的 650 美元一个的锤子在哪里？就在这个老鼠洞中，它将会象漫天要价的航空备件那样用以达到同一个目的：损害五角大楼和防务工业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

已经对五角大楼失去信任的丁格尔，想看一看这种黑预算的内幕，想抓住那种黑锤子。五角大楼最大的武器项目隐形轰炸机，已经是很长时间的秘密了。这位议员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五角大楼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些大规模项目，对国会，对总审计局以及对它自己的审计机构统统保密，他们每次保密的事实一旦公诸于众，总是以谎言作掩护。”

1986 年 1 月 16 日，丁格尔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把它与布鲁西奥录音副本的复印件钉在一块，寄给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国会与五角大楼围绕黑预算进行的战斗中，这是可以听到的第一轮枪声中的一声。

丁格尔写道：“小组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了空军的所谓‘秘密’项目日益迅速扩大的规模……了解到这些‘秘密’项目中越来越多的弊端。这种秘密正在被承包商作为手段，掩盖其错误要价，过高要价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彻头彻尾的非法活动……空军似乎向承包集团提供了空白支票……”

丁格尔继续写道：“归结起来说，空军实际上一直就与‘黑’项目有关的资料隐瞒国会。”丁格尔要求从这位部长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空军超过1千万美元的全部秘密项目的清单；每一个项目的费用，空军调查过的那些搞欺骗活动的项目名字。丁格尔要求在10天之内知道这一切。

丁格尔什么也没有得到。温伯格决不会答应这种要求，他3个月没有回信；而当他回信时，他是为了向这位议员保证，在那个黑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不当之举，尽管并非一切都好。1986年4月9日，温伯格收到了来自国会山的又一封信，这封信是不可忽视的，它来自众院军事委员会的莱斯·阿斯平和另一个重要的民主党人，亚拉巴马州的比尔·迪金森。阿斯平和迪金森是代表该委员会全部47名成员写这封信的，该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先生”：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秘密”这把保护伞掩盖下的防务项目

正在不断增加……当然，特别项目是必需的，不能使每一个项目都公开进行是令人遗憾的，然而，使我们防务努力的大部分都公开进行还是基本的，我们的防务项目需要动员人们的支持，仅此一点就要使其公开进行。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掩盖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的数量，也是一种很不好的政府政策。

特别项目基金的大部分都为隐形轰炸机和先进巡航导弹所使用，我们不相信，对包含于这些项目的大量基本数字——

本财政年度筹措资金的需要量以及这种项目的估计费用——

继续保密是一种合法要求。事实上，包含在这种（秘密预算）中的大约70%的存金，在我们看来似乎都可以解密……

这封信冷静的语言，是一次严肃挑战的标志，两位国会议员在告诉这位国防部长，他隐瞒隐形轰炸机费用以及70%的军事黑预算的理由是非法的。

五角大楼自己的章程规定下述情报应属绝密，这种情报的扩散可能造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阿斯平和迪金森的意思是，公开多数秘密武器的费用，丝毫不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对隐形轰炸机的费用保密，有害于其他理想：公开性，责任感，公众辩论以及合理决策。他们要求现在就公开秘密武器的价格。

温伯格拒绝把“最基本的数字”公开化：隐形轰炸机的年度预算，有关整个机群的最新数字。但是他意识到，隐形轰炸机的费用总有一天要揭示出来。这种认识导致他公开了某些明显的数字。

1986年6月3日，温伯格就隐形轰炸机公布了一个“事实简报”，它为每一架飞机提供了一个2亿7千万美元的“估计费用”，整个项目则需要366亿美元，这是按1981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的。

温伯格说：“这个项目尚在按计划进行，技术问题已经解决，正在发挥效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丝毫无真实可言，即使按照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估计费用实际上也缺少110亿美元以上，而且这种费用还在一天天上升；诺思罗普公司的生产线也遇到了麻烦，技术亦没有经过试验。这个“事实简报”完全颠倒了事实。

这些导向歧途的事实和数字，可能是由于最坦诚的不规行为所致，它们不会引起有力的争论。1986年秋，五角大楼开始有选择地对那些希望得到事实简报的议员发放安全许可证。然而他们所得到的，正如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俄亥俄州议员约翰·凯西希所说，是“歌与舞”。有空军和诺思罗普公司联合炮制的这些简报，等于是一种公关演讲。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迈克·宰纳说：“他们不正直，不坦率”。宰纳在看过简报之后告诉

我，国防部欺骗了他：“显而易见，当国防部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对国会和美国公众并不那么诚实。”1988年我采访过众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职员，他曾经说，那些简报都是“推销商品的宣传，不折不扣的欺骗活动，就象某人在告诉你大人物多么有才华一样。”

到1986年底，空军几十年梦寐以求的进攻型轰炸机B—1B终于准备就绪。象隐形轰炸机一样，它也是按照协作原则制造的，这个经验也许能够提供某些有用的教训；国会采用的干预方法可能也会如此。五角大楼坚持不能对B—1B轰炸机进行“微观控制”；国会答应以掩盖该飞机的预算为交换条件。

1987年1月16日，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称B—1B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在纸上也许如此。但是，它不可能飞得很好，它根本没有完成。它的飞行控制器不起作用；它在中空中很不稳定，以至无法通过油罐重新加油；它的地形显示雷达不工作；它

不可能靠近地面飞行以躲避敌方雷达；它的计算机化的神经系统中心、用以避开敌人雷达的电子干扰装置，即大脑损伤。

差不多3年以后的1989年底，电子干扰装置仍然不能工作，空军向国会乞求19亿美元进行修理。在这100架B—1B轰炸机中，有3架在训练飞行中坠毁：1987年9月27日，B—1B的3名飞行员由于其飞机碰上一只鹈鹕而惨死，这只鸟刺穿了飞机的外壳，损坏了它的电子控制器，从而导致了飞机坠毁。1988年11月6日，第二架B—1B在空中燃烧坠毁，幸运的是，4名机组人员安全跳出机舱。11天后，第三架又爆炸燃烧，飞行员生还。

从B—1B轰炸机可以吸取一些教训，但这些教训是残酷的。

它的制造者空军、罗克韦尔公司以及国会，要求采用协作方法，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生产出一种有缺陷的飞机，这预示了更为复杂得多的隐形轰炸机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协作方法对这种秘密轰炸机生产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影响。B—1B轰炸机基本上是一种不保密项目，然而在它那里也留下了秘密和欺骗的烙印。空军为了维持这个项目而隐瞒了这种飞机已知的缺陷，五角大楼说，B—

1B轰炸机将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飞机，如果国会不插手，只让空军负责的话。国会相信了这种说法。阿斯平在B—1B公开以后说：

“国会的所作所为就是不折不扣地接受五角大楼的要求……空军把事情搞糟了……还不告诉任何人有关情况。”他后来又在国会对其同僚们说：“当问题成堆的时候，负责B—1B和隐形轰炸机的机构空军系统部，还极力进行掩盖；不仅国会和公众一摸黑，国防部的文职领导人，甚至空军的一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

1987年5月1日，拉里·韦尔奇不太肯定地承认了隐形轰炸机问题。这位空军参谋长在一次进早餐时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我并不是说我们意识到了全部费用和危险，因为显而易见，在这一方面，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规定隐形轰炸机第一次试飞的日期正在临近；由于改变设计方案以及其他原因，这个日子已经后推了两年。现在又放出了风声，那公开的一天又无限期延长了，在皮科维拉和帕尔姆达尔两地的诺思罗普公司，某种挫折又出现了。

麻烦的一个明显迹象出现在财政方面，因为诺思罗普公司的会计在1986和1987年，不说明任何原因就一笔勾销了2亿1千4百万美元的利润。航空

空间分析家们认为，原因可能是隐形轰炸机，他们仔细研究了诺思罗普公司的财政帐目，勾销的原因在于一个非常大的黑项目。

可供考虑的另一个原因是诺思罗普的采购部，它负责从分包商那里购买大量轰炸机零件。1987年秋，空军的一次审查使采购部遭受了挫折，结果，五角大楼中止了对诺思罗普公司某些款项的支付，部分原因就在于1987年勾销利润。空军究竟扣留了多少钱，当然是保密的。

第三个原因显然是相互有关的螺母和螺栓问题。我在与主管武器购买的前空军部副部长罗伯特·科斯特洛交谈的时候，他说隐形轰炸机的质量控制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科斯特洛在制造业的质量控制方面有一定经验，他曾经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总经理。科斯特洛说，隐形轰炸机的扣件、螺母和螺栓以及把轰炸机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凸缘法兰，都有很多问题。

科斯特洛说：“你在这里所得到的，是一台他们从供方买来的各种不合格的扣件组装的机器。这些扣件总是给人们造成麻烦，你必须对它们全部进行测试，不然，你就必须要求供方用统计学的方法去检验质量控制。1988年，他们对B—2轰炸机的零件

根本没有这样作”，尽管前6架飞机已经在帕尔姆达的工厂离开了生产线。

用于隐形轰炸机的很多钛扣件都来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沃伊香的公司。1988年，沃伊香公司引起了在航空空间工业部门调查诈骗案的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注意，这个诈骗案调查组怀疑，在沃伊香公司扣件上加盖的“11号检验员”的印章是伪造的。

沃伊香公司把它的螺母和螺栓卖给西雅图的波音高级系统部，波音的子公司再把这些零件安装在隐形轰炸机的机翼以及许多其他部件上。尔后，波音又把完工的部件卖给诺思罗普公司的采购部，也就是1987年底没有通过空军检验的那个部。

1988年2月，也就是联邦特别工作组开始其工作的同一个月，波音高级系统部主管质量控制的经理，下令停止对沃伊香公司扣件按惯例进行检验。

《西雅图时报》的一个记者，从这位经理那里挖到了一份文件摘抄，该文件称：“立即停止在收货时对扣件进行的例行检验。”为什么？这位经理说，只检查“可疑”扣件，每月可为波音公司节省9千美元。为了省时省钱，波音高级系统部取消了它对这些扣件的检验；但在联邦调查人员看来，沃伊香的所有扣件都是可疑产品，正如科斯特洛所说，一旦用到这些扣件，“你必须对它们全部进行测试”。诺思罗普公司、波音公司以及沃伊香公司，均没有这样作。

对于诺思罗普公司以及秘密飞机来说，1988年冬天是一个惨淡的冬天，是年1月底，空军又一次秘密推迟了隐形轰炸机的第一次试飞时间，直到8月份。计算器仍在不停地走动：每延期一个月，就要使纳税人至少多耗费一亿美元。2月25日，诺思罗普公司的4名雇员上书，对该公司提出诉讼，他们的律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听起来令人义愤，他们指控诺思罗普公司向政府提出，暂时要几千名雇员“一天到晚坐下来看报，喝咖啡”。这种现象既不非法，亦不令人惊奇，属正常情况。在皮科维拉“酒柜”中的生活费用，亦是这个黑世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诺思罗普公司与任何其他更大的防务承包商相比，并不属于更恶劣的罪犯之列。

但是，这个诉讼案超出了“酒柜”的范围，涉及到诺思罗普公司的办公

室，它宣布，诺思罗普公司的审计人员，已经准备好一份调查研究草稿，说明隐形轰炸机多收费 4 亿美元，而且，该公司经理们撕毁和焚烧帐目。由于隐形轰炸机保密而复杂化的混乱诉讼程序，很快使该议案本身被终止，在一年半时间内不知去向。不过，它所提出的指控引起了一系列反响。

经分档归类，该讼案应按照 19 世纪的一部法律《惩办要求条约》进行审理，因此责成司法部对这些雇员的指控进行公开的民事调查。洛杉矶的联邦调查人员叹了口气，又继续他们的工作；8 个月以后，他们给华盛顿司法部的上司们写信说，关于诺思罗普公司向政府索要高价的纯经济问题，他们不可能立案，因为诺思罗普公司的索价是空军批准的。

法律是以神秘方式发挥作用的。民事调查的原始资料变成了刑事调查的新内容。如果空军批准，或者是宽容了，或者是完全忽略了这种索价，那么公正他说，联邦政府都不能起诉诺思罗普公司，并追回多索款项。但是，如果五角大楼那同一些职员们，为了掩盖这笔款项而与诺思罗普公司的经理们进行秘密交易，那就是阴谋和欺骗。司法部刑事局是在 1988 年 10 月底开始调查的，差不多也就是空军把“隐形轰炸机拿出来展示，空军军乐队开始高奏隐形轰炸机之歌”的 3 星期之前。

对于诺思罗普公司来说，隐形轰炸机初次表演的一年应该是真正喜庆的一年，应该是汤姆·琼斯在该公司 30 年中最光辉灿烂的一年，然而，它却是无穷尽金融、政治以及在法律方面灾难交加的一年：诺思罗普公司的股票暴跌；报刊编辑部发表漫画对隐形轰炸机挖苦讽刺，这是政治麻烦肯定会出现的迹象；在整个这一年，诺思罗普公司看上去一直都处于 10 家最可能倒闭的候选公司名单之中。职业安全及卫生管理局，开始调查为什么帕尔姆达尔生产线上的人们患了致命的疾病，工人们为什么责怪在隐形轰炸机表面使用的外来的化合物。司法部门也对诺思罗普公司在力图把其最不成功的产品 F—20 虎鲨喷气战斗机售给南朝鲜政府的同时，却支付给南朝鲜企业家 775 万美元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兴趣。国防安全调查局也怀疑，诺思罗普公司正在黑市购买秘密文件——贿赂政府官员和防务顾问，以换取反映五角大楼长期购买武器计划的秘密文件的复印件。

1989 年 4 月 11 日，诺思罗普公司被点名搞阴谋和欺骗活动。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该公司及其 5 名高级管理人员，在核巡航导弹和喷气战斗机的测试方面故意弄虚作假，两周以后，汤姆·琼斯宣布他将于年底辞去诺思罗普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他已经 68 岁，无意在 70 岁时依然主持该公司的工作。他回顾了自己的长期经历，并且说，他为诺思罗普公司能够得到生产 B—2 轰炸机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感到骄傲。

长期等待的隐形轰炸机第一次试飞，在 5 和 6 月份进行。国会对防务预算也还在争论，空军对于隐形轰炸机的费用依然没有公布任何过硬数字。最后到 1989 年 6 月 23 日，在历经了 10 年秘密的研究与开发以后，在国会通过要求公布其费用的法律一年半以后，在隐形轰炸机展示出来 7 个月以后，空军才公布了隐形轰炸机的预算。

这个预算令人大为震惊。首先，即使立即支付所有飞机的款项，即使全部飞机经测试均完美无缺，即使没有任何微小的技术故障，不推迟一点时间——所有这一切将完全是奇迹，132 架飞机的价格也将达到 702 亿美元。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目。700 亿美元，它比国防部直到本世纪末

的整个星球大战计划的费用还多，比五角大楼用 90 年代预算购买的任何其他武器都贵。除一个银行以外，它比美国其他任何银行的现有存款都多；除两个公司以外，它超过了美国任何一个公司的年销售总额。

五角大楼的希望是，在 1993 年的研究与开发完成之前，就用 700 亿美元中的 400 亿美元，先制造出 44 架隐形轰炸机，这 400 亿美元要在对这种飞机进行全面试验之前就支付出去。然而在当时，这种飞机还没有用自身的动力滑行过。400 亿美元是联邦全部扶贫项目费用的两倍多。

最后，五角大楼要求 1990 年为隐形轰炸机拨款 47 亿美元，是联邦政府用于防治艾滋病费用的 3 倍多；五角大楼要求 1991 年拨款 53 亿美元，比环境保护局的预算还多；五角大楼要求为此后的一年拨款至少 80 亿美元。阿斯平说：“那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建议。他们一定是又抽什么烟了，如果认为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就会为某一种武器系统拨款 80 亿美元的话。”

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参议员约翰·格伦说：“现在，美国公众第一次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是多么昂贵了。”

阿斯平和格伦二人都是军事委员会非常重要的成员，他们在两年前就大致上知道这种轰炸机的耗资数额，但是，他们不可能议论，不可能公开争论，不可能抵制，也不可能告诉公众。

7 月 7 日黎明，电视台实况转播隐形轰炸机的首次飞行，它把引擎推向空挡，大量灰色烟云腾空而起。它一个急转弯，滑向帕尔姆达尔的跑道；以每小时 200 英里的速度在跑道上嘎吱嘎吱地前进；最后划了一个优美的弧形，朝着沙漠上空的太阳飞去。当路旁一个妇女唱起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时候，一个空军上尉展开了一面美国国旗。隐形轰炸机在沙漠上空 1 万米处缓慢地绕了几圈，后来又飞行不到两个小时，便在 30 英里以外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降落。

对这次空中表演，各种评论混杂在一起。画面是漂亮的，但这些画面体现着很多故事，它们告诉人们有一种秘密轰炸机，它的使命是进行核战争，它的未来尚不能肯定，它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面纱已经揭开，争论已经开始，而且是最激烈的争论。

阿斯平说：“今天的飞行对于诺思罗普公司是一个大跃进，对于 B—2 轰炸机项目确只是一小步。今天，隐形轰炸机项目表明它飞起来了……但是，它是不是带着美国人民和国会一块飞起来，仍然没有决定。”科罗拉多州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众院军事委员会

成员帕特里夏·施罗德则直言不讳：“不能因为一次试飞就发给一张空白支票。”

隐形轰炸机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漂亮的轰炸机进行出售，一旦美国选民的每一张选票表明，他们同意结束冷战的思想，希望削减防务预算的话；隐形轰炸机需要有一个与核战争毫无关系的理论基础。

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竞争战略”。简单的说，B—2 轰炸机将迫使苏联人花费大量财富，以对付这种轰炸机造成的威胁；这种理论使隐形轰炸机变成了一种进行经济战的武器。

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希克斯在 1986 年离开五角大楼之前不久曾经写道，隐形轰炸机“将会使苏联的空防设施——苏联人已经投入的卢布总量合计 1 千多亿美元的防务系统——完全过时。”为了对付隐形轰炸机，“苏联人将必须多支付几千亿卢布。”希克斯对苏联空防投资的估计，来自空军情

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该局分析家提供的数字是，莫斯科过去 15 或 16 年来，每年用于空防的资金大约是 60 亿美元。——

然而 1989 年初，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告诉国会说，苏联人已经向空防力量投资 3 千 5 百亿美元；突然之间，空军又在隐形轰炸机那里发现了 2 千 5 百多亿美元的价值。无论是中央情报局或者是五角大楼，都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苏联人正在执行一种应急空防项目；在隐形轰炸机正式起用后一年，美国的间谍卫星并没有找到苏联的新型大规模雷达，或是其他预警装置，发现了隐形轰炸机的活动。从 1980 年卡待总统的助手宣布隐形轰炸机的存在时起，苏联人就知道这种飞机，他们对此似乎并没有过多关心；苏联人可能也赞成布鲁斯·布莱尔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核战争的进行将使用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空军司令部和苏联人都将尽其所能袭击对方；第一次打击之后的战争计划，只不过是為了把碎砖烂瓦打得粉碎罢了。

如果制造隐形轰炸机是为了压垮红军，那么，核战争就不会是头脑复杂的国际象棋战略家所设想的样子了，它是在深更半夜进行的一种用 7 张牌赌博的游戏，——美国已经押上了 800 亿美元的赌注，用来吓唬苏联人以增加其赌注。

“竞争战略”并没有赢得国会对隐形轰炸机的新的支持，不管空军如何玩这张牌，这种论点都无济于事。

后来，空军企图论证说，隐形轰炸机可以用于战术性斗争，例如攻击卡扎菲。国会中虚伪的鹰派议员们认为，这种想法荒唐滑稽：派一架价值 6 亿美元的轰炸机去炸毁一座价值 6 百万美元的桥梁，去冒一个被 6 万美元防空导弹击落的危险？这在成本与杀伤人数的比例表上恐难找到。缅因州共和党人，参议员威廉·科恩则说：“这等于要我们把一个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放到战区去经营杂货店。”

1989 年 7 月 21 日，空军又加大了赌注。韦尔奇告诉参院军事委员会，如果国会不购买 132 架隐形轰炸机，他将退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也就是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谈判，并且带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约翰·T·钱恩也提出了类似威胁，他认为，空军“需要比 132 架更多的 B—2 轰炸机”，如果削减战略武器的会谈成功，必须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导弹部队的话。钱恩将军还告诉参议员们，如果空军得到的隐形轰炸机少于 132 架，“我这就预先告诉您们，我不能支持消减战略武器协定”。

空军最有力的将军们，都说要以牺牲军备控制，去祭隐形轰炸机。

听起来，这样说似乎有点极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参议员莫西·沃思不买这个账，他告诉将军们说，“那不过是空军玩的一场其赌注很大的扑克牌游戏”——。

诺思罗普公司为赢得这一局也发挥了作用。该公司用 10 多亿美元作电视和报纸广告，向华盛顿发起突然袭击，兜售隐形轰炸机。诺思罗普公司的广告费也是由国会提供的税收。鉴于没有一个美国人有钱或希望购买一架轰炸机，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广告的目标就是国会。诺思罗普的广告也有滑稽可笑的一面，几个月之前，公开谈论这种轰炸机还是一种罪行，现在却又在黄金时间搞起了一个宣传这种秘密武器的运动。

诺思罗普公司和五角大楼还公开了分布在 46 个州内 156 个生产隐形轰炸机的承包商名单以及“全国范围内由几万名男男女女参加的……B—2 轰炸机的生产小组。”不难理解，这个花名册在于提醒每一个国会成员，说明他们

为这种轰炸机拨款而创造的职业。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戴维·斯卡格斯认为，这种呼吁倒人胃口。他在众议院挥舞着手里的名单说：“现在，空军正在和诺思罗普公司一道，把 B—2 轰炸机作为一种职业项目来出售。”这个名单的目的，“显然是企图说服议员们，投票支持以他们家乡所在州利益为基础的项目。”这样硬性推销，作用适得其反。

此后到 7 月 25 日，坏消息出现了；这一天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天，众议院首先公布了 B—2 轰炸机的预算，五角大楼宣布，它已经参加了司法部围绕隐形轰炸机问题，对诺思罗普公司焚烧账目和向政府索要高价问题的刑事调查。到此时，联邦政府的起诉以及 6 个不同的刑事调查，都对准了诺思罗普公司。

这一天标志着隐形轰炸机的秘密遭到严重破坏，它的账目要公开，要暴露在联邦调查局成员，国内收入署的刑事案件调查人员以及五角大楼审计人员等窥探者的眼前，各种挑剔的会计人员都正紧紧盯着这个保密账目。在华盛顿，国会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这种秘密轰炸机争论，有赞扬的，有批评的，还有谈论削减其预算的。

次日，众议院的争论持续了 3 个多小时；在国会公开辩论秘密武器系统，这还是第一次。这种辩论充满仇恨，语言过分，常常不合逻辑，最终没有定论。行动上也是完全民主的。

差不多已有 230 亿美元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了隐形轰炸机的流水生产线，要完成这个机群大概还需要 500 亿美元以上，可能还要更多。如果生产量少于 132 架，每一架的费用将会上升至 10 亿美元之巨，或者 10 亿开外。美国需要这种战争机器吗？它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是这个秘密之所以持续 10 年之久的原因。

这种轰炸机的一个十足支持者，密苏里州民主党人议员艾克·斯克尔顿称，关于隐形轰炸机的决定是“本年度或者也许是这

10 年，该议会所投之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票。”在这一天，众议院将在有关隐形轰炸机的 3 个方案中选择一个：全速进行下去；缓缓拉起制动闸；停止生产。斯克尔顿称这些选择是“好的，差的和可怕的。”

斯克尔顿的议案提议为这种轰炸机开放绿灯，在 1991 财政年度就为它提供 39 亿美元，比五角大楼的要求少 8 亿美元，但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

莱斯·阿斯平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僚迈克·辛纳，建议提供 37 亿 6 千万美元，但他们的议案要求，在另外提供少量款项之前，隐形轰炸机必须通过许多飞行试验。这是一个黄灯，它放慢了生产速度，足以使国会有时间深深喘一口气，研究一下实际情况，作出一个可靠决定。问题在于，现在每推迟一年，就要多耗费公款 20—30 亿美元。

红灯案是由俄亥俄州的极端保守派约翰·凯西希和加利福尼亚的极端自由主义者罗恩·德勒姆提出的，他们提议封存这个项目，节省 400 亿美元左右；而后，国家可以生产 13 架隐形轰炸机，每架花费 20 亿美元。

凯西希这位摆出一副新面孔的年轻共和党人，宣称自己“是防务开支的一个坚决支持者”。对于里根和布什在 80 年代提出的武器项目，他有 99% 投了赞成票，但是他说，保密措施破坏了国会就隐形轰炸机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在一个秘密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讲坛，实际提出各种必须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由于 230 亿美元而不得不与把我们扣作人质的军方走在一条道上。”凯西希提出了一个虚伪鹰派的观点：为这种

轰炸机付款，就迫使五角大楼“消减用于训练、购买备件以及建设军事设施的费用。”

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约翰·爱德华·波特也捡起了凯西希的观点，他说：“这是一个可能从比较重要的武器系统那里夺走拨款的项目，是一种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

来自伯克利的灰色鸽派人物德勒姆斯，从右的方面抨击隐形轰炸机：它不是从其他武器，而是从人民身上掠夺财富。德勒姆斯说：“我们应该研究贫困问题，饥饿问题，疾病问题以及不充分的教育问题；国家安全应该意味着健康的经济，前途光辉的健康孩子们，这种轰炸机不会为他们带来这些。”

右翼与左翼的少有联盟，控制不了中间派。否决隐形轰炸机的议案最终还是以 144 对 279 票被否决。接着，该轰炸机的强烈支持者处于有利地位，斯克尔顿首先发难，他说：“未来的所有武器都应该使用隐形技术；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几代人的安全来说，使我们能够生产 B—2 轰炸机的这种技术，这种美国最先进的技术，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从隐形轰炸机的某些吹鼓手的讲话看，似乎世界已处于战争边缘。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弗洛伊德·斯彭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理想地解决如何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如何采取步骤，单方面裁减这个国家的武器。每当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系统时，似乎总可以听到有人叫喊说，这种系统是挑衅性的，会引起不稳定·它有进行战争的潜力。上帝呀！但愿如此！我们花的几十亿美元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要阻止战争，我们就必须拥有有效的战争武器。”这是制止战争的传统逻辑的激烈表示。

斯彭斯说：“如果 B—2 轰炸机能够维护我们的自由，它就是我们所具备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他大声喊道：“价格？你为自由的出价是多少？”

立即制造隐形轰炸机的也未能经得住考验，以 173 对 247 票被否决。现在已经清楚握牌者是谁，阿斯平和辛纳掌握着这把锁。他们在议会用大部分时间说服其同僚，阿斯平的话简单明了，他说：“如果现在上这个项目，只拨款 700 亿美元，那将是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会势必作出决定，如何对待隐形轰炸机。阿斯平说：“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就 B—2 隐形轰炸机作出一个是不是继续向前走的决定；我觉得，今天作这样的决定是令人不愉快的。”阿斯平不打算给隐形轰炸机开绿灯，或者是采取截止审议的方法。

辛纳说，现在所需要的是“根本改造”隐形轰炸机项目，“我们将要求在购买这种飞机之前进行试验；我们要加强对这个项目的监督，最后，对这场争论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要打破对过多秘密项目的支持，这个项目以及许多武器系统，保密的时间太长了。”多年来，辛纳一直阐述这个论点，但都毫无用处。

他说：“我们可能已经吸取了教训，即特别项目可能是我们所干的最糟糕的事情，不仅从纳税人的角度，而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都是如此。”

国会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众院终于以 257 对 160 票同意在 1991 年为空军拨款 37 亿 6 千万美元，隐形轰炸机也要通过任何其他新武器必须通过的试验，并且根据国家可能提供的款项制造尽可能多的飞机。次日，参院通过的议案同意为空军拨款 43 亿美元生产隐形轰炸机。结果，参院的议案在 11 月 19 日一次精疲力竭和混乱不堪的会议上为两院所通过。隐形轰炸机得到了 43 亿美元拨款，其中包括购买某些备件，以及生产以后 5 架隐形轰炸机的费用。

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切尼说可能重新考虑这种轰炸机的生产，因为有两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美国正越来越穷；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面冲突……现在似乎有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小。”

6个月过去后的1990年4月，切尼和国会才又一次坐下来讨论隐形轰炸机问题。此时，柏林墙已经倒塌；华沙条约也已消失，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与隐形轰炸机的经济威胁相比，似乎已不那么直接。切尼宣布，五角大楼现在谋求只生产75架隐形轰炸机，预料每一架不可避免的直接费用，至少要上升到8亿2千万美元。国会对这笔费用公开表示震惊；然而，隐形轰炸机已经在生产线上滚动。以国家安全名义秘密推出的隐形轰炸机，变成了最庞大的一只航船，它按照秘密指令，乘风破浪向着危险的终点全速前进；即使操作台发出改变方向的命令，它的动量也会使它沿着最初的航向前进几年。

关于隐形轰炸机的使命，需要它的原因，以及它的费用的争论，开始得太晚了；这种争论之所以被压制10年之久，因为任何政策也没有可能为它的存在自圆其说。当这种飞机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它的制造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敌人及其造成的威胁正开始消失，他们正失去制造隐形轰炸机的理论根据，生产这种飞机的想法已经过时。隐形轰炸机所面对的未来是，它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遗物，被埋藏于积满灰尘的秘密机库中。就其所使用的所有21世纪的技术而论，隐形轰炸机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最新式的武器已经成为过去。

隐形轰炸机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因为它一直被当作为秘密。现在，五角大楼已经得到如此多这种轰炸机，所以，它的生产计划不可能夭折，已经支出的钱不可能一笔勾销。没有经过任何平等的公众辩论，国会就已经拿出230亿美元，给了五角大楼，给了一个有违法和贪污受贿记录的公司，换回了唯一一架作战飞机。国会关起门来，同意在未来10年内把隐形轰炸机的费用掩盖起来；现在，它关于违法乱纪的吼叫，听起来很不诚恳。

帕特·施罗德议员曾告诉我：“错误在国会自身。如果我们强制要公开这个消息，也就不会出现问题。既然国会同意五角大楼设立的秘密项目，我们也就不要再抱怨什么了。”_隐形轰炸机之所以如此长时间地保密，原因在于国会的认可；黑预算本身的存在，也是由于国会同意，使其不断扩大。还是在很久以前，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向国会提议设立这种秘密金库了。

第二编 秘密战争

第五章 严守机密

黑预算是冷战的产物。秘密支出的政策是在战后的世界刚刚出现时，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开始的，据认为，它是掩盖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战争的一块盾牌。

掩盖秘密拨款的这块盾牌，在很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把剑。每当美国通过阴谋手段、经济战争和颠覆活动，企图改变外国政府的时候，该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便会越来越经常地在夜光掩盖下充分发挥出来。尽管这些秘密开支并不为宪法所许可，但是，它对于反对苏联人，他们的卫星国和代理人以及海内外美国所有实际的和想象的敌人，却是最基本的。

执着秘密活动的迷念，在通过美国总统的权力这部庞大的机器扩散出去以后，接着便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姊妹机构的迅速行动：拆阅美国人的邮件，琢磨他们的电报和纳税申报单，录音他们的电话，混进宗教团体和大学组织，打入新闻机构并控制新闻消息。中央情报局还力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海外民主国家的选举，如果失败，就动用暴力把合法选举的政府推翻。他们掩盖在五角大楼预算中那些无限量的，不经审计和不计其数的秘密资金，使外界不可能控制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他们为对付共产主义而设立的秘密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威胁国内合法政府的力量。

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光荣时代已经结束，它再也不可能毫无顾及地自由漫游世界，雇佣刺客，开枪开炮和颠覆外国领导人；旧的中央情报局表明，它和美国的民主是不相称的。但在其全盛时期，中央情报局却是作为只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机构存在的。一开始，他们分布于华盛顿一些仓促建成的办公室中，地位低微，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为总统的秘密部队。

美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并没有建立永久的秘密政府部门，讨厌秘密机构是美国人的本能。在 1912 年的竞选运动中，伍德罗·威尔逊曾对选民讲：“每一个人都知道，秘密的地方会滋生，公开的场合则可避免腐化堕落：我们相信，秘密意味着行为不规的推定是很公正的。”威尔逊的话很好地总结了美国 150 年的政治传统。美国的道路在于避免出现秘密政府。

已故阿拉斯加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说过，冷战在这个世纪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用秘密作盾牌去保护美国生活免受影响的国家安全文化。”¹反对苏联人的战争需要新的斗争程序，需要由秘密代理机构操纵的新式武器，以及通过秘密拨款提供的资金。在国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后，这种秘密文化开始茂盛起来。

在国会并不确切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于什么，也不了解它的行动可能造成什么结果的时候，它就同意了这种行动。在国会建立中央情报局之后，它就放弃了自己对其钱包的合法控制权，放弃了了解总统的部下是如何花人民的钱的权利，不管这些钱花得是否有意义，花得是不是合法。这种权力的放弃是秘密的，但却是令人震惊的。到国会企图维护这种控制权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在 25 年内，已经积聚了可贵的骨干力量，参与了几百次秘密活动；无数遭到刺客暗算者，由于微量致命毒药而丧生者，许多被推翻的政府官员，以及 30 万被列入档案的美国人，都已经躺在了公墓里。

经过几年斗争，国会在 70 年代末重又控制了中央情报局，并且成立了监督委员会，以便搞清该局的活动，但是，这个秘密部门很快又挣脱了镣铐，企图重新获得它已丧失的年轻时代的魔力。在国会制止中央情报局插手中美洲事务，限制它在那里的秘密行动以后，白宫、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又

确定了它们自己的一套根本不入账的秘密活动项目，欺骗代替了公开对话；其结果是在国外遭到越来越多的惨重失败，被提出刑事控告以及大量雇佣兵死亡。国会的情报委员会不得不更多地对中央情报局进行监督，犹如一个临时入境以便跟踪一个惯偷的官员一样。

只要不解散国会，不砸烂印刷厂，任何公开对抗宪法规定的保密制衡原则的行径，都是不能存在的，对人民保密就是对美国制度最伟大力量的挑战。50年以后，还没有人能够解决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制度中从事秘密活动这一自相矛盾的难题。

中央情报局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1年6月18日，这一天，罗斯福总统邀请威廉·J·多诺万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任命他为情报局长，该国第一任间谍大王。多诺万是纽约的一名律师，曾经与美国骑兵一道在墨西哥进行过反对潘乔·比利亚的斗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国会颁发的荣誉勋章。他为文职间谍机构拟订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导准军事活动的计划，他的建议直接导致了美国第一个现代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产生。象曼哈顿计划一样，战略情报局也由总统控制的秘密帐目提供资金。

多诺万为其服装选择的标帜是一个黑底金矛，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情报收藏馆中，现在还保存有一块这种标帜。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保管员指出，金矛标志着“打开通向制服敌人防御力量的道路”，黑底呢？“黑颜色也许与在黑暗掩盖下从事的活动有关。”

正象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形成了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制定核战略的军人一样，战略情报局的秘密活动决定了4个人成为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科尔比，威廉·凯西。从瑞士的安全出发，杜勒斯负责窃听纳粹的电讯联系，和各抵抗运动领导人密谋策划。赫尔姆斯负责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伦敦组织情报网络。科尔比空降到法国和挪威的敌人后方，负责搜集德国军队调动的情报以及炸毁桥梁。凯西是伦敦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在整个欧洲战区策划各种行动。

战略情报局老战士的回忆录，都具有老年人回顾其放荡岁月的那种奔放的激情；战争时期的秘密工作人员都单独从事活动，他们都是具有创造精神的权术家和合法的罪犯。凯西在其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多诺万的私人部队’均是从社会最高层和最低层招募来的，其中有银行家和将军，有盗贼和骗子，有印刷工人和剧作家，还有运动员和马戏表演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机构看不起这种独往独来的秘密活动：“多诺万建立战略情报局，曾遭到陆军、海军、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规军高级将领以及整个五角大楼官僚机构中每一个人的反对，最具破坏性的也许还是白宫职员。”

战争结束以后，当多诺万力图保留这个秘密机构时，杜鲁门总统对此极为悲观。这位总统对于多诺万的情报工作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华盛顿报纸上的各种专栏对战略情报局成员所作的下述描绘以外：他们是“半瓶醋外交家，华尔街银行家，业余侦探”，“以前的水球运动员，百万富翁，俄国王子，社会玩童……民主制度的贵族。”各部门的头头们阻止提升多诺万。1945年9月，杜鲁门接到一份军事情报，指控战略情报局犯下120多条罪行：“工作不合格，贪污受贿，‘放荡不羁’，拉裙带关系，搞黑市交易”，以及其他战时犯罪。该报告不会加强总统保留这个局的愿望。杜鲁门在美国轰炸广岛6个月之后，下令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将其成员分配到了国务院和陆军部。

秘密情报局的思想依然存在，在战后的世界上，美国需要有一个情报机构作为总统的耳目，以警惕珍珠港事件的重演，以预测经济和政治革命的发生。除此以外，美国还需要有一支秘密部队能够搞颠覆渗透，阴谋破坏，武装暴动以及其他战争行动，因为用秘密情报的外衣可以掩盖进行秘密战争的剑。深受多诺万影响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发展史表明，多诺万确认的情报分析非常便于掩盖海外颠覆活动的伎俩，在此后年代确实是十分有用的。

1946年1月23日，杜鲁门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创建中央情报组（CGA），并任命海军少将西德尼·索尔斯为该国第一任中央情报组长。次日，总统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为索尔斯举行一个小小的私人就职仪式，他让索尔斯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件黑色大衣和一把很小的木制匕首，然后开玩笑地称他为骑士，说他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密探局长”，是“盖世大保头子”。

这个中央情报组的产生是不合法的，它没有合法权力，总统不能够大笔一挥，就一手操纵组织一支新的政府军。这个单位的资金秘密地从陆军的预算中转来，而不是合法拨款。正如身为中央情报局26年法律总顾问的劳伦斯·豪斯顿所称，这意味着“中央情报组从技术上讲是非法的”，“你不可能有一个没有法律基础而活动一年以上的行动机构”。

不管是不是私生子，这个中央情报组乃是现在的中央情报局之父。由于人们越来越清楚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秘密情报机关，国会和白宫的许多人都表示，担心它会成为一支秘密警察，成为一支美国式的纳粹冲锋队。杜鲁门听到了来自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的警告，马歇尔告诉总统：“拟议中建立的机构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马歇尔强烈意识到，秘密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来，那将会使国家蒙受耻辱。马歇尔的继任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说，他对于建立中央情报局，有一种“严重凶多吉少的预感。”

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领导人，终于使这些担心得以解除，他们一次又一次他说，中央情报局将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只负责收集、整理和核对情报，仅此而已。曾经在瑞士伯尔尼一幢有500年历史的古老房子里主持过战略情报局活动的艾伦·杜勒斯，此时正在国会两院负责少量工作。就是这位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任内两度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也在1947年4月就拟议

中的这个机构，向国会提交过秘密的书面证明，他对这种机构的描绘，让人听起来似乎就是研究生院召开的一次外交事务研讨会，身着粗花呢的人们手持烟斗，喷云吐雾，仔细推敲战后世界的各种问题。杜勒斯说，中央情报局的“主要目标”将不是“战略和军事的，或者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其他目标”，“而是科学方面的……是政治和社会的。”他还理想地猜测需要有多少人参与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我认为，在美国有20多个人也就可以了；在国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员，但不会很多，也许只需要几十人而不是几百人。”

仅仅5年之后，杜勒斯就当上了中央情报局长，此时，该局已经设立了一个秘密行动部门，含蓄地冠之以“政策协调处”的名字。

这个处有47个国外工作站，雇员5954人，年预算至少8千4百万美元，和杜勒斯那谦恭的设想实在是大相径庭。

在创建中央情报局时到场的那些人，可能真正以为那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可能的确相信，可能诚心诚意地相信，对秘密的需要，就象极其需要洛

斯阿拉莫斯的秘密武器实验室一样；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向国会隐瞒了自己的行动和意图，他们秘密地扩大其势力，使这种势力迅速发展。

这股力量的正式形成还是在 1947 年 7 月 26 日签署国家安全法的时候。这个法并没有界定“国家安全”的含义，倒是它所批准创建的各种机构承担了这项工作；这个法把陆军部改变为国防部，从政治语言语源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具有分界线性质的重大事件；这个法批准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空军，同时还产生了中央情报局，尽管可笑的是，它只完成了建立该局工作的一半。此时，这个局已经存在，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它还没有拿到国会签发的出生证；这个任务差不多是在两年以后才全部结束的。此间，中央情报局的费用从五角大楼的预算中秘密划拨，未经任何法律认可。

国会需要以可靠的情报为基础，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所特许的情报机构，这种清楚的思想应该为未来的中央情报局所遵循。国会的这种可靠情报应该来自杜鲁门，来自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以及杜勒斯，然而，国会所得到的有一半是事实，一半是遁词；有人眨眼，有人投足，还有人警告说，过河时要小心进入深水区。杜鲁门在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法时，根本没有讲海外有秘密行动，关于建立情报局亦只字未提；杜勒斯对于秘密活动，也没有只言片语；福莱斯特在作证时以不肯定的口气说，中央情报局将永不从事秘密活动。国会是在一片黑暗中结束有关立法工作的。

关于中央情报局执行间谍任务，采取准军事行动或进行秘密战争，国家安全法本身什么也没有讲，立法史上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会有赋予该局以这种权力的意向。但是，国家安全法中的漏洞，即中央情报局可以“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又一次指示……发挥这类其他作用，担负这类其他责任”，却给了它这种权力。40 多年来，由于这一句毫无限制的话而造成了一千多个秘密行动：颠覆外国政府的革命行动，指示暗杀或企图暗杀的阴谋行动，多次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暴力行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认为，这些都是遏制苏联人，维护美国的权力以及在冷战时期，维持不稳定的世界和平努力的组成部分。

1947 年 12 月，在中央情报局建立还不足 6 个月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是执行总统对外政策权力的一个主任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福莱斯特下令中央情报局开始进行反对苏联的秘密战争，要求在各条战线上采取行动，因为到处都存在着威胁。意大利首先被选中；划拨款项，开动宣传机器，以击败意大利的左翼政党。在欧洲，他们要为争取美国利益的力量加油，借以形成亲美社会舆论。

当时，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斯大林要反对，有一个真正的暴君要斗争，但是，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福莱斯特的要求有点狂热色彩。这种要求随着他变得疯狂而发展；1948 年，福莱斯特开始产生幻觉，他发现各个角落都是共产分子，他觉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处处埋藏有窃听装置；他终于疯了，于 1949 年 5 月自杀。从某种意义上看，福莱斯特就是冷战初期的牺牲品。

福莱斯特在 1949 年 12 月第一次会议上的动议，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了 NSC—4A 秘密命令，它指示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科特，在欧洲开展一场心理战。深感不安的希伦科特与中央情报局总顾问劳伦斯·豪斯顿进行协商：“在欧洲进行心理战吗？合法吗？他有执行这个命令的合法权力吗？”

豪斯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说，这种心理战是非法的，该局没有这样做的

权力。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情报部门，而不是总统的秘密打击力量，它不能在外国建立办事机构，不能购买无线电设备和枪枝，不能用自己的钱资助暴动。豪斯顿写道，这将是“未经授权而使用中央情报局支配的资金。”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总统下达正式命令，中央情报局就必须到国会去要求得到执行命令的资金。

这位律师对法律的解释使希伦科特感到沮丧，因此，他又问豪斯顿第二种意见如何。豪斯顿回忆说，他已经告诉了这位中央情报局长：没有任何法律“特地赋予我们进行诸如此类活动的权力。后来，希伦科特又问有没有其他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说，如果总统给我们以正式命令，国会给我们以实现这个目标的资金，我们就有了执行这个命令的行政权。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介入秘密行动的原因。”

国会没有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拨款，但是，国外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国内的法律问题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法律这个下层领域里，中央情报局可以勇往直前。

在6个月之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4A号文件为一个更加彻底的命令所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0/2号文件、总统新的密令重又规定了中央情报局的权力，确定建立该局的秘密行动机构政策协调处。这个密令是中央情报局在海外活动的行动计划，它赋予中央情报局的权力是从事“经济战争；采取直接防御行动（换句话说，即准军事行动），包括破坏和反破坏措施，爆炸和撤离措施，颠覆敌对国家政府”以及任何除武装斗争以外的行动。这是一个向秘密战争前进的命令。

总统将批准，并且最后对这些秘密行动负责，但是，他必须把自己的手藏起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0/2号文件，确定了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矢口否认的概念：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要非常有计划地完成，以至美国政府对此承担的任何责任都不可能显示出来……一旦暴露，美国政府要能够花言巧语地否认对此应该承担的任何责任。”

这是总统正式公认政府有权撒谎，这种谎言必须有说服力，必须保护政府，必须能使美国人民信服，使敌人也信服；秘密战争的云雾从战区升起，又随风飘回国内。在战争时期，撒谎比古代的石弓石箭出现得更早，它是在战场上保存部队的掩体。美国政府的谎言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它是总统行使权力的一把双刃剑。

统治者撒谎并非新闻。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称“高尚的谎言”含有某种政治寓意，权贵者可以因此使穷人相信贫穷和非正义是上帝的旨意。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伊拉斯谟认为，这类谎言“用虚构的幻影欺骗下层平民，使人民不可能起来向地方官吏开火”；

这类谎言是“一些杜撰的假话，使很多人都由于其自身利益而受欺骗。”这种政治传统确认撒谎有理，但只能以父母对孩子撒谎的方式，以医生欺骗临终病人的方式；只有当谎言成为有利于公众的苦口良药时，它们才可能是高尚的。

美国政府这种似乎有理地否认谎言，则含有其他意思：使总统利用谎言维护自己的权力。

这种欺骗理论是在1948年5月提出的。1948年过去了，1949年亦正在成为过去，但中央情报局依然未被正式认可，它还没有正式预算，除了秘密行政命令使其权力合法化以外，它仍然一无所有，仍然依靠从陆军拨款中

偷偷摸摸搞来的资金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差不多继续了两年。中央情报局的希伦科特找到了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卡尔·文森，告诉他中央情报局需要立即通过一项赋予它以活动权力的法律，这是一个“紧急问题”。这位中央情报局长坦率他说：“我们的活动实在太多了。”中央情报局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它需要一个扩大的法律。

1949年的中央情报局条例，是允许政府在美国秘密开支的惟一法律基础，也是美国历史上由立法机关通过的那些极不平常的法律中的一个。

中央情报局条例是由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关起门来审查的，文森在总结这些秘密会议时曾说：“我们将只能告诉众议院，他们必需接受我们的裁决，我们不可能回答他们可能提出的大量问题。”在参议院也发生了掩盖这个议案的类似情况，该议案的“高度秘密性”，禁止对其内容进行公开争论。

因此，国会并不十分了解究竟要它干什么，它通过了这项法律，但“不知道法律条款的内容”，北达科他州参议员威廉·兰格如是说。

第一个黑预算于1949年3月7日在众议院经过半小时辩论之后获正式通过，文森介绍了这个议案，对其内容作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小心翼翼的说明。对该议案的语言没有进行争论，文森说，泄露中央情报局的这个预算将是不“明智”的；他几乎是最直率地建议，国会一定要“批准”中央情报局这笔绝密基金。

争论集中于秘密通过这个议案，而不是该议案本身，纽约议员伊曼纽尔·塞勒投了赞成票，但他抗议少数知情人拒绝介绍他们了解的情况：“如果军事委员会成员可以听到支持这个议案的具体情报，为什么全体议员就不可以？难道他们是文人雅士，我们是贱民百姓？秘密就是答案。”

提出反对该议案的唯一议员是纽约的左翼人士维托·马尔坎托尼奥，他争辩说：“军事委员会通过的报告提醒我们，众议院议员必须通过这个议案，而且对其所有条款还不作任何解释，这使该议案的每一部分都令人产生怀疑，”因为，通过一个必须以保密的法律的议员，需要“放弃他们的职责”，这些议员需要“逃避他们对人民的责任。”中央情报局条例有一种力量，“能使一切涉及政府拨款的法律终止其效力。”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重要共和党议员，密苏里州的社威·肖特玩弄了老一套花招；他说：“我们从事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事业，是一种我本能地感到讨厌，但有时候你又不不得不以火攻火的事业……我们对这个议案在公众面前讲得越少，我们就越容易摆脱纠缠。”

其他争论就不再提了。该议案未经任何修正，以348票对4票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于1949年5月27日把该议案提交参议院时，听到的争论甚至更少。他向其参议员们担保，围绕这个新的法律已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民主防护措施”。泰丁说，在其他国家，政府都是通过命令，直接向他们的情报机构提供资金的，他们“不经任何法律授权……就拨出一笔其数额被隐瞒起来的款项；如果我们的参议院要了解该议案的具体细节，可能也会造成类似于其他国家那样的情况；不过，我们是决不会象他们那样从事我们的事业的。”

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拨出一笔其数额被隐瞒起来的拨款议案。这个议案的含义，这种秘密拨款机制以及不经过任何正式监督的情况，仍然未引起注意。经过没有唱名的口头表决，参议院通过了这个议案。

中央情报局条例说，政府任何权力机构都可以把拨款转入中央情报局名下，而“不管其他法律条文如何规定。”这意味着，对购买武器，对公共福利或污水控制的合法拨款，都可以指定为中央情报局专用，偷偷记入中央情报局的保密帐户。

这个新的法律说：“划拨给中央情报局的款额……可以毫无限制地……扩大。”这意味着该局需要多少就可以花多少，需要什么样的钱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钱，正如这个法律所说，中央情报局的开支“可以不考虑政府资金支出的有关法律条文和规定。”也就是说，该局无需为其支出说明原因——中央情报局长的这句话已经够清楚得了。

最突出的是，中央情报局条例竟然规定，该局的预算属于秘密，这和宪法的要求，即国会要公布一切公共资金收支帐目，恰恰是对立的。由于为中央情报局建立秘密金库，国会又退回到国王统治的时代，他向公众征税，秘密地花钱，但又从来不说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是第一代美国人经过战斗，赢得了革命胜利，才取消了这种原则。

象中央情报局一样，美国革命的军队也曾经面临一个醉心于权力、秘密和欺骗活动的远方敌人的威胁。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出现了新的斗争规律，秘密进行的战争不得不放弃义不容辞地对战争给予公开说明的陈旧概念，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再为其创始人讨厌隐蔽活动的思想所制约；这是一场在世界上偏僻的小巷中进行的白刃战，任何手段都不能排除。这样，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出现了空白，美国的预算变成了秘密故事。

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名老手詹姆斯·麦卡格，非常熟练地解释过掩盖的概念：“尤如公开的战争取决于武器一样，秘密战争决定于掩盖的手段。武器本身并非战争的目的，但它们可以掩护军队，使他们有可能向着目标前进，或者是保护他们撤退。掩盖措施可以避免秘密的执行者遭到反对……美国政府的预算本身就是一种掩盖措施。”通过这种掩盖措施，秘密战争扩大到了各种战线。随着美国总统、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不断组建新的情报机构，这种掩盖措施亦逐步向纵深发展。1952年，杜鲁门签发了迄今仍属于机密的一个长达6页的许可证，准予建立国家安全局；该局的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电子通讯设施进行窃听。任何公法都没有规定或限制它的权力和责任。在美国公法中，人们知道唯一提到过该局的是1959年制定的一个条例，它说：“这个条例以及其他任何法律的内容……都不应该被解释为要求公开国家安全局的组织或它们的“任何作用。”

国家安全局的潜听站包括世界各地的地面站和绕地球轨道的间谍卫星，它主要从通讯卫星系统，微波发射和遥测装置以及控制导弹和卫星的计算机语言系统方面，收集电讯情报。它拥有世界上最大功率的系列电子计算机，有能力从国际交通电讯系统中，窃听特殊的电讯密码谈话。国家安全局还控制着美国的密码制作程序，为美国军队编制密码，同时破译外国的密码。

国家安全局还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于美国各城市的间谍活动，在它问世21年来，它跟踪进出美国的每一份电报和电传，监听政治上可疑的每一次电话，现在，国家安全局至少有6万名雇员，每年支出大约100亿美元，全部隐藏于五角大楼的黑预算中。

国家侦察局是一个更为秘密的机构，它组建于1960年。亦如我们所见，它的间谍卫星既服务于和平事业，又充当战争工具，这些卫星是核查军备控制条约的主要手段，它们为核战争的策划者提供资料。在国会，任何人不得

公开谈论国家侦察局，或对其每年 50 亿美元的预算提出质疑。——

中央情报局同样也有 30 年时间不受任何监督。从理论上讲，中央情报局条例给了国会以控制该局的有限一点权力，但在实践中，国会在 20 多年内并没有维护这种权力，摆脱了控制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是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代。50 年代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部的主任汤姆·布雷顿，曾经叙述过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是时，中央情报局无需向任何人说明情况：

中央情报局从来都没有必要向任何人——除了总统以外，如果他希望知道的话——说明它的开支情况；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不仅不进行解释，而且也不提供收据，实际上没有办法进行核对。“无收据资金”意味着，不对支出作任何说明由于对开支不需要作任何说明，所以，中央情报局愿意雇佣多少人就雇佣多少，它从不需要告诉任何委员会，也没有任何委员会对它说：“你们只能雇佣多少人。”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必须准备好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它可以雇佣军队；它可以购买银行。它的开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它雇佣工作人员不受任何制约；它决定必须采取的战争行动——秘密战争行动，不受任何干预。——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可能对其支出不作任何说明，靠的是国会那些文人雅士。国会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对政府忠心耿耿的人士手中，一旦涉及对外事务问题，他们就会相信上帝和艾伦·杜勒斯。

每当决定预算的时刻，杜勒斯便私下与负责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南方极端保守派议员会晤，就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可能需要的拨款数额达成君子协定；这些人只提出少数几个问题。

这些南方先生中的一个，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曾经说过，一旦涉及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他的同僚们应该“把他们的眼睛闭上一会儿，接受既成事实”。很少召开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纳州参议员艾伦·埃伦德说，他根本不想知道中央情报局要于什么，他担心自己会在梦中泄露了秘密。——

也有少数人反对这种秘密支付，其中之一就是蒙大拿州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 1954 年曾警告其同僚们说：“秘密几乎掩盖了中央情报局的一切活动，它的费用、效益、民功和失败……一旦秘密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它就会招致各种弊端。”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的同僚们拒绝他的意见说，“将会有一个国会委员会监督中央情报局，减少这个失控机构由于其本性而可能造成的对民主进程的威胁。”在国会中之所以流行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用长期担任国会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的麻萨诸塞州参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的话说：“问题在于，我们都不愿意就有关的那些问题去搜集情报和进行了解，也许你们尔于干；至于我个人……我完全不愿意

这样做。”——

国会对黑预算的审查是一件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严格控制的简单事情，从中央情报局长那里发出的各种简报，是一个只需半小时旅途的邮包，它通过传送外交政策文件的通道迅速传递，在这些简报上，人们可能模糊地看到火山爆发后烟云弥漫的远方海岛。国会成员对这种简报内容，很少或者根本不提出任何疑义，他们都知道，任何敏感问题都会通过中央情报局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个予以解决。六十年代，当保守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领导参院军事委员会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按规定与中央情报局领导集团会面的参议员。时光年复一年地流失了，然而，两院军

事委员会的两个情报小组委员会，却从没有召集过任何会议，他们若干年会晤一次，也不超过半个小时；最后，众院的小组也根本不召集会议，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控制权完全丧失。

这就给了中央情报局以进行秘密战争的无限自由。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发展在于准备战争，所以，极大的恐惧感席卷了这个国家：苏联人威胁着国内外各地的每一个人。当时，紧急广播系统的调门是最高的。近乎于惊慌失措的感觉，在 1954 年总统委员会的一份绝密报告中亦有所反应，该报告要求中央情报局成为：

一个敢作敢为的秘密心理、政治和准军事组织，它要比敌人的同类组织更加有效，更加无可匹敌，必要的话，还要更加

残忍。任何人都应该阻止它果断、有效和安全地完成其使命……现在已经显而易见，我们正面对一个不可饶恕的敌人，它公开宣布的目标就是要采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地争取统治世界。在这样一场游戏中无任何规则可讲，人类迄今为止公认的行动准则已不再适用，如果美国想生存下去，美国人就必须重新考虑其长期坚持的“公平竞争”的概念。

我们……必须学会使用比敌人对付我们所使用的更聪明、更有效和更复杂的方法，去颠覆、破坏和摧毁我们的敌人；必须使美国人认识、了解和支支持这种根本对立的哲学。

美国人民多年之内仍然不了解这种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及其所支持的政策一直保密。现在我们知道，中央情报局颠覆、破坏和摧毁其敌人的历史，并不是一部令人愉快的历史。一开始，该局企图从共产主义制度下拯救弱小的欧洲国家，但进展很不顺利；它在打着民主旗号推翻第三世界弱小政府的活动中建立了功勋；它的权力已经扩大到以鼓动残杀作为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的工具。

中央情报局企图把美国式的革命输出到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但是，它开始其活动的年代正是国内革命发展尚未结束的年代。法律是分而治之，它不尊重南部黑人的选举权和任何其他权利。政府要求，并且得到了工人们保证忠诚的誓言；很多公民由于其信仰不受欢迎而被投入监狱，教师、演员、科学家和码头装卸工，也为了国家安全而失去职业。中央情报局也由于强化正统政治观念，在美国人中进行间谍活动而使其自身威信扫地。

这场革命进展得并不顺利，中央情报局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怪物，美国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实际的和想象的罪孽，都要由它承担，在美国人看来，它和外国的共产主义是同样的幽灵。中央情报局经常发挥的作用就象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真正的宗教，但伴随这种福音而来的却还有麻疹，上帝的王国得救了，而无辜的人们却失去了生命。

在外国土地上的这种秘密代理人是外人所看不见的总统的使者，他暗地里行动的目的，在于影响和改变政治事件的进程，他制定的计划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步骤，都可能引发政治暴动，诸如起义、暗杀活动和革命。他可能发现自己就象一个飞行员，意在耕耘播雨，以扑灭烤焦庄稼的火焰，但是他看到，大雨变成激流，激流又引发了洪水。中央情报局经常组织起一些它无法控制的力量，有时候，这些力量象敌人一样可恨，甚至更糟。

1953 年在伊朗，一次代号为埃杰克斯 (AJAX) 的秘密行动，推翻了上一年刚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名人”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中央情报局硬说摩萨台受了共产主义欺骗，因为他拒绝英国人和美国人支配伊

朗油田；实际上，这个首相只不过是一个瞧不起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者。埃杰克斯行动重新确立了西方对伊朗石油的控制权，把礼萨·巴列维国王扶上了孔雀宝座，使他统治伊朗达 25 年之久。当时，埃杰克斯行动看起来是一次伟大胜利，但随着岁月流失，这个国王的高压统治以及中央情报局培植的秘密警察，激怒了伊朗人，导致了巴列维国王的倒台，形成了霍梅尼政权，出现了漫长而痛苦的扣留人质的 10 年，反对伊朗的商人外交遭到破产。

1954 年在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执行的一次代号为“成功”（SUCCESS）的秘密行动方案，把心理战和经济压力相结合，再加上中央情报局培植的军人骨干队伍和武器，推翻了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总统。中央情报局通过慈善基金会和虚构的公司，向这些军队运送飞机和枪支。美国还指责阿本斯是共产分子，尽管他在

出任国防部长期间忠心耿耿，后又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为总统，而且从未任命任何共产党人入阁，也没有谋求苏联支持。他的致命过错仅仅在于他有一种想法，即没收一家联合果品公司大量占有的某些农村土地，并转让给农民。联合果品公司又捞回了土地，而美国得到的却是危地马拉的更大怨恨；而且，推翻阿本斯，宣布了军人统治时代的开始，即使按照中美洲的严格标准，这种统治的残酷程度也是有名的。在危地马拉，杀手横行的时代迄今尚未结束。

在国会发给中央情报局搜捕证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以后，该局就成了总统自己的杀手队。策划屠杀的阴谋活动，就象白宫夜间怒放的鲜花一样盛开起来。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有人反对由于宗教、政治或道德原因而策划进行谋杀的计划。总统有权下达这种命令，中央情报局亦把这种命令当做义务去执行。

1960 年夏，似乎心慈面善的艾森豪威尔也批准了一起政治谋杀案。在非洲心脏地带的一个大国，由比利时占领的刚果，冷战的形势出现了，比利时人同意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在 1960 年 6 月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但是，他们要继续控制该国的经济和军队。刚果新政府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面临比利时军官以及准军事部队诱使该国最富庶的省份脱离刚果的威胁。这场斗争，导致中央情报局驻刚果情报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于 6 月份电告总部，他警告说，卢蒙巴正在领导一次“典型的共产主义运动，以便接管政府。”由于德夫林这个可怕的报告的刺激，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除掉卢蒙巴。8 月份，杜勒斯电告德夫林，说卢蒙巴必须走开：“把他除掉必须是……我们秘密行动的一个紧急而首要的目标。”9 月，常驻中央情报局研究毒药的专家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准备了暗杀用的生物毒剂；中央情报局为了完成杀害卢蒙巴的使命，又雇佣并培训了两名职业杀手，他们飞往刚果首都利奥德维尔去会见德夫林；戈特利布的毒药箱则藏匿于外交邮袋中运抵目的地。

德夫林培植的亲信约瑟夫·蒙博托是一个年方 29 岁的陆军上校。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对卢蒙巴穷追不舍，但蒙博托首先得手。卢蒙巴于 11 月 30 日被蒙博托的军队抓获，1961 年 1 月 17 日被害。蒙博托迄今仍然统治着这个现在已称之为扎伊尔的国家，并且继续在非洲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蒙博托利用自己的权力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据国务院估计大约有 50 亿美元，但他的国家依然是非洲最贫穷和最不走运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暗杀计划开始于 1960 年初，是时，杜勒斯签署了一个备忘录，鼓

吹“已经全面考虑了根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问题。”

1960年9月，中央情报局和富有谋杀对手经验的黑手党头子们联合在了一起。这次代号为“成功”的行动计划方案，其领导人包括E·霍华德·亨特，一个怪癖的军官、间谍小说家和具有多种才能的人，他们计划入侵猪湾。

现在，这种灾难具有一股神话般的味道：古巴流亡者在委地马拉接受训练，他们那些来自中央情报局教官们，用一些鼓励的话为他们打气；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们，早晨两点钟就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读来自滩头堡令人痛苦的急电；入侵失败；最后还有社勒斯所谓的军队“安排问题”。¹

这个安排问题指的是如何处理几千名已武装起来并受过训练的古巴人。有些人参加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继续其谋杀卡斯特罗的企图。从1963年到1966年，中央情报局设在迈阿密的情报站，为进行反对古巴的无效战争而雇佣了几百人；当这场战争逐步降温的时候，这些流亡者痛苦地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还有些人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恐怖活动小组，开始谋杀其政治上的对手，他们的理想目标则是古巴派往联合国的外交官。还有许多猪湾的老兵，则为一些需要有特殊技术的零散职业所雇佣，他们闯入过水门饭店；为尼加拉瓜政府的反对派偷运过武器。他们变成了迷失方向的冷战巡逻队，他们的愤怒之情尤如大地上隐约升起的一股热浪。

中央情报局的对外冒险活动究竟完成了什么任务呢？秘密行动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永久性利益呢？1961年1月猪湾行动的前夕，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一个专门小组、总统对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得出结论说，秘密行动是总统执行其权力的一个毫无价值的工具。这个委员会由前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持领导，他在10年前曾界定冷战是“热战……是一场比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更坏的战争。”该小组的报告认为，秘密行动并不能证明它们的耗费及其所造成的危险是合情合理的：“总的说，我们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秘密行动项目，是有价值的冒险，值得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国会和公众并不知道这个结论。²

猪湾入侵的惨重失败是中央情报局进行某种反省的原因。该局总顾问劳伦斯·豪斯顿在1962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为革命和暴动培植秘密军队，并不属于中央情报局的合法权力范围。

正如他早在15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采取这类行动……的法定权力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顾问强调，利用国家安全法中的漏洞而赋予中央情报局的权力是，它可以按照总统及其助手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义务和职责”，即仅仅收集“影响国家安全的情报；把危地马拉或古巴包括进来，过分地扩大了这部分的内容。”因此，当秘密行动招致战争的时候，“在总统领导下的这个行政部门，实际上是在没有特殊法定权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超出了合法范围的行动。中央情报局正在从事的活动完全是非法的。豪斯顿被紧逼着要为秘密行动找到一个它不可能有法律支持的合法基础。他写道：“国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知道已为中央情报局拨了款，也知道有一部分款项用于秘密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活动是国会批准的。

¹ 以国会通过了具有多种用途的秘密预算为理由，而且又是在它此后对发生的问题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假定国会通过了它一无所知的特殊秘密行动，这种论点是荒谬的；然而，这就是中央情

报局秘密活动的法律基础，它引起了一些严重的欺骗活动。例如，国会在 60 年代末曾每年为东南亚难民拨款几千万美元，但是，中央情报局却用这笔钱在老挝进行准军事活动。难道国会投票为战争难民提供衣食费用，就等于是批准进行秘密战争吗？

只要秘密行动计划继续隐瞒国会，执行这些计划的权力就不可能受到挑战。中央情报局的权力来自总统：它是他的秘密部队。

分享这个王国的情报就是分享总统不乐意与人分享的权力，所以，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冷战活动只能继续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者并不仅仅是国会，肯尼迪和约翰逊任内的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迪安·腊斯克说，他在那些年内也不清楚中央情报局的预算。通过法律指挥和审批秘密行动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后来都发誓自己不知道有谋杀卡斯特罗的企图。实际上，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这 3 个总统都深深卷入了秘密行动——任内，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中央情报局执行的每 7 个秘密行动计划中，仅仅正式批准过 1 个。在 60 年代，法律对秘密行动的控制徒有虚名，正象在 50 年代总统对核政策的控制一样。

现在，秘密掩盖着美国政府大部分野心勃勃的政策，白宫为了保密而不得不开始公开使用谎言。1960 年，当苏联击落了中央情报局的 U—2 间谍飞机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这架飞机的使命向世人撒谎；1961 年，当有报纸报导说，在美国支持下对古巴的入侵已迫在眉睫时，肯尼迪政府又就此事向世人撒谎。接下来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是，编造越南战争已得到控制的谎言；当官方有关这次战争的谎言几乎变成为老生常谈的时候，在美国语言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信任差距，和虚假的与苏联的导弹差距相对应，这个术语无疑于是承认，谎言是政府用以对付自己人民的一种武器。美国人民逐渐明白，他们的政府不可信任；而这种认识又正是美国政治体制在 60 年代开始衰败的原因之一。几百万人民完全停止参加选举运动，他们拒绝跟着使他们误入歧途的领导人走，他们逃避这种制度，反对操纵他们的愿望。

对秘密政府的不信任感也扩大到了以前的总统。曾经帮助创立了中央情报局的哈里·杜鲁门，在晚年也对该局进行了无情的谴责。杜鲁门也象每一位总统一样，曾经热情地利用过中央情报局，审批过海外的 81 个秘密行动计划。1963 年，在他离开官场 10 年以后，他责备中央情报局是民主制度的危险。杜鲁门说：“中央情报局那些家伙不只是报告战争之类的问题，他们还到国外去自己制造冲突，任何人也不可能追踪他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活动。他们花费几十亿美元去惹是生非，以便自己得到进行报告的内容……中央情报局自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政府，一个完全保密的政府，他们不向任何人说明情况。

国会并没有要求了解有关情况，直到 1971 年 1 月，它一直没有控制总统秘密战争的意图。是年冬，新闻媒介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在老挝控制有 3 万 6 千人的一支部队。国会并没有核准这支部队，虽然有 5 名国会领袖被告知存在着某种老挝行动计划，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每年支付 3 亿美元，企图在老挝丛林中建立一支雇佣军。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询问拨款委员会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埃伦德，他是否知道这种行动计划。他们的对话是第一次围绕为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的机制问题，在参议院进行公开讨论：

富布赖特先生：据报导，中央情报局在老挝有 3 万 6 千人，这已经不是秘密。埃伦德参议员是不是说，这个在老挝的部队在组建之前，就已经提交拨款委员会研究过，该委员会知道并且核准了这个计划，是这样吗？……参议员您同意这个计划了吗？

埃伦德先生：情况不是这样，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从来就没有问过在中央情报局要求的拨款中是否有任何用于进行这种战争的资金。您提的有关问题我一点也不了解……

富布赖特先生：您实际上并不知道，是吗？

埃伦德先生：是的。

富布赖特先生：您是参与这种行动计划的 5 个人中的一个，事实上，您还应该是这 5 个知情人中的第一位；那么，究竟谁知道这笔钱的用场呢？事实在于，即使并非 5 人都知道，而您是 5 人中的主要一个，您应该知道实际情况。

埃伦德先生：很可能不是这样。——

这个对话在国会引起一阵骚乱。整个拨款制度都是以信任中央情报局，都是以相信这些智慧的老人会按照规定负责监督中央情报局为基础的。22 年之后，这个制度正在象迷一样被揭示出来。

1971 年 4 月，受到刺激的中央情报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决定发表少有的公开讲话；他在向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讲话中，宣称新闻机构和公众应该“相信，我们是非常诚实的人。”听众接受了他的讲话，并报之以热烈掌声；然而，这次讲话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开始大夸海口的标志，公众对它的信任正在开始消失。——

国会成员们开始对中央情报局提出了疑问，但只有少数问题得到回答。长期担任纽约市长的埃德·科克讲述了他 1971 年第一次拜访中央情报局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一个新当选的国会议员。

科克和其他 17 位国会新成员应邀和赫尔姆斯谈话。中央情报局总部屹立于弗吉尼亚州兰利森林的一片空地上，冬天，在树木落叶之后，在沿着波托马克河延伸的乔治·华盛顿大街望上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由院墙环绕的建筑群。总的看，中央情报局看上去就象是中西部一个州立大学的校园，但位于主楼第七层的局长办公室的设施，却有豪华名牌大学的派头，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流餐室。

这些议员们在 7 楼进了早餐；科克回忆说：这是一次“放在金光闪闪餐具中的丰盛早餐。”在这些立法者匆匆吃完他们的鸡蛋后，赫尔姆斯向后挪挪椅子，开始讲话：“先生们，这也许是诸位可能得到的唯一一次机会，可以就中央情报局提出任何问题。请吧！”

科克抬起头说道：“赫尔姆斯先生，我的确只有两个问题：您雇佣了多少人以及你们的预算有多少？”

赫尔姆斯反唇相讥。他说：“我只有两个问题不能回答，就是这两个。”

“赫尔姆斯先生，”科克说：“您是在对我、一个国会议员说，我不能了解你们有多少预算吗？我毕竟对这个预算投了赞成票，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预算。”

“我要告诉您的确实就是这些，”赫尔姆斯反驳说：“这些预算项目划拨于其他项目中，您不会知道那是一些什么项目的……永远也不会知道。”

“您的意思是，把这种预算划拨在社会安全项目中了？”科克问道。

“我们还没有利用社会安全项目，”赫尔姆斯说：“不过，这倒是一个很坏的主意。”——

这些精明强干的国会议员开始意识到，为中央情报局秘密战争提供的拨款，都掩盖在五角大楼秘密购买武器的帐目中。不过，还是赫尔姆斯说的对：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笔钱。用购买武器的费用掩盖秘密战争支出的事实，1971年4月在参议院第一次被公开揭示出来；还是富布赖特推门而入，加利福尼亚自由派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以及长期为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紧随其后。

国会对这种黑预算的第一次公开讨论，随着富布赖特在空中挥舞起五角大楼的一本预算帐目而开始：

富布赖特先生：在这个拨款中包含有几十亿美元的情报资金，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这本帐中的资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当人们看到一个项目，发现用那么多钱购买一架飞机或一艘潜艇的时候，那个数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这种惯用手法使人们对每一项有关拨款都产生疑问……

克兰斯顿先生：这个拨款帐目提到了用于情报机构支出的资金吗？

赛明顿先生：没有。

克兰斯顿先生：情报机构的费用是如何提供的？通过虚报其他类型的帐目吗？

赛明顿先生：也许是这样。我不能肯定，我没有掌握作出回答的足够情况。

克兰斯顿先生：这些项目的拨款就是利用这种手段处理、膨胀或扩大的，实际上，其中至少有一些项目的拨款，掩盖着这本帐中包含的情报机构的费用，不是这样吗？

埃伦德先生：是这样的，参议员您说得对，其中有一些项目掩盖了情报机构的费用。——

此时，参议员们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赛明顿提出一种方法，建议把每年给情报机构的预算拨款限制在40亿美元之内。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向参议院建议揭露这种黑预算。据信，这

两种设想都太危险，不能考虑。但在1971年12月，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提出的一项议案赢得压倒优势的支持，并形成了一项法律：砍掉用于老挝秘密战争的资金。通过民主程序揭露和制止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计划，这还不是第一次。这是一种预兆。

那些老卫士为保守秘密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参议员斯坦尼·斯为了解决反对秘密拨款问题，停止了军事委员会情报小组委员会的活动，一次会议也不召开，企图筑起一道大坝阻挡情报泄露；

但是，参议员埃伦德则开始在这道坝上找断层，他于1971年末对黑预算领域进行了调查，他惊呼：“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领域花了多少钱，浪费了多少钱，那一定会使你从椅子上惊倒在地。罪孽！”——

没有人知道这些罪行，没有人进行调查或提起公诉。

水门丑闻几乎使中央情报局遭灭顶之灾。在这桩肮脏的交易完全结束之后，当公众认识到他们的政府为一些撒谎者所支配，已经不可信任的时候，国会开始向这个用坚固墙壁环绕起来的情报机构发动了攻击。——

1972年3月17日，一小队盗贼在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

捕。该小队的队长就是“成功”行动计划的一个老兵 E·霍华德·亨特，他由于猪湾行动而遭受精神创伤，这伙盗窃犯还包括：中央情报局前负责治安活动的头目詹姆斯·麦科德；亨特在猪湾行动期间的助手伯纳德·巴克；曾经肩负到古巴去执行

354 项任务的中央情报局船长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他在该局的工资报表上，迄今还仍然是一个情报员；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长期代理人，化名弗兰克·斯特吉斯的弗兰克·菲奥里尼，这个被雇佣的斯特吉斯，以亨特一部间谍小说《比米尼快跑》中的一个物，作为自己的化名。

是时，这个小队并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是在为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活动。6 天之后，尼克松总统指示中央情报局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该盗窃案的命令录音带问题，引起了人们对这位总统的注意，这个录音带表明，它录有这个很长故事的关键性情节。

尼克松以“国家安全”和“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向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交出录音带；经过一年冷酷无情的政治压力，而且是在最高法院作出一致决定之后，尼克松才交出了录音带。此时，众议院已经通过议案弹劾尼克松，其中还指控他“力图滥用中央情报局的权力。”

由于水门病毒而使中央情报局忍受的痛苦，潜伏了很长时间，这种病发作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1972 年 11 月 20 日尼克松解除赫尔姆斯的职务，任命他为驻伊朗大使以后；赫尔姆斯之所以被解职，最大可能的原因是，他在掩盖水门丑闻的过程中拒绝充分合作。尼克松选择了一个傲慢的教授，曾经出任他的预算局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詹姆斯·施莱辛格取代了赫尔姆斯。施莱辛格在中央情报局仅仅呆了 4 个月，便升任国防部长；在这短短的 4 个月内，他遇到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突然袭击，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持审判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联邦法官令他生气。埃尔斯伯格过去是一个核战略家，当时是和平运动的一个活动分子，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传播五角大楼文件、越南战争的秘密历史。

1973 年 4 月 27 日，该法官在公开的法庭上大声宣读了司法部的一个备忘录。该备忘录说，霍华德·亨特利用根据白宫要求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掩护，带领巴克和马丁内斯去盗窃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以便寻找这位被告的秘密情报。

亨特曾忠心耿耿地为中央情报局干了 30 年，60 年代升任为国内行动计划处搞秘密行动的处长，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没有人料到中央情报局还有这样一个国内秘密行动处长，该局的规章规定，禁止它在美国人中间搞间谍活动；赫尔姆斯在他对报刊编辑的讲话中，也发誓中央情报局从不干这种勾当，但国内行动计划处却很少干其他事情。亨特于 1970 年 4 月按规定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来，他与尼克松的白宫签约，担任日薪 100 美元的顾问职务，重又拿到了中央情报局为期 3 个月的安全通行证。在他作顾问期间，亨特得到中央情报局签发的身份证和掩护用品，主要是一套很不合适的红色假发。他使用中央情报局的磁带录音机、微型步话器，并且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关系，从事他为白宫服务的肮脏工作。

中央情报局已经冲洗了亨特在盗窃这位精神病医生办公室时拍下的照片；该局还根据亨特的要求，准备了两份有关埃尔斯伯格心理状态的材料。从当时受指控的气氛看，中央情报局已经被看成是迫害埃尔斯伯格以及陷害政治上持不同观点者阴谋的一部分。

兰利森林中中央情报局主楼 M 层的警铃开始响起来了。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主管秘密行动计划的副局长的威廉·科尔比说：

“这件事令人震惊。”他指出，施莱辛格已经宣布，“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严格审查，‘撤掉必须撤去的每一个人的职务’；但我们必须找一找，在我们过去的秘密行动中，是不是隐藏有我们不知道的，随时都可能在我们脚下爆炸的那些可疑的或非法的活动。”在地表下面埋着很多这样的地雷。

1973 年 5 月 9 日，在施莱辛格宣布离开兰利森林到五角大楼任职之前两天，他发布了一道由科尔比起草的命令，使中央情报局为之胆战心惊：

我已经命令本局主管业务的所有高级官员，立即向我报告可能被解释为超越本局法定规程范围的一切目前正在开展或者是过去已经完成的活动。

我特此命令中央情报局目前雇佣的每一个人，向我报告他所知道的任何这类活动；我还要邀请所有已经退职的雇员也这样作。任何掌握这种情报的人都应该打电话给我的秘书（电话分机号 6363）……

科尔比不得不应付这些电话；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差事。科尔比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进行秘密战争而奋斗，从 1950 年开始，他就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工作者勤勤恳恳地工作；从 1962 年到 1967 年，他出任远东处处长，监督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活动。此间，他仅仅停职主持过一个代号为“凤凰”的计划，致使两万多越南人死亡。

科尔比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普林斯顿人的言谈举止恰如其分，总是很有教养；他们态度温柔，但可能冷酷无情。科尔比戴着一付镜架洁白的眼镜，有时候他可以看到别人，但别人却看不到他的眼睛。科尔比出身军人家庭，对罗马天主教非常虔诚，这两点可以成为认识他背叛中央情报局的线索。他按照一切合法命令办事，有一种负罪和赎罪感。

他现在接受的使命完全违背了保密原则：开列一个秘密活动的清单，它是各种肮脏交易的百科全书；中央情报局官员称这个清单为“家珍”或“家丑”。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中充满了这种活动，最后打印出来达 693 页之多。在“针对美国公民的活动”的标题下有一长串条目，大部分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中央情报局把几千名美国人置于其长期监视之下，对他们的电话进行录音，在他们的住处安装窃听器，审查他们的纳税退款，夜里偷看他们办公室的文件。中央情报局 20 多年来一直私拆美国人的邮件。国家安全局也已经截取了几百万份电报和电传。戈特利布博士令人扫兴的毒药研究问题也提出来了，中央情报局与生命科学部联合进行思维控制实验，使被实验者不知不觉地服用麻醉剂，致使有的人丧失记忆，还有 2 人死亡。此外还有各种暗杀阴谋。每一个总统使中央情报局为其服务的手段，都违背了人类尊严的标准。

开始，这些活动一件也没有揭露出来；但是，随着水门事件狂风大作，科尔比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尼克松的密闻和欺骗活动可能毁了他，所以他产生了一种想法：揭露和忏悔对于挽救中央情报局的灵魂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和秘密战争的鼓吹者，科尔比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某些违背其规章，违背法律和宪法的活动。他告诉我，他已经意识到，中央情报局完全保密的年代已经结束，花言巧语地否认事实已经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已经威信扫地，完了，一切都已经结束。当间谍活动的范围还很少为总统所左右的时候，花言巧语地否认事实还可能是个好主意……现在的中央情报局太庞大了，已经不可能再那样弄虚作假了。”中央情报局对事实的否认，

听起来再也讲不通了，因为总统自己撒谎的嘴脸已经暴露出来；是说清楚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起初，科尔比前进的步子非常谨慎小心，仅仅有选择地进行一些揭露。1973年夏，他分别向参议院主席、密执安州参议员赛明顿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众议员卢西恩，尼齐揭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家珍”。他对尼克松白宫的问题是保密的，他觉得，尼克松泄露出来一些材料的目的是，在于使他的活动在相比之下，看上去并不太严重，但是，记录秘密活动的清单却在不断扩大，6363号分机一直响个不停，根本无法挂断。

一个最严重的电话来自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中层官员，他警告说，在3个月前核准赫尔姆斯为驻伊朗大使时，赫尔姆斯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撒了谎。该官员提出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仍然在秘密颠覆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参议员赛明德：你在中央情报局企图推翻智利政府吗？

赫尔姆斯先生：不，先生。

参议员赛明德：你为阿连德的反对派提供任何经费了吗？

赫尔姆斯先生：没有，先生。

参议员赛明德：那么，有关你卷入这场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了？

赫尔姆斯先生：是的，先生。——

中央情报局对于推翻通过公平和自由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者阿连德是非常卖力的。1970年，尼克松命令赫尔姆斯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阿连德当政，中央情报局收买选民；在墙上涂刷标语口号；加紧向屠杀了智利参谋长的右翼军人运送自动化武器。1973年阿连德被推翻，在这次政变中身亡。

赫尔姆斯的处境令他尴尬，他不可能使自己过去的秘密活动与当前说实话的精神协调起来，他是发过誓的。就秘密行动对他提出的质询是直接了当的，要求他披露一个十分危险的秘密；他不可能说真话。

科尔比十分勉强地要求中央情报局监察主任威廉·布罗调查这个问题。布罗十分清楚，中央情报局的人迄今还呆在智利，在反对阿连德的秘密行动开始时，他是主持拉丁美洲秘密行动计划的负责人；他也知道，赫尔姆斯始终处于严守机密和讲出真情的矛盾之中。布罗是第一位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面前公开作证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问题就是智利。

布罗任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析家小组撰写赫尔姆斯的证词报告，这些分析家坚持认为赫尔姆斯作了伪证。赫尔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助手则认为，这个报告纯粹是一付毒药。一场残酷的激烈斗争直到1974年12月初才告结束，是时，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司法部，“伪证”一词仍然保留在上面。——

两星期以后大坝决口了。12月12日星期五，《纽约时报》一名记者西摩·赫什来访科尔比，他已经沿着从中央情报局储秘库中泄露出来的涓涓细流，追踪了整整一年，赫什告诉科尔比，他准备公开代号为“混乱”（CHAOS）的秘密行动计划，这是中央情报局利用电话线，对反战活动分子搞搭线窃听的一个项目。科尔比向赫什承认，“在极少数场合”，中央情报局搞过搭线窃听，搞过监视活动，私拆过美国人的邮件，“超越了它的规章所确定的工作范围”。两天以后的星期日，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通栏大标题：《披露中央情报局在尼克松年代在美国对付反战力量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行动计划》。哈里·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

室用间谍故事取乐的玩笑，已经有点苦涩味了。——

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家丑开始公开外扬。国会不得不面对它不了解中央情报局情况的现实。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众议员保罗·芬德利说：“在国会议员中，知道中央情报局每年花多少钱者不超过12个人，他们中也许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局究竟用这些钱干了什么。衣阿华州民主党人、参议员哈罗德·休斯告诉其同僚们：“从来也没有人向我们通报情况，即使向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我们甚至也没有资格和责任了解一下，这种信息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是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公众的认识和争论在于，怎么样才能使民主制度这部机器顺利运转；这部机器正在嘎吱嘎吱作响和冒烟，没有人希望它垮掉。

新上任的总统杰拉尔德·卡特，不象是一位能够主宰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改革的时代的人，他是国会老卫士中的重要成员，从1957年到1965年，一直是众院拨款委员会情报小组委员会中沉睡的看门狗之一。他参加了沃伦委员会，调查暗杀肯尼迪总统事件，这个小组不可能是一个热忱进行调查的样板；卡特曾秘密向联邦调查局通报沃伦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现在，他不得不改变他的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方法。——

1974年12月30日，白宫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仪式就掩盖了中央情报局用以“否定事实的花言巧语”。福特签署了由参议员休斯和加利福尼亚州议员利奥·瑞安提出的一项议案，作为对被揭露出来的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所起作用的反应。休斯—瑞安议案禁止中央情报局支付海外秘密行动的费用，“除非总统发现，每一项这种活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及时报告，向国会拨款委员会……说明情况。”现在，总统必须签署一个“发现十分重要”问题的文件，以授权进行秘密行动。卡特的名字和权力都处于危险之中，他的机构必须向国会山报告其秘密行动。

中央情报局发现它遇到了和理查德·赫尔姆斯同样的矛盾。如果它被迫成为公开政府的一部分，它还如何保守秘密？这是一种混乱，一种严重的混乱。该局一些老的支持者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告退。

5天以后的1975年1月3日，总统在其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科尔比。福特决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央情报局在国内的活动，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活动不能过分激烈，不能提出太多问题；它由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以图控制对这个秘密权力机构造成的破坏。

科尔比向这个委员会成员讲述了他们并不乐于知道的真实情况。在一次会议上，洛克菲勒把这位中央情报局长拉到一旁，以他最令人陶醉的态度说，“比尔，你真的要向我们提交所有这些材料吗？”科尔比叙述说：“我对这个启示的领会完全没有错，但我不喜欢这种启示”。洛克菲勒的目的在于要科尔比知道，“他宁愿我采取传统姿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用秘密的外衣把中央情报局掩盖起来，阻挡调查。”科尔比扔掉了这个外衣。他认为，要挽救中央情报局，他就必须“教育国会、报界和公众，我相信，中央情报局的生存权只能来自建立在认识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敌视。”该局已经破坏了对它的信任，必须公开实情；中央情报局再也不可能单凭人们的信任维持下去了，理解和认识只能来自事实。——

对公众的教育在 1 月 21 日开始，是时，参议院以 82 票对 4 票通过、建立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调查中央情报局的问题。众院的委员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组织，它在争吵和反诉中自我毁灭了；参院则不同，它的工作象人们期望的一样成功，在此后两年内，它就暗杀阴谋、各种肮脏的骗局、国内间谍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和经过仔细斟酌的报告。令人尴尬的时候也有一些，在 9 月 16 日的第一次公开听证会上，该委员会强制科尔比出示中央情报局仓库中保存的一把看上去很象是古怪手枪的东西。令人难忘的是，科尔比说那是“一种无法辨认的微生物注射器”。那是一种枪，它能够发射毒弹和顶端带有毒剂的小飞镖。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手举着的那支枪的照片，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不过，丘奇委员会进行工作时的方法，一般的还是清醒和首尾一致的；科尔比的合作使中央情报局没有因为国会的愤怒而被取消，被剥夺权力或者被削弱。

科尔比的合作是以他的职业为代价的，他没有和总统商量就向国会提供了实际情况，各种暗杀阴谋由于他而被迫揭露出来，是他暴露了机密，是他展示了毒药枪。科尔比说：“政府并没有批准我采取与调查组合作的态度，人们指责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完全否认赫什的说法；批评我向司法部提供了有关赫尔姆斯的材料；责备我过多地帮助了洛克菲勒委员会……交出毒药，尤其是在国会提出要求时支出有毒的飞镖，其影响极为广泛。”科尔比向有权的国会讲清了事实；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于 1975 年 11 月 2 日被总统免职。

一年后就是选举日了，福特由于偶然机会而得到的总统权力，发展得很不顺利，为了得到党内右翼的支持，他必须把具有过硬共和党人资格的真正保守派置于主管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他选择了自己在国会时期的同僚，在水门事件期间曾领导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当年 52 岁的百万富翁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布什作为一个临时主管，对中央情报局的神经过敏症起了一定的安抚作用。中央情报局见识极广的高级官员科德·迈耶曾经写道：“开始，人们曾经怀疑布什将可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企图利用中央情报局达到其党派目的。”但是，布什“却把政治放在一旁”，而致力于“恢复已经遭到足够沉重打击的该机构的士气。”

布什在中央情报局的一年只有少数其他方面的明显成就：他帮助制止了最后一些秘密的扩散；帮助制止国会公布该情报机构的黑预算。

洛克菲勒委员会就中央情报局问题公布的最后报告，大部分内容平淡无奇，其本身也是一种功绩；它提出的劝告是引人注目的：“国会应该仔细考虑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黑预算是否不要公诸于众，至少从某种程度上看应当这样，特别是考虑到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第 7 节的规定。”在铅印好的报告脚注中，该委员会指出了这关键的一项：“除了依法拨款以外，不允许从财政部提取任何款项，对所有公款的定期说明以及收支帐目，都应该不断公布。”

丘奇委员会也提到了这个基本问题：黑预算符合宪法吗？该委员会于 1976 年 4 月得出了结论，它的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管理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预算程序，有碍于国会议员了解这些机构的某一个究竟花了多少钱，甚至有碍于了解整个情报机构的支出究竟是多少。此外，政府其他机构的预算和支出也隐瞒了大多数公众，这些机构的预算不断膨胀，用以掩盖为情报机构提供的资金。

不向公众和国会提供这类信息，既妨碍有效地优先项目安排，亦违犯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第 7 节……

本委员会认为，公布为国家情报机构提供的拨款总额，只会满足宪法要求，不会有损于国家安全。

丘奇委员会以 8 票对 3 票通过决议，要求公开国家安全机构的预算总额。当时的秘密武器项目还不很多，这类项目基本上都是 80 年代的奇迹。所以，公开这个总额可能使国会和公众在较大程度上确切地知道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究竟秘密地花了多少钱。

国会真正肯定知道的是，情报部门的开支比已经揭露出来的要多；国会议员们力图估计出以往的黑预算。他们的计算变化极大。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要求在《国会记录》中写上一个粗略的数字，估计 1973 年的情报预算总额为 62 亿美元。

普罗克斯迈尔的有些数字似乎击中目标，有一些则过于离谱，他估计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为 10 亿美元左右，实在是太低。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在 1976 年未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为 150 亿美元，确实又太高。

1976 年的这种黑预算，实际上大约在 70 亿到 80 亿美元之间，其中秘密武器项目占不到总数的 1/10。丘奇委员会的参议员们认为，揭示这个事实不会使美国人民感到震惊，亦不会有害于国家安全。他们准备着分享这个秘密。

布什请求他们不要这样作。这位中央情报局长私下对参议员们讲，公开预算将是一场灾难，它会使中央情报局遭到破坏而无法恢复。布什的请求发挥了作用，丘奇委员会仅以一票之差同意保留这个议案，6 票赞成 5 票反对把该议案提交参议院。然而，这个议案却从未送到参议院。

参院领导集团把这个争论送给了新组成的小型情报特别委员会，一个新组建的监督中央情报局的机构，该委员会于 1977 年 4 月开始审理这个问题，它召开了两天公开的听证会和一个很长的秘密会议，听取了科尔比和赫尔姆斯，新任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中央情报局的前高级官员以及各军事情报机构高级官员的意见，并且拜访了总统、副总统和美国司法部长。

没有任何人——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认为公开这些数字会危及国家安全，许多人都说这样作符合公众利益；中央情报局的特纳将军也证明，这“有助于公众观察他们国家的情报活动。”

1977 年 6 月，该委员会以 9 票对 8 票通过公开这个秘密。多数派认为，向公众公开 1978 年情报预算的这一个数字，将会是这个秘密世界受到欢迎的一束阳光。在公开和揭露秘密的这个浪潮中，此刻正是高潮位线。多数派报告说：“公众有权知道尽可能多”有关情报开支的情况，“现在他们是一无所知。”揭露黑预算的决定“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本质反映”；他们还声称：

“情报紧迫感是一个健康民主制度的标志。”

秘密开支非法和黑预算应该公开的思想，现在已为总统委员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以及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多数人所认可，他们各自的劝告都强烈表示，这种秘密开支的情况是不符合宪法的。以某种形式公布黑预算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思想，也已为前中央情报局长，前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否定。

然而，秘密的力量还在起作用。参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派痛斥说：公开黑预算“将完全破坏我们整个情报机构的有效性。”那“将是一个严重错误”。少数派之一的怀俄明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马尔科姆·沃洛普甚至走得更远：“那的确是向着削弱自己的方向发展，是对赋予我们的信任的叛卖……问题决不会就此为止……我们有什么必要伤害我们力求保护的国家，去满足美国新闻巨头们的好奇心。”到此告一段落，少数派的见解又占了上风。该议案又被搁置起来了，因为在多数派中，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后来的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威廉·G·米勒曾经说：“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已经丧失，宪法问题还没有解决，”

当威廉·科尔比坐在家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考虑了很多有关宪法的问题。科尔比的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沉痛教训是一清二楚的，关键在于要解决“情报机构的老传统与宪法之间从前不为人们所承认的矛盾。”

中央情报局的詹姆斯·赫苏斯·安格尔顿是这种旧传统的最好体现。安格尔顿种植兰花，是各种阴谋活动的组织者和苏联动向的预言家；他在中央情报局内影响极大，长期主持反间谍活动，是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和以色列帐户的唯一控制者。丘奇委员会曾要他出面作证，请他回答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不服从白宫直接下达的命令，毁掉该局储存的毒药。对他提出质问的人，从他的回答里听到的正是中央情报局25年来走过的历程，安格尔顿说：

“要政府的一支秘密部队服从政府的全部秘密命令，那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观点把中央情报局放在了受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外，它意味着，中央情报局无法可依，除了它自己的信条之外，它可以不遵守任何法律。它的信条是一种狂热的法典，和宪法的规定格格不入。

在宪法上，大多数外交政策机构均无提到，因此产生了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所说的“过度地带”，在这里，总统和国会不断地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是在暗地进行的，它所实施的等于是美国的秘密外交政策，是宪法制定者始料不及的一种外交政策。

凡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其条文都很清楚。宪法规定唯国会有“组织和供养军队”的权力；中央情报局却建立和支持秘密部队。宪法规定禁止总统进行战争，如果不经国会批准的话；总统却利用中央情报局实施秘密战争行动。宪法规定，总统及其助手在未经合法和公开拨款的情况下不得动用一分钱，中央情报局却能够执行各种命令，因为它可以秘密得到和使用大量资金。

如果秘密和民主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解决，还必须借助于宪法，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开始，就要使它成为合法政府的一部分。

到1980年，经过总统和国会之间的长期斗争，有关秘密行动的一个审慎考虑的一致意见已经形成。双方都同意，美国需要有中央情报局收集和分析事实情况，预料远方正在出现的危险，了解极其复杂的世界，一句话，提供情报。现在，当中央情报局确定去争取朋友和影响敌人的时候，向游击队运送武器或颠覆外国政府的时候，要经过情报委员会认可，最好是事先认可；必须告诉该委员会秘密行动的飞行计划和行动过程，而不只是在飞机坠毁时才要求处理善后事务。

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宣称，他们有权知道总统何时采取秘密行动；协商一致可能为行动计划制定一种规范。一旦事情败露，则必须通过这种机制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可以把了解情况的

圈子缩小到 8 个人，即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少数高级领导人，以及参众两院的少数派和多数派领袖。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在事后“及时”向情报委员会说明情况。中央情报局是采取秘密行动的唯一机构，除非总统明确指示其他机构进行这种活动。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黑预算的秘密。尽管宪法公开规定的程序，明确禁止这种预算，尽管思想已经改变的两个参院委员会，发现这种秘密不符合宪法、是不民主的，但这个问题仍然未能解决。现在，这种改革的时代正在迅速过去。

在很久以前，聪明而又腐败的但曼尼协会的一个说客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曾这样说过：“改革委员会……就象是一簇早晨的牵牛花，清晨看上去美极了，但时间不长就会凋谢；而正规机构则永远欣欣向荣，就象一棵非常古老的橡树。”力图改革中央情报局的那些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他们要了解中央情报局秘密历史的努力，却使其精疲力竭。1981 年 1 月，反改革的行动又开始了。

罗纳德·里根观察世界的方法，犹如 50 年代的冷战鼓吹者：世界充满了善与恶。他作为总统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人保留了他们犯罪、撒谎和欺骗的权利。”因此，美国必须再次用更机智、更复杂和更加有效的方法，去破坏、颠覆和摧毁自己的敌人。

里根的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曾经是一名陆军元帅，该局秘密行动处长克莱尔·乔治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他是“来自战略情报局的最后一个伟大冒险家。”凯西之所以能够上台，原因在于他具有在掠夺时代作为一个秘密代理人的经验，头脑又比较清醒。

他的领导使美国情报机构又有了某种从战略情报局时代开始以来就存在的感觉：一切都毫无限制。凯西努力工作，他要使中央情报局再次成为美国政府最有力的外交政策部队。

为了维护其权力，国会必须免受牵制。凯西对他的国会监察人员非常蔑视，总是把那些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证词倾泻给他们。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加利福尼亚的诺曼·米内塔在 1983 年这样说：“我们简直就是蘑菇，他们把我们放在阴暗处，还大量施肥。”

在其少有的公开讲话中，凯西有一次给他所进行的战争以及敌人的性质下了个定义，他说：“这并不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赫鲁晓夫在 1961 年，而后还有苏联其他领导人都曾经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将会取得胜利，但不是通过核战争，因为核战争会毁灭世界，也不是通过常规战争，因为常规战争可能很快导致核战争，而是通过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战争。当时，我们不愿意相信赫鲁晓夫，正象 30 年代我们不愿意严肃对待希特勒一样。”凯西似乎把颠覆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从道义上与打败纳粹等而同时了。

里根和凯西都是过来人，里根上台时，他们所坚持的竞赛规则是经过 10 年争论之后明确规定的。里根和凯西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这些规则，但是，他们打破了每一项规定。

他们违犯法律发动战争，并且与刺客和恐怖主义分子秘密勾结。他们很难向国会的情报委员会解释这些行动，或者从他们那里得到资金。所以，里根政府对国会保密，欺骗国会，他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找资金，最后就象这位

总统郁郁不乐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所说的那样，美国已经发展到了“依靠秘密活动作为我们政策核心”的地步。——

里根政府知道，法律对秘密行动的限制还为总统留下了 3 条开放的途径，他可以由此而实施秘密外交政策，里根选用了所有 3 条途径。

总统可以不顾法律，通过白宫进行秘密活动，里根这样干了。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被宣判为罪犯；他的秘密政策被视之为愚蠢和失败行为而于报光。

总统可以利用武装力量代替中央情报局的职能，里根这样干了。他的将军们把转业为间谍的军人组成为一支难以指挥的部队，该秘密部队的战绩甚微，而它的罪行却使其一些领导人物的利文沃思落网。

最后，他可以按照法律，依规定行事，赢得国会对秘密行动的认可，就象中央情报局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把该局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工具。国会、白宫和中央情报局三者勾结起来，实施了几十年来最大，也是最野心勃勃的一项秘密行动计划——大规模向阿富汗运送武器。

在阿富汗采取的秘密行动是 80 年代中央情报局所获得的最大成功；但是，它也留下了一笔腐败、叛卖和谋杀的遗产。

第六章 致力圣战

相信有神存在的一名目光锐利的白胡子军人马哈茂德，拉赫曼跪在一座荒芜的山顶上，他面对落日，目光穿过阿富汗，向西边的麦加眺望；他用他的家乡语言高声歌唱，赞美真主，乞求报仇雪恨。在他面前放着的，是一个针刺导弹发射器，有一条5码长的护符标明：绝密——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未经核准而拆封者以犯罪论处。这种针刺导弹是通过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一个世界范围的武器通道运到这个山顶的。——

黎明时分，拉赫曼已经离开了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以外的难民营，他随同一个由日本吉普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满是乱石的不毛之地，那里曾是他的祖父和曾祖父与大不列颠军队战斗过的地方。

沿着通往阿富汗边界起点的道路，标明死难者的绿色旗子在由乱石堆起的坟墓上飘动。拉赫曼手中拿的是一支由中国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型步枪。这些吉普车和卡宾枪，也是由中央情报局出资购买的。

这个车队突然转弯翻过两座山，穿越了只有少数几间用泥土、

稻草和牲畜粪便垒起的小屋之后，又通过狭窄的羊肠小道，在差不多9千英尺高的山间要隘处停了下来：拉赫曼和其他一百人穿过要隘进入了阿富汗，一个其景色就象月球上的山脉一样荒芜和美丽的地方。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进行一场圣战，一场反对异教徒苏联军队的圣战。

苏联人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进行了一场几乎达10年之久的反对这个国家的战争；这种入侵是一种大规模屠杀行动，造成了几十万，也许有一百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苏联人摧毁了几千个村庄、农场和清真寺；5百万阿富汗人，该国人口的1/3，不得不向东逃亡巴基斯坦，或者是向西逃亡伊朗。——

中央情报局为阿富汗反抗者购买了大量武器，该局获得沙特王子、瑞士银行家以及伊朗激进分子的支持，组成了一个全球性倒卖军火网络。抵达游击队的这些武器使苏联人遭到严重伤亡；美国的刺毛导弹在历史上第一次击落了苏联飞行员。阿富汗的斗争也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圣战。

在整个80年代，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圣战者私运的武器，支出将近30亿美元。开始时，这种行动的规模很小，1980年只有3千万美元的武器，后来增加到每年1亿、5亿和7亿美元。除了20年前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战争以外，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装运武器则是它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行动。

开始运送武器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和秘密的道义行动。华盛顿没有料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通道会遭腐蚀，它的资金会被用于帮助为进行海洛因贸易提供资金；它的针刺导弹会落入伊朗手中，圣战会分化为一场内战，中央情报局的迫击炮和卡宾枪会在某一天用来杀害它意欲搭救的人民。

这场圣战爆发于整个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政治革命的年代。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下台。仅仅在9个月之前，该国王还告诉前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布什，他担心苏联人会包围并毁灭伊朗，以图攫取对波斯湾的控制权。2月11日，这位国王的军队分化，霍梅尼夺取政权。3天以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美国大使阿道夫·达布斯在一次预谋的绑架中被杀害。11月，伊朗的狂热分子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无辜居民扣作人质。原教旨主义的烈火席卷了沙特阿拉伯；武装的宗教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这就是麦加的大清真寺。——

伊斯兰世界怒火中烧；而且，这股野火还在铺天盖地向苏联边界蔓延。苏联人神经紧张地望着南方，因为莫斯科的统治范围，包括有生活在伊朗和阿富汗北部几个加盟共和国内的 4 千万各阶层穆斯林教徒，克里姆林宫不愿意看着这场大火扩展下去。

在喀布尔，一个手段毒辣的政权在 1978 年 4 月的政变中问世，并且向莫斯科寻求支持。1973 年 3 月，反对这个喀布尔政府的武装叛乱爆发，苏联人向阿富汗首都运送了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到是年夏，已有 1500 名苏联顾问控制着抵达阿富汗政府的军用物资，4 千多名苏联军官和技术人员控制着越来越图谋反叛的军队。8 月，阿富汗军队的一个团发生兵变，用坦克向这个政权的总部发动了一场徒劳无益的攻击，被苏联的直升飞机所摧毁。随着阿富汗的国家开始分化，红军也开始发动了入侵，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克格勃代理人于 9 月进入喀布尔，苏联军官于 10 月中旬便掌握了阿富汗西部欣丹德战略空军基地的控制权，此地距波斯湾不到 600 英里。美国的间谍卫星观察到，整个 1979 年的 11 和 12 月份，苏联部队一直在阿富汗边界大规模集结。

阿富汗象得克萨斯州一样大小，和埃塞阿比亚一样贫穷，它被夹在高大的群山、荒凉的沙漠和庞大的帝国之间，长期忍受不幸命运的折磨；它在俄国、中国、伊朗和印度统治者的包围之中，几千年遭受抢劫、掠夺和蹂躏，然而，它却没有真正被征服；它那些古老的城镇都在一代天骄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和帖木耳的攻击下保存下来了。现在，阿富汗正面临着它 6 千年文明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进攻。

11 万 5 千苏联部队的第一批，在圣诞节前乘军用运输车辆和飞机进入阿富汗，他们的出击是苏联军队在二次大战后，第一次侵入外国土地。莫斯科的代理人杀害了不称职的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扶持了一个坚定的亲苏统治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1980 年新年，卡尔迈勒在苏联入侵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的电视片表明，他象一个由绳子系着的木偶一样，从一个平台上愚蠢地向一样人挥手。

卡特总统于 12 月 28 日告诉美国人民，这种入侵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1 月 8 日他又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国务院的一份秘密报告得出结论说，美国已不可能制止苏联向伊朗和波斯湾推进。该报告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应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苏联人。这个赌注大概已经下列了尽可能大的地步。

在这次入侵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对阿富汗流亡者进行的游行示威，开始提供有限的资助，用无线电广播对阿富汗进行宣传，并且通过捐赠药品和通讯联络设备，与流亡的阿富汗游击队领导人开辟联盟关系。从 1978 年阿富汗政变开始，这些反抗者就在巴基斯坦边界内的营地内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一直与他们之中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一些人物保持着联系，他们中的齐亚·纳赛里曾告诫一名国务院官员，不要有与反抗集团结盟的想法，他说，那将会象把“5 只不同的野兽放在同一个笼子里一样。”

中央情报局命令它在喀布尔的情报站长注意苏联人的动向，而不是组织和支持抵抗运动组织；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还一直盯着阿拉伯国家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曾经报告，卡扎菲为反抗力量提供了 25 万美元。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电告他在这一地区的大使们，沙特阿拉伯也在为游击队提供资金。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于 1979 年 10 月发回的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战地报

告说，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正在与“一位巴基斯坦陆军少校会晤，该少校将为阿富汗持不同政见者提供由这个部族的叛逆者使用的弹药。”

苏联的入侵使这些“部族叛逆者”，在他们同胞的眼里形成了一种新的形象。现在，他们是圣战者，在伊斯兰教中，这是一个具有极强烈宗教含义的词汇：部分地指自由斗士，部分地指报仇雪恨的

天使——真主的圣战勇士。他们的上帝命令他们进行战斗，但真主的士兵装备太差；他们很有可能要在反对苏联人的斗争中取胜，但他们需要有导弹以攻击令人可怕的武装直升机，他们需要火箭推进的枪榴弹去穿透坦克的装甲板。

在苏联入侵的一周内，卡特总统就决定为阿富汗人运送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不能来自美国的武器储备。游击队必须有可能声称，他们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供应的；以这种方式把手隐藏起来，正是秘密行动的标准程序。卡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命令中央情报局“开始安排苏制武器（似乎是从阿富汗军队那里得来的武器），向阿富汗的自由战士发送。”

中央情报局已经准备就绪。在遭受几年水门事件的调查、解雇和怀疑之后，对于该局来说，这是一次在反对苏联的战斗中检验自己的机会。

开始，中央情报局碰到的是一个道德问题：鼓励一支其武器质量低劣、且又缺乏组织的游击队去对付苏联红军的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这样作合适吗？游击队有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吗？圣战者已经作好了比为他们的事业而死还要充分的准备，为圣战而死是走向天国的最近道路。无论有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他们都将把反对俄国人的斗争进行下去。

卡特的中央情报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我们一开始就遇到某些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个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那些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民提供武器，以达到使俄国人丧失其均势地位目的的作法，对美国来说是不是正确？从道德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回答起来很棘手的问题。为自由战士提供给养的整个计划，都是一个为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人们提供给养的计划。”

“不过在当时，在1979年，这种行动对美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我说：‘好吧，我想从道德方面讲，我可以接受这种计划。’”

看一下地图便显而易见，中央情报局要把武器运抵圣战者只有一条道路。阿富汗的西部和南部邻国为伊朗，当时已陷入霍梅尼的迷惑之中；它的北部邻国是苏联；这条通道只能穿越巴基斯坦。这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已经下降到了空前低的程度。

巴基斯坦的军人统治者穆汗默德·齐亚·哈克将军非常乐于称自己为独裁者，他那深陷的双眼和自行车把似的小胡子，使他看上去就象是无声电影中的一个恶棍。他把对手投入监狱，取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无视全世界的抗议，于1979年4月处决了被他推翻的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布托被从监狱里拖出来，在半夜时分被吊死。更糟糕的是中央情报局了解到，巴基斯坦正在偷运技术，企图制造一枚核弹头——第一枚伊斯兰核弹。根据美国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法律，卡特于1974年4月砍掉了对巴基斯坦的全部军事和经济援助。11月21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一个月，巴基斯坦人抓

住伊斯兰愤怒的狂热精神盛行之机，反美的暴民们洗劫并焚烧了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以及美国设在拉瓦尔品第和拉哈尔的文化中心。

中央情报局就是在这种仇视和相互不信任的气氛中处理与齐亚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问题的。不过，他的国家现在已发生了变化，巴基斯坦已经不再是与美国敌对的伊斯兰专政国家，而是反苏战争前线的一个坚强联盟。中央情报局终于在这场圣战中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同盟。

苏联入侵后两周的 1980 年 1 月，中央情报局开始向巴基斯坦装运武器。新年伊始，特纳就给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最大情报站之一的开罗情报站拍发了电报，他告诉该站站长，美国总统希望得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帮助。埃及领导人掌握着中央情报局需要的一些东西：大量苏式武器，如自动步枪、地雷、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等；它们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留下来的，当时，埃及和莫斯科关系友好。

1981 年 9 月在萨达特遭暗杀之前两周，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采访时还回忆说：“阿富汗事件一爆发，美国就与我联系，并且对我说，‘请打开您的仓库，以便我们可能为阿富汗人提供他们战斗需要的武器’，我提供了这些装备。为阿富汗人运送武器的美国飞机都是从开罗起飞的。”

1980 年，中央情报局从萨达特那里运走了价值 1500 万美元的武器，而为埃及的武器库补充了更新式的美国装备。其中有些武器进入了位于开罗附近的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工厂，改装为苏联武器的式样，提供给圣战者。中央情报局还雇佣和它常有交往的一个承包商休斯飞机公司，更新埃及的苏制 SA—7 型防空导弹。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一个月內，这些武器便开始运往巴基斯坦。然而，在运送武器的通道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尚待确定，因为，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某个巴基斯坦防地建立一种交换机构，把枪支弹药分发给阿富汗反抗者，它还需要一个出面的办事机构。

卡特的同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于 1 月份飞往伊斯兰堡。伊斯兰堡是一个人工城市，修建起来作为巴基斯坦的新首都，它的政府中心看上去象一个庞大的国际航班中转站，一个无精打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布热津斯基走下军用飞机之后，直接去会见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长，此人在美国使馆被焚烧之后找了一个临时住所。他们二人和齐亚的情报局长阿克塔·阿卜杜勒·拉赫曼将军坐定之后，布热津斯基拿出了白宫非常简单的信函：如果齐亚愿意帮助中央情报局向阿富汗抵抗运动运送武器，美国将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此次会晤非常熟悉的一位巴基斯坦人士说：“当齐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看法与中央情报局完全一致。”——经过讨价还价——齐亚的局长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卡特最初提出的援助数额，说“数目大小”——之后，美国同意在此后 6 年之内，为齐亚提供 32 亿美元援助，一半现金，一半高技术武器。这次交易使巴基斯坦从一个国际流浪者，又变成了除以色列和埃及以外的第三个美国外援的最大受益国。

齐亚同意在中央情报局的运输通道上发挥有效的联系作用，但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要求说，一旦运送的武器抵达巴基斯坦，它们就应该由巴基斯坦控制，明确他说，由齐亚的军事情报机构混合军事委员会（ISI）控制，它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秘密警察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组织。

中央情报局很快答应了齐亚的条件，因为除了把运送的武器交给齐亚的间谍以外，它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根据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圣战者

在国会中最卖劲的支持者、参议员戈登·汉弗莱提供的消息，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美国情报员，在最关键的运送地段监督这些武器的转送。在这凡年内，混合军事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开始是拉赫曼将军，后来是哈密德·古尔将军），一直按惯例与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情报站站长讨论后勤和策略问题，但大权控制在混合军事情报委员会手中，通过它把武器分发给阿富汗游击队的政治领导集团，由它决定抵抗运动的哪些部分得到什么样的武器以及得到多少武器。

在阿富汗的反抗者中存在着7个不同的主要政治派别，尽管他们的美国捐赠者称这些圣战者为抵抗运动或联盟，似乎他们是唯一一支战斗部队，但这些反抗者仅在他们仇恨苏联人这一点上是一致的。7派的领导人相互欺骗，他们的内部政治活动领域是一个进行宗教、政治和人事斗争的地雷区，他们的联盟也是神话。圣战者的一个战场指挥官赛义德·艾哈迈德·杰汉说，这7个头头只有一个问题是共同的：“他们都想当阿富汗国王。”

分发中央情报局枪支和财物的巴基斯坦一方情报站长们，非常赞赏他们认为在战场上最富成效的4派阿富汗游击队，这4派是坚持最极端政治思想的集团，是坚持原教旨主义观点的集团，也是坚持反西方的集团；他们还同时得到来自伊朗和利比亚伊斯兰兄弟的支持。混合军事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欣赏一个最激进的圣战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他身体瘦削，黑络腮胡子有一英尺之长。

希克马蒂亚尔历年来所获得的中央情报局的武器，价值超过5亿美元，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合理分配，尽管他咎由自取的名声还是残暴的狂热分子；一个其表现几乎完全为西方所瞧不起的人物，竟成了中央情报局武器运送的最大受益者。

希克马蒂亚尔是伊斯党（Hizb—i—Zslami）的负责人，他在苏联入侵前的喀布尔作为一名学生领袖爬上了掌权的地位，他对伊朗

的霍梅尼及其伊斯兰革命深为赞赏；他的追随者最初是由于向拒绝佩带面纱的妇女脸上倒酸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我与之交谈过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官员们，都称他是“胆小鬼”，“堕落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一块确定无疑地要实行专政的料”，而不是一个民主分子。如果希克马蒂亚尔出任阿富汗国王，他会踏着用中央情报局的武器屠杀的同胞们的尸体向上爬；几年来，希克马蒂亚尔的游击队绑架和暗杀了一百多名与其竞争的反抗者，他及其助手经常对犯人进行屠杀和碎尸；他还劫持运往指定战场的武器运输机，甚至用枪逼着人们去偷盗装载食物和药物的卡车。从利比亚的卡扎菲那里，他也能得到资金和武器，他象仇视苏联人一样仇视美国，在这些反抗者维持其流亡政治司令部的地方白沙瓦，他的追随者在政治集会上既高喊“该死的美国！”亦大叫“该死的苏联”。

长期以来，白沙瓦一直是酝酿屠杀阴谋的一个城市，1987年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位于开伯尔山口附近这个古老的前线城市度过的，我与卷入这场战争的阿富汗人、美国人以及巴基斯坦人谈话，准备与圣战者一道进入阿富汗。尽管上个世纪的英国征服者，已经把白沙瓦的中心强行安排在了有条不紊的地图坐标上，然而它的街道却已消失在了一条条脏乱不堪的偏僻小巷中。在那里，出售红宝石、小萝卜、杂碎肉、山羊头、香料、匕首以及石榴的小贩生意兴隆。佩戴穆斯林头巾的阿富汗人擦着由锑粉制作的亚洲眼脸膏，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型步枪，手挽手走在非常粗糙的道路上。由抵抗运动

中的叛逆者和苏联训练的渗入分子安放在汽车上的炸弹，不时发出令人恐怖的爆炸声。由于行动自由的新闻记者和自由作家作为秘密代理人出头露面，间谍活动十分猖獗。白沙瓦是该国法律所管辖的最后一个前哨城镇，从它的郊区向西就是阿富汗边界，一个该国管辖权结束、部族法典起支配作用的地方，铺好的路面至此结束。

正是在这个间谍、走私犯和盗贼活动的天然天堂白沙瓦，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对阿富汗秘密行动的控制，该局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条武器运输线有一条多么奥秘的流程，一个美国的秘密行动者和阿富汗步兵付出了极高代价的流程。

中央情报局的运输线出现了漏洞，而且极为严重，大量武器充斥在世界上这个无政府主义最严重的地区。首先，巴基斯坦军队在运送武器的过程中随心所欲地进行扣留；其次，腐败的阿富汗游击队领导人，也从中央情报局的武器库中偷盗和贩卖价值几亿美元的防空枪炮、导弹和火箭推进榴弹以及 AK—47 型自动步枪、弹药和地雷。有些武器还落入了犯罪团伙、贩卖毒品的要犯以及伊朗军队内最激进派别的手中。还有其他一些则为诸如希克马蒂亚尔这样的领导人从战场上扣留下来，储藏起来，以备苏联人开始离开的一天为争夺阿富汗而战。

阿富汗境内抵抗运动的一位指挥官拉姆·艾哈迈德说：“白沙瓦诱人上当的活动多得很；在那里，忠心耿耿从事政治活动的正直人不多，很多人都把钱塞进了自己腰包。”

圣战者的领导人在巴基斯坦的武器市场上出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某些武器，使这些武器在整个国家卖来卖去。巴基斯坦城市的犯罪辛迪加，也用这些已经运抵阿富汗的枪炮武装自己；小村镇的生活，不时为使用中央情报局的自动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进行战斗的火光所打乱。驻白沙瓦的一位国务院官员说：“有大量武器在整个农村地区扩散，即便在每一个看护羊群的牧童手中，也都有一支 AK—47 型步枪。”

至少有 12 枚中央情报局的致命针刺防空导弹，在伊朗革命卫队手中上紧了发条，这些伊朗人是从最有名的游击队之一的组织那里得到这些导弹的，这个游击队为一个蓄棕色胡子的持强硬路线者尤尼斯·哈利斯所领导。哈利斯坚持说，伊朗偷了埋伏在伊朗边界附近的针刺导弹；然而驻伊斯兰堡美国使馆那些持怀疑观点的人则说，哈利斯的助手卖掉了这些导弹。无论实情如何，原教旨主义者派系的圣战勇士与他们伊朗的伊斯兰兄弟之间，肯定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的许多人都相信霍梅尼是英雄，而不相信西方所说的他是危险的狂热份子。1987 年 10 月 8 日，革命卫队在伊朗的炮艇上，向在波斯湾巡逻的美国武装直升机，发射了一枚这种针刺导弹；通过中央情报局运往海外的武器，又反过来对准了美国士兵。

此次事件后的一周，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阿诺德·L·拉菲尔告诫我：“据估计，有些针刺导弹可能落入罪恶之手，这一点已经考虑到了。”美国已经考虑到了运送针刺导弹的危险性，但却视而不见。

该大使承认：“漏洞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指挥官有很多武器，而他又非常需要钞票，那么，他一定会设法讲求一点实际利益的。对此，我们既无能为力，亦不好多说。”

在波斯湾的针刺导弹事件中，并没有美国人死亡，不过，这场圣战却为美国带来了衰运，虽然是以贩卖海洛因的形式。对于圣战勇士们来说，枪炮、

毒品和钞票都是可以交换的商品，这些反抗者把大量的钱用于种植和买卖提炼海洛因的原料鸦片。阿富汗境内圣战勇士的指挥官们，个人都控制有大片种植鸦片的土地，有些土地穿过该国南部平原地带，绵延几英里之长。根据驻巴基斯坦的国务院官员和美国药品管制局在巴基斯坦的代理人的看法，由这些反抗者所控制的土地，每年可收获多达4百万磅的鸦片。为他们进入阿富汗开道的导弹和迫击炮，都装在中央情报局为游击队购买的卡车和拖车上长途跋涉；在返回巴基斯坦的旅途中，这些车上常常装载着鸦片。在沿边界一边的制药厂中，把这些鸦片提炼为海洛因，流向世界各地。

在争论毒品交易时受到责备的伊斯兰堡国务院官员说：“我并不怀疑，这些圣战者在穿过边界时携带有毒品，我们对他们的指挥官谈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说，‘我需要这些人，我不能疏远他们。’在这些圣战者之中发现这么大的毒品集团，我们确实非常震惊。”

美国驻巴基斯坦药品管制局的代理人说，这些圣战者向种植鸦片的抵抗运动指挥官以及收购鸦片的海洛因商人，倒卖从中央情报局的补给线上转移出来的自动步枪、火箭推进榴弹，甚至防空火炮。药品管制局驻伊斯兰堡的一位代理人说，“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毒品集团都已经得到了火箭推进榴弹和AK—47型步枪。我说的是，世界各地的毒品贩子都在购买枪支，但是在这里，这些家伙已经武装到牙齿……你以为这些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呀！有很多枪来自我们的朋友手中，这一点毫无疑问。”

1979年圣战开始之前，在巴基斯坦加工的海洛因非常有限，到1989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生产和运出的海洛因，多达世界其他地区数量的总和。美国痛君子每年使用的1/3到一半的海洛因，即大约3吨毒品，都来自控制在这些圣战者手中的土地所种植的鸦片。

最后，齐亚将军的巴基斯坦军队，也把从中央情报局的运输线上扣留武器和弹药，视之为他们的权利。1985—1987年曾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小乔治·E·布朗曾说：“巴基斯坦人也抽走了我们所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援助物资。”中央情报局宽恕这种偷窃行为，说这是一种代理权；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丹尼斯·德康西尼则说：“这是我们为巴基斯坦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的一条人为的道路。”

不过，中央情报局计划的破产，首先在于阿富汗抵抗运动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政客，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个人的权力，而不是战场上的危险；当他们的部队在阿富汗的群山和沙漠中艰苦奋斗时，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却在白沙瓦修建豪华别墅，在他们的司令部保养车队。当这些阿富汗政客把中央情报局的武器变卖为现金的时候，该局却保持缄默。

巴基斯坦军队的主要思想库、战略研究所，位于伊斯兰堡郊区开挖在半山坡上的一座院落里，主管该研究所的退休巴基斯坦将军杰马尔·马蒂努丁说：“在这一类秘密行动中，你必须对那些腐败现象以及转移和丢失武器问题有所准备，如果美国认为它所提供的东西都一定会收到，那是不明智的。在这条运输线上有很多代理人，有很多可能捞钱的家伙；在卖给犯罪份子的武器和储藏起来以备困难时使用的武器二者之间，控制武器的人就可以待机而为之。”

根据中央情报局官员以及收到有关情报资料的国会议员的估计，在中央情报局运送的武器中，被偷和被转移者大约价值6—10亿美元，或者更多一

些。中央情报局对损失的估计最保守，1986年，该局告诉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们说，为阿富汗抵抗运动运送的武器，至少有20%从运输线上被转移出去。国家安全局所作的另外一项研究，估计被偷和被卖的中央情报局武器有30%，这个估计与几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情报人员的猜测是一致的，这些人员认为，这个时期的损失大约合9亿美元。我所采访过的国务院官员和国会成员，都说这种损失可达50%甚至更多。无论如何统计，由于为阿富汗奋斗而被盗窃的武器价值，都远远超过国会在80年代为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的3亿5千万美元的拨款。

在秘密行动中，这种损失属正常现象，或者，就象在中央情报局度过他们一生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经监管向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老挝游击队提供武器的前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说：“在这类性质的秘密行动中，你必须乐于接受这种消耗，20%的损失并不算太坏。”

开始执行阿富汗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武器只有1/4或1/3没有运抵目的地感到吃惊：“我不愿意估计20—30%的损失；不大量行贿就不可能使武器通过白沙瓦。这不是一种清白而顺利的活动，一定会有武器落入不道德者之手。巴基斯坦人要拿走一些；阿富汗各派也会均分一些……如果我们只能使20%的武器运到目的地，我并不为此感到奇怪。

“不过，你必须睁大眼睛，你必须提醒自己知道，误入歧途的那些针刺导弹的代价，那些被窃之物的代价，是不是比其本身的成本更高；你必须们心自问：‘我失去理智了吗’”

对这种盗窃问题，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官员是知道的，但他们无法予以制止，伊斯兰堡的一名国务院官员说，他对于这种损失只能听之任之：“如果我们提供的各种武器能通过50%，那就是奇迹；不过，这就是世界上这个部分的生活。”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也承认这种盗窃的事实，参议员德康西尼说：“你能使这种损失停止吗？我猜想，这个国家会说是的。”

中央情报局知道向一个不受管辖的战争地区运送枪支的危险，在这块土地上，宗教狂热风行，鸦片的种植轻而易举地处于统治地位，法律的支配作用就象一层簿簿的遮羞布。该局知道最强大的反抗组织都公开反美，企图把强硬的伊斯兰政权强加于阿富汗，该局也清楚，这些游击队既不是议会党人，亦不是典型的正直人，偷盗、狂热，毒品盛行，这就是在秘密世界进行交易的代价。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重要的是这些圣战者在反对苏联人的战争中，乐于战斗和牺牲。许多世纪以来，阿富汗人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斗，这里的军阀和部族所生活的土地，是地球上最具野性的几个地方之一，除了真主和残忍的暴力以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法律，作为战士，他们的勇猛精神是传奇式的。

1987年11月，我同一队圣战者离开白沙瓦，沿边界进入了阿富汗，我们穿过阿富汗东北部库纳尔河河谷旁的大山，在一个名叫纳朗的小城镇扎营，这是在圣战中遭到破坏的若干尚未公开的阿富汗村镇之一；从敌人阵地上不断飞来的炮弹划破天空，盲无目的地落在河谷之中。

几天之内，7个游击小队中有3个申请穿过险峻的小道，来到了这个营地，他们用于瘦的骡马拉着装有导弹和迫击炮的大车。他们把这些武器存放于开挖在半山腰的洞穴中，睡在露天以及用泥巴搭起的草棚中。白沙瓦抵抗

运动的政治领导者说，战争的新阶段就要开始了，抵抗运动战士反对红军的斗争，将不再是小规模地打跑跑的运动战，他们将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们计划进攻库纳河沿岸的6个阵地，异教徒的6个碉堡。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重要进攻，1980年1月发生在这个富饶的河谷里；集中在纳朗附近的许多圣战者，都曾生活在库纳河岸，他们已经失去了家庭和亲人。为土地灌溉送水的渠道也遭到破坏，我们下面的土地一片荒芜。在他们准备进行战斗的间隙，他们一面饮茶，一面讲述那第一次战争的日日夜夜。

这次入侵前曾是一个小店主的马哈茂德·拉赫曼说：“俄国人轰炸了我们的村庄，杀害了我的孩子，我失去了儿子和兄弟。我把家里的其他人找到一块，步行进入了巴基斯坦，在这期间，我们不断遭到直升飞机的进攻……

他凝视着营火说道：“我经常想到我的家乡和菜园，我们有土地，有森林，有上等水果以及很好的淡水。我种植胡桃、葡萄、苹果、桃子和柑桔。”

每一个人都有一连串的损失可以讲。象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姓与名合二为一个的指挥官扎姆雷说：“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失去有自己的家庭成员，母亲、兄弟、姑母或父亲。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孩子、妇女和老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村庄、菜园和寺庙。”

在营地传出呼喊祈祷的声音时谈话终止；祷告声在山中回荡。

按照伊斯兰法律，当天的第五次祈祷，人们必须放下他们的自动步枪和老式枪支。这些圣战的战士们赞扬上天，祈祷胜利。

我随身带有一本《古兰经》，那天晚上，我还曾经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读过；《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所听到的真主说过的话。这些圣战者的故事都写在上面：“他们曾抛下若干园圃和泉源，庄稼和美宅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福泽！”

他们的上帝告诉他们：“有一族人已经违犯盟约，要想驱逐先知，而且首先进攻你们，你们怎么还不讨伐他们呢？难道你们惧怕他们吗？”

“你们应当轻装地或重装地出征，你们当借你们的财产和生气为真主而奋斗”。——

当晚深夜，游击队毫无组织的进攻开始了，迫击炮和大炮火光冲天；次日，手持自动步枪的步兵等了一天前进的命令，但没有任何指示下达。晚上，他们睡在坚硬的土地上；而精心安排这次战斗的政治领导人们，却在巴基斯坦一侧的堡垒中过夜，他们睡的是软垫，枕的是金线绣花枕头。

这些圣战者等待着命令，同时，对约定的武器弹药没有到来表示严重不满，他们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武器的洪流，在阿富汗就变成了涓涓细流。扎姆雷一边支起他的步枪，一边唠叨说：

“武器从没有够用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在帮助我们，这些武器来自美国人民，但是不够。”他抓起一把碎石象征武器，用以说明他的看法：“总共就这么多武器进行分配”，他拿出几粒石子放在另一只手中：“这就是我们所收到的。巴基斯坦人把最好的武器都偷走保存起来了；他们在白沙瓦就这样干。”

从山上营地里充作指挥部的几间被炸的农舍里，传出了吵闹声，3名开小差的阿富汗军队士兵，骂骂咧咧地来到了这些圣战者的营地。几年来，有好几万阿富汗军队的士兵，都是这样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3个都说，他们是被强迫编入军队的，是从田地和村庄被抓走送到远离家乡的前线的。

其中一个逃兵叫马哈茂德，他来自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偏远地

方。他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政府的兵营，也没有俄国人。一天，几个士兵来把我们抓到了这里，”阿富汗军官告诉他，那些圣战者都是国外异教徒的工具，和他们斗争是他的爱国主义义务：“这些军官告诉我们，你们必须保护我们，你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圣战者是由美国和欧洲人支持的，他们为了外币而打仗。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否则，我们就不会向圣战者投降了。”这正是抵抗运动成员的痛处；他们不想让他们的阿富汗同胞把自己看作为外国势力的工具，所以，他们坚持自己没有接受任何外援的虚幻看法。

翌日太阳升起的时候，阿斯拉夫·汗正蹲在山旁擦拭他那陈旧的恩斯菲尔德步枪，他已经70岁了，他的枪差不多也有这么多年头；他脸上长满了犹如暴风和乌云般的灰色胡须。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两个儿子，30岁的穆罕默德·尤尼斯，13岁的萨拉赫丁，他们都拿着自动步枪。

阿斯拉夫·汗说：“我愿意为阿富汗而死，我愿意成为烈士，我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瞬；我已经教导儿子们，要战斗到他们最后的时刻。”

萨拉赫丁记不得圣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他知道这场战争的原因。他说：“俄国人到这里破坏了我们的宗教，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说，他们是来帮助阿富汗人的，但他们却来屠杀我们。”

在这个营地上，到处都是还不到结婚年龄的孩子，但他们已足以参加战斗和作出牺牲了。谢里默18岁，已经参战6年，他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朋友和童年。他说：“在我父亲殉难之后，他告诉我决不要投降，我将战斗到生命的终结，到死为止。”

穆罕默德·阿里14岁，从12岁开始就参加了战斗。他指着库纳河谷说：“我父亲和一个哥哥就是在那里遇难的，我哥哥死时我在场……我们的家也在那里，我们有很多羊，我是牧羊的；现在，我的家已经被毁，羊也都跑了。”

我问他长大了准备干什么，他怀疑自己是否可能长大：“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我无法预料，我也许会牺牲，成为烈士，那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防空炮火又开始发射，穆罕默德·阿里遥望着那令人眩目的太阳；几架米格机又出现了。

当苏联的米格喷气轰炸机和红色雌鹿式攻击型直升机出现在天空，企图杀死许多阿富汗人时，他们才第一次了解了现代技术。苏联空军对这场战争的控制差不多达7年之久。

1986年底，通过中央情报局运输线运来的针刺导弹开始到达。中央情报局还雇佣了一些退役的美国军人，派他们到位于巴基斯坦的游击队营地，教授这些部族的人如何使用这种导弹，针刺导弹通过寻的传感器追踪轰炸机引擎散发的热量，发现目标。这种扛在肩上的导弹非常有效，以至苏联的武装直升机不得不在白天停止飞行，苏联的轰炸机也只能高空飞行，大大降低了轰炸的准确程度。

不过，使用这种导弹是要经过一定训练的，能够瞄准头顶4架银色米格机之一的人，连一个都没有。瓦利·汗为信任他使用这种昂贵的武器而感到骄傲，此刻，他正在高山顶上摇来摆去，价值5万美元的火炮就架在他的臂膀上。当米格机在距圣战者的一个迫击炮位仅200英尺远的地方扔下一颗500磅重的炸弹时，大地颤动了；这是两天内他所看到的第四次米格机轰炸，也是他第四次清楚地瞄准，他发射了，针刺导弹飞向天空，但没有击中目标，在蓝色太空中留下了一条蜿蜒漂动的白色漂带。

他虚张声势他说：“我们要吓唬吓唬他们，他们不会再来了。”

3 天以后，圣战者们的这次进攻，准备用两周时间进行的关键性进攻失败了。事实表明，这 3 个小队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作战计划，那一个也没有实现。无后座力炮，地地导弹发射器和迫击炮，花极大代价和冒极大危险运到这个山旁的所有武器，都没有使用，这些圣战者的政治领导人把他们的弹药存放起来，以备分赃时使用。围绕以前的装备争论问题，这些反叛的游击队在该月相互厮杀了 3 次；在由于武器储存问题而引起的相互屠杀的战斗爆发的时候，当投入战斗的各派游击队都在用火箭推动的枪榴弹相互轰击对方碉堡的时候，这次进攻却由于缺少弹药而失败了。米格机又一次对他们的很多营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反抗者退却了。他们损失了 19 个人，却没有守住阵地。

这就是这场战争所走过的道路。面对苏联军队，圣战者的勇敢精神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反对入侵者的美德也是公认的。他们的领导集团的政治分歧和腐败，则是中央情报局必须支付的一笔代价。

为了赢得这场圣战，华盛顿几乎乐于付出任何代价，特别是国会非常喜欢阿富汗这场战争，它向阿富汗倾注的钞票，比中央情报局所要求的，或者说比它所明智使用的都多，在这些年内，中央情报局每要一个美元，国会就提供两个美元。在许多保守派人物看来。美国武器能够杀掉苏联士兵的任何战争，都是天赐良机，在许多自由派人物看来，阿富汗反叛者的传奇故事和勇敢精神，已证明很有竞争力。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支持，可以在政治上保护自己免受反共不力的指责。

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热情，与围绕里根政府的另一个伟大的反共事业、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斗争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曾效劳于众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位国会议员，用指头在空中打了一个问号后说：“那是一场‘糟糕的战争’，阿富汗则是一场‘理想的战争’”。

在华盛顿已成为圣战者最好朋友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查尔斯·威尔逊说：“这场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圣战。噢，还有一些自由派人物反对杀人，包括杀俄国人在内。不过就这次战争而论，即使站在错误一方持反对观点的自由派人物，也是支持的。”

查尔斯·威尔逊是一个高个于得克萨斯人，具有一种投得克萨斯人所好的欲望。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里，他保存着有关阿富汗战争的各种纪念品：他与圣战者的骑手一块骑在一匹白马上彩色照片，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在他办公室的门口，则挂着一个针刺导弹发射器；一个手工雕刻的匾牌放立其上，上书：“准备着：考

虑战争。”我是在威尔逊正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前往阿富汗边界附近的一个巴基斯坦小镇达拉途中遇到他的，在这个小镇上，各种各样的枪支和毒品，最著名的是自动步枪和砾石般大小的球形鸦片，在沿该镇唯一一条街道的商店里公开出售。当我在达拉看到这位国会议员时，他正从许多武器交易者中的一个人肩上，取下一支非常难看的长枪，对着天空扣动了扳机。

“这完全是一种研究枪支的文化”，他十分高兴他说道：“就象 19 世纪 70 年代阿比林的文化一样。”来自牛镇的这位议员，在阿富汗边界就象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威尔逊发起的运动要求持续不断地为圣战者提供更多资金和更好的武器。我们 1987 年在华盛顿交谈时他说：“我认为，这次行动是我们在战场上打败苏联人的一个机会。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在越南损失了 5 万 8 千人，苏

联人可能已经损失了 2 万 5 千人；我估算，他们还欠咱们 3 万 3 千个死人。”

—— 威尔逊说，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凯西认为；这对于苏联人可能是一次沉重的失败；美国作出一点点财政努力，承担最低限度政治风险，从政治上给阿富汗抵抗运动以支持，这在道义上是一种完全正义的事业。”

在关起门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斗争中，国会同意保持中央情报局有关阿富汗行动计划的预算要求不断增加。1983 年底，威尔逊领导的运动取得胜利，导致国会对隐藏于五角大楼黑预算中，为阿富汗提供的 4 千万美元的军备拨款翻了一番。但是，对阿富汗

行动的某些不同见解，在里根政府初期的中央情报局内已经出现，该局分析家们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运输线已经满载，我们已经收到了有关腐化堕落，以及圣战者们倒卖武器的报告，”正如众院情报委员会一名国会议员告诉我的那样。

1984 和 1985 年，围绕阿富汗行动的内部斗争发展得更为激烈了，情报委员会内部有一派，不相信阿富汗反抗者会赢得对苏联人的军事胜利，他们主张把每年的援助保持在 1 亿美元以下。这一派的领导人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该局 32 年的老战士约翰·麦克马洪，他企图尽其所能“否决”这个行动——仅仅使用共产主义集团的武器，使复杂的美国装备脱离战场，控制武器运输的规模和范围。麦克马洪是一名专业人员，在凯西的中央情报局中，他比任何人都想维护该局的荣誉；但是，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观点毁了他的职业。

中央情报局主管秘密行动计划的助理副局长托马斯·特韦顿说：“有人指责麦克马洪在这个问题上太软弱，使他受到极严重打击。1985 年曾出现过一次很大的书信运动，有很多信都是针对约翰·麦克马洪个人的，这对他确实是个严重干扰；这是一次公开的运动，发给国会议员的信有几千封，攻击约翰·麦克马洪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不想让圣战者赶走俄国人。这是一些用心险恶的材料。”这种攻击是麦克马洪 1986 年 3 月离开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原因。

—— 对立面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些“弃血者”——这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称呼——认为，只要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者提供他们为胜利而斗争的武器，他们就能在战场上打败苏联人，他们企图使苏联人用鲜血和生命，为他们的入侵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1984 年，国会中的保守派攻击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软弱而无效。威尔逊议员说：“从 1980 年到 1984 年，中央情报局有点害怕枪炮声，他们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不愿意插手另一大堆麻烦事件。但在 1983 和 1984 年，我们把他们要求的拨款增加了一倍，坚持要他们提供防空导弹……我们胜利了，麦克马洪的离去是这次胜利的关键。”

1984 年 10 月，这些弃血者取得了这类胜利中第一个胜利，他们迫使中央情报局为圣战者购买了击落苏联战斗机用的更多和更好的武器。中央情报局迫于压力，从瑞士银行帐户取出 5 千万美元，购买了 40 门厄利康防空大炮，这种庞大的瑞士产大炮是一种复杂而昂贵的武器，要拉上山坡或拖过沙漠并不理想；在阿富汗，从未见到这种厄利康发挥多大作用。在中央情报局购买的这 40 门大炮中，只有 11 门运到了战场，其他 29 门，价值 3625 万美元，都在沿途失踪了。

到 1985 年，这些弃血者已经控制了阿富汗行动计划。是年初，他们把中央情报局用于阿富汗项目的预算扩大了 3 倍，达到 2 亿 5 千万美元，这个数目表示，它在当年中央情报局的全部秘密行动计划开支中，占 75% 以上。此后到 1985 年 4 月，里根总宣布他也是一个弃血者；他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即关于国家安全决定的第 166 号指示，要求中央情报局“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10 月，白宫又抓住了一个黑预算的钱包，空军预算中用于“特别活动”计划项目的 20 亿美元。这个秘密指示又安排了 2 亿美元的情报资金，把这些钞票输往阿富汗战场。现在，中央情报局支付于这场圣战的钱，每年已接近于 5 亿美元。

苏联入侵差不多 6 年之后，美国才最终制定了官方的阿富汗政策，弃血者取得了胜利。从精神看，以及就本质而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基本上都是查尔斯·威尔逊的政策：报越南损失之仇。

除了美国的黑预算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以外，圣战者还需要另外一种资源，他们还需要为把物资拉进阿富汗的拖车司机和卡车司机支付高昂的费用；在阿富汗生活中，行贿也是做交易的正常开支。有时候，抵抗运动成员还可以从溃败的阿富汗军队那里购买枪支弹药；因此，他们需要现金、阿富汗货币，而且要很多。中央情报局至少仿制过 2 千万美元的阿富汗钞票。在世界各地，阿富汗是属于纸币总是很脏、严重磨损和非常破碎的国家，然而我在阿富汗所遇到的抵抗者的指挥官们，都有很多叠崭新而且是清洁整齐的钞票；这种仿制计划似乎是极为成功的。

中央情报局的援助从没有足够的时候；无论国会和中央情报局向这场战争倾入多少钞票，圣战者们获得军事胜利的观点仍然是一个幻想。

中央情报局长凯西面向国外寻求新的秘密现金的来源；在 70 年代，他一直是为共和党筹措资金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懂得如何在不得已时强迫那些捐助者掏腰包。他把外国政府视之为秘密行动资金的富源，利用它们建立一个可能躲避国会耳目的中央情报局秘密金库。凯西的中央情报局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结成了伙伴关系，这些国家向阿富汗武器运输线提供了 7 亿 5 千万美元以上的枪支、货币以及物资援助；美国则卖给他们几十亿美元的武器，送给他们几千万美元、鼓励其秘密支持。

这位中央情报局长首先找到了沙特阿拉伯王室。在凯西任内，中央情报局和沙特发现他们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可以合作。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前任斯坦斯菲尔德·侍纳曾说：“没有理由不那样作，从一个富裕大叔那里弄点钱挺好。如果你和另一个国家有共同利益，你们就可能乐于协作。凯西令人误解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告诉国会。”

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是通过美国武器凝结起来的。1981 年 10 月美国卖给沙特人 5 架 AWACS 侦察机，一种最现代化的情报收集工具，同时还有一大批武器，价值 85 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对外武器销售，必须经参院批准，因此，在美国参议院引起了激烈争论。白宫有一个小组专事寻求参议院审批，它的领导人就是空军少校、后来又成为副助理国防部长的理查德·西科德，他有多年向外国出售美国武器的经验；新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一个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海军少校奥利弗·诺思，也是专门对参议员进行鼓动工作的这个小组的一分子，在白宫的强大压力下，参议院以 52 票对 48 票通过了这笔交易。沙特阿拉伯非常感激里根政府；凯西利用了这种感激之情。AWACS 飞机交易之后，凯西开始催促沙特阿拉伯王室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为阿富汗

抵抗运动提供资金，精于实践支票外交的沙特人乐于，而且可能为之效劳。

1981年11月，当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还是一个王储的时候，他就把在 AWACS 侦察机交易中达成的默契，告诉了一位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商人萨姆·巴米赫。1987年7月在众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面前宣誓作证时，巴米赫叙述了这次谈话，他作证说，为了交换 AWACS 侦察机，沙特将致力于为中央情报局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提供资金；在秘密外交的世界上，这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等价交换，没有人会说是佣金。

为了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中央情报局在瑞士开立了美国和沙特联合银行帐户，就象为一场马拉松比赛提供捐助一样，沙特阿拉伯按中央情报局每年分配它为抵抗运动提供的数额，以美元偿还美元。1984年初，凯西个人说服了法赫德和他的驻美国大使班达拉·宾·苏丹王子，也帮助支付尼加拉瓜反对派进行战争的费用。沙特为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资金的协定一经签订，为阿富汗提供资金的瑞士联合银行帐户一经开启，里根总统便利用紧急状态法赋予他的特殊权力，绕过国会的强烈反对，为沙特提供了400枚针刺导弹。1984和1985年，沙特政府为中央情报局在瑞士和开曼群岛的银行帐户，输入了5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有5亿至5亿2千5百万美元投入了阿富汗抵抗运动；至少有3千2百万美元瞒着国会，划拨给了尼加拉瓜反对派。用于这两项事业的钱，在中央情报局开立于瑞士的唯一一个银行帐户上是混在一起的。当对伊朗反对派事件的调查揭穿了秘密帐户的丑闻时，国会调查人员怀疑，凯西把国会拨给阿富汗的款项，转移给了尼加拉瓜反对派；

他们的这个怀疑既没有得到证实，亦未能被驳倒。

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利用外国政府筹措秘密基金的策略，在里根第二个任期的初始得以流行。寻找为政府所支持的自由战士提供资金的途径，激发了某些创新思想的产生。

1985年，凯西收到乔米利特克（GeoMiliTech）咨询公司提出的一个极为诱人的建议，该公司是华盛顿一家向外国政府反对派秘密输送武器的武器经纪商，它的经营者是迈阿密电台前“谈话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斯塔克利，她满怀炽热的信仰，留一头浅金黄色头发，指甲长达3英寸。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中，曾经是奥利弗·诺思的顶头上司的退役陆军将军罗伯特·施韦策说：“巴巴拉……相信她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组织这个公司的委任状。”施韦策是

1982年被解职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是，他就苏联可能立即入侵波兰和东欧问题发表了令人难堪的公开讲话；后来，他成了乔米利特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乔米利特克公司后来改称为 GMT 公司，施韦策说，斯塔克利之所以想到这个名字，因为她“得到了上帝的启示……GMT 的意思指上帝的强大团队。”施韦策是通过领导世界反共同盟，并充任乔米利特克公司顾问的一个退役陆军将军约翰·辛格劳布，介绍给了斯塔克利；这3个人是在由猪湾老战士召集的为无名战士墓献花圈的仪式上相遇的。

乔米利特克公司企图成为中央情报局购买一切武器的主要票据交换所，该公司正在与向中央情报局出售武器的一帮国际军火商进行竞争，其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前德国空军飞行员维纳尔·格拉特，此人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很大的农场，按照纳粹空军的标志，取名为黑鹰。

辛格劳布于1985年11月底或12月初，送给凯西一份乔米利特克公司的

书面建议，称中央情报局应该“建立一条通道，以保持连续不断地运送苏联的武器和技术，供美国用以支持尼加拉瓜、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自由战士。”接着，该建议还解释了这种想法的美妙之处，它既不需要“国务院或国会同意，亦不必让他们知道。”

对于中央情报局完成其使命来说，这是一种自立的、无原始帐目可查的武器交易形式，是私人企业和秘密武器交易相结合的一个典型，即使在伊朗反对派事件的调查中，该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乔米利特克公司的三线交易是这样进行的：

中国政府储存有大量苏式武器；中国力图提高其军队和装备的水平。

以色列政府希望把新式武器卖给中国，因为以色列经济缺少现金，又不可能得到长期贷款或安排以货易货贸易。

中央情报局插手其中。该局为以色列安排几百万美元的贷款，购买美国特殊的军事技术，接着，以色列再把等价的武器卖给中国；而后，中国把等量的苏式武器出口给由中央情报局和乔米利特克公司开办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司，该公司再把这些武器转与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和中国只知他们自己所起的作用，却从不了解他们在帮助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武器库筹措资金。

乔米利特克公司的主意足智多谋，然而，中央情报局背着国会，用秘密资金支持购买武器的思想却是完全违背宪法的。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这完全超出了我们依靠和必须依靠的管理体制的范围，你不能使用国会既没有授权你得到，又没有给你划拨的款项；这是宪法讲的，我们必须坚持。”

在向阿富汗和其他反对派走私武器者的头脑里，宪法的概念不多。凯西研究了乔米利特克公司的建议，并且在1985年12月份的第一周对奥利弗·诺思谈了这个问题，他还给了诺思一份乔米利特克公司建议的副本。这位海军军官把这份建议锁在了他在国

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一周，诺思在纽约与以色列情报官员的谈话中，第一次提起了把销售军火的钱转移给伊朗的想法。乔米利特克公司的建议，与诺思想到的“巧妙主意”——

把美国的武器卖给伊朗，攫取其收入，为总统的秘密战争提供资金——完全吻合。

为阿富汗人提供武器的各种努力，通过美国秘密向伊朗运送武器的网络联系起来，美国和伊朗在阿富汗有共同利益，阿富汗圣战是他们秘密订约的基础。

当里根总统于1985年6月30日宣布他的强硬决定，反对与这个敌人作任何交易的时候，有5名美国人已在黎巴嫩被伊朗训练和资助的恐怖分子扣作人质，里根说：“美国不会给恐怖分子任何报酬，不会提出任何担保，我们决不让步，不作任何交易。”这位总统在8天以后又说，伊朗也是“这个恐怖国家联盟……一个新的国际性屠杀团体”的组成部分。

1986年1月17日，里根在他的日记上草草写下了7个字：

“我同意向伊朗出售陶式导弹。”这是一种用管筒发射，通过光学原理跟踪的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一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

向伊朗人运送陶式导弹是一场恶梦。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处长的汤姆·特韦顿于1月份召来陆军少将科林·鲍威尔，确定把陆军的这种导弹转送给中央情报局。鲍威尔后来成了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主要助手，今天是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鲍威尔和温伯格都曾预先被警告说，这个计划是非法的。国防安全援助局副局长格伦·拉德曾告诉他们，不通知国会，就没有合法途径转让这些武器。温伯格把这种合法的反对意见转告了总统，尼克松回答说：“好吧，如果我由于这个法律问题而未能把这些人质救出来，美国人民将永远不会饶恕我。”

这个法律问题又回到拉德那里，他得出的结论是，处理这个转让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合法体制之外进行，他对其上司说，这笔交易必须——用他的话说——“在黑市进行”。通过黑市，陆军便可以把武器秘密卖给中央情报局；该局再根据总统的裁决，即根据总统签字并提交国会的一份授权采取秘密行动的合法文件，把武器运出去。

通过黑市，这笔交易就可以保密，法律就可以蔑视。这样的裁决不会暴露在国会面前，就象中央情报局和白宫所期望的那样。正如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一位律师所指出的，总统的助手们希望这个裁决“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里根从未见过这个重要文件，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仅就此向总统简单打了个招呼，而后就自己签了字：“RR per JMp”。就这样，总统同意了向伊朗出售陶式导弹。

1986年2月25日，诺思和中央情报局的汤姆·特韦顿敲开了德国法兰克福谢拉顿机场旅馆的大门，房间里出现的是为伊朗首相米尔·侯赛因·穆萨维进行武器交易的主要中间人艾哈迈德·坎加尔卢以及两名伊朗陆军中校；中央情报局一个退休的官员乔治·凯夫担任翻译。这位空军的将军转向武器交易者理查德·西科德及其出生于伊朗的贸易伙伴艾伯特·哈基姆，参加了谈判。

他们告诉伊朗人，他们是军事情报官员，受顾而来，希望通过秘密外交政策牟求一些利润。

就在那个星期，美国给伊朗人发去了1000枚陶式导弹。这次交易为西科德、哈基姆以及诺思和他们支持的反对派产出了550万美元的利润。没有一个人质被释放；不过，诺思向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在这次会晤中达成了一项重要的谅解：“伊朗人同意，如果美国政府向伊朗提供陶式导弹，他们愿意依次把同样的武器提供给阿富汗圣战者。”特韦顿回忆说，法兰克福的交易非常特殊：“伊朗将把我们发送给它的武器的10%转送”阿富汗人。

1986年3月，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乔治·凯夫给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发去一份长电，详细报告了用武器换人质的谈判。凯夫向凯西讲述了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一个诱人的主意：“我们用这些交易以及其他交易得到的利润，为阿富汗抵抗者提供资金；我们还四。”在伊朗反对派事件的公开听证会上，舒尔茨回忆了里根和温伯格的对话。

1987年6月3日，众院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律师布鲁斯·法国描绘了使总统裁决消失的情况。可见中央情报局辩护人乔治·克拉克的证言，载《最后报告》第5卷《附录B：证言》第383页。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对派。”4月4日，诺思对他的秘书福恩·霍尔口授了一个呈送波因德克斯特的很长的备忘录，叙述了他利用从与伊朗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支持反对派的计划的细节；该备忘录还说明了美国寻求伊朗为阿富汗人提供援助的方式。诺思说：“我们已经告诉

伊朗人，我们对他们可能愿意为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的援助感到兴趣，我们希望在德黑兰讨论这个问题……伊朗人无疑想以讨论追加武器和商业交易，作为顺应我们对阿富汗和尼加拉瓜观点的‘报酬’。

接着，诺思建议就伊朗人参加中央情报局为阿富汗抵抗运动开辟运输线的问题进行谈判，并且为会谈开列了“参考条件”；

——找到在阿富汗合作对付莫斯科的途径，对伊朗和美国可能都具有实际价值。

——美国能够为阿富汗人提供……生死攸关的援助。

——我们需要知道你们与什么人一道行动，你们已经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以及援助的战略是什么。——

5月26日夜，诺思和他过去的老板，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与一名伊朗议会成员共坐在德黑兰独立饭店顶层的一套房间里，这位留着胡须的秃顶政治家，就是侯赛因·纳贾法巴迪，此人是伊朗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是有权有势的议会议员阿里·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的执友。纳贾法巴迪是一个有教

养、有才气，且政治上也非常内行的人物；精通英语。

差不多7年以来，美国和伊朗政府双方高级代表第一次会晤的日程是极为不寻常的：用美国的武器交换美国的人质；联合起来反对苏联人；分享有关中东的秘密情报。但是，双方首先要相互摸摸底，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麦克法兰从德黑兰发给波因德克斯特的电报说：“我们准备进行对话，以决定其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阿富汗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适当例子。”——

诺思对纳贾法巴迪说，美国人希望与伊朗建立一种工作关系，他们有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诺思说：“这不是用武器交换人质，而是与我们所看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意图有关。”当这些美国人为苏联人反对伊斯兰国家的计划勾画一种黑暗的前景时，纳贾法巴迪很有兴味地听着；他告诉他们，伊朗正在为支持阿富汗圣战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纳贾法巴迪对美国人说：“伊朗也有训练圣战者的营地，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援；俄国人已经报怨伊朗的子弹杀害了俄国人。”他说，阿富汗的斗争和伊朗革命是一致的，“你们在阿富汗的战壕里，可以看到很多霍梅尼的画像，他也是他们的领袖。”

诺思问，伊朗是否乐于帮助美国人把正在运给德黑兰的某些陶式导弹，提供给阿富汗抵抗运动。纳贾法巴迪回答：“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与你们合作。”

纳贾法巴迪告诉诺思：“我们有一句名言：汝敌之敌可为汝友。”

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伊朗，同意成为向阿富汗运送美国武器的中央情报局军备运输线的组成部分；正如他们所允诺的，或者象

白宫所相信的，他们实际上已为阿富汗人提供了100枚陶式导弹。——

到1986年夏季，中央情报局在一个月就从其帐户上取走了近5千万美元，用以购买导弹、拖车和机枪，决心使苏联人在军事上陷入困境：导弹用来攻击苏联坦克和战斗机；拖车用以通过阿富汗的大山运送武器；机枪用以屠杀苏联士兵，而苏联的军事困境将会伤害他们的斗争元气。苏联新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描述这场战争是一个“不停流血的伤口”。不停流血者是阿富汗；不过，戈尔巴乔夫这种说法的含义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场圣战正在使俄国人在阿富汗的处境，日益变得象美国人在越南一样。

满怀极大热情支持圣战者的议员们，现在真心实意地相信，阿富汗抵抗者将在军事上战胜苏联人。两年混战之后，中央情报局完全为自己的强烈希望所折服，他们开始向阿富汗提供 900 枚导弹发射器中的第一批，尽管人们完全有根据担心，那些破坏力极大的针刺导弹会落入伊朗人之手，但这些导弹还是运了出去，因为针刺导弹已经发生了效用：击落苏联战斗机达 350 架之多。

中央情报局在这个方面的支出继续稳步增加，越来越多的武器倾注于运输线上，1987 年达到 6 亿多美元，1988 年 7 亿多美元。

戈尔巴乔夫断定他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无论从那个方面讲，俄国人都没有输掉这次战争；不过，战争在若干年来却一直处于残酷的僵持状态，苏联军队安全地控制着城市，游击队在农村自由地来来往往，谁也没有力量把对方驱逐出去。这场战争毫无意义；苏联人民的孩子们为什么要留在阿富汗，苏联政府就此撒的谎，已经明显地难以维持下去；戈尔巴乔夫有更多的国内利益，是宣布胜利和撤军的时候了。

差不多 6 年来，联合国发起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谈判一直在日内瓦进行，完全保密，毫无结果。现在，苏联人正在寻求某种撤出阿富汗的方式，以求比美国离开越南时体面一些；美国人紧紧抓着最后一架离开西贡的直升飞机的形象，那种完全绝望的形象，一直在苏联人面前萦绕。戈尔巴乔夫于 1988 年 2 月 8 日宣布，如果在 3 月 15 日能够签定协定，苏联人将在 5 月 15 日开始离开阿富汗，在 9 个月以内完全撤出。

美国匆匆决定了它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的立场。3 月 15 日的最后期限过去了，外交上的欺骗活动却仍在继续。4 月 10 日，伊斯兰堡附近存放有中央情报局价值几千万美元武器的一个庞大军火库发生爆炸，这似乎就是在外交手腕掩盖下的激烈斗争的标志；当这个秘密武器库中的导弹和迫击炮弹飞过大街小巷，遍地开花的时候，差不多有 100 人死亡，1 千多人受伤。

4 天以后，日内瓦谈判突然达成协议，长期进行的一场聋子的对话，现在似乎变成了外交胜利。从原则上讲，这些协议宣布了“外国干涉阿富汗”为非法；从实践看，它们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苏联人将撤出他们“穿军装的军队”，但是，这些协议并不阻止莫斯科为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人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美国政府说：“如果苏联承担……为阿富汗各党派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美国将保留提供……这种援助的权利。”美国也是有意识这样干的。这种政策被美其名曰“对等”。这些协议意味着，苏联人可以走，但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

1989 年 2 月 10 日，当苏联人匆匆忙忙完成其撤军任务的时候，其目的在于塑造阿富汗未来的两个会议，在两个外国首都召开

在华盛顿，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是否继续中央情报局每年 7 亿美元的武器运送。随着苏联撤出日期的临近，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的枪支和弹药将保持继续不断地进入阿富汗。

在伊斯兰堡，阿富汗抵抗者的领导人集会，为其美国后台鼓劲；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最高委员会、长老会议，企图组成另一个阿富汗政府。白沙瓦老资格的政治家们均以极为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这次集会，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政治发言人纳瓦卜·萨利姆告诉我：“迄今我们已经 8 次结成联盟；但部已经土崩瓦解。”——这次会议亦很快破裂，变成了怒气冲冲的大吵大闹，圣战者们的这第九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联盟，则是一次无政府主义

者的集会。

几年来，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的马蒂努丁将军，一直非常注意和担心阿富汗反抗者中间相互仇恨的积累和爆发，他说：“大规模争权夺利的斗争将会出现，你可以看到这种斗争正在发展——阿富汗国内的7个党、他们的各个派系以及他们的指挥官之间四分五裂。阿富汗人从来就是你争我夺，他们都已经武装起来。如果说他们已经得到了针刺导弹、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爆发内战的危险就更大了。”

他说：“许多人相信，出现另一个黎巴嫩的一切因素在这里均已齐备。圣战者在分配武器和资金方面都不可能有一致看法，他们还如何可能就阿富汗的未来达成一致意见呢？”

了解阿富汗情况和秘密行动费用的少数美国人，一直深深担心苏联撤军后这些反抗者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一位分析家沮丧地摇摇头说：“你会看到一片混乱，那里没有组织，没

有政党，也没有团结。你已经看到圣战者正在储备武器，现在，他们可以相互开枪射击，而无需再相互割断对方的喉咙了。”

1987和1988年的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菲尔，预料在阿富汗抵抗者中间会出现疯狂行动和残酷屠杀。他说：“在苏联人撤走以后，这种屠杀也不会停止。那些指挥官将会相互进攻，进行大屠杀；各种各样的决定都将由枪炮最多的指挥官们作出。”

1989年2月15日下午，中央情报局总部香槟酒横流，充满了一种少有的热烈气氛。在遭受失败和凌辱15年之后，该局赢得了一次大为令人满意的胜利：最后一支苏联部队离开了阿富汗，该局自越南战争达到顶点以来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实现了目标，中央情报局赢得了它的圣战在距华盛顿1万英里的白沙瓦郊区一个美国俱乐部中，一次酩酊大醉的庆祝会已经举行。在这个严格的伊斯兰城镇，这是唯一一家美国俱乐部，它禁止绝对戒酒主义的穆斯林教徒入内，但招待各种各样放弃原国籍的人们，从外交官到衣服褴褛的自由作家。那天晚上，这个俱乐部象疯了一样，参加庆祝者在如醉如痴的狂欢中，纷纷把赌金抛进一个容器中，力图猜测阿富汗政府垮台的日期。

回到中央情报局的那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分析家们也是如此，他们相信，一旦苏联军队离去，由苏联支持的这个政权，将会象惊涛骇浪上一座用沙子堆起的船楼一样土崩瓦解；他们肯定，圣战者将会在几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穿过喀布尔的大街，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武器对空鸣放，以示胜利。

他们错了。这场战争并没有在苏联人回国以后而告终。圣战者们并没有能坚持下来，团结战斗，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争取胜利的共同战略。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反抗者的处境越来越遭。苏联撤军一个月后，他们根据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的建议，发动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进攻，攻击贾拉拉巴德市。这次行动是灾难性的，战斗5个月，死亡5000人之后，抵抗运动没有赢得一寸土地；随着进攻时间拖长以及攻击失败，他们的愤怒转向了内部。

他们很快使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武器相互开火，他们已互相屠杀了几百人，使战争变成了带来残杀和欺骗的车队。那些最强大的抵抗运动领导人，都在谋求建立一个与民主制度毫无关系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相互伏击和屠杀对方的部队，特别是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已向与它对立的反抗组织宣战。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罗伯特·G·纽曼说：“希克马蒂亚尔正在挖空心

思夺取全部权力。”在国破家亡的一片废墟上，自由战士之间还在进行残酷的斗争。

现在，这些圣战战士们还在摧残他们自己的人民，游击队从他们的高山阵地上，已经向村庄和城镇发射了几万枚火箭和迫击炮弹，摧毁了无数清真寺、汽车站和住房，无辜者惨遭杀害；仅根据西方救济机构的消息，1989年在喀布尔就已有1千多平民由于抵抗运动的火箭攻击而丧生，农村死亡者则在几千人以上；这种屠杀一直持续至今。

中央情报局仍然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武器，它不愿意也不可能控制它帮助发动的这种野蛮屠杀。武器运输线作为反抗者力量的唯一源泉，是不可能撤消的，中央情报局正在支持一场不可能停止的内战，它既不会抛弃游击队，亦无能于控制他们。人们所能指望这种战争的，只能是更大的伤亡和更严重的破坏；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在80年代取得的巨大胜利的代价。

正象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凶恶的一样，中央情报局搞秘密行动的理由，也已在苏联撤军的那一天不复存在，中央情报局武装圣战者的原因，在于赶走苏联人；他们离开了，但秘密行动却在继续。苏联撤军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超级大国停止运送武器，共同充当停火的担保人，白宫反而拒绝了 this 个建议。

一年以后，也就是苏联入侵和中央情报局运送武器开始10年以后，阿富汗的可见未来仍然是无休止的内战。国务院的一位分析家克雷格·卡普在白沙瓦曾告诉我：“这场战争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你必须以20年、30年的观点去看待它。”1990年冬，当大雪使阿富汗战斗的速度逐渐放慢下来的时候，雾谷以及河对面兰利的人们依然还在从长计议，他们说，这场战争还要进行“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的圣战将继续下去。

中央情报局就象造成这场阿富汗战争的政治家们一样清楚，该局不可能制止游击队相互攻击，在华盛顿，阿富汗战争秘密会议的领导人，参议员戈登·汉弗莱说：“我看不到我们有任何力量控制他们，我毫不怀疑，将会出现一场争夺权利的斗争，特别是希克马蒂亚尔。一场长期的混乱，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以及血腥屠杀，一

定会到来。”

查理·威尔逊议员对这些圣战战士还比较信任，他说：“最好的希望是出现一个人民相互宽容的独立阿富汗；腥风血雨也是可能的，还可能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血战。”

开通了这条武器运输线的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也不无踌躇地评述了阿富汗事件的进程，他说：“你把武器送给了即将垮下的人民，使他们在战场上站了起来。现在，他们似乎就要用这些武器相互残杀，这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消极后果。”

第七章 从黎巴嫩到利文沃思

1986年11月份的某一周，一个穿着入时，并且佩带有很多勋章的陆军中校陷入了深深的麻烦之中，是时，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秘密运输线有关的各种谎言和意外发现，正在整个华盛顿流传。

这个军官的上司，请他就五角大楼几百万美元黑预算的提取问题进行说明。他在中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秘密行动中花了这些钱；他利用挂名公司，开立秘密银行帐户，把那些转移出来的资金存入银行。他的碎纸机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上司要求他提供答案；而他的解释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

这位受到质问的士兵并没有向伊朗运送武器，他就是陆军中校戴尔·C·邓肯。他是美国陆军内部一支秘密部队的组成部分。

这支部队并不是通过电视广告招募来的，它没有穿军装，亦没有人为其颁发荣誉勋章；它是一支雄心勃勃的中校干部队伍的一部分，是一批退役将军的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部分代理人；

在80年代，他们已经接近于抓到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这些秘密军人是在里根上台那一周开始其活动的，他们从事美国陆军最敏感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央情报局的智慧移植到戴绿色贝雷帽的美国陆军的躯体上，专门从事那些中央情报局因缺乏热情，陆军因缺乏情报而无法进行的活动：解救人质、挫败恐怖主义者、提起诉讼以及进行报复，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他们有几亿美元可供自己支配，他们把五角大楼其他项目的资金吮吸出来，隐藏于秘密银行帐户中，购买了直升机、飞机、船只以及装现金的各种箱子。他们背着国会以及陆军的文职领导集团，确定在中美洲、中东和欧洲的秘密行动计划；他们接受陆军最高一级将军的指挥，但是，他们最终不向任何人报告情况。

这支部队的建立是为了打一场美国在越南战争后面临的秘密战争，敌人是在中东扣留美国人质以及爆炸美国部队的那些长胡子穆斯林教徒；还有热带地区被美国视之为苏联滩头堡的那些极不稳定的共产政府；以及反对忠于美国的军事政变政府的各种游击队。

美国的陆军还没有准备好进行这样的战争，他的坦克、炸弹和装甲运输车，在对付绑架者和阴谋破坏分子时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军队不配于对付恐怖活动；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教训也没有为这个国家留下多少在丛林地区进行公开战争的胃口。

中央情报局对于进行这样的战争也没有多少好主意。它可以雇佣私人军队，但这些军队常常腐败堕落，不起作用；它可以颠覆共产政府，但又很少能安排新的政权取而代之。它无法解救美国人质，甚至不可能发现这些人质在什么地方；它可以告诉你黎巴嫩的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蒂莫西·恩内金的采访；而对陆军和司法部其他调查人员的采访，则没有人提到这个记录。国民生产总值，但不可能绘一张贝鲁特街道的详细地图，更不用说绘一张说明穆斯林什叶派扣压人质的地形图，即贝鲁特南部贫民区遭到轰炸的弄堂小巷和暗室地堡的地形图了。

这支秘密部队的出现，是美国在1980年为营救被德黑兰革命者扣留的52名人犯遭到失败后脑羞成怒的结果。在这个很长的苦难时期，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集情报，也就是那种只有间谍，而不是机器所可

能收集到的情报。军方知道德黑兰的美国使馆看上去象什么样子，但完全不了解，关压着美国人质的使馆建筑物内部情况究竟如何。

总统命令国家最优秀的突击队员去营救这些人质，要求他们在一个非常陌生而又敌对的国家，在并不确切知道降落后到什么地方去以及去干什么的情况下，发动一次危险的进攻。同时，五角大楼也在陆军少将詹姆斯·沃特指挥下下达了营救人质的命令，并且组建了一个情报机构，使4名美国代理人混进了德黑兰。1980年4月24日，132名地面部队的武装军人登上了C—130运输机和8架海上种鸟式武装直升机，穿越伊朗领空，向着预定目的地，一片被称之为“一号沙漠”的荒原飞去。

这次使命是灾难性的。有3架直升机在5个小时以后坠毁，争取成功的营救机会不得不枪慌放弃。在一号沙漠地区，当突击队员准备撤退的时候，又有一架直升机在起飞时与运输机相撞，致使8人在可怖的荒漠中丧生。伊朗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那些被烧焦的尸体以及七扭八歪的飞机残骸的照片；这是一次奇耻大辱。

军方根据对事件后果的分析，认为过分保密是这次使命遭到破坏的原因，它说，“过多地强调行动安全”——军方的保密行话——“严重制约了协调行动所必不可少的联系工作。”对这种计划进行严格控制，以至它们得不到任何分析和批评；直升机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也不能相互交谈，担心伊朗人或俄国人偷听。保密太

多，内部争论太少，这就是造成灾难的原因。

沃特开始安排第二次营救计划。这个新的使命的代号为“爱灌”（HONY BADGER），一种凶猛的小肉食哺乳动物，人们都知道它会把猎物撕成碎片。沃特在制定计划时只找去了他相信的几个亲信。他的副手是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此人在中央情报局进行越南和老挝战争时期，曾飞行250多次执行秘密使命，对德黑兰的里里外外也十分了解，因为他70年代末曾在那里任职4年，向伊朗国王出售了几十亿美元五角大楼的武器。

“爱灌”的生命从一个小动物开始，很快就成长为一只庞大的野兽，有2千多名士兵被列入了这个秘密行动计划的名单上；这些计划已变得非常复杂，以至它们更象是一次入侵行动。而不是小外科手术般的营救使命。为了对国外的敌人、国会以及舆论界保密，五角大楼把非保密项目的2亿多美元划拨到黑帐户上；沃特用这些钱的一部分，强行购置了20架远程直升机，并为其装备了特殊雷达、电子干扰系统和通讯设备。

西科德后来说：“我们的力量已作好战斗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但我们不能，我们不可能……限制这些人质的关押地。”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没有这个方面的确切消息，陆军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营救他们。由于缺乏情报而不得不把“爱灌”锁在笼子里。——

陆军认定，它已从这些失败中吸取了3条教训，3条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想法：它永远也不会再仅仅依靠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它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匆匆上马，去执行完成这类重要使命的计划；它必须组建一些秘密机构，以便于协调准军事行动和情报收集工作。陆军从来也未能学到的是，如何防止过分保密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或者是如何控制摆脱了日常权力制约的那些秘密力量。

1981年1月20日，伊朗最后释放了人质；罗纳德·里根也在这一天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发誓要加强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再也不遭受这样的羞辱。

由他的诺言所产生的大量新的军事和情报动议，中央情报局被赋予新的自由和新的活力，武装部队也得到成 10 亿美元的资金，用以装备突击队：新的面孔，新的使命和新的力量即将出现。

里根宣誓就职一星期后，为 52 名返国人质召开了正式欢迎大会；白宫的欢迎仪式是极其成功的，彩旗招展，鼓乐齐鸣，语言热烈。这一天，里根发出了坚硬警告：“我们要让恐怖分子知道，一旦国际行为准则遭到践踏，我们的政策就是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反应。”随着向诸兵种发出的这一响亮呼声，陆军开始组织力量，执行总统要报仇雪恨的命令。

就在这一天，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 BF741C 号房间，詹姆斯·朗霍费尔中校对实现这个诺言的绝密计划进行了最后润色。这位 44 岁的军人是个佩带勋章的越战老战士，其历史完全符合标准，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新组建的特别行动处的司令；五角大楼的这个地下室，就是这个处的司令部。五角大楼内的官员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处的领导人物，称他们为“地下室的狂人”。

他们是一些在越南战争中上台的年轻军官，是特种兵的精华。

陆军情报机构上尉，非常了解这支秘密部队的蒂莫西·恩内金说：“一些最能干的人，最有天赋的人通常都从事特别行动，通过各种各样广泛的途径进行特殊活动。你所说的人都必须懂多种语言，能够背起帆布包，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苦，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他们行动起来干净利落；他们都有一着拿手好戏，这就是赚钱和得到优厚待遇。他们都是一些‘最有才华和最精明’的人。”

特别行动处的创始人是陆军的高级将领，参谋长爱德华“夏伊”。迈耶将军。对于多少年来一直在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而奋斗的迈耶将军来说，该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成就。他的副参谋长小约翰·维齐也是这个秘密部队的支持者，此人于 1982 年升任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一个精明强干和直言不讳的司令官。

迈耶要求其助手一俟接到分配的任务，就能立即着手完成。但是，越南战争以后的五角大楼却是一个臃肿庞大和懒懒散散的官僚机构，完成一个最简单的任务也需要几个月的日常文件处理工作。朗霍费尔的命令是，清除文件堆，搬掉文件山。“夏伊”·迈耶说，他要求特别行动处“在反恐怖活动和人集情报领域，在联系和支持其他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过程中，开发大量新型的潜在工作能力。他要求现在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迈耶将军还要求这些使命完全保密，他说：“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行动领域的保密问题，我们要采取一切手段，保证参加这种行动的人员不被发现。”为“爱獾”行动调集的人员和机器，已经成为迈耶将军新的特别行动处的核心：恩内金上尉说：“迈耶与所有的人都有接触，他们直接向他报告。”这位将军把这个新建处置于主管秘密行动和计划的陆军副参谋长的领导下，在 1981 和 1982 年，詹姆斯·E·穆尔中将就是领导这个处的指挥官。穆尔将军说：“我们从事活动的主要途径，都是根据从伊朗营救人质的使命提出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的指示是，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坚持最严格的行动安全。”

这个处超越一系列权限，减少了官僚机构的控制层次，它的使命几乎瞒过了五角大楼的每一个人；他们是“烟筒”式行动，超越各种权力机构，从地下室直通陆军最高领导层。负责研究与发展的陆军副参谋长詹姆斯·梅里曼中将说：“某些行动非常敏感，陆军参谋部中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恩内金中尉说：“这些黑行动砍掉了各种权力通道，其他将军们只得接受‘地下室狂人’超越他们权限的事实。这些家伙无论干什么，总是能快就快，很少有什么限制，很少有已提出的什么规定挡道。”

这种秘密单位需要有不入帐簿的资金，不可能追查的资金。为该处提供资金的体制是仿效中央情报局的一套体制建立的。看上去象是正规企业的控股公司和各种企业，都不过是提供武器和资金的门面，秘密银行帐户的秘密故事，均由此而产生。

但是第一步，资金必须先从财政部划拨出来。迈耶将军说，陆军副审计长拉里·基南是开始为该处提供秘密资金的“联络点”；维齐将军写信给基南，请他帮助确定该处的资金供应，这位将军说：“应该确定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钱袋。”

整个1981年，基南填满了这个钱袋，他把手伸进陆军金库，拿出了国会拨给其他项目的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当特别行动处需要资金时，朗霍费尔和他的财物官基思·奈廷格尔中校，就拿起电话招呼基南，一周之内就可以有钱用；有了这笔种子基金，特别行动处站稳了脚跟。

基南的工作就象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代理人，既要以免被敌人发现的日常工作方式从事他的工作，同时还要完成秘密使命。在那些从未发现为特别行动提供资金的地下通道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基南的老板，陆军审计长欧内斯特·佩肖托中将，他说：“从来也没有人和我商量过安排任何特别资金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提供这种资金的活动。陆军的高级领导人，显然没有和我商量就已经建立了某种制度。”

有好几种这样的制度已经形成。1981年10月，特别行动处的领导人们集合于国会山，简报了军事和情报委员会新建立组织的问题，国会同意为特别行动处拨款9千万美元。

在国会心甘情愿公开的这几千万美元中，有2千万消失在了黑世界中，用它建立了一个秘密单位，称之为情报援助机构（ISA），它的目的是为在全世界实施秘密行动计划收集情报。它是陆军自己的秘密谍报部队，它隐瞒了为其提供资金的国会议员。

在陆军为情报和军事委员会提供的保密简报中，陆军总是围绕情报援助机构问题跳舞；这些简报都是由主持这个项目的少校和中校“行动官”提交的，他们常常一个一个地单独与情报或军事委员会主席会晤；这些简报和50年代中央情报局那些漫无目的的简报是一样的。梅里曼中将说：“在国会这些委员会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是主席——了解全部具体情况，可见某些这类项目和使命是多么敏感！”

但是，主席亦并不完全知道详情，情报援助机构的简报所掩盖的内容，比它们暴露出来的更多。该机构的一位官员说：“对他们上报国会的东西我根本不相信。我认为，他们所说的他们已上报国会

这一点，实际上完全是夸大事实。我并不非常相信已经提供的情报，它们太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得出的答案太多了……在我工作于情报援助机构的整个时期内，一直对资金安排感到不舒畅，情况不正常……有某种阴谋诡计在进行”。

随着各种秘密力量的发展，情报援助机构和特别行动处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情报援助机构的力量很快由50名军官发展到将近300名，他们在整个中美洲，其中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

巴拿马，建立了一系列办事机构，支持反对桑地诺分子及其左翼联盟的战争；他们建立了各种私人公司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掩护，其中包括在巴拿马建立的肉食店和肉类仓库在内；他们还修建了安全住宅、秘密机场以及储备资金和武器的地下库房，为未来在尼加拉瓜开展对敌斗争行动开辟道路。

在情报援助机构扩大的同时，朗霍费尔的实力也在膨胀，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处境越来越大，已经不可能继续通过正常的保密程序打掩护，他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行动彻底掩盖起来。1982年1月，由他提出，经维齐将军核准，又制定了一个代号为“前兆”的秘密行动计划。

“前兆”行动计划要求陆军销毁全部提到该处的公开记录和帐目；2月12日，维齐将军签发命令，特别行动处的记录按例行公事予以销毁；该处人员以及他们完成使命的费用，也在各种公开的帐目中消失了。

仅仅靠基南一次又一次提供资金，该处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它需要有一个连续不断供给黑资金的源泉。它找到了一只野猫：一个52岁的文职官员小奥特默·阿克利，此人是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的财务主管，从理论上讲，该司令部指挥陆军一切情报与反间谍活动。阿克利从事军事情报职业已经30多年，他越来越讨厌陆军官僚机构对情报活动的财政限制；因此，当特别行动部队找到他来要钱时，他有现成的回答：等着！阿克利有点象一个炼丹士，他有办法把普普通通的一片纸变成现金；这种纸是陆军使用的标准公文用纸：“表1080”，这是一种用于各种拨款和资金提取的转帐票据。这种表的一个用途是把资金从财政部转入陆军帐户，或者是从陆军的一个户头转入另一个户头，只要有一名军官填写这种“1080表格”，尔后由这位主管签字，并支给一张财政部的支票。这种“1080表格”可以证明，这笔钱是用于为已批准项目提供的费用，它为审计人员提供了一条跟踪的途径，一条表明资金流向的途径。

阿克利发现，他可以利用“1080表格”作为通道，给这支陆军秘密部队签发财政部的支票，他可以成为使这支秘密部队具备支付能力的资金供给渠道，他能够把许多其他项目尚未使用的资金，转移到这支部队的帐户上。他可以扣留支票以备他们未来使用，同时证明这些钱已经用掉，并在陆军的帐目上予以说明；这个部队便可以把支票兑成现金，尔后再把现金转入他们所控制的秘密汇兑帐户，从而使绿皮包变成黑皮包。为了这种秘密事业，他们清除了审计追踪的痕迹。

恩内金中尉说：“阿克利突然意识到，这种方法可行。他知道他不必把这些钱入帐。慢慢地，各种手续越来越松松垮垮……他可以把一张白色帐单变成绿色帐单，把一张长11英寸，宽厚8英寸半的白纸变成几千万美元。”

对于这些秘密军人来说，无需进行说明的现金是天赐之物，他们对于阿克利的特殊会计制度极为需要。恩内金说：“这种需要遇到这样的制度，局势突变。”有了自己的秘密现金库，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以及自身一套松松垮垮的规章制度？特别行动处开始全力以赴运转起来。

朗霍费尔已经建立起一个秘密航空机构，称之为“海浪花”，隐蔽于中央情报局所属的一个公司、航空技术服务公司内。朗霍费尔为“爱獾”行动协调购买和整修了特殊的远程直升机。现在，这些直升机均为“海浪花”公司所有；该公司骄傲和高兴的是，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休斯500MD直升机，它们在完全黑暗的天空中每小时可飞行150英里，螺旋桨发出的呼呼声还不及一台电动食品搅拌机大。

1981年8月，中央情报局急呼“海浪花”去完成第一次分配给它的任务。黎巴嫩基督教领导人、军阀贝希尔·杰马耶勒秘密访问华盛顿，会晤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需要直升机送他回国，朗霍费尔能秘密送他返回贝鲁特吗？

3天以后，“海浪花”的两架直升机于半夜飞行于地中海黑暗的上空。他们在贝鲁特以北9英里处的米尼耶降落，当直升机接近海滩时，平旋桨卷起的尘土淹没了射入夜间高空的束束灯光。杰马耶勒跳出直升机，与来自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一位官员握手后，钻进了正在等待他结束回国最后一段旅程的汽车。

中央情报局和“海浪花”公司之间形成了工作关系；这种联系证明是成功的。1982年的大部分时间，“海浪花”的飞行员都在尼加拉瓜边界飞行，通过电子装置截取尼加拉瓜军队和政府的通讯联络情报，提供给中央情报局，该局再送给尼加拉瓜反对派组织，协调他们对尼加拉瓜的进攻。有关这个方面的任何消息，都不曾告诉国会。

随着特别行动处的发展及其任务的扩大，朗霍费尔认为他必须有一个新的单位，专事维护该处的秘密。1982年夏，他创立了陆军历史上特有的一个机构，其基地就设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安纳戴尔的一座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距五角大楼只有数英里。从外观看，该办公楼是一个被称之为国际安全商用公司的咨询公司；从内部看，它是一个执行代号为“黄果”的秘密行动计划机构。

“黄果”计划由戴尔·邓肯中校主持，此人是出身于乔治亚州的一个农家子弟，是年38岁，差不多精通他在陆军服役期间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邓肯的行动计划，为该处所有军人都提供了一个极奥秘的掩护层。他的资金由奥特默·阿克利魔术般的钱袋提供；而掩护层则来自邓肯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开立的秘密汇兑帐户以及他加入其中的挂名公司。无论陆军的文职领导人或者是国会，均对“黄果”行动计划一无所知。

特别行动处已经变得不再仅仅是一支陆军部队了，它有自己的数不尽的资金，有自己作为挡箭牌的公司，看上去，它开始更象中央情报局自身了。诡计多端的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收到了一份有关特别行动处的简报，他很快发现了这个潜存的世界。根据法律，陆军勿需象中央情报局必须作的那样，预先向国会报告其秘密行动；陆军的秘密军人和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已经共同从事过大量商业活动，为什么不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呢？如果中央情报局有自己的人主持陆军的秘密行动计划，如果陆军的行动有自己的秘密资金，这种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中央情报局就又可能有它自己秘密的准军事力量了。凯西请陆军选派一名中校到中央情报局，出任与特别行动处相联系的联络官；他脑子里已经物色了一个特殊人选。

就这样，朗霍费尔中校来到中央情报局参与工作，1982年10月4日，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计划联络委员会首席军事助理，与中央情报局特别活动处一道工作，向世界各地的反政府武装分发武器和传送情报。朗霍费尔仍然秘密地控制着特别行动处。

到1983年春，朗霍费尔、邓肯及其一帮人，看起来已经不可一世，川流不息的秘密现金以及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联系，已使这个处发生了变化；它是作为一种反恐怖主义力量，作为一个营救人质的单位，作为一个收集情报

单位建立起来的，但是，它没有进行任何反恐怖分子的斗争，没有救出任何人质，而是集中精力于在中美洲从事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该处的人员、飞机、直升机以及快艇一直在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为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从事秘密行动。它的工作人员还在洪都拉斯、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培训中美洲的反政府分子，在哥斯达黎加修建简易机场，夜间飞行于尼加拉瓜上空。陆军的这些秘密单位还在加勒比地区、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叙利亚、苏丹、甚至在伊朗，都建立了各种办事机构。这些秘密军人已经走遍了全球，而国会和陆军的文职领导集团却还一无所知。

他们掌握的秘密和权力是为了进行粗暴鲁莽的阴谋活动，是使人腐化堕落的诀窍。这支秘密部队既没有规章制度可循，亦没有任何法律可依，外界没有任何人负责为它的行动确定一个限界或者控制其过程。它生存于自己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开始土崩瓦解了。

奥密开始慢慢地解开。首先，情报援助机构的外衣被撕破，被一个从前戴绿色贝雷帽的退役中校詹姆斯·“鲍”·格里茨所撕破，此人一直坚持认为，在越南战争时期失踪的某些美国军人，现在仍然活着，作为犯人被困禁在老挝。他与情报援助机构合作，制定了若干寻找这些美国人——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的秘密行动计划。

格里茨的蛮勇在新闻界走露了风声，《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在他们的报导中，提到了这个被称之为情报援助机构的神秘组织。后来成为情报组织负责人的陆军副参谋长哈里·索伊斯特少将，开始接到国会一些委员会的来信，实际上是质问这位将军，到底什么是情报援助机构？索伊斯特将军也是在看报时才发现情报援助机构的。这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惊愕，但不是最后一次。索伊斯特将军同样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黄果”行动的简报。

1983年3月，遭到伤害的格里茨被召到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明情况，他讲，情报援助机构“希望得到一张营救在老挝的美国战俘的航行图”，并且计划“把一个美国人放到老挝去，使用各种记录手段，证明美国人就关压在我们所设想的特殊地方。”这是一个令人着迷，但又棘手的故事。在国会，几乎没有人知道情报援助机构：在了解到第二手情报，知道五角大楼还有一支秘密的间谍队伍，背着装满现金的袋子周游于世界以后，有些议员大为烦恼。国会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种想法，而且不止于此；但是，它希望就国家的情报活动进行协商，而且是预先协商；那是法律精神。

中央情报局秘密冒险的第二个问题是，联合参谋部有他们自己的在老挝营救战俘的任务，情报援助机构对此并不十分了解。当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听到情报援助机构在老挝的行动消息时，他暴跳如雷，下令解散这个单位。然而任何这样的情况均没有发生，情报援助机构在温伯格宣布它死刑之后，仍然存在到今天。

陆军于1983年4月告知情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它知道情报援助机构出了些问题，但已经解决，支票和帐目的结算均已强制处理完毕。国会相信，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情况并不如此，争夺特别行动处控制权的激烈斗争，于是年春，在一个二星级将军和中央情报局一个穿文职官员服装的中校之间爆发了。这位将军失去了这个控制权。

在朗霍费尔于 1982 年 10 月到中央情报局走马上任的时候，“夏伊”·迈耶任命霍默·朗少将统率特别行动处，然而朗将军发现，他不可能执行自己的命令；几个月后他又发现，他完全未能主持这个处的活动，朗霍费尔在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上秘密控制着这个处的工作。

一般说来，将官并不欣赏校官强占自己的权力。朗将军说：“朗霍费尔在从事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同时还企图控制这个单位。我与朗霍费尔之间令人不愉快的一次接触是，我请他到我的办公室，并告诉他，他已经和这个单位毫无联系。”“他已经不主管任何事情了；这使他非常愤怒，如果他带着刀子，他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的。”

朗相信，他的下属拒绝接受他的命令。这位将军说：“我不相信朗霍费尔，既然我把他撵走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通过递条子或者是个人联系找到了参谋长”——迈耶，朗霍费尔保持住了他与这个处的联系，坚持在幕后指挥。他是真正的主管。”

1983 年 6 月，“夏伊”·迈耶在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杰出的历程之后退休离开了陆军，他是为特别行动处定名的教父，他创立了这个新的组织，给陆军这个官僚机构以有力的冲击。现在，这个组织失去了它最大的盟友，朗霍费尔失去了他的支持者；陆军也失去了一个最了解该处内幕活动的人物。

迄今，维齐将军也随着迈耶将军离休而升任为联合参谋部主席：朗将军的司令部则遭到了破坏，他的秘密部队已不在他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新提升的陆军参谋长约翰·威克姆将军以及他的第一副参谋长马克斯韦尔·瑟曼将军，对于这类秘密行动知之甚少。陆军部长小约翰·O.马什也逐渐意识到，特别行动处的建立以及它所进行的黑项目，都有意隐瞒了他，陆军中这个权力最大的人日益了解到，各秘密单位支付其使命的费用，均不受一系列上层指挥机构中任何人的控制。

一个极不平常的命令从最高领导层下发到了特别行动处：陆军部长和他的副部长，陆军参谋长及第一副参谋长，命令你告诉我们你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

朗将军回忆说：“这个通知指出，全部黑项目都必须向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部长及其副部长进行简单扼要的报告。不要对我们讲废话、不要以任何安全许可问题为借口……在美国陆军中，不存在任何不可以告诉这四个人的问题。对于我们的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显然，很多事实都用墙封闭起来了。”

这堵石墙正在倒塌，不过，它在那个夏季还一直站立在那里。陆军知道，它必须控制这些黑项目；面对这样的严重问题，陆军的措施会象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样：组织一个委员会。特别行动项目监察委员会，力图对陆军领导人们提出的某些问题作出答复：到底有多少个黑项目？都是什么？陆军如何控制它们？

这个委员会由詹姆斯·梅里曼中将主持，他命令开出全部黑项目的清单，这项收集工作就花了几个月时间。他说：“这个名单大极了，没有人不为之惊奇。”陆军领导集团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军队至少已经开设了 50 或 60 个黑项目，然而他们却对此毫无所知。

70 年代末曾对改善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威廉·奥多姆将军，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他后来成了负责情报的陆军助理参谋长，人们对特别行动处失控的责难，也有他的一份。但奥多姆几年以后说，他长期以

来一直对“特别行动计划表示怀疑。”他指出，没有人负责监督这个处的活动，“没有任何正规程序”，因为“特别行动计划不需要任何控制体制”；结果是，“完全没有任何始终如一的行政管理机构。”

据说，特别行动项目监察委员会向陆军领导人报告过如何控制黑项目；但在这一方面，失败是惨重的。奥多姆将军说：“特别项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极其混乱，从来也没有抓住基本问题。”在提出用新的安全分支机构和密码代号去取代从制度上进行控制时，该委员会浪费了时间。它几乎不可能为黑项目规定个界限，更不用说处理那些捉摸不定的责任问题了。奥多姆说：“这种想法在于为未来建立一个有条不紊处理困难问题的机构。”但是，这种机构从未建立起来，“一片混乱的基本状况仍在继续。”

1983年8月15日，该委员会公布了它为黑项目定的界限：

“不受正常购买渠道、金融渠道和安全渠道制约的”绝密项目。问题就出在这里，除了正常渠道以外并不存在其他渠道。索伊斯特将军说：“要按照其他方法而不是‘正常’方法办理，但并不存在另外一种方法。”

奥多姆将军说：“关键是‘正常’一词，它的目的在于否定该项目存在的违背情报观点的内容。特别行动项目监察委员会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按照这种安全标准保证对财政和政策进行说明。”

击败克格勃所需要的秘密，会使陆军内部的法律和命令完全失效。

就在同一周，“黄果”行动出现新的局面。威廉·T·戈尔登已经在军事情报行业干了20年，曾经在尼加拉瓜的马纳瓜美国使馆出任助理武官。任何一个驻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武官，肯定都有很清楚的一系列任务；在桑地诺分子的巢穴，戈尔登是一个间谍。

戈尔登后来作证说：“分配我在那里从事的一个项目称之为‘黄果’，它以弗吉尼亚州安纳戴尔的国际安全商用公司为掩护。我直接为邓肯中校工作。当我1983年8月到达时，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已经预支给个人以及该机构已支出的秘密资金建立帐目。”

建帐是一个危险任务，对于“黄果”行动是十分危险的。

当戈尔登专心致志于“黄果”计划的各种档案材料时，邓肯偕夫人到欧洲度假去了，戈尔登很快发现，这次度假用的是政府资金；那是一笔最少的开支，邓肯向他报销了两张共计8万9千美元的发票。戈尔登说：“这两张发票都是假的，都是伪造的发票。”他从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犯罪的线索。他很快得出了结论：“邓肯中校进行了某种大规模的欺骗行动，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也是如此。”戈尔登告发了邓肯。9月13日，他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陆军刑事案件调查处立即深入调查“黄果”行动计划。他把报告送给了特别行动处的副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拜厄德中校，拜厄德为该处在财政方面的诡计多端陷入了深思之中；这个报告就象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一样扔在了他的桌子上。

拜厄德把报告呈送给了在中央情报局的朗霍费尔中校。朗霍费尔要来一架飞机，飞往柏林去见正在度假的邓肯。一周以后，戈尔登在办公室的“黄果”保密专线上接到一个电话，是朗霍费尔打来的。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中校说：“回国来，再也不要到办公室去；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你不要给我们打电话来。”

戈尔登回国后一直等待着。他仔细考虑了他在国际安全商用公司看到的一切。深留于他脑海里的一条是朗霍费尔从中央情报局带回的一个有关“黄

果”行动的文件，这是一个精心研究的计划，打印在 30 或 40 页普通纸上，保存于国际安全商用公司的一个保险箱里，这个保险箱就放在存放有凡万美元现金的一个没有上锁的箱子旁边。

戈尔登回忆说：“这是一个应急计划，一个准备在用于支持外国政府反对派的资金被砍掉后才于执行的计划。”9 个月之前，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博兰修正案，禁止中央情报局支付用于“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目的”的费用。1983 年 7 月，也就是戈尔登离开尼加拉瓜前 3 星期，众议院又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活动。”现在，国会正在酝酿要充实博兰修正案的内容，禁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任何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尼加拉瓜政府的反对派。

戈尔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着急；大家在办公室谈的就是博兰修正案；为反对派提供的资金要砍掉，我们都会失去工作，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戈尔登说，这个放在保险柜中的计划，“谈到了各种各样对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间接支持的方案”，如果国会宣布直接支持为非法的话。一个方案是用这种秘密援助冒充向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提供的军援项目，“心照不宣地把这些冒充的东西运送给尼加拉瓜反对派。”另一种方案是利用“某种供应系统，这就需要航空器材以及修建简易机场。”这个机场将建立在约翰·赫尔的牧场上，“赫尔是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美国人，他拥有一块牧场。”

戈尔登说：“毫无疑问，这整个计划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付博兰修正案。”该计划呼吁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陆军详细研究特别行动处和“黄果”行动，他们的枪支和资金将通过邓肯中校精心安排的秘密组织的渠道，输往尼加拉瓜反对派。戈尔登说，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在 1983 年 9 月已开始实施，简易机场差不多已准备就绪，作为“黄果”计划门面的公司已经建立，秘密银行帐户也已开立，正等待命令；但是，邓肯中校和“黄果”计划就要垮台了。尼加拉瓜反对派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个中校填补了这个空缺，他是一个不知疲倦

的军人，每天工作 18—20 个小时，把整个计划的每一部分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是为了美国总统而工作的。

在戈尔登生日的 10 月 14 日星期五，他一直等待的电话终于来了，是国际安全商用公司的秘书达伦·拉什，把电话打到了他的家中。她说：“邓肯中校已经返回，他在司令部里，你星期一上午来，带上你办公室的钥匙。”

戈尔登回到国际安全商用公司准备摊牌：“邓肯中校站起来说，‘我已经对你提出的一切指控都进行了辩护，我现在又回到了司令部；有些人必须立即解雇’……在他的名单上我是第一个。”

戈尔登回到家，拿起电话叫通了联邦调查局。他说：“联邦调查局认为我是个怪人，把我的档案材料放在了怪人的卷宗中；他们说，过去从没有听说过任何这类情况。”除了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白宫的一小撮人以外，其他任何人也不会听到这种消息。戈尔登不得不找到在阿尔帕克基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为他作证；他终于向该局叙述了有关情况，并对一个陆军律师以及一位联邦检察官介绍了有关问题。

此时，整个地狱爆炸了。陆军的秘密军人胡作非为，几百万美元——迄今还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流进了他们的黑金库；执行“黄果”计划的

军官们把资金用于个人享乐，还企图掩盖罪行。陆军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正在酿成的丑闻。3个不同的调查机构成立了，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的刑事案件调查处，正在寻找犯罪证据；陆军的一个情报和财政官员小组，则追踪已为特别行动处提供的资金的下落，力图弄清楚什么人负责这些资金。

陆军最初对自身进行调查的努力，差不多毫无结果，令人可笑。来自陆军督察处的调查人员，仓促草率地检查了1983年秋季“黄果”计划的记录后，对“黄果”集团的成员说，“会有查帐那一天的”——某一天吧。调查人员离开以后，“黄果”集团的官员重又开始把他们的记录往碎纸机里面填起来。来自陆军财会中心的审计人员，只检查了“黄果”计划1984年1月至6月的帐目，没有发现任何不恰当的地方。

一年多以后，陆军调查人员才抓住了这个案件。在这些调查人员中，有一个就是26岁升任中尉的蒂莫西·恩内金，他过去的任务是从事保密活动，设法使陆军的武器发展项目保密，确认这些项目没有暴露出去。最初，他参与调查的具体任务是确保秘密行动在调查过程中的安全。然而，陆军调查人员陷入了困境，他们请恩内金帮助对黑项目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促使调查人员把整个1984年以及1985年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奥特默·阿克利之手的资金，与由此而流入黑世界的资金进行了合计，这些漏记和没有入帐的资金，其总额竟然高达3亿2千4百万美元。

恩内金说：“当陆军发现了这个他们差不多已经掌握的3亿2千4百万美元的黑洞时，他们去调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果”行动计划，尔后又找到了“海浪花”的所在地；后来他们说，‘岂有此理！我们要搜查这个黑世界’。没有人知道这3亿2千4百万美元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公诸于新闻界，你一定会说：‘这些秘密项目在这个10年的前5年，就已经丢失、误用、偷盗或滥用了300多亿美元。调查罪行的工作正在展开，这在国防部组织的活动中属于绝密，没有人知道它的进度，也没有人会随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的调查范围。’”

陆军认为，不把这种情报透露给新闻界是极其重要的。1984年10月，恩内金与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副总指挥查尔斯·斯坎伦准将一块坐下来，他请这位将军指示，在这种调查中应该把多少情报划归保密范围？

斯坎伦将军说：“一切都必须保密，一旦这种情报泄露出去，就可能影响竞选。”

恩内金大为震惊。他说：“简直把我吓了个半死，这就是对某些问题不予保密的原因。你不能由于政治原因而对某些问题保密。实在令人不安，因为这家伙告诉我，‘我们需要支持政府，我们不想干任何会使总统失去再次当选机会的事情。’”

恩内金继续说道：“他已清楚地表示，选举正在临近，如果泄露了这种情报，就可能对选举产生不利影响。这个指示既非常清楚，又引起了很多麻烦。

“我想，我已经得到了一个我不可能执行的命令。我陷入了困境，一种围绕这个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困境；在这里，多数人都不得不服从命令；你服从了，那是违法；你不服从，就可能送命。”

他说：“我面对的就是斯坎伦的命令；不过，我镇定自若，干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侥幸没有受到处分，我很幸运。他实际上是可能发怒的。他可以把我杀掉。”

在陆军的许多调查人员中，只有恩内金一个飞遍了全美国和全世界，企图找到这些资金的下落，尽力决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显而易见，要找到答案是困难的。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愿意插手这个问题。

陆军用了差不多4年时间，企图追踪失落的资金，但并不容易。在1983年9月13日戈尔登提供他的有关报告那一周，特别行动处的所有军官就销毁了他们的现金帐目、各种收据、存折以及任何其他记录；在此后17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又销毁了一切证据。

法律和各种官方条例均禁止销毁政府文件，但是，维齐将军发布过命令，授权销毁特别行政处的各种记录；奥多姆似乎也如法炮制。现在，维齐是联合参谋部的主席，奥多姆又恰恰被任命为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调查迂来回去，碰到了军内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

到调查开始一年以后的1985年春，调查人员把零七八碎的证据拼拼凑凑，搞出了一个说明陆军秘密单位内部活动的材料，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材料。

他们发现了一张秘密活动存款单，数额达64292335.5美元，这是一笔存入私人帐号的公款，为秘密陆军军官所控制。

他们发现秘密部队把无数资金——之所以无数，因为帐目被销毁——用于住6百美元一夜的旅馆，喝每月1万2千美元的饮料，坐头等舱旅行，购买时髦服装和昂贵的行李箱，携妻子和情人吃喝玩乐，支付医疗费、托儿费和保健会员费。所有这些支出，似乎没有一项与进行反恐怖主义战争有任何关系。

他们发现的那些被销毁的零零碎碎的证据表明，陆军一秘密单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员，住的都是比四星级更高的饭店，乘坐的是比鸚鵡螺号更豪华的舰艇。据陆军一个调查人员反映：“传闻快速反应部队的人员，乘飞机四处玩妓女，贩毒品。”

偷盗政府资金者有之，搞欺骗活动者有之，阻碍司法行动者有之，作伪证者有之，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然而，调查人员却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发现。恩内金说，这种调查“从未触及那些问题最严重的职员，从没有把可能存在的偷窃行为完全追查出来，从不敢过问严重滥用权力的现象。是的，人们确实有一种感觉，我们可能挖出一些问题，但暴露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实在令人胆颤心惊……”

恩内金在赫克托·佩雷斯—勒布伦上校的领导下工作，后者的正式职务是主管陆军的行政调查。调查记录清楚表明，这项任务使佩雷斯不知所措；有一个空缺需要填补，恩内金入选。这种调查摇来摆去地缓慢向前，沉重的任务使它东倒西歪。1985年6月，佩雷斯和恩内金在国家安全局的大本营，马里兰的乔治·G·米德堡找到了奥特默·阿克利，他现在已调换工作，不再当陆军主管的黑钱管理员，而负责检查五角大楼人员的安全通行证。

他们开始倾听阿克利讲述他的故事。36年来，无论他是否穿着军装，都一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随着岁月流失，他对陆军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越来越气愤，越来越沮丧，1965年他作为一名少尉在西贡坐办公室时，这种沮丧发展成了愤怒。

他说：“在越南，我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为从1964年到1968年在越南担任美军高级指挥官的“威斯特摩兰将军，设立了应急资金”，这是一笔以备在困难情况下，司令官想怎么使用都可以的应急资金。

阿克利的工作在于把资金划拨出来，用于秘密情报活动，用他的话说，“为了对临时目标作出反应”；军事情报单位必须对这些活动目标迅速作出反应。“别无其他办法，不这样干不行，你不可能阻止这种官僚主义的可怕情况的出现，它们是在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时造成的……”

阿克利说：“陆军的规章制度并不是为情报活动制定的，情报活动不采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少尉，我首先领会的是陆军的规定不过是一个手册；我现在仍然认为它们仅仅是一个小册子而已。”

因此，阿克利很久以前就开始考虑取消这种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到1981年，他提出了一种把公款转移到黑项目去的方法，这在陆军秘密活动的历史上尚属前所未有。

阿克利把手伸进了陆军12个尚不属于保密范围的不同帐户，帮助把国会拨出的购买枪支弹药和坦克导弹的费用以及作战演习和后勤维修的费用，转移给秘密部队。他还得到授权接触中央情报局的帐户，进一步模糊陆军和该局之间的界限。实际上，阿克利说他所使用的“伎俩”还是“从情报机构那里学来的。”

他说：“我们是在开垦新的基地，这是过去从没有于过的，它完全是一种新的程序。”

佩雷斯问，陆军为什么依靠他为秘密使命提供大笔无法查对的资金？

阿克利答：“原因在于陆军部不愿到国会去要求拨款。”

佩雷斯问：“你的意思是，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程序，因为陆军不乐于到国会争取更多资金？”

阿克利说：“我可以以生命为此担保。”

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说过，宪法“就好比是《圣经》，应该一次又一次地阅读。”陆军似乎需要上一些强制性的温习课程。陆军不愿意到国会为其秘密行动争取更多资金，故而寻求并发现了秘密提供资金的方法，这既有助于保密事业，又很方便，但它违背了宪法。按宪法规定，禁止陆军进入国库，只有国会，而不是陆军，才有权动用公款；除其他方面以外，这正是使美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军人政府的地方。

宪法规定，“除以法律所规定之经费外，不得从国库中支拨款项。”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联邦法要求，已经划拨的资金“只能用于国会为之拨款的相应项目，不能挪作它用。”陆军不能够提取“除以法律所规定之经费外的款项，用以秘密行动，这正是黑预算违背法律规定的地方。——

恩内金后来说：“阿克利所干的就是把白的变成黑的，把国会有意放在可见之处的资金，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凡是被认为资金公开的领域，审计人员的踪迹都已中断。”陆军的一个无名财会人员，变成了秘密金库的审计长，这就是特别行动处的使命为何要隐瞒国会和陆军文职领导人的原因。当他们对阿克利的讯问拖长到下午的时候，这两个调查人员已头晕脑胀。阿克利并不是一个自由散漫的扒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人——他们还并不完全知道是谁——授权的。这个阴谋的整个目标都是为了掩盖对资金帐目的审核，谁应该对帐目进行说明呢？什么人应该负责呢？

佩雷斯质问阿克利：“通过你转移出去的那些不属于特别行动处的资金，到底是两千、三千、四千万美元，还是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美元？这些钱属于纳税人，它们是公款……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军官，他不应该对这些资金作出某种解释吗？”

阿克利对两个调查人员讲，注意！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把这些钱变成现金，我的说明到此为止。他说：“是我第一个承认，我的使命有确定的目的；我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提供劳务，为了有工作干，我认为这是合法的，理由是充分的。”

他认为，这些钱属于陆军，而不是纳税人；一旦这些资金通过他的手，就不再是绿色的，而成了黑色的，就再也见不到了。阿克利说：“你们坚持说，这些资金依然存在；我认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佩雷斯把最厉害的一招留在了最后：“当你知道通过你的帐户流出的资金，总额已经高达3亿多美元的时候，你感到吃惊吗？”

阿克利吓得目瞪口呆，他结结巴巴地说：“天哪！有这么多钱，我——我——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

佩雷斯又说：“一旦你知道还有6千4百多万美元现金保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吗？留在银行的现金或者活期存款的确切数目是64292335.5美元。所以，我们现在谈的现金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错，我们谈的是一大笔钱。”

佩雷斯接着说：“我们所谈的钱数很大，这就是每个人都对过去4年发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的原因。让我就已经发现的情况给你举几个例子吧：我接到了没有入帐的现金……有些资金实际上已经消失；我还发现有人销毁帐目……”

恩内金打断佩雷斯的话说：“先生，还发现有服饰用品，还有妻子和女朋友……”

佩雷斯继续说道：“滥用资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安全’的名义。”阿克利说，陆军的高级财政专家们一向了解发生的情况，他点出了陆军负责财政政策的助理审计长奥利弗·肯尼迪的名字。阿克利坚持认为：“他完全了解我们进行的活动，他无能为力，但他知道内情。”

1985年10月，佩雷斯和恩内金找到了肯尼迪，他大为震惊。

肯尼迪宣称：“令人吃惊！没有任何帐目说明？”我不相信政府会有什么人授权批准这样的提款程序……一种无效的支付方法也可以行得通！而且没有帐目？天哪！不会的！中央情报局有他们活动的特殊规定，但据我所知，陆军没有。”他说，调查人员所讲述的制度只能达到一个目的——巧妙地软化国会的决心。

陆军刑事案件调查处的办案人员，也在为帐目问题寻找答案，他们寻访了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部司令格伦·奥蒂斯将军，他是

陆军负责作战和计划的副参谋长，1981年特别行动处开始组建时，此人是名义上的负责人。

据说，奥蒂斯一直监视着特别行动处的活动，但事实上他没有。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为秘密单位提供的资金。”特工人员基思问道，那么，该处购买的价值1千7百万美元的飞机以及几百万美元的高技术装备，国会有人知道吗？“这些钱是哪里来的？采取有什么管理措施吗？谁应该负责建立各种管理制度呢？”奥蒂斯将军说他不知道。

特工人员告诉这位将军，“黄果”行动计划已经设立了“他们所谓的应急行动基金。”该处自作主张，设立这种基金作为他们取得非法现金的渠道。

基思的同伴肯尼斯·海恩斯说道，现在，“这些钱已经用光，再也没有

支持这种开支的资金，紧急行动基金作为一条渠道已不存在。”

这位将军大为震惊。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已赋予他们任何掌握资金的权力。”

基思紧追不舍：“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有装满现金的箱子，好比装满现金的保险箱，是吗？”

这位将军说：“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现金，从没有听说过他们手里掌握有美钞。”

这两个特工人员又去查访了刚刚退休的一位将军霍默·朗，基思询问了这些军人为购买飞机和武器而秘密支付几百万美元的情况。他问道：“陆军一个身着文职军人制服的士兵，外出提着装满钞票的箱子，或是拿着支票，并且说‘我要去买一架飞机’，”陆军领导机构知道这类问题吗？

朗回答说：“我完全不认为他们会了解这种情况。”

特别行动处违犯陆军规定，用现金交易，并且销毁帐目，逃避监督，将军知道吗？

朗回答说：“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那和他们的行动方式是协调的。这就又使你们回到了他们是不是可靠的问题上；不过，他们的活动方式就是为了避免外界的一切控制。”

佩雷斯和恩内金非常惊讶地阅读了查访奥斯蒂和朗的记录副本。他们坚持要寻找一个能够说明帐目情况的人；他们又坐在了艾伯特·斯塔布宾斯少将的面前，此人1981—1984年曾是情报和安全司令部司令。这位将军承认他玩忽职守，说：“我没有对特别行动处的活动程序提出过疑问，我设想他们的财会制度是可以信任的。”他回忆说，那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

佩雷斯问什么人授权建立了这种制度？是谁批准建立的？

斯塔布宾斯突然低下了头，把视线转向一颗子弹。他说：“我不认为我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能够自己得出结论。”

那好，将军，佩雷斯继续问道：是你授权的吗？

斯塔布宾斯将军回答说：“当我来到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我设想它表达的是陆军领导机构的愿望。”这两个调查人员意识到，他指的是迈耶和维齐将军。

在佩雷斯和恩内金的调查开始以后3年，他们查访了陆军司令部最高层的这两个人物。迈耶将军说，他应该给予该处的活动以更密切的关注，但是，对安全问题的考虑压倒了一切；至于该处的资金供应，“我相信已经建立了发挥这类作用的制度。”这种制度并

不存在。

维齐将军最近已经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明尼苏达州加里逊地方的家里安享清福；他并不特别高兴在华盛顿会晤两个调查人员。他承认自己授权销毁记录，但又说，这个授权是附在由他签名的一个很长的备忘录上的一条。他说，他从没有听说过“黄果”行动计划，从没有听说过该处资金供应的特别方法；他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安全方法都是正当的。

他说：“这样作的意图并不是为了要任何个人富裕起来，其目的在于保护工作人员……以避免暴露他们作为军人的身份。”

寻找责任者的工作导致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任何人都没有责任。

这一事件的最后报告共集成 8 卷，几乎满满 2 千页。根据情报自由法，我得到了该报告的一个删节本，但它仍然是迄今唯一可以公开利用的一套有关现存黑项目的审计报告，它暴露了前前后后的犯罪方式以及完全缺乏管理工作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秘密权力是如何在没有人充分了解情况，以便进行制止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这个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陆军构想、宽容并且采用了一种非法掌管黑资金的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和不合法的方法”，“在这种制度出现以后，它又进一步扩大……这种制度根本没有进行过明确阐述的明确规定程序、内部控制措施和有效监督方法。”

共有 8 名陆军最有权力的将军“了解、宽容或是批准了这种非法的特别使命基金制度，”排在这个名单最前边的是 3 个人们熟悉的名字。

“维齐上将”——1982 至 1985 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知道、支持、宽容和批准了这个明显违背陆军和国防部财政法规的制度。”

“迈耶上将”——1979 至 1983 年的陆军参谋长——“助长了松松垮垮的气氛……（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奥多姆中将”——1983 至 1989 年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或者知道、应该知道、但宽容了这种制度”，或者是“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大意。”

审阅过这个报告的两名陆军律师，撤销了对 8 名将军进行纪律处分的决定，他们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将军“应有很多权力”，作为一名将军，他“有权假定其下肩是依法采取行动的”；他们还说，将军可以制定、修改和取消某种军事规定，如果他愿意的话。至于说到刑事法规禁止销毁政府记录的问题，律师们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当维齐和奥多姆将军下令销毁记录时，他们知道这种法规。”

这两位陆军律师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将军在法律之上，本案到此终结。——

适用于将军的美差并不必然适用于普通士兵。陆军对特别行动处的 500 多名下级工作人员进行了行政纪律处分，从口头斥责直至解雇，共有 36 名军官被解职、惩罚或处分。——

对秘密行动计划内军人的刑事案件的调查和揭发，迄今仍在继续。秘密突击队中的一个分队、“三角力量”的 8 名成员，因为在

财政方面滥用权力而受到了纪律处分；另一个保密单位、海军的“海、空、陆第六小队”，至少也有 3 个人因偷盗和欺骗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在本书写作时，情报援助机构负责采购枪支弹药的陆军上校军官迈克尔·史密斯，由于从情报援助机构枪库中偷出至少 200 件武器而受到联邦政府的追查。这张单子还在不断扩大，它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

然而，有些偷了几千美元的军人则免于处罚，或处分很轻。恩内金说：“对于实际被发现有罪者不作任何反应，有个家伙承认偷了 8 千美元，但在他海外服役结束后，还发给他一枚奖章，并提升为中士。有些偷了一两千美元的人，则往其档案里放一张惩戒材料。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故交联络网，我们自我保护。你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却是一种很普遍的态度。”

宽恕了那些将军们的两个陆军律师作过一个犀利的评论：“陆军领导机构迷恋于行动计划的秘密，”保密是首要的，其他一切问题——财政方面的放任自流，行动计划失败以及人员的行为——

则都是次要的。

这些将军们从来不停下来问一问，他们的秘密单位究竟完成了什么任务？特别行动单位究竟为他们显示了什么成就？贝希尔·杰马那勒飞返黎巴嫩了吗？这是一些很合逻辑的提问；不过，杰马耶勒在 1983 年被暗杀了，由这一使命而自然产生的任何利益也随着他进了坟墓。在抓获 1985 年阿希尔·劳罗巡洋舰上恐怖分子的过程中，特别行动处发挥了支援作用，肯定应该赞扬，但也只是如此而已，国家安全并没有因为这种特别行动力量而明显加强。

极其秘密地为特别行动处提供资金，并不必然会保护这些人员及其使命。恩内金上尉说：“正规的安全渠道可以控制秘密行动过程，通过阿克利手的资金，只有 10% 或 20% 是真正出于行动安全方面的原因。”

恩内金说，终于，“保密变成了目的本身，你已经看到了发生的情况。没有监督，缺乏管理；没有任何财政控制，没有后勤方面的控制，也没有法律上的控制，我们谈的是资金、财产和法律，这 3 个领域都是乱糟糟一团。对于军队的这个特别分枝没有任何监督工作；它最终遇到了麻烦，最终要有人对其负责，遭到可耻下场”。

恩内金说：“奥利弗·诺思没有和奥特默会面是一件大好事，他们差不多就要会面了，如果晚 6 个月，他们就会见面，已经准备就绪；阿克利所支持的那些人正在开始接近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这个选手。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是见一次面而已——‘阿克利，这是奥利’；奥利，这是阿克利’；但这种会见可能会产生锦上添花的后果。”

“黄果”计划在各个方面——无限膨胀的勃勃野心，沉醉于秘密活动，蒙蔽欺骗以及各种犯罪现象——都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了伊朗反对派支持者的垮台。当诺思 1981—1982 年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阴谋策划的时候，秘密部队就已经在进行黑市交易，他们搜罗资金，购买飞机、直升机和枪支弹药，并且向国会隐瞒其活动；他们树立了一个样板。

“黄果”计划这个题目，引起人们对关起门来为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言产生了兴趣，这种证词太秘密，太敏感，或者是太令人惊奇了，以至不能公诸于众。陆军部长小约翰·O·马什对“黄果”计划产生了某些想法；他关于对军事和情报机构实行政治控制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寻常的深刻见解。在水门事件后为

改革中央情报局而奋斗的时期，马什曾担任福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越南战争期间，他一连 4 届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作为陆军的一名高级文职官员，他也是秘密部队隐瞒和欺骗的对象。

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律师们问他，“黄果”行动错在何处，马什说，卷入秘密计划和秘密使命的每一个人，从指挥机构的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只要是秘密，就一定合法。”

马什作证说：“当你抱定只要是秘密就一定合法的观点时，现有一切章程、法律、规范和习惯，都会经常被抛弃在一边，人们之所以会抱着这样的观点走下去，原因就在于那是秘密，所以合法。”

这也是诺思向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的全部内容，他说：“我们行动的前提是，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诺思上校背后是总统；邓肯和朗霍费尔有陆军高级将领授予他们的无限权力，他们都认为，他们秘密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已经为高于法律的某种权力所认可。

马什作证时说，对比一下“黄果”行动计划和诺思为伊朗反对派秘密提

供资金的事件，其结果“使人不安，令人烦恼”。二者都企图建立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军人和间谍网络，他们通过寻找秘密资金来源，支付不计入政府公开帐目的无数资金，使自己摆脱了困境。

这位陆军部长说，各种巧立名目的借口“违背了政府制度和各种机构的规定”。美国政府的制度要求对秘密行动进行监督和审查；陆军作为一个机构，要经由立法权力进行管理。马什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的财政控制制度，如果没有……我敢担保，还会出现麻烦。”

马什说，美国需要完成秘密使命，“我们生活在一个情报活动极其重要的世界上，秘密行动事关重大；在一个社会自由和开放的时代，组织秘密使命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进行的。不过，如果你因为制定秘密活动计划比较困难而破坏了制度的规定，你就会招致麻烦……”

他说：“这些秘密活动计划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问题，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五角大楼地下室的狂热分子和为总统工作的军事助手，对国会强加于秘密行动计划的各种控制越来越愤懑，故而组织了由他们自己提供资金的地下情报单位，由被秘密赋予权力的人们主管。这种秘密活动造成了一种感觉：他们的任何活动都符合道德规范，没有什么行动应该予以禁止。由于没有规章制度和法律控制他们，致使这些秘密士兵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间谍与军人联姻，陆军的力量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结合，造就了一帮精神失常的斗士。恩内金上尉说，在执行特别行动计划的力量中，“你看到有许多象流氓无赖一样的成分集中到了一块。这些人行动迅速，干劲十足，有一种阻挡不住的精神。把这些人搜罗到一块，与世界上其他人隔离开来，你会看到某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你学会了如何撒谎……是非分明的界限逐渐消失了……一旦你精疲力竭，陷入这种境地，要回头是很难的。”

这一类单位的问题在于，它的活动非常秘密，非常熟练，速度很高。有很多好人都愿意从事与特别行动计划有关的工作，完全是因为这种工作太秘密，节奏太快，太灵活多样。对于这一点，有些律师就不大在乎，那些管理财务的家伙也不大在乎，有人还在 10 世纪 80 年代的一张几百万美元的帐单上签了名，真是个瞎子，傻瓜！如果不是由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而且又是黑帐和秘密的话，他们会这样子吗？他们也会暂时对自己工作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他们的正常思维过程表示怀疑。他们已经被同化，他们已经腐败堕落。

有 3 名军官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陆军调查机构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证明朗霍费尔上校及其司令部的第二把手拜厄德中校，还有邓肯中校，严重滥用职权。从严格的责任感出发，陆军 20 年来第一次组成了它的秘密军事法庭。

朗霍费尔上校 1986 年 3 月 31 日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滥用职权，在调往中央情报局以后仍然秘密控制特别行动处；他不服从朗将军的直接指挥和合法命令，放弃对该处的指挥权；他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军官，因为他掩盖“黄果”行动计划的罪行。

这次审判延续了 13 天，最后数罪并罚，朗霍费尔被判监禁两年，他作为秘密部队一名指挥官的生涯，把他从黎巴嫩海滨送进了利文沃思监狱。

是年 5 月，拜厄德中校出庭受审，其罪行是偷盗“黄果”行动计划资金，

他被监禁 18 个月，罚款 5 千美元。

当年 11 月 10 日，戴尔·邓肯中校站在了秘密法庭上，这是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一个很小，但戒备森严的房间。邓肯的罪行是伪造发票，从“黄果”计划资金中虚报冒领 15 万 7 千 8 百 16 美元，他还犯有偷盗罪，侵吞“黄果”计划秘密资金 6684 美元；同时，他还被指控干扰司法部门工作，企图以军事秘密掩盖其罪行。

军事法庭是严肃的：邓肯被判 10 年监禁，没收 10 年收入，罚款 5 万美元，开除出美国陆军。

两个星期以后的 1986 年 11 月 24 日，邓肯硬着头皮踏上了前往利文沃思堡的旅程。朗霍费尔躺在他的监号里，希望他上诉的声音能有人听到。奥利弗·诺思通宵达旦地销毁其档案，抢在联邦调查局之前先走了一步。

第八章 法律与谎言

“海军学校学生决不撒谎、欺骗和偷盗……”

——美国海军学院《行为准则》的前几个字“在美国海军学院，没有人教我如何从事秘密活动。”

——奥利弗·L·诺思在美国华盛顿法院提供的证词，1989.4.11 奥利弗·诺思身着笔挺的海军制服已坐在电视摄像机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向美国人教授秘密世界的行动方式，这个讲习班是在1987年那个炎热7月的一个上午，他向国会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提交证词10分钟以后开始的。

诺思的声音嘶哑、颤抖、充满了激情。他说：“我想重要的是，我们此时此地已经就什么是秘密行动达到了某种共识；就其本质而论，秘密行动或‘特别活动’就是撒谎，在秘密行动中，从事欺骗和蒙骗的活动是大量存在的，这些活动从本质上看就是撒谎。我们要尽其所能就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行为欺骗敌人，否认美国与这些行动有任何联系……这并没有错。”

在诺思看来，撒谎是总统行使权力的一种合法工具，总统的这种权力又很少受到宪法或法律的制约，所以他的谎言成倍增加。他对中央情报局撒谎，对国会撒谎，对他在白宫的同僚们撒谎。从他站在国会面前的那一刻起，直到宣判他有罪的那一天为止，诺思始终认为撒谎是秘密世界的共同语言。诺思鼓吹和实践的欺骗原则很简单，撒谎是秘密行动的本质；秘密行动计划是总统对外政策的核心，所以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以谎言为动力的；这并没有错。

诺思的信条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无稽之谈，从事秘密战争的老战士们对此十分了解。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克莱尔·乔治，在诺思出庭后一个月在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证时说：“我坚决不同意诺思上校的观点，正象我不能同意任何人这样的观点一样。这是一种讲求信任的事业，一种能够和必须完全信任与你一块工作的人们的事业。如果你认为：由于我们和撒谎者打交道，由于我们可以在海外撒谎以及从事类似的其他活动，所以就给了你某种许可，某种权利或特殊理由，使你可以对你的同事如法炮制——我不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而且要说，这将对民主制度中秘密活动的破坏。”

诺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常客，他必然非常熟悉中央情报局雕刻在它那大理石门庭上的《约翰福音》中的两句话：“你必须牢记忠诚，忠诚会使你获得自由。”这些话已雕刻于墙上，而诺思却从来都没有理解它们，用秘密世界的话说，忠诚仅仅是生活的准则；当秘密行动的从事者一个又一个开始撒谎的时候，情况就完全变了。

诺思把谎言以及秘密行动计划所需要的秘密故事带回国内，交给华盛顿。3年的艰苦调查还没有把真正出现的小麦从他用谎话堆成的谷物中分辨出来。当他销毁、焚烧和改写记录他丰功伟绩的文件时，他是在欺骗历史，企图偷盗忠诚。伪造假文件和销毁真文件，对于秘密世界是家常便饭，或者说，诺思认为如此；用法律的眼光看，这些活动是犯罪。

诺思目不转睛地盯着克莱尔·乔治和中央情报局主管中美洲特遣队的头子艾伦·菲尔斯，发誓他没有负责中美洲的秘密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已经把诺思对他们讲的情况转达给了国会情报委员会，传播了他那象病毒一样的谎言。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被出卖了。受到谴责的菲尔斯在他们自己关

于伊朗反对派事件的秘密证词中说：“你们不能撒谎，你们必须相互信任；你们必须有一种道德规范，一种道德基础……否则，你们就离开，你们就会失败。”

由于缺乏这种道德基础，海军上校一位严峻的海军军官，沉默寡言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驾着国家这条航船走上了一条搁浅触礁的航道。对于他们那些谎言和自欺欺人的把戏，我们知之甚少，虽然有那么一点，也还是偶然存储于计算机中为子孙后代保存的东西。该计算机的主机存有若干捏造的备忘录，这是他们通过波因德克斯特建立的特殊安全通讯系统相互写给对方的。在这台计算机的数据库中，存储有乱七八糟的事实和虚构的内容，它们可能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谜；该系统的代号为私人空白支票。

空白支票在周转过程中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超出了管理秘密行动的法律准则所规定的范围。经过仔细雕琢的法律条文，要求中央情报局和国会之间达到共识；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的谎言破坏了这条纽带，但是，诺思仍然以颤抖的声音忠诚地对国会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不会为了保护其秘密使命、武器运输、瑞士银行的帐号以及各种拙劣的任务而轻易撒谎的”。他说，天平上放的是人命，所以，他“不得不权衡一下生命和谎言的差额。”

在诺思的等式中是不会出现法律条文的，他的论点只不过是温斯顿·邱吉尔在战时为谎言辩护的微弱回音，邱吉尔认为，秘密对于战争的胜利极为重要，他们必须以谎言为保镖而维护之。但是，美国并非处于战时，而是在向伊朗的激进分子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谎言并不仅仅是诺思所支持的秘密政策的卫兵，而是它的躯体和灵魂：这种政策就是搞秘密行动，而秘密行动在诺思看来，其本质则是谎言。

这些谎言产生于一个共同的基础：不顾法律为秘密行动计划提供资金的愿望以及为执行总统命令而建立武器库和金库的愿望。秘密资助向伊朗人和尼加拉瓜反对派运送武器的行动，逃避了国会审查，抢走了国会的财权。美国宪法的主要作者詹姆斯·麦迪逊曾经写道：“这种财权是任何宪法用以武装人民的直接代表者的最精良、最有效的武器。”它是美国民主制度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托马斯·杰斐逊说，把这种财权“由滥用其金钱者手中转移到出资者手中……可以有效地制止战争灾难。”打破这种束缚的人们，违背了宪法的明文规定，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所玩的把戏是多么

危险。1984年6月25日，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对里根说，在国会拒绝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从其他国家骗取几百万美元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这将是一条“要遭到弹劾的罪行。”舒尔茨说，这是一个出色的律师詹姆斯·贝克的意见；他后来是白宫办公厅主任，现任国务卿。

里根不顾这种警告，指派其助手为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而打开与暴君、共产党人、敌对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盟友的交易渠道，在美国借以支援“尼加拉瓜民主抵抗运动”的国家名单上，有中国和文莱，危地马拉和巴拿马，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这许多国家中，很难找到一个民主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国王和将军统治的国家。里根觉得，要求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法赫德为尼加拉瓜反对派拿出几百万美元是很自然的，他与该国之间的契约是两个保皇主义者之间的契约；秘密地为这种违犯法律的战争提供资金，与民主传统毫不相干。设立用于秘密行动的私人金库，是向着17世纪英国君主政体倒退了一大步，在那个时代，国王们使用、而且滥用和平时期储备起来用于国

家防务的资金，不让议会知道，为满足个人欲望而随便花钱。在 80 年代，里根及其助手们隐瞒帐目，用几百万美元资助他们为所欲为的外交政策决定，使这些秘密基金变成了总统执行秘密政策的私人钱包。

这个秘密金库由诺思、一名退役少将理查德·西科德和他的美籍伊朗商业同伙艾伯特·哈基姆控制，为西科德所谓的“企业”

的背叛行动提供资助。这种企业是爱国主义的，它的利润是转化为军火商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的秘密机构、各种挂名公司以及瑞士银行帐户。该企业向伊朗人、尼加拉瓜反对派以及中央情报局售出过价值 4 千 8 百万美元的武器，从中牟取现金大约 1 千 4 百万美元；其中有一些，用来帮助诺思实现其从黎巴嫩赎买人质的拙劣企图，帮他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的各种无效运动以及他与以色列情报人员合谋的各种一无所获的使命。

在用黑预算创立的国家安全综合体中，据说这种企业是一个非常恰当而标准的典型，是国家安全综合体抽取种子基金，获得技术和专家的宝库。诺思在他的罪行审判会上作证说：“西科德将军建立了很多机构，从事中央情报局过去从事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已经建立的机构之外，基本上是仿效该局又建立了一套机构。”——这是对民主制度中秘密活动的拙劣模仿。这种企业的存在是为了为秘密行动计划谋取资金，为更多的秘密行动生产利润；它的审计人员是一帮声名狼藉的家伙，西科德及其机构的名声很低，以致连一张安全通行证都搞不到。哈基姆是一个惯于偷窃的商人，头脑里总是有几十亿美元武器交易的影像在晃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职员、一个强烈的保守派杰奎琳·蒂尔曼的话说，诺思实际上似乎有一种病态心理——“迷恋于幻想，渴望权力，对总统和国家都是一种危险。”——这个秘密行动计划的主要情报员是伊朗的一个诈骗犯马努切儿·戈巴尼法尔，中央情报局知道他是一个毒品贩子、军火走私商和善玩骗术的家伙；他极其恶毒地撒谎说，中央情报局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出了一份少有的“急件”，警告该局所有人员，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出现，都要将其拒之门外。

这种企业决不仅仅是一帮歹徒所策划的各种阴谋诡计的集成，用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的话说，它是“一个秘密政府，一个藏在阴暗角落的政府，它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有自己谋取资金的机制，有能力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思想，能摆脱各种核查，能平衡帐目和摆脱法律的束缚。”——它不是心理失常的结果，不是由一名中校的混乱想象力而产生的某种怪物。它是制度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制度中，大量秘密资金流入了一个由可能控制政策和权力的军人及其秘密行动计划构成的封闭社团。它是黑预算的精髓之所在。

作为这种企业惯用伎俩的谎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因为事实过于令人扫兴，无法公开；以民主和自由为名，总统的人马就可以和暴君、恶棍以及盗贼联合行动。

罗纳德·里根出任总统不到两个月，就邀请罗帕托·比奥拉将军访问白宫。比奥拉是阿根廷陆军司令，刚刚被选择为阿根廷军事政变政府的新一任领导人。卡特政府一直与这个军政府保持有军事和情报联系，因为这个政府的将军们曾经以不寻常的气魄屠杀和拷打他们在国内对手。比奥拉最终被判除 17 年监禁，原因就在于他屠杀、绑架和拷打国内反对派，并且在军政府对付公民的肮脏战争中，指挥行刑队劫持和杀害了至少 9 千人。

1981 年，里根回答比奥拉说，美国将停止对他的政府的批评，并开始向

该政府出售武器。里根在逐渐喜欢这位将军以后又说：“我们已经就各自国家所关心的双边和多边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我期望着双方政府共同努力，加快我们关系的改善；我已经对比奥拉将军就任总统表示良好祝愿”。

在阿根廷军政府和美国所关心的多边问题的清单上，最重要的是与那些反叛者，即尼加拉瓜反对派的微弱联系，威廉·凯西的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反叛分子有可能推翻尼加拉瓜的左翼政府。

里根和比奥拉之间的友好往来，开辟了中央情报局和阿根廷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渠道；就是在这两个领导人进行会晤的那个冬天的某周内，凯西第一次提出了针对尼加拉瓜搞秘密行动的建议，到1981年夏季，阿根廷开始为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资金和培训军队，并且向洪都拉斯渗透情报特务，因为该反对派在尼加拉瓜边界附近建有营地。8月份，中央情报局新当选的负责拉丁美洲秘密行动的头目，一个西班牙文极差，在该地区无任何工作经验，而且又只求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杜安·克拉里格，在阿根廷军事情报机构的副手马里奥·达维科陪同下，飞抵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在那里，他们会见了洪都拉斯的总统、情报机构头目以及国家警察部队；克拉里格介绍自己是杜威·马罗尼，他说，美国、阿根廷和洪都拉斯需要联合起来支持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武装斗争，并宣称，他是代表美国总统说这番话的。他在撒谎，他并没有得到合法授权。秘密战争就在此时此地形成了。——

4个月以后的1981年12月1日，里根在一份调查材料上签名，授权采取秘密行动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美国政府向国会撒谎说，它的唯一目的是停止尼加拉瓜向中美洲其他地区输出革命；里根的讲话还根据幻想作出判断，说共产主义的浪潮正在席卷从墨西哥到得克萨斯的北部地区，一把红色利刃已经对准了美国的心脏。无论是国会还是公众，对这种可怕的警告都不买帐。秘密行动开始一年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个，禁止政府

拨款加速实现它的真实目标——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1983年4月27日，里根向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主题是中美洲问题。此前3周，尼加拉瓜反对派领导人已经宣布，他们正在“为解放尼加拉瓜而奋斗”，他们决心“砍掉桑地诺分子的脑袋。”——

里根告诉国会：

让我们讲清楚美国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态度，我们并不谋求推翻这个政府……按照美国的法律以及国际法，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阻止武器流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

这些话包含着3个谎言。首先，美国确实在谋求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为此目的，它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正如国际法院和美国国会后来所决定的那样。再者，美国政府不是阻止武器流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而是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武器运送给这些国家的将军和游击队。

1983年4月，即里根发表演讲，阐述其政府的美好愿望的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长凯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为尼加拉瓜反对派寻找武器来源，——他询问国防部长温伯格，看五角大楼是不是有人能够秘密为反对派弄到武器。温伯格知道有一个人正在从事这种活动，他挑选的是西科德少将，一个了解武器交易的路子，并且一直作为五角大楼的官方武器出售者，在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购买武器的人。尽管西科德经验丰富，但此人在情报团体中名声欠佳，正如中央情报局的克莱尔·乔治所指出的：“这位好将军西科德的名声，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并不是很高，在我们脑子里，在我思想上，他作为美国秘密活动的一个管理人员，是一个我不愿意与之做生意的人。”——

西科德已不可能清除他名字上的污点，这些污点是他在各种交易中，是在他个人与埃德·威尔逊的联系中沉积起来的；威尔逊是一个被中央情报局抛弃的官员，他由于向利比亚倒卖几十吨高品位炸药以及阴谋杀害其检举人而被判处 55 年监禁，西科德与威尔逊的关系，使他在五角大楼永远被禁锢起来无法得到提升，尽管这位三星级将军可以等待。现在，在西科德一生中又有了一次机会，他可以脱掉军装，作为黑人服务于他的国家，他可能从令人愤怒的道德乌云中挣脱出来了；他可以用其技术在全球武器市场上搞到几百万美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也许还可能实现其取代克莱尔·乔治，而成为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行动计划的局长的职务。

西科德 1983 年 5 月正式离开了国防部，当年某时，他开始安排向阿富汗圣战者秘密运送武器；他在五角大楼的特别行动处，谋到了一个周薪 1 千 2 百美元的咨询工作，五角大楼雇佣他为特别行动计划政策咨询小组成员，这是一个由退休将军组成的小组，请他们就秘密行动计划提供公证的专家咨询。西科德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一个专家，然而，他是不是会完全公证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1983 年 5 月底，西科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梅内赫姆·梅隆少将，他们的讨论简单明了，但结果可喜。此年，以色列为五角大楼提供了几百吨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里缴获的弹药以及价值 1 千万美元的枪支；五角大楼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央情报局，该局再送给尼加拉瓜反对派。中央情报局就这些武器到达的目的地欺骗国会，谎称要把它们运给阿富汗抵抗运动，以支持其他比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更受人欢迎的事业。为这些游击队的合法拨款在 1984 年用光之后，这批武器的大部分运送给了尼加拉瓜的那些反对派组织。

到 1984 年，调子已经确定，美国政府准备用谎言维护其为所欲为的权力，准备与诸如阿根廷这样一些名声欠佳的政府勾结，以达到其目的。中央情报局长凯西，打算沿着法律的边缘以及超越法律的范围进行活动，尽管法律已经规定不准向尼加拉瓜反对派运送武器，但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仍然企图“避开已确定的法律，暗地里进行交易”，正如缅因州共和党人、参议员威廉·科恩在伊朗反对派事件听证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政府的意见不可能得到国会同意的时候，它就绕开法律的规定，用秘密行动作为公开政策的补充。

前中央情报局长斯但斯菲尔德·特纳曾经写道，秘密行动的“危险之一”“在于它很可能失控”，在上司授予广泛权力之后，秘密特工“在某些问题上能够充分自我发挥其潜力，一旦必要的话。”在国会宣布向尼加拉瓜反对派运送武器为非法以后，里根还请求波因德克斯特帮助他冲破法律的限制，这位总统的辩解词是：“难道说，我不能够单方面采取某些行动吗？”这种辩护词可能为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了广泛的权力。这出戏的下一场，就是暗地里为秘密行动提供资金，黑钞票把总统的助手们从令人烦恼的法律束缚中，从宪法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了。——

通过受总统人马控制的一个公司，就可以说明秘密行动所策划的一系列活动的情况。1985 年，诺思给一个名叫戴维·沃克的英国雇佣兵打了个电话，这两个人是通过海军部的约翰·莱曼介绍认识的。后者开办了一个所谓“基

尼米尼服务公司”，带领一帮人专门从事阴谋破坏活动；基尼米尼是非洲人用的一个术语，形容蛇在草地上起伏爬行的状态。诺思把这个英国雇佣兵的名字，也放在了西科德正不断扩大的人员工资单上，和沃克共同协调这个突击队在尼加拉瓜的使命。“基尼米尼”的人员在蓄意炸毁桑地诺分子的一座武器库的过程中，烧毁了一家医院。这一行动是在巴拿马一家炸弹制造商协助下完成的，这个制造商则为杀人成性、后来又统治着巴拿马的军事铁腕人物曼努埃尔·诺列加将军所雇佣。

在乔治·布什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诺列加曾经是该局特工人员，他发现了这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哥们儿们作一小笔交易的机会，他需要美国朋友的某些帮助。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诺列加，原因是，他在巴拿马为世界最大的可卡因网络梅德林卡特尔提供了保护；目前，他正在佛罗里达州受审；他由于为可卡因提供庇护所而从该卡特尔那里接受了几百万美元。美国情报官员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诺列加最近下令，绑架、拷打并杀害了他最有名的一个政治对手。

诺列加派遣一名间谍去会见诺思，这个人建议，如果美国帮助澄清诺列加被玷污的形象，解除对巴拿马出售武器的禁令，诺列加愿意作一些美国希望作的事情，他可以暗杀桑地诺领导集团，破坏桑地诺的资产。诺思和诺列加曾经在 1985 和 1986 年至少两次会晤，讨论这些建议；诺思还把诺列加的意见带给了他的老板，海军中将波因德克斯特。后者认为暗杀是不合适的，不过，如果诺列加能够为美国政府效劳，采取某些破坏性行动，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国在那些年内的秘密外交政策。

国会伊朗反对派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并不以具有激进思想著称的人们，企图简单而直截了当地摆出问题：“在决定重要政策的过程中，过去的秘密是根本反民主的，”也是完全愚蠢的。诺思不仅与象诺列加这样的独裁者阴谋策划，以推动总统的秘密外交政策，而且还主持一系列非法的和不正当的行动，企图赎买扣压在黎巴嫩的 5 名美国人质。诺思的赎买人质计划是里根批准的，尽管里根后来说，他不会忘记“自己这样作所造成的一些麻烦。”这次行动差不多使美国政府的每一个人都大为震惊。

在诺思的上司制定他们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赢得人质自由的总战略的同时，诺思也策划了一个从绑架者那里赎买人质的计划，他差不多支付了 50 万美元去贿赂那些掌握人质情报的骗子，而这些情报肯定又是毫无价值的。诺思与药品管制局的两个特工人员共同策划了赎买计划，这两个人也象他一样，是不折不扣的业余间谍活动爱好者；中央情报局和药品管制局为此项使命募集了种子基金，背着国会非法保存这些秘密款项。为应付日常开支，诺思又找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百万富翁 H·R·佩罗特，此人过去曾经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可靠的私人资金来源，佩罗特终于为诺思的贿赂和赎买计划拿出了 230 万美元。在诺思的计划破产之前，就已经有 40 多万美元用在了寻找那些虚假的线索方面。中央情报局的克莱尔·乔治说，这位海军陆战队员“一次又一次地上了那些扬言要出卖人质的乞丐、阿飞和高级小偷的当。”

有一个伊朗骗子使诺思相信，他是肩负高级情报联络重任的沙特阿拉伯王子，从而骗走了诺思 1 万 5 千多美元；还有一个声称了解人质下落的美国情报员，从诺思那里一次就搞走了 10 万美元，而后迅速消失在了叙利亚；与毒品集团勾结在一起的黎巴嫩情报员追逐和得到的款项，则在几十万美元以上。

1985年6月，一个得到诺思嘉奖的情报员首先回到贝鲁特，尔后又转道飞回了华盛顿，他携带有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一份贝鲁特报纸，据这个情报员讲，这份报纸是由遭绑架的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创办的。载有巴克利手迹的这份报纸放在了巴克利的秘书面前，这位秘书告诉中央情报局官员，他们上当了。正如中央情报局后来确认的那样，巴克利已经死去，这个受害者遭到拷打，已经一年多音信全无。盛怒之下，克莱尔·乔治宣布诺思的赎买行动计划“纯属骗局”和“欺诈”，他当年夏天决定取消这项任务。诺思则另有打算。他依然相信巴克利的签名是真的，因此继续把这个黎巴嫩人情报员列入其发放工资的名单上。诺思不仅没有取消这项活动，而且从佩罗特的资金中又为这个情报员筹措了20万美元，以求得到更多情报；同时，他还从为尼加拉瓜反对派准备的基金中提取1万1千美元以供自己开支。这位情报员再没有提供其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尽管这种活动又持续了16个月之久。

第一次秘密武器交易在1985年8和9月成交，诺思和中央情报局协助以色列把496枚美国的反坦克导弹运给了伊朗人；这些导弹归伊朗革命卫队、这个激进化国家中最激进的部分所掌握。这次620万美元的交易违背了美国法律，也打破了漂亮的总统誓言，不过，它增加了利润，产生了结果，一个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大主教于9月15日获得了自由。兴高采烈的诺思，不知疲倦地为开辟新思路又奋斗了一个秋冬，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向伊朗出售武器，从而为尼加拉瓜反对派筹措资金的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方法。

1986年初的时候，诺思开始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漫游，他把朦胧的思路由海外飞行转向那值得自豪的业绩，他对其他同伙们说，他看到整个欧洲和中东，到处都有穆斯林扣留的人质，准备着交换美国抓到的战俘。克莱尔·乔治很有分寸地挖苦说：“上帝呀，快救救可怜的诺思上校吧！上帝拥有一切，世界属于我；我要去见总统，我要去见国王，我要飞往中美洲，参加一次私人会晤。搞几张票去看印第安人的比赛何如？上帝呀……”

到诺思的使命最终暴露出来之时，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比他开始其使命时又多了3个，1990年初，仍然有6人被监禁，如果他们确实还活着的话。国务院从前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弗朗西丝·麦克尼尔说，赎买、贿赂以及出售武器都是“完全无效的活动，我们没有救出任何人质。”诺思热衷于秘密活动，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大部分行政部门都被指责与这些敏感行动有牵连，国会和美国人民都因此而目瞪口呆；而且你知道，每一个（敌对的情报机构）都确切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你知道西欧每一个拙劣的军火商都明白，有些人正力图借助于美国，从伊朗人那里大赚其钱……你知道，他们之所以避开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清楚人民将反对他们这样作。由于这种愚蠢举动而引起的喧闹声，将会大得令人难以忍受。”里根政府中没有人会把药品管制局的把戏即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是为尼加拉瓜反对派运送弹药的情况告诉国会，这是很自然的。不通知国会就是公然违背法律；国会依法管理秘密行动的法律、1980年的情报监督法，明确包括了政府的每一个机构。这就是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药品管制局借助于中央情报局搞秘密行动，但又不经国会批准，不由国会拨款，就象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所干的那样，那就是拒绝宪法和法律对秘密行动的控制。

里根的政策要继续下去，这项法律就必须取消。国会虽然宣布向尼加拉

瓜反对派运送武器为非法，但是总统，他的中央情报局，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那些受宠的士兵却说，他们不喜欢这个法律，他们需要秘密资金以资助其外交政策。他们搞到的黑钞票，可以使他们有一支秘密政府部队，自我管理，自我检查，自我提供资金，并且扩大其权力，使之不受外界控制。这是对法律的公开藐视，其结果必然是美国的法律为一系列谎言所践踏。

如何证明撒谎是正义的呢？在诺思、凯西和波因德克斯特看来，在美国及其敌人——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包括反对里根政策和有权制止他们行动的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战争状态；他们认为，这种战争状态使他们的一切作为都变成了合法的和符合宪法要求的行动。在关于伊朗反对派事件的听证会上，现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迈阿密州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米切尔，曾经请诺思就这种战争准则告诉他：“在你与凯西和波因德克斯特进行讨论的时候，在你们中间是不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已经提出的各种建议合法吗？”

诺思对这个问题似乎迷惑不解，他象一只在篝火照耀下遭到诱扑的小鹿一样大吃一惊，他结结巴巴他说：“噢，不，我不认为那是——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活动的前提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

这个前提是假的，前提在于一个人处于战争状态的理论基础。在战争中，法律被束之高阁，撒谎合法，即使屠杀也符合道德。从1984至1986年，美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均靠一小撮为这种设想的战争所控制的人去贯彻；在凯西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对于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来说，越南战争还在漫延；这种不真实的战争火焰在他们内部燃烧，焚毁了一切法律和章程。战场上的道德占了上风，法律规定被抛在一边。

对于这些当权人物头脑中的战火，联邦调查局的威廉·C·沙利文在不久前作过一次极有表情的解释。60年代和70年代，在J·埃德加·胡佛当权时期及其以后，沙利文都是该局的一、二号人物，副局长，在美国情报委员会这个总统研究情报活动的执行委员会中，他也占有一个席位，他是该国大多数最高级秘密的参与者。

沙利文在一次与国会调查人员的谈话中说：“我在美国情报委员会已经呆了10年，该委员会收到过来自全世界以及美国内部，为该国提供的那些最重要的情报，但在这个期间，我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致同意的这个行动过程符合法定手续吗？是合法的吗？符合伦理或道德规范吗？’我们从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合法性不容置疑，依法行动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沙利文把这种盲目行动归结为“一种战争心理”，一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及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存在的思想状态。他说：“随着冷战到来，我们似乎无法使自己从这种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执行的是同样的方针；冷战继续下来，而后是越南战争。你看，在珀尔·哈伯之后，我们从没有把自己从这种已经灌输给自己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认为，这就是对似乎没有人关心的诸如‘这种行动合法吗？符合法律程序吗？讲道德吗？’等之类问题的说明。正象战场上的一个士兵一样，当他击倒敌人的时候，他不会问自己这样作合法吗？符合法律程序吗？讲道德吗？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士兵所希望做的。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正是希望我们从事的活动，这种活动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思想的一部分，成了

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沙利文所解释的就是秘密行动的信条：“只要

是秘密的，就是合法的，”或者如理查德·尼克松曾经说明的那样：“凡是总统干的，都意味着并非非法。”确实如此。白宫视法律为一种令人讨厌的障碍物，它置法律于不顾；中央情报局长凯西，海军陆战队成员诺思，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都干了要求他们干的工作，都执行了总统的违法政策。没有人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负责，这就是秘密权力永恒的遗嘱。

1989年4月，当诺思站在审判他罪行的法庭上面对证的时候，他和我们记忆中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成员的形象比较起来，似乎更为矮小，更加忧郁，也更为悲切了。诺思想到了美国总统曾经如何称赞他为“美国的英雄”；然而现在，他听到检察官一个曾象他一样是一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的公诉人，斥责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老式美国谎言家。”诺思的辩护理论鸡零狗碎，不仅不可相信，且有失体面。其一是纽伦堡式的辩解：我只是按照总统的命令行事。其二是花言巧语的否定：为了维护总统的秘密，我不得不销毁文件。其三是行政特权说：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法院和国会一文不值。

当一名总统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面前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发誓要注意忠实地执行法律，违背这种义务是一种要遭到弹劾的罪行。里根1986年11月的电视演说——不用武器交换人质，美国与为尼加拉瓜反对派和伊朗人运送武器的活动决无联系——是由于他阅读了诺思及其上司准备的假文件而造成的。诺思犯了伪造文件的罪行；他曾经说，他不得不在谎言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在他

看来，他选择撒谎似乎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违背了美国法律，使轻信于人的总统也违背了他的誓言，触犯了宪法。

撒谎的行政特权是不存在的，即使诺思，似乎也在法庭上承认了这一点。他在作证时耳堵语塞，小心翼翼地选择字眼说：“我的认识已经提高，知道了正确与错误的差别。我知道不讲实话是错误的；我感觉到，我象下棋时的一枚小卒一样被大人物耍弄了……我所处的地位是要提高自己，认识到‘十戒’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自己那样作是错误的，但作梦也没有想到是非法的。”确是如此。但是，宣判诺思的罪行时，却仅仅说他撒了谎，他在阴谋败露之后为挽救自己而销毁了文件以及其他一些丢人显眼的事实，如他从自己的“企业”利润中提取了1万3千美元，为自己郊区的家里修建了安全防护栅栏等等。——宣判波因德克斯特有掩盖罪行罪，而不是*据《旧约·出埃及记》与《申命记》载，“十戒”是铭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宗教戒条，其中包括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和财物，禁止拜偶像等等。——译注参与犯罪。

没有任何人因为伊朗反对派事件阴谋活动的真正罪行而站在法庭上，永远也不会有；白宫、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肯定了这一点。

在执行任何一道法律程序时，政府都竭力回避对诺思、波因德克斯特以及他们的合谋者的主要指控；每前进一步，法院都要进行奋斗，虽然并没有人能断然拒绝他们的努力。对诺思的审判开始前，格哈特·格塞尔说他遇到了“一种荒唐的情况”：白宫、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都宣布，报界过去发表的，因而公众可能已经知道的大量情报和事实，实际上都是在审判诺思的公开法庭上不能泄露的深层次秘密。这位法官说：“当报界正在确切地对情报活动进行公开报导时，法院面对的说法却是，对同样的事实官方决不能承认。”代表里根、布什以及国家情报机构说话的美国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坚持认为，大量的具体事件、人物和地点——其中大多数是已经发表和公开的明显事实——都是极为敏感的秘密，披露出去就会削弱美国的力量。

西伯里：保险柜中？

法利：是的。

西伯里：保险柜中的一个小箱子里？

法利：一个大保险柜中。

西伯里：一个大保险柜中的一个小箱子里？

法利：在一个大保险柜中的一个小箱子里。

西伯里：……先生，安全保管在大保险柜中的这只小箱子，是铁箱子还是木箱子？

法利：铁箱子。

西伯里：这只铁箱子是专门设计和定做来装现金用的吗？

法利：是这样。

西伯里：……那些额外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先生？

法利：噢，来自我那个漂亮的箱子。

西伯里：一种魔术箱？

法利：一只奇妙的箱子。

他竭力维护的秘密包括诸如英国和非洲这样一些国家的名字，里根政府曾经谋求他们帮助进行反对桑地诺份子的战争。这些秘密还包括中央情报局官员在诸如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马那瓜和尼加拉瓜等外国首都的美国大使馆以外进行活动。《华盛顿邮报》或《威奇塔鹰一灯塔报》的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对这些事实都了如指掌。

在记者提出质问时，索恩伯格供认他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包含这些机密的文件，但是，中央情报局和白宫的高级情报官员已向他作出保证，说披露这些文件所包含的事实，将会为国家造成危险。事实上，索恩伯格在其秘密证词中已经承认，公众已经知道的中央情报局那些情报站及其所在地是存在的，然而他说，公开承认这些事实就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就这样，司法部在指控诺思、波因德克斯特和西科德犯罪案的核心部分插了一杠子，它竭力阻止被指派的独立检察官自主开展审理工作，拒绝出示他们在进行辩护时要使用的被告的文件。它还强迫法官否认这些案件的关键内容，以至格塞尔法官不得不撤消对诺思的主要指控：盗取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利润，用以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对波因德克斯特和西科德盗用资金以及搞欺骗活动等类似阴谋的指控，也以同样的理由予以撤消：政府拒绝披露所谓国家机密。

司法部还取消了前中央情报局驻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乔·费尔南德斯的犯罪案，据说，费尔南德斯不顾国会禁令，帮助安排了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武器运送活动，对他的指控是，他就自己以及诺思的活动，向中央情报局和总统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撒谎。在索恩伯格的帮助下，费尔南德斯一案最终也不了了之。这位司法部长，拒绝公开设在3个中美洲首都3个美国大使馆内的中央情报局训练处地址。这一系列事实很难再成为国家机密，对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美国消息灵通的公民来说，这些已不再是新闻。

伊朗反对派事实的独立检察官，前联邦法官，终身共和党人和美国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劳伦斯·沃尔什说：“把那些文件称之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或者是不能承受的危险，似乎很难接受，”政府所封存的不是：‘虚构的秘密。’”沃尔什采取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步骤，他直接警告布什总统，白

宫和中央情报局拒绝把那些想像的秘密公诸于众，对法律的规定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危险”，这些秘密“即使不会使全部，也会使多数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免于人民揭发”，无论他们所犯的罪行如何。在沃尔什主管的案件被撤消之后他对记者说，迷恋于机密，在政府中已经成为“惯例”，秘密已经成为政府崇拜的“偶像”。“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方面正在走向极端，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那些负责国家安全的重要官员的一个独立王国正在发展，他们不受司法程序的约束，因为安全机构不会拿出审判他们所必须的情报。”

已经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依法办事的政府已经漂泊而去；违犯宪法的罪行不可能诉诸公堂，只要它们包含有政府所谓的秘密。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罪行越严重，似乎越难于使被告走上审判台。

据说，审判是为了寻找真理，而秘密却破坏了审判。政府宣称它的机密更加重要，国家安全的金箍咒压倒了法律。在公开法庭上，永远也不会有人在宣誓之后提供与伊朗反对派事件阴谋有关的证词，不会有人负责对这种阴谋进行说明，也不会有人知道全部事实真相。依然如故者，连篇累牍的谎言也。谎言掩盖着一个秘密政府的的活动，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的法律均不可及也。

第九章 公开政府活动

在旧社会，政府是秘密政府，它的机密神圣不可侵犯；国王的继承人决定于上帝，国王掌管着权力，他的命令带有神圣宗教仪式的神秘色彩。没有人敢对国王的权力提出疑义，更不要说窥视他钱包里的东西了；他的话就是法律。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经警告众议院议长说：“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干涉政府事务，或者是国家的重要问题。”詹姆斯王的臣民、哲学家弗朗西丝·培根在1605年写道：“涉及政府的事务都应该视之为……秘密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所有政府都是隐蔽的和看不到的。”

这是美国革命已经予以否定的政府。美国革命的创始人对秘密问题考虑得很多很多，他们的结论是，秘密应受到制约；他们承认外交机密，承认战时以及国会内部会议上的秘密；但是，起草宪法的人们还希望他们的政府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政府，他们要求使政府的活动人所共知。

美国的创始人认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最好方法是让人民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如何花他们的钱的，在他们看来，了解这种情况对于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力，对于人民控制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以及他们作为公民能和其代表处于平等地位上，都是最根本的。所以，他们要求公开法律，公开预算，以保持其政府是一个公开和诚实的政府，是一个对其行动能够负责予以说明的政府。

这些创始人谋求确立的这种社会契约，是周而复始不停运动的一种动力，人民的钱赋予政府机构以动力，政府则通过信息给人民以权力，钱是权力，信息也是权力，这些权力经由宪法机制进行交换。人民通过纳税为政府提供资金，反过来他们得到的是，政府要公开说明他们的钱是如何花掉的。

在辩论美国宪法的语言时，马里兰州的詹姆斯·麦克亨利说：

“当公款存入国库时，交纳这些款项的人民，应该知道这些钱是如何用掉的。”弗占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坚持认为，自由的人民不能“允许国家的财富……在秘密的掩盖下被处理掉。”他的老乡、弗吉尼亚人乔治·马森“不认为可以掩盖公款的支出和收入。”他说，人民“有权知道他们的钱的支出情况。”

这种有权知道的完美思想，是民主权力的源泉；公开的政府情报给了人民以权力，一个秘密政府留给人民的境遇，不会比国王统治下的农奴更好。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曾说：“不给民众以信息，或者是不给民众以得到信息之手段的民众的政府，不过是一出闹剧的或悲剧的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序幕。知识必将永远征服愚昧；

意欲成为他们自己主宰的人民，必须用给予他们力量的知识武装起来。”

一个靠公众理解和通过合法拨款提供资金的开放的政府。不可能进行秘密战争，在国会经过公开辩论并作出公开决定之前，总统不能够花一分钱去供养军队或洗劫敌人。进行战争的权力决定于为军队提供资金的权力；宪法通过把资金和武器锁在不同房间里，把这两种权力分割开来。乔治·马森在国会大会上说过：“永远不能使钱包和剑掌握在同一些人手中，无论这些人是立法机关的，还是行政机构的。”

这条极严格的规定，就是宪法第1条第9项第7节：

除以法律所规定之经费以外，不得从国库中支拨款项。一切公款之收支

帐目及定期报告书应随时公布之。

这句话的精神在于，它撕破了政府秘密的面纱，同时也控制了发动战争的权力；扩大了公众了解政府情况的权利。

这些创始人一向都认为，公开预算可以避免在政治和财政方面出现腐败现象。1811—1844年担任最高法院法官职务的约瑟夫·斯托里，曾在评论宪法的著作中写道：他们把预算公开，看作是“制止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影响的一种最有效和最理想的办法。进行各种限制是非常明智的……由此，所有公共财富和共有资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公平用于从法律上看是属于共同防务和普遍福利事业之类的项目。”

随着民主制度在这种新社会中植根，那些热爱这种制度的人们均对秘密权力提出了警告。杰斐逊民主的维护者约翰·泰勒，在1814年就提出了秘密政府可能造成的愚昧和软弱问题。泰勒写

道：“行政秘密是君主政体的习俗之一……对共和政府肯定有致命影响。如果不公开国家事务，国家的自治怎么可能存在下去？秘密立法的立法机关怎么可能采取明智的或独立的行动？”

冷战使这些理想消声匿迹，它改变了美国政府花钱的方式，改变了它利用权力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该国的军政领导人认为，继续用过去文明的那些温文尔雅的设想去管理美国，已经不再可能，这种新的战争已经使那些旧概念过时，它们属于一种用火药、而不是用钶弹界定国家权力的社会。

曼哈顿计划是使美国国家发生变异的一种染色体。爆炸秘密武器在政府内部产生了一种秘密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很快就开始创造保守秘密的方法，它发放安全通行证，实行保密等级制度，发明了各种代号专用的秘密词语；它秘密制定了各种政策、法律和拨款方案，并利用秘密武器和秘密战争扩大国家权力。秘密本身也成了国家的一种武器。

没有秘密金库就不可能制造秘密武器和进行秘密战争，1949年的中央情报局条例使秘密政府的开支合法化。使隐蔽的战争和各种秘密项目成为可能。当时，掩盖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这种秘密，包括有美国最昂贵的武器和最精明的对外政策。

美国革命的创始者并不曾构想一个以秘密作掩护，去消耗国家财富，去计划国家最重要战略的政府。在战后的美国社会中，权力的设计者在秘密的掩护下提出了国家安全状态问题；由于花钱不经审查，一个只对其自身负责的政府因此而发展起来。

就二战后的一代来看，没有人就秘密支出是不是符合宪法提出异议，很少有人知道秘密制度的存在，很少有人知道宪法禁止这种制度，亦很少有人具备反对这种秘密权力所需要的知识和勇气。然而1967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个小镇上的保险索赔审查员威廉·理查森，决定就这个问题诉诸法庭。

理查森知道，且相信共产主义的威胁，亦非常了解秘密情报的价值。

理查森说话带有他家乡田纳西州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口音，鼻音听起来象班卓琴；他个子高大，骨瘦如柴，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而有点弓背。理查森是个爱国者，但没有虚伪的虔诚气。他热爱自己的故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联络和情报官；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服务于一个非军方情报机构。他尊重正当地使用秘密，以致在40年以后，他仍然不愿意谈及自己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活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普通公民”，和多数美国人并无区别，只

有一个方面例外，他于前述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在田纳西大学拿到了法学学位，在那些年内，他真正理解了宪法，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拥宪论者”。

法律的实施过程和理查森的想法难于一致起来，所以，他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安家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格林斯堡，这是距匹茨堡 30 英里以外的阿勒格尼山脚下的一个城镇。

1967 年 2 月，他拿起早报看到一篇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报导，说该局正在秘密资助美国国内的一些组织——学生联合会、工会组织以及出版公司之类。

几年后他回忆说：“我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没有任何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内部活动概念。我当然不想在这个国家搞共产主义，情报机构从事情报活动，收集外国情报，当然没有任何不对，在美国以外秘密从事这种活动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它与美国的本质似乎是抵触的，但却是必要的。但是我想，如果一个美国纳税人相信宪法，他不会同意用他的钱在自己国内进行一场政治战。

理查森详细地叙述说：“这种情况促使我又回头去研究宪法。中央情报局条例说，该局局长勿需就他支出的款项进行说明；而宪法则说，一切公款收支帐目及定期报告应随时公布之。好！到此我突然醒悟了，在这个国家内部，必然会有许多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的这类组织……”理查森思前想后，认定中央情报局条例关于秘密开支的条款是违犯宪法的，他决定自己独自向这种制度提出挑战。

理查森说：“尽管我们需要情报，但我们不应该动摇宪法的基础。人民至高无上，如果他们不知道政府在干什么，他们就不可能尽最大努力发挥其作用。”

1967 年 5 月 12 日，理查森给美国政府印刷局写去一封信，要求得到一份“政府根据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第 7 节公布的”中央情报局的预算方案。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公款；政府印刷局公布由财政部提供的联邦预算；宪法关于公布帐目的要求一清二楚。3 个月以后他接到了回复，此信来自财政部一位主管报告和财会工作的副署长 H·A·特纳，他很有礼貌，对迟复表示歉意；然而没有答复理查森的要求。特纳在信中封入了几份联邦预算；理查森所寻找的消息却未能发现。

理查森又试了一次，他给特纳写了封信，引用了中央情报局条例，询问该局未予说明的支出，是否对财政部所公布的预算的“可靠性产生影响。”这次回信就不那么客气了：“关于你信中提到的那个局，我们没有其他消息可以奉告。”

1967 年 9 月 25 日，理查森又给财政部的特纳写了回信，这封信是一次直接挑战：

亲爱的先生：

……你关于中央情报局没有其他消息可以提供的声明，与宪法明文规定的（财政部）的任务是不一致的。宪法清楚地……要求，财政部应能使公众自由得到一切公款的收支帐目及其确切说明……财政部是提供这种文件的唯一机构；无论财政部、预算局和国会或者是政府其他机构，都不允许公布导向错误的说明和帐目。如果财政部签发的文件，意在公布一项与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第 7 节相吻合的说明，它必须包括支出公款的所有政府机构。我无法设想，阻止公众审查政府机构公款开支情况的规定符合宪法。这封信敬请财

政部取消它目前的出版物，直到司法部作出裁决，看一看根据宪法第 1 条第 9 项第 7 节，究竟应该公布什么内容……恭候迅速回信，提出您意欲何如。愿您就有关法律方面予以仔细考虑。如果政府采取与我相反的立场，我希望知道其基本原因何在。

谨启威廉·理查森一个月以后，理查森收到了财政部财会署署长 S·S·索科尔的回信。索科尔长篇累牍地说理查森获得成功的希望渺茫：他无权怀疑保密体制，他无权对符合宪法的合法意见提出疑义；他无权得到理查森所寻求的对政府帐目的全面说明；他无权要求财政部改变其公布文件的实际工作，以适应理查森所理解的宪法。

理查森坐在打字机前撰写他的复函。信写完后，他就去了匹兹堡联邦法院，向法院职员呈文备案。

《威廉·B·理查森对美利坚合众国》一案，是一场极为复杂的针对政府机密的法律论战。理查森向法院自我介绍说，他“是本选区选民，一名忠实的美国公民和纳税人”，他提出诉讼的基础是“美国宪法的权力。”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条例与“宪法是抵触的”，因为它使宪法所要求的“公布一切公款收支及其定期报告的文件变成了一纸谎言。”他说，删除中央情报局的开支，使联邦预算成了“一个欺骗性文件……成了一个歪曲事实的文件，与政府的责任不相一致。”

理查森恰如其分地引用了所有要求公开拨款和禁止政府文件弄虚作假的联邦法律，他请求法院坚持法律，请求法院指令财政部人员“要象美国宪法所规定的那样……执行他们的义务。”他不想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只有有一份符合宪法要求的真实的帐目。

《匹兹堡新闻邮报》就理查森诉讼案发表了文章，一个普通公民要和中央情报局较量，这是一个很能刺激记者兴趣的事件，也是一个很可能使小城镇和小心眼受到震动的事件。理查森说：“不少人都认为我可能是个阴谋破坏分子，我在工作上很快就被另眼看待了……老龄保险公司于 1969 年解雇了我。我猜想与这个案子有关。”他失业后，一年之内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在他家乡新设立的公共辩护人办公室找到了一个进行司法调查的职业。

在法院的每一轮审判中，理查森都遭到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一个美国律师，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年轻检察官，现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理查·索恩伯格的反对，索恩伯格及其助手告诉匹兹堡的联邦法官约瑟夫·P·威尔逊说，理查森无权就他表示不满的方面控告政府。

威尔逊法官同意这种看法，他把这个案子推出了法院之外。这位法官说，理查森没有资格指控政府；资格意味着，按照法律规定，他没有权利把这样的讼案提交法院。也就是说，理查森作为一个公民，他控告政府的权利便成了问题。法律认为，从该案的结果看，该案必须与理查森个人利害攸关；他必须根据宪法提出某种明确的疑问。1970 年 6 月 16 日，在经过 3 年的法律争论和拖延之后，威尔逊法官说，理查森不符合这一方面的标准。

更高一级的法院认为，理查森符合这种标准。

理查森找到费城的美国上诉法院听取他的意见。该院法官在大萧条时代建起的一个法院内开庭审理此案；这个法院距离 18 世纪修建的那座红砖大楼，那座签署美国宪法的大楼，美国第一个最高法院审案的大楼，也是自由钟鸣响的大楼，只有 4 个街区。

联邦上诉法院是比美国最高法院低一级的法院，在有关法律程序或是对

宪法的解释问题上，它们有权推翻审判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通常由 3 个法官组成的特别小组审理案件。1971 年 6 月 25 日，该法院第一次听取了有关《理查森对美国》一案的论证；理查森已经写好一份 33 页的诉讼摘要，一个认真准备的文件，其中有一段充满了热情：

现摆在法院面前的这份讼案，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直接违背宪法规定，支出如此大笔款项而又不按传统程序予以公布的先例。——由雇佣军进行战争，由美国财政部付款，还不对这些款项作任何说明。各种社团机构秘密组建起来了，它们是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或是战争物资的提供者；他们的资产来自纳税人……各种秘密实体每年消耗掉几十亿美元，这些钱均通过财政部混淆视听和蔑视宪法的报告制度扩散出去。

本讼案提出的问题，还没有任何联邦法院对其中任何一个，曾经提出过较为全面的完整答复。

鉴于理查森不是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承认的律师，而且因为他的讼案提出了复杂的宪法问题，该法院决定委派一名有名的法学教授拉尔夫·斯普里特作为该案的法律顾问，或称“法庭朋友”，以理查森的名义就该案写一个摘要。斯普里特教授对理查森的论据又进行了加工：

概括起来看，问题在于公众究竟有没有权利知道中央情报局到底得到和支出了多少钱，因为宪法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

美国革命的创始人所寻求的，就是为了确保公众有权知道这一点……之所以进行这场革命，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公众对不进行任何公开说明就收税和花钱的一个遥远的国王表示不满……

如果把中央情报局的支出作为福利支出，或者是作为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公布出来，那几乎称不上是一种有意义的说明，正象一个纳税人填写其申报单时，在收入项内填上资本收益，而把个人消遣费用则作为对慈善事业的捐助填在支出项内一样，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政府的论点简单扼要：理查森没有资格就要求公布中央情报局的预算提出诉讼，他是在法庭上制造政治争论。国会明智地选择了对预算情报予以保密的方案，即使对大多数国会议员本身也是如此。无论法律还是国会，都没有给理查森对中央情报局秘密预算提出疑义的权利；美国不欠他任何东西。

在听取了这些论点之后，法院决定由整个法庭出面评估这个案件，也就是说，由被任命于该上诉法院的全部 9 名法官，开会共同考虑这个案子，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讨论会，一般只适用于研究重要问题和法律上新提出的问题。

1972 年 7 月 20 日，该法院作出了支持理查森的裁决，它在 6 票对 3 票的决定中说，理查森作为一个纳税人，有权就宪法禁止流失的拨款提出疑义。

巡回法官马克斯·罗森写出的法庭意见是：

与人们通常听到的政府谋求纳税者说明帐目的上诉案件相反，本案是一名纳税人谋求政府说明其帐目……

（理查森认为，）定期公布公款的收支情况，是政府对纳税者必须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该义务显而易见的目的，就在于为选区提供在民主社会中与公共责任有关的重要信息……

政府则认为，它没有什么特殊义务，因为，国会批准的中央情报局条例已经免去了财政部长的义务：公布与中央情报局得到和支出资金有关的情况

说明。

法院否定了政府对法律的理解；政府并不能决定中央情报局条例是不是符合宪法；不过法院说，理查森对该条例合法性提出的疑义，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法律本身，就可能是违犯宪法的，政府不能把它的辩护词置于一个尚无定论的法律基础上。

政府也不能够说，财政部长没有向理查森说明中央情报局支出情况的义务。美国革命的创始人希望公布收支报告书，并且希望这种报告书“广泛流传……以教育公众，为公众谋利益。”有关的法律也说，这种报告是为了“为总统、国会以及公众提供信息。”该法院认为，理查森“明确提出了财政部长应对他承担的义务。”

接着，该法院又谈到资格这一困难问题，这是一个多年来使联邦法官困惑的问题；法律在这个方面还不十分清楚。理查森资格是以两个问题为基础的：他作为一个公民和纳税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吗？他提出的疑义涉及宪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吗？

该法院说，理查森作为纳税人有向违犯宪法的支出提出疑义的合法权利，其根据在于：

除非纳税人知道这些钱是如何支出的，否则，他为何不能提出疑义呢？……一个有责任心和有觉悟的纳税人，当然想了解他的税金究竟是如何使用的，不了解这种情况，他既不可能自觉遵从国会或最高行政当局的行为，亦不可能恰当地完成他作为选区成员的义务。

宪法的创始人认为，如果一个选区要对其代表实施控制权，要真正满足共和政体内部公民们新的责任心的要求，公布财政信息是最基本的一条；选民有权要求公布……政府收支情况。不管这种义务的最后范围和程度如何，一旦取消就会给纳税人造成很多不利影响。

理查森已经通过了考察的第一部分；关键在于他有权了解情况，这是得到宪法保护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该案究竟是应由法院决定的法律问题还是一个应留给政治家们决定的政治问题？

该法院认为，“更清楚地搬用创始人的意图……要求向公众进行说明是困难的。”理查森并没有就政府提出一个总的讼案，他并没有毁掉中央情报局的企图，也不想了解中央情报局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他仅仅力求得到一份说明税金收支情况的帐目报告书。”府法院说，如果理查森“作为一个公民、选民和纳税人，无权坚持美国宪法的训示要求联邦政府提出所有公款支出情况的说明书，那么，要坚持这种训示就是困难的，尽管宪法的创始者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正确地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该法院还指出，理查森的讼案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政府却企图要我们得出结论说，已提出的这个问题明显没有法律依据。”政府错了。理查森抨击的“所谓法律，与宪法的明确规定是抵触的。”宪法的条文显然对理查森有利；“在最高法院以往的决定中，也没有任何排斥作这种解释的内容。”该上诉法院裁定，理查森的讼案有其法律和宪法的基础。

该法院的裁决作出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刻。中央情报局正在美国公民中搞间谍活动：私拆他们的邮件、窃听他们的电话；阴谋推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智利政府，中央情报局正在成为只对总统一个人负责的帝国势力的工具。4周前，尼克松总统秘密下令中央情报局阻止水门盗窃案的调查，这是阻止司法部门的工作，是要遭到弹劾的一条罪状。美国政府的秘密和欺骗活动已经

达到顶点。

从威廉·理查森第一次走进匹茨堡联邦法院以来，6年过去了。他现在正站立于华盛顿大街的人行道上，看着那些使美国司法机构的圣堂大为增色的古希腊科林斯式圆柱和古希腊塑像，身后就是国会山的圆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穿过大街，登上最高法院的大理石台阶，迈步走了进去。他有点害怕，但很兴奋：“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但是，我发现了法律上的不一致之处，应该引起注意。我时刻记得感谢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应该失去的政府。”

理查森的所作所为，总而言之还是为了回到民主政府的初始阶段。最高法院的建筑风格不仅会使人回忆起古希腊的建筑设计之美，而且会唤起人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这个法院对公众是开放的，因为民主传统尊重公开性，否定秘密。两千四百年前，当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雅典城邦，在与斯巴达进行长期战争的第一年被围困时，伟大的雅典将军佩里克里斯，曾站出来向一年一度聚集在城邦战死者纪念碑前的公民发表演讲，他提醒说，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是那种“使我们变得伟大的我们的政体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政体称之为民主政体，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和开放的……在对待军事安全的态度上，我们与敌人有巨大差异。我们的城邦向世界开放，我们并不采取定期流放措施，去对付那些了解或发现可能在军事上有利于敌人的各种秘密的人们，这是因为我们不靠秘密武器，而靠我们真正的勇气和忠诚。”

勇气，对宪法的忠诚以及秘密不民主的基本感觉，使威廉·理查森走进了最高法院。他的案件现在已被定名为《美国对理查森》，因为上诉是由政府提出的；该案于1973年10月10日摆在了最高法院面前，是时，水门事件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华盛顿。在法庭上代表美国的是它的首席律师、副总检察长、一个尖嘴利舌的代理人罗伯特·博克。理查森清楚地记得博克：“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物，一个又圆又胖的家伙，留着一撮小红胡子，衣冠楚楚，”出庭时还穿着一件正规晨礼服，就象副检察长通常的穿着那样。

10天以后，博克带着尼克松总统的命令，发动周末之夜大屠杀，在美国司法部长和助理部长坚持原则，提出辞职以后，尼克松又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德·考克斯的职务。14年以后，美国参议院拒绝确认博克为最高法院法官，理由是发现他对宪法的理解狭隘地令人难以容忍。

现在代表理查森的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律师奥斯蒙德·弗伦克尔，他在法庭上非常委婉地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理查森思考过很长时间的那些思想和论点；理查森觉得有一股寒气从首席法官沃伦·伯格那里袭来，这位首席法官似乎并没有接受公民自由协会律师的看法，弗伦克尔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法庭。理查森说：“他事后有一种感觉，事情并没有向我们设想的方向发展；如果败诉，我们可就要遭殃了。”

在理查森的案于提交最高法院的6年时间内，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认为，它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较之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更为重要；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种概念。

政府在战时的权力能够压倒法律和宪法的权力吗？1967年，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在处理一桩坚持具有左翼观点的工人有权在国防工厂得到一个工作的案件时，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

不能把进行“战争的权力”当作为护身符，以便支持政府实施权力的措

施……不能把“国家防务”视之为目的本身，从而证明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任一符合法律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国家防务”一词暗含的一种概念，就是维护那些把国家与防务区分开来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国家安全能够把宪法设想的公开政府封闭起来吗？它能够废除人民了解政府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权利吗？雨果·布莱克法官在1971年处理一桩涉及准予报刊公布五角大楼文件、政府的越南战争秘史时，针对美国的情况也作了否定的回答：

“安全”一词包含有某种广泛的和含糊不清的普遍性原则，不能用这种概念抵销基本法律（宪法和民法）的规定。以信息广泛的代议制为代价去维护军事和外交秘密，政府就不可能为我们的共和政体提供任何真正的安全。

公众真的有权了解核武器和保密战略这样一类秘密领域的情况吗？斯图尔特法官在处理涉及五角大楼上述文件一案时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有检查和评估政府活动的措施；在没有这些措施的国家防务和国际事务领域，对政府政策和权力的唯一有效制约因素就是开明的平民，就是见多识广、且非常尖锐的舆论，只有它们可以维护民主政府的价值观念。

在美国政治思想界，这些声音是主流。有一种，只有一种权力能够压倒政府所鼓吹的国家安全，这就是公民自由说、自由写和自由思考的基本权利；所有这些自由都产生于了解情况的权利。在这些以及在理查森的案件中，关键都在于以国家安全为盾，斩断民众的不同意见，以国家安全为盾，保护政府的权力。这些法官都选择了维护在他们看来是比军事秘密和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理想。

民主是人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一场混战，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为了每一次著名的胜利，总会有很多人在精神上遭受创伤，因为他们要为自己所信仰的和失去的进行斗争，他们要遭受失去理想的痛苦，他们会感到，在自己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不声不响地熄灭了。

威廉·理查森终于败诉。1974年6月25日，最高法院裁决任何公民都无权知道政府的秘密开支，或是对这种开支提出疑问；投票结果是5比4。

首席法官伯格代表微弱的多数讲话。这位法官写的结论是：理查森没有资格控告政府；他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威胁；帐目不能对他公开。

伯格还写道：“可以说，如果不允许理查森就这个问题提出诉讼的话，确切的说，也不会允许任何人这样作。”事实正是这样。在这类案件中，法院的门对公民是关闭的；理查森所寻求的消息只能下发到国会，而不是法院为止。

这位首席法官说：“这种问题要提交国会监督，最终经由政治程序进行处理。任何其他结论可能都会有一种意思，说美国宪法的奠基人的目的，在于建立某种具有雅典民主政体或新英格兰城邦性质的制度，以满足监督民族政府行动的需要……”

法院不会听取大街上每一个对法律表示不满者的意见。如果理查森不喜欢这种法律，他尽可投票选举不同的法律制定人，他以及任何其他抱类似思想的那些“有不满情绪的公民，都尽可去说服足够数目的选民，说服那些选举了不履行其义务的代表的选民。”这位首席法官说着把手一挥，就打发了理查森；理查森没有了解情况的权利，法院也无意坚持这种权利。理查森要

了解内情的权利，只有通过“缓慢的、拖拖拉拉的和反应迟钝的”选举过程进一步强化。——

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在

他提出的激烈反对意见中写道：

“人们只要读一读法律史就可以知道，（伯格）的声明将会使宪法的奠基人多么震惊。”

道格拉斯说：“秘密正是宪法第1条第9项第7节所对准的弊端；奠基人把这一条写进宪法，就是为了让公众知道公款支出的方式……政府秘密现在又具有了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道格拉斯继续说道：

国会当然有权酌情定夺，然而这就是说，当它发现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其行动令人震惊的机构时，它有权把宪法的这一条大声读出来……

（这个）决定……把政府的大量活动划归秘密的范围，阻止公众了解有哪些秘密计划涉及到这个或是其他有关国家……历史表明，政府的祸根并不总是腐化堕落，秘密也是一种最诱人的掩体，可以避免政权受到批评……

美国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官僚机构，公布公款的支出帐目涉及这种最高权力的核心问题；如果纳税者不能就这种最起码的问题提出质疑，他们的最高权力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象征，就会使秘密官僚机构主宰我们的事务。——

通过一次投票，最高法院就取消了一个公民得到有关信息的权利，一种宪法明文规定要保护的权力。政府的帐簿被锁了起来；事实证明，秘密的权力比宪法本身的权力更大。

在美国主流派思想中，道格拉斯的不同意见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倾向；黑预算的建立以及法院在审查黑预算建立的合法性时遭到的失败，扭曲和抑制了这种倾向的发展。理查森的控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国会通过的某种条例能够压倒宪法有关公开预算的要求吗？有可能强制政府与这种要求保持一致吗？秘密开支违犯宪法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吗？最高法院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仅仅说，公民无权揭露黑预算；秘密开支是不是符合宪法的问题并未于说明，法院迄今也没有对此作出答复。到目前为止，公民还是不能提出这类问题。国会将进一步表明，它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果是严重的。

在紧接着最高法院拒绝威廉·理查森讼案以后的几个月内，秘密对美国政府的合法性造成的危机达到顶点，象暴风雨一样暴发了。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的4周内，利用秘密作剑和盾对付自己人民的总统下台了，到年底，美国人开始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变成美国国内的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同时也象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的那样，变成了渗透于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凶手”。西贡陷落之后，由一次小规模秘密行动开始，慢慢扩大为无法控制的一场长达13年之久的战争才告结束，改革中央情报局和限制秘密力量的一次长期斗争开始了。

但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上台时为止，也就是最高法院裁决理查森之后还不到7年时间，这种改革精神就又消失了。中央情报局的预算翻了一番，它的特工人员开始采取50多个重大秘密行动，对付实际的和设想的敌人；秘密行动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国会取消对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进行战争的拨款时，由穿便衣的海军陆战队员所操纵的一支私人部队，却能在与国外敌人的武器交易中得到资金。美国革命的奠基人希望为灵活外交保留

下来的秘密，已经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掩盖起来，达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这些政策已不可能经受光天化日的考验。

五角大楼开始把最昂贵的武器用黑预算隐瞒起来，掩盖日益证明的公开争论的基础，秘密武器生产线全速运转，制造隐形轰炸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卫星、新式巡航导弹以及大量用于进行核战争的武器；每年都有大约成百亿黑美元秘密用于这种武器；其代价已经不可能仅仅用钞票计算。

然而，这些武器基本上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使用这类武器，就可能毁灭世界。公众了解这种武器，就这些武器进行公开辩论，是绝对无法阻止的。五角大楼把这种项目打上秘密的标记，象吸血鬼一样从公民那里攫取权力。

似乎我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一样——从遵从法律，尊重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任何意义上看，我们都不处于战争状态——政府用大量与国家有关的理由去证明秘密和欺骗活动合理合法。在反对希特勒和裕仁的战争中，军事秘密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为了避免敌人得到国家的秘密，必须使公民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今天，在敌人日益消声匿迹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我们对自己政府的活动提出疑义，仍然把我们置于愚昧状态之中。

只要是在秘密掩盖下的政府活动，可能都是在不受任何法律、规章以及宪法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由这些活动产生的计划和政策，即使从事秘密活动的那些冷酷无情的骗子也大为震惊。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局长克莱尔·乔治在1987年作证时说，凡是秘密所支配的人都是某种偏执狂，“如果你终究有一天知道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制定的各种有关计划，一定会把你吓得离开此地。”这位间谍大王说：“你不可能停止他们制定计划，只有停止他们采取行动。”但事实证明，要他们停止行动亦很困难。至于那些在秘密面纱掩盖下进行的活动，用克莱尔的话说，“是一种在法律之外进行的交易……是一种很难用法律术语说明的交易，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法律体系的范围内活动的。”

一种存在于法律之外的制度产生了各种无法无天的现象，正如参议员丹尼尔·井上所说，它可以形成“一个秘密政府……不受任何检查和评估，摆脱了法律本身的约束。”

这种黑预算是对宪法应允的那种开放政府的挑战；今天，五角大楼用于制造新式武器的预算的将近1/4，都在这种黑预算的掩盖之下。这并不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所想象的秘密；黑预算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他们的设想，秘密支出的每一个美元，都是对这些奠基人的看法——要使政府帐目成为公开文件——的公然违抗。在欺骗性伪装掩盖下的武器和政策，无论是公开记录上存在的或者是完全从公开帐目上被一笔勾销的，都是对宪法上崇高的诚实和义务标准的嘲弄；我们的民主制度由于支付秘密资金而抛弃了它的传统。

政治争论以秘密为名而受到抑制，在由此产生的沉默中，五角大楼制造了极为昂贵但价值却令人怀疑的武器；白宫实行的政策也使美国蒙受耻辱。国会放弃了它所掌握的为人民承担义务的权力：管理钱包的权力；杰斐逊曾经写道：“人民的钱包是真正敏感的地方。”不明智的、非法的和违背宪法的行动，都是黑预算的必然结果，因为秘密开支是以一种尚未定论的法律为基础的；秘密金库不过是建立在沼泽地之中。

秘密掩盖了寻求一颗使我们处于看不见的战争之中的神秘子弹的费用，秘密也窒息了对这种寻求活动的批评。原子弹从其构想

伊始就被分类为秘密；随着它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它把一束不

断延长的阴影投射在政治的蓝图上，逐步使国家的弹头工厂、计算机、科学家和军人，发展成为一个在最高国家安全秘密领域掩盖下的综合体。在制造原子弹的玉国中，政治问题来源于军事思想，政治思想来源于军事技术，军事秘密控制政治权力。秘密甚至可以阻止总统了解和控制国家核力量的规模和性质，秘密力量在毫无控制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不断扩大：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两颗原子弹变成了 2 万 5 千颗；还有将近 2 万 5 千颗仍然在制造中。我们已经用自己制造的弹头堆起了一个埃菲尔土峰，但却没有找到一条从这个弹头高峰上走下来的道路。

在冷战的深渊中，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曾于 1962 年要求为各种秘密武器无限制地拨款，他说：“我们完全应该支付几十亿美元”用于核武器，“同样地，在一个有特殊和连续不断危险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付一场看不见之战争的一切方面。”

危险时代正在结束，黑预算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世界正在消失，紧急状态已不复存在；由于对敌人恐惧而使国家安全掩盖下的一切活动都合法化的时代，也已成为过去。

将近 50 年来，国家安全的定义都是用核武器和秘密行动表达的，目前，世界正在沿着使这种定义不击自溃的道路前进。我们靠举债资助秘密武器：我们更强大了吗？我们已选择的这些武器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需要：我们更安全了吗？我们进行了大量秘密战争：

我们的生命更有保障了吗？

安全意味着摆脱危险和恐惧。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苏联人的核攻击，而是生态破坏，经济扭曲以及贫困的蹂躏。苏联人已经选择了缩小军事规模的道路，因为他们的人民缺乏象样的食品 and 体面的住房，他们由于缺少卡车和燃料而使 1/3 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他们的国家安全已经不可能再用武器衡量；我们也是如此。

即使我们的总统，也曾经对仅仅根据军事力量定义国家安全的观点表示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说：“为这个充满武器的世界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它还在消耗劳动者的血汗，浪费科学家的精力，葬送孩子们的前途。”肯尼迪总统说，超级大国“投入制造各种武器的大量资金，完全可以用于和愚昧、贫穷以及疾病进行斗争……我们都生在同一个很小的星球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对孩子们的前途充满希望；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把自己的血汗、精力和财富用于武器和战争：但是，我们不能秘密这样干，同时继续声称我们具有一种开放的民主政体的特性。从制造原子弹到生产隐形轰炸机；从为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战争提供秘密拨款，到支持伊朗反对派秘密阴谋活动的破产；秘密的代价已经很高，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太高了。正如道格拉斯法官所说，秘密金库为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一个其总量有 11 位的数字，每年大约合 340 亿美元。然而，当我们不允许就这个问题对政府提出质询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了解情况的权利；我们失去了了解情况的权利，也就失去了政治权力。

现年已 71 岁高龄，正期待自己末日来临的老人威廉·理查森说：“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保密是自然的；不过，对于一支军队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对于一个民主政体就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最适用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秘密，可能是处于平时时期的人民的敌人。

后 记

90年代五角大楼的第一个预算方案，很象是缓慢发展着的人造偏振片，透过它，过去那些看不见的奇形怪状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隐形轰炸机、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以及其他少数秘密武器的费用，第一次被披露出来了。五角大楼打算在1991年用41亿美元购买两架隐形轰炸机，用9亿6千5百万美元于建造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

随着这些秘密构思和设想的武器逐步公开，从山洞里爬出来的这些怪物以及它们的本性和来龙去脉，也已揭示出来。它们是在冷战中产生的最新一批庞大野兽；这些核恐龙的含义不应该忽略，它们存在的原因在于，五角大楼用国家安全掩盖了它们的出生和成长。

国会应该制止五角大楼隐瞒我们不得不为其军备支付的费用，武器的购买不应该象秘密行动计划那样秘密进行。在隐形轰炸机的费用最终公布之后，会有人认为美国已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了吗？把隐形轰炸机公诸于众，更可以发现它作为轰炸机毫无用武之地；既然没有用场，就不应该为其拨款。

正象五角大楼有两本帐，一本公开，一本秘密一样，它为核战争也制定了两套政策。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秘密的。秘密政策是真实的政策，它建立了一个其权力公然蔑视理性的武器库；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研制，则是为了在长达很多月的核战争中与这种武器库配套使用。这是一种荒谬的追求。

我们应该停止为实现核战争胜利的幻想而制造秘密武器，作为重新考虑90年代国家需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这些武器以及围绕着它们的那些秘密的费用，对我们的幸福是一种威胁。仍然在黑预算掩盖之下的核战争技术，应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旦它们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其中某一些也许可能被抛弃，从而使这个发展进程转化为人类的需要。在本书创作之时，国会正在为削减或砍掉隐形轰炸机和军事战略和战术传递系统的费用而奋斗，围绕这类问题进行的实际争论的发展，与包裹在它们周围的那些黑色裹尸布的脱落是相辅相成的。

当公众认为苏联对美国是一种巨大威胁时，要求对政府及其秘密机构进行说明的呼声比较小，随着这种威胁的消失，这种要求必然会发展。作为实现宪法所要求的公开性和责任心的一个步骤，在政府预算中不应该再有秘密开支，不应该再有空白帐页和密码代号；黑预算活动是冷战的残迹，现在应该停止。

凡是研究过这些问题的每一个总统的国会专门小组，都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国家情报机构的预算可以公布，而不会损害国家安全；美国秘密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以及其他情报机构——的总开支，在90年代初将增加到每年大约300亿美元。揭露这个事实无助于我们的敌人，也不会伤害我们自己。

在一个残酷复杂的世界上，中央情报局通过尽力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含义，为国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服务，它在收集、分析和传送情报方面的独到见解，应该加强和维护；但是，它作为总统秘密部队的作用必须制止。鉴于过去40年的经验有力地表明，秘密行动一直是总统滥用权力的工具。所以，这种行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国会一致通过才能采用，而且要定期检查，确认这种行

动是按照其控制者所设想的方式进行的。阿富汗秘密行动造成的混乱和堕落表明，即使在最合适的条件下，秘密行动也不一定是达到民主目标的最好手段；自由只能在独立自主的人民提出这种要求时才会出现，没有通过枪杆子强加于人的自由。

美国的目的是同样也不能采用非民主的手段去实现。白宫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奋斗，企图实现其白宫有权制定秘密外交政策和采取秘密战争行动的理想。在进行这种奋斗的同时，它使用黑资金资助这类秘密行动计划。它的律师们以国家安全为法宝，阻挠对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官员的刑事审判；它的军事领导人回避解释自己行动的义务；它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合伙违法乱纪。

洛德·阿克顿曾经说过：“任何秘密都会造成蜕化变质，甚至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然而，国家有可能既保守秘密，又坚持民主体制，只要权力的行使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只要依法办事，外交活动、追逐高技术、收集情报以及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可以秘密进行。但是，把五角大楼的资金平衡表格变成秘密故事之类的阴谋诡计应该停止。40年前糊里糊涂通过的一个糊里糊涂的法律，给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以支出公款而无需说明的权力，使秘密武器得以开始制造，秘密战争得以开始进行，这种权力慢慢地、不声不响地发展起来，不受任何制约。为制造毫无用处的武器，为支持一系列变节者的对外政策，已经有几十亿美元的秘密费用被浪费；人民对其民主制度的冷嘲热讽正愈益严重。

詹姆斯·麦迪逊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指出：“我相信，无声无息地逐步剥夺当权人民自由权利的例子，比用暴力突然夺去这种权利的例子更多。”我们若想使自由不被剥夺，政府的公共帐目就必须予以公开。

1990年5月1日

